新城市危机

The New Urban Crisis

How Our Cities Are Increasing Inequality,
Deepening Segregation,
And Failing the Middle Clas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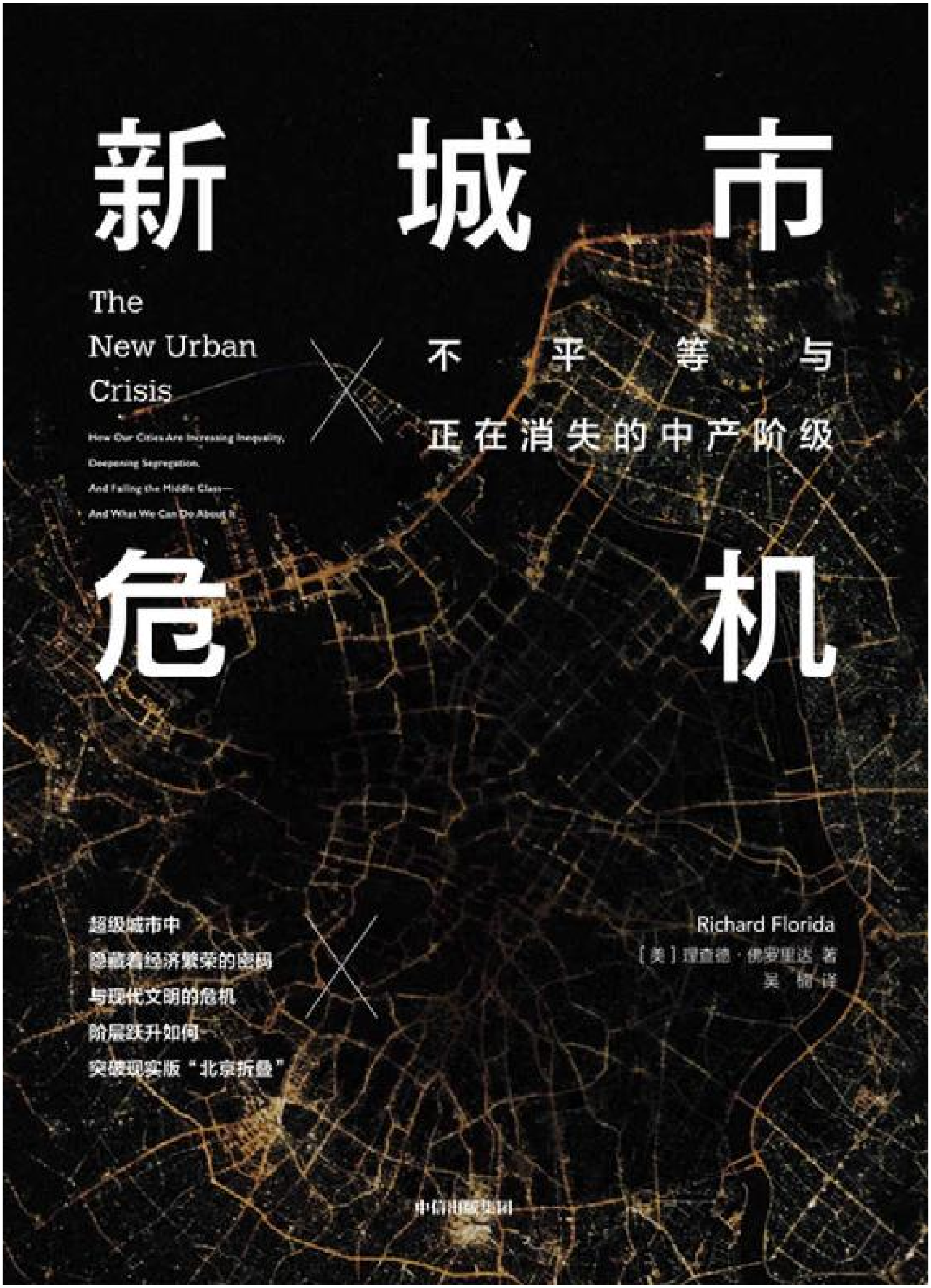
超级城市中
隐藏着经济繁荣的密码
与现代文明的危机
阶层跃升如何
突破现实版“北京折叠”

Richard Florida
［美］理查德·佛罗里达 著
吴楠 译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新城市危机
The New Urban Crisis
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
How Our Cities Are Increasing Inequality,
Deepening Segregation,
And Failing the Middle Clas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超级城市中
隐藏着经济繁荣的密码
与现代文明的危机
阶层跃升如何
突破现实版“北京折叠”
Richard Florida
[美]理查德·佛罗里达 著
吴楠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

[美]理查德·佛罗里达 著
吴楠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献给

前言

第一章 城市矛盾

第二章 赢者通吃城市化

第三章 精英城市

第四章 绅士化和它引起的不满

第五章 城市的不平等

第六章 大分层加剧

第七章 拼布城市

第八章 郊区危机

第九章 全球城市化危机

第十章 惠及全民的城市化

附录

致谢

版权页

献给

献给米拉

前言

1957年我出生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当时纽瓦克还很繁华，有标志性的百货商场、早报晚报、图书馆、博物馆、热闹的市中心和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我的父母都在市区的意大利人聚集区出生长大，直到我出生的时候他们还住在那里的支溪公园附近。我父亲七年级时辍学去工厂上班，他的工友有意大利人、波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参加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几场重大战役，除了服兵役的这段时间外，他一生都在这个工厂上班，从普通工人做到工头，后来又当了工厂经理。

我的父母和其他千百万的美国人一样，在我开始蹒跚学步时决定搬家到郊区离纽瓦克15分钟车程的北阿灵顿小镇。他们经常提醒我，搬到这里主要是因为有好学校——一所教会学校，和平女王高中。他们坚信我和弟弟上了这所学校就能考上大学，从此前途一片光明。我姨妈朗妮一家当时已经住在那个小镇了，我姨夫沃尔特在纽瓦克工程学院获得了化学工程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成了高露洁-棕榄公司的高级总裁。尽管我们一家属于蓝领家庭，而姨妈一家属于富裕家庭，但是我们能在同一个社区毗邻而居，可以说都属于同一个美国梦。我们搬离纽瓦克后，还能在周末回到原来的街区看望祖母和其他亲戚，一起享受美好的意大利晚餐。

1967年7月，9岁的我目睹了一次城市暴乱。当父亲开车带我们进城时，空气中充满烟雾，浑浊不堪：纽瓦克陷入了一场臭名昭著的暴乱。警察、国家警卫和军事装备排在街道两旁，后来一个警察把我们拦下，警告我们有“狙击手”。我父亲一边紧张地给车子掉头，一边指导我们趴下以确保安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纽瓦克有几十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黑人，还有超过750人受伤，1000多人进了监狱，财产损失多达数百万。这场灾难性的暴乱蔓延到其他数个城市，包括附近的

新泽西州的新布朗斯维克、普兰菲尔德，“铁锈地带”[01]上的底特律和辛辛那提，以及南方的亚特兰大。这段历史后来被称为“1967年漫长炎热的夏天”。在多数暴乱事件中，导火索都是警察对黑人的暴力执法，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工作机会、经济活力以及以白人为主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离开了城市，而在“大迁徙”中从南方搬来的黑人涌入城市，挤在市区的贫民窟里。[1]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但见证了后来被称为“城市危机”的问题的演变。以前我一直认为，在整个现代历史中，城市是工业、经济发展和文化成就的中心，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情况变了。中产阶级群体和工作机会都从纽瓦克等城市流向郊区，城市的经济被掏空了。70年代初我上高中时，纽瓦克成了经济衰退、犯罪率和暴力事件攀升及种族集中贫困的牺牲品。1975年我高中毕业时，纽约市正在破产的边缘挣扎。不久之后，我父亲的工厂也倒闭了，数百个和他一样的工人都失业了。希望、繁荣和美国梦都流向了郊区。

这些赤裸裸的现实常常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为什么人、公司和商店都离开了纽瓦克？为什么城市会爆发种族骚乱并迅速衰落？为什么我父亲的工厂会倒闭？早年间见证的那场最初的“城市危机”对我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975年秋天我进入了罗格斯大学，有关城市及相关的种族、贫困、城市衰落和工业萧条的课程深深吸引着我。大二时，我的城市地理学教授罗伯特·莱克布置了一项作业，让我们游览曼哈顿下城并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我被当时纽约苏荷区（位于曼哈顿岛第二区）、东村和附近区域上演的奇妙景象惊呆了：社区充满活力，充满令人着迷的画家、音乐人、设计师和作家，旧仓库和工厂被改造成工作室和居住空间，朋克音乐、新浪潮音乐和嘻哈乐给酒吧等演出场所注入了激情。后来这一系列的萌芽演变为一场彻底的城市复兴。

在匹兹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学教书的近20年时间里，我开始整理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匹兹堡曾饱受去工业化的困扰，流失了

几十万人口和大量高薪蓝领就业岗位。所幸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医疗中心、企业研发部门和慈善事业，这个城市才没变得更糟。当时市政府努力想办法扭转乾坤，我作为经济发展学教授也参与其中。然而即便是前沿的研究创新潜力也没能留住匹兹堡的大学人才，我身边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专业的同事以及我自己的学生都成批地前往硅谷、西雅图和奥斯汀等高科技中心。当起家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互联网先锋Lycos（搜索引擎）公司也突然宣布从匹兹堡搬到波士顿时，我灵光一现。

传统观念认为，人才随着企业和工作岗位流动，在我看来这一观念已经过时了。匹兹堡的市政府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试图通过减免税收等刺激政策来吸引企业，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工业园区和办公园区，但这些并不是企业真正需要的，也不是我的学生和其他离开匹兹堡的人才真正需要的。波士顿没有给Lycos提供任何税收减免或其他优惠政策，实际上，在波士顿，从租金到员工工资的所有经营成本都远高于匹兹堡。Lycos迁址是因为，它需要的人才已经聚集在波士顿了。

2002年，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断言，城市成功的关键在于吸引并留住人才，而不仅仅是吸引企业。由知识工人、技术专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创意产业从业者构成的创意阶层聚集在有以下特征的地方：有大量高薪工作——也被称作密集的劳动力市场；有大量可以结识和约会的同伴——我把它称为密集的同伴市场；富有生机，有大量餐厅、咖啡馆、音乐表演和其他娱乐活动。[2]

到世纪之交的时候，创意阶层群体已经增长到4000万人了，占美国劳动力总人口的1/3。我指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优势和主导阶层，他们的品位爱好不仅重塑着城市，还影响着文化、工作方式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我同样指出了两个构成劳动力剩余部分的弱势阶层：一个是人数更多、工资更低廉的服务业阶层，有大约6000万人，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一半，他们从事低薪的食品制备、零售和个人服务工作；另

一个是正在收缩的蓝领工人阶层，他们从事制造、建筑、技工、交通和物流工作，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5。

我进一步指出，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和都会区都在“3T要素”方面表现出色，3T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性（Tolerance）。它们拥有密集的科技公司，拥有能提供人才的优质学校和研究性大学，还富有包容性，这使它们能吸引和留住不同性别、国籍、种族和性取向的人才。

城市就是把3T集合在一起的地方，并由此成为最基础的经济组织单位。在旧工业经济中，通用汽车、美国钢铁和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样的大型公司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为广泛的中产阶级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这个阶层既包括像我父亲那样的蓝领工人，也包括像我姨夫那样的白领管理层和工程师群体。地点本身已经变成了新型知识密集经济的中心组织单位，也是吸引人才、匹配人和工作岗位、激发创新和经济成长的主要平台。

我把这个理念带给世界各地的城市治理者，尤其是那些仍相信老一套城市政策——如税收减免等刺激政策、修建市中心体育场馆和露天购物中心等大型设施——能吸引居民的城市官员。我告诉他们，只有以人为本、基于地点的新型经济才能持续繁荣，关键是要建造一些小型设施让城市变得更宜居，比如建造人行道、适宜步行的街道、自行车道、公园、艺术场馆、演出场地，以及有咖啡店和餐厅、能吸引人流的活力街区。城市不仅需要竞争的商业氛围，更需要良好的人文环境，吸引形形色色的居民，不论他们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或性取向如何。

我的观点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包括市长、文艺界领袖、城市规划专家，甚至房地产开发商，他们都想找到促进城市发展得更好的方式。我的主张也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派的强烈反对。有些保守派质疑我把多样化和城市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观点，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是企业和就业，不是创意阶层。有些人（主要来自左派）把房租上涨、中

产阶级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账都算在创意阶层和我个人头上。还有一些更个人层面的批评，虽然令人不快，但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思考，使我开始重塑对城市和影响城市发展因素的看法。

我对城市的理解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过于乐观地相信城市和创意阶层会自动带来更好、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强劲复苏的城市的贫富差距就已经迅速扩大了。随着科技从业者、专业人士和富人搬回城市，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中的弱势群体以及部分艺术家、音乐人都被高昂的生活成本挤出了城市。在纽约苏荷区，我在学生时代看到的促进艺术和创意产业发展的元素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同质化的富人群体、高级餐厅和奢侈品商店。

老实说，我很早就注意到了城市复苏的弊端。早在2003年（那时让大家开始关注“前百分之一”群体崛起的“占领华尔街”游行还未发生，提出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的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也还未问世），我就提出警告：美国最富创意的城市同时也是经济不平等的中心。我的研究表明，薪酬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大都市恰恰是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创新驱动型经济体，如旧金山、奥斯汀、波士顿、西雅图、华盛顿和纽约。[3]虽然当时我记录下了这些新出现的分裂问题，但我并不知道它们的扩散速度会有多快，也不知道这些城市的两极分化问题会有多严峻。仅仅过了10多年，我曾预言的城市复兴就带来了广泛的绅士化，房价变得难以承受，富有的新市民和艰难维生的老市民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我最担忧的是大量中产阶级社区的消亡，这些社区曾是城市和社会的支柱。它们是我在纽瓦克出生的地方，是我在北阿灵顿生长的地方，也是我曾希望新创意阶层能带回城市的社区。但现在，这些强大的中产阶级社区正在我眼前消失。

于是我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反思和知识重构，写作了本书。我看到了自己以前大力歌颂的城市复兴运动的黑暗面：重返城市运动把绝大

多数的好处都分配给了少数的地区和人群。

分裂扩大了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不平等。通过对数据的仔细分析，我发现只有少数城市和都会区真正通过知识密集型经济实现了发展，其余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跟上，而是越落越远。很多“铁锈地带”上的城市仍在人口向郊区迁徙、城区衰败和去工业化的泥潭中挣扎。“太阳地带”[02]上的城市仍在用低廉房价、郊区散漫无序的扩张发展吸引人才，但很少能建立起知识创新驱动的健康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数千万美国人仍陷于长期贫困，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面临不断加剧的经济分裂问题。随着中产阶级群体和社区的消失，城市版图被割裂成少数的富人及优势群体聚集区和多数的穷人及弱势群体聚集区。

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造成城市化不平等的正是人才和经济资源的聚集，只有少数超级城市和精英社区从城市化中获利，大多数地区的发展都远远滞后或停滞不前。这股推动城市经济广泛发展的力量也带来了分裂和矛盾，阻碍城市继续发展。

最终，我的研究使我不得不面对令人忧心的城市新版图。常识和经济学研究都告诉我们，知识密集型大城市的居民收入更高、经济状况更好。但我和我的同事通过研究三个阶层群体支付房租后的生活状况，意外地发现了令人不安的现象：知识工人、专业人士和传媒文化产业从业者这些优势创意阶层过得还不错，能在大型知识密集型都市获得高报酬，并且所获报酬对负担这些地区的高住房成本绰绰有余。但另外两个较弱势的群体，即蓝领工人和服务业从业者就被远远甩在其后，支付住房费用后，他们实际上在消费昂贵的大都市过得更糟了。[4]

这个现象背后的隐含信息深深地困扰着我。创新、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的最强驱动力——人才和其他经济资源在城市的聚集把大多数利好都带给了原本的优势群体，而把剩余66%的人口落下了。我写下这些研究成果时引起了一阵小风波，一位批评家甚至宣称我已经承认

了创意阶层理论的局限。我当时直接做了回应[5]，但我更完整和深入的回答正在你手中的这本书里。

我在第二故乡多伦多的所见所闻深刻影响了我对城市和城市化的看法。2007年我搬到多伦多，在多伦多大学研究城市繁荣问题的研究所担任主任。对我而言，多伦多是先进城市化的典型代表，拥有北美最多样化的人口、几乎没有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的繁荣经济、安全的街道、优质的公立学校和紧密结合的社会结构。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曾被彼得·乌斯蒂诺夫称作“瑞士人管理的纽约”的先进多元化城市选了罗布·福特当市长。

尽管福特的个人问题可能使他深受“福特王国”支持者们的钟爱，但在我看来，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反城市化的大城市领导人之一。当选后，他就立即着手拆除了几乎所有城市规划师眼中构成伟大城市的东西。他拆除了主干道两边的自行车道，以此恢复他的“汽车上的战争”，他还提出计划将市中心的主要湖畔地带变成带大型摩天轮的万众瞩目的购物商场。福特之所以能当上市长，大概正是因为他想将城市变得更像郊区。[6]

福特上任是城市阶层不断分化的结果。多伦多曾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后来随着中产阶级的人数不断缩减，社区逐渐消失，城市分裂成了少数小型的富人、知识分子社区和多数大型弱势群体社区。前者分布在市中心及附近主要地铁和火车线路周边，而后者则远离市中心和交通枢纽。[7]福特传递的信息在工人群体和新移民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们认为精英们占尽了城市复苏带来的好处，而他们则一无所获。

我认为不断扩大的阶层分裂是一个定时炸弹。如果一个像多伦多这样进步、多元和繁荣的城市都可以沦为民粹主义集体抵制的牺牲品，那么其他城市更不能幸免。

那时我就提出，福特只是这场不断发酵的冲突的第一个信号，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如我所言，紧接着英国就决定脱离欧盟，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尽管富裕、有全球性眼光的伦敦人强烈反对脱欧，但饱受全球化和再城市化双重折磨的工人阶层则普遍支持这一决定。

后来发生的事更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更可怕：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了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总统。特朗普的上台得益于他动员了美国较落后地区愤怒而焦虑的选民。虽然希拉里·克林顿拿下了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且知识集中型的城市及其近郊，并且这些新型经济中心确实帮她赢得了远远领先于特朗普的大众选票，但特朗普拿下了广大偏远郊区和农村，从而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特朗普当选、福特上任和英国脱欧这三件事都反映了今天不断深化的阶级和地域断层。

政治分裂从根本上起源于“新城市危机”的深层经济与地理结构，是我们赢者通吃城市化的产物。在这一城市化进程中，人才和优势群体聚集起来，占领了少数发达的超级城市，把其他人和城市甩在身后。“新城市危机”不仅仅是城市的危机，更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危机。

在本书中，我尽量用浅显的语言呈现新城市危机以及城市和社会的深层矛盾。我有三个主要写作目标：阐述危机的主要特征；明确危机的根本成因；提出措施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新型城市化，即在鼓励创新和财富创造的同时，为所有人带来更好的工作岗位、更高的生活品质和更优质的生活方式。

如今形势已经岌岌可危，我们应对新城市危机的方式将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加深分裂、持续倒退、陷入经济萧条，还是向前一步，迈向包容的可持续经济繁荣的新纪元。

[01] 铁锈地带，指美国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编者注

[1] 国家民事骚乱专项顾问委员会报告（克纳委员会报告）(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8); Max Herman, Summer of Rage: An Oral History of the 1967 Newark and Detroit Riots (Bern: Peter Lang, 2013); Kevin Mumford, Newark: A History of Race,

Rights, and Riots in America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8); Sidney Fine, Violence in the Model City: The Cavanagh Administration, Race Relations, and the Detroit Riot of 1967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9); Thomas J.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2002);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Revisite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3]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Richard Florida, "The New American Dream," Washington Monthly, March 2003; Richard Florida,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02] 太阳地带，美国南部到西南部，气候适宜，以发展旅游业为主。——编者注

[4] Richard Florida, "More Losers Than Winners in America's New Economic Geography," CityLab, January 30, 2013, www.citylab.com/work/2013/01/more-losers-winners-americas-new-economic-geography/4465.

[5] Joel Kotkin, "Richard Florida Concedes the Limits of the Creative Class,"Daily Beast, March 20, 2013, 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3/03/20/richard-florida-concedes-the-limits-of-the-creative-class.html; Richard Florida, "Did I Abandon My Creative Class Theory? Not So Fast,Joel Kotkin," Daily Beast, March 21, 2013, 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3/03/21/did-i-abandon-my-creative-class-theory-not-so-fast-joelkotkin.html.

[6] Richard Florida, "How Rob Ford's Pride Snub Hurts the City of Toronto," Toronto Star, April 23, 2012, www.thestar.com/opinion/editorialopinion/2012/04/23/how_rob_fords_pride_snub_hurts_the_city_of_toronto.html; Richard Florida, Toronto Needs a Muscular Mayor," Globe and Mail, November 30, 2012, www.theglobeandmail.com/globe-debate/richardflorida-toronto-needs-a-muscular-mayor/article5822048; Richard Florida,"What Toronto Needs Now: Richard Florida Offers a Manifesto for a New Model of Leadership," Toronto Life, October 22, 2012, www.torontolife.com/informer/features/2012/10/22/what-toronto-needs-now. 也参见 Zack Taylor, "Who Votes for a Mayor Like Rob Ford?," The Conversation,November 13, 2013, http://theconversation.com/who-votes-for-a-mayorlike-rob-ford-20193; Zack Taylor, "Who Elected Rob Ford, and Why? An Ec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2010 Toronto Ele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Waterloo, Ontario, May 2011, www.cpsa-acsp.ca/papers-2011/Taylor.pdf。

[7] 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最早提出了这一现象，参见J. David Hulchanski,in "The Three Cities Within Toronto: Income Polarization Among Toronto's Neighborhoods, 1970–2005," Cit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0,www.urbancentre.utoronto.ca/pdfs/curp/tnrn/Three-Cities-Within-Toronto2010-Final.pdf. 也参见Richard Florida, “No Longer One Toronto,” Globe and Mail, October 22, 2010, 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no-longer one-toronto/article4329894。

第一章 城市矛盾

假设你能回到1975年的纽约，在大街上随机选一个路人，把他送到今天，他会怎样看待现在的纽约？在他所熟悉的纽约，经济急剧衰退，居民、企业和就业机会都在流向郊区，城市濒临破产。纽约是肮脏、危险和暴力的代名词。

如今，他应该还能轻易地分辨方向。布朗克斯区还在北边，炮台公园还在南边。自由女神仍俯瞰着曼哈顿的海港，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洛克菲勒中心和林肯中心等地标建筑风采依旧。交通仍然同往年一样拥堵，他可以乘坐同样线路的地铁在曼哈顿市区穿梭，或是去布鲁克林、皇后区或布朗克斯区，也能乘纽新航港局过哈得孙河捷运去旁边的新泽西，再换乘新泽西公共地铁和大都会北方铁路去更远的郊区。

但很多其他事情都大不相同了。非常遗憾的是，在1975年还崭新的双子大楼现在已不复存在。重建后的金融区里除了商务人士之外，还搬来了很多以前住在郊区的富裕家庭。金融区附近以前是一片废墟，只有残砖废瓦和破败的码头，现在却建起了绿意盎然的公园，公园里延伸出贯穿整个曼哈顿哈得孙河沿线的自行车道。时代广场仍是一片霓虹灯和广告牌的海洋，但原来成人电影院和性用品店林立的地方变成了都市版的迪士尼，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游客，还有户外桌椅供游客休息。以前的苏荷区挤满了非法搬入的艺术家，东村和西村的大街上则随处可见嬉皮士和朋克爱好者，现在这些地方则是各色高端餐厅、咖啡馆和酒吧，高薪投行人士、技术专家、游客甚至社会名流都是这里的常客。

肉类加工区的肉食处理工厂、仓库和隐蔽的同性恋酒吧现在也消失了。人们把废弃的高架铁路改造成一个长长的公园，公园两侧是崭

新的公寓和办公楼、惠特妮美术馆、精品酒店和高档商店。附近的纳贝斯克工厂变成了高端美食城，旧的港务局大楼现在挤满了谷歌的工程师，而谷歌只是这片社区里许许多多的科技公司之一。在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区和哈得孙河对岸的霍博肯市和泽西市，原来只有大片的工厂、破旧的租屋和联排住宅，现在则是年轻职业人士和家庭聚集的社区，他们在这里居住、工作和娱乐，晚上也能在大街上散步，无须担心遇到抢劫犯罪事件。

然而，这个1975年的纽约人也能感受到，虽然今天的纽约看起来一应俱全、光鲜亮丽，但是某些问题正在内部发酵。对于他这样的工薪阶层来说，在这里生活比1975年艰难多了。那时售价50000美元的公寓现在至少值上百万美元，而那时月租金500美元的公寓现在的租金至少要5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他能看到闪闪发亮的摩天大楼在57街拔地而起，那是亿万富豪们的住宅，但因无人居住而被闲置，在夜里往往一片漆黑。他还会听到人们抱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百分之一”人群崛起，以及令中产阶级越来越难以负担的城市高昂的物价。

除了财富新贵和游客外，他还能看见大量状况堪忧的社区紧挨着财富新贵们的社区。贫困、犯罪和毒品等社会问题以前阻碍着城市发展，而这些问题现在转移到了从前聚集着中产阶级社区的郊区。让他惊讶的是，民主党人士终于在2014年当上了纽约市市长，而在这之前的20年，纽约市市长的位置都被共和党占据，其中包括一位连任三个任期的超级富豪。让他更震惊的是，这位新上任的民主党市长以前是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社区积极分子，他的竞选理念就是改变纽约“双城记”的现状：穷人和富人就像生活在两个城市。“双城记”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这个来自1975年的纽约人在过去的40多年中错过的事情。

我从出生以来就住在城里或城市周边郊区，并一直在仔细观察这些地区。我对城市规划进行学术研究已超过30年，见过城市衰落，也见过城市复苏，但这些都没有使我准备好面对今天的状况。看起来城市似乎正要走出困境，居民和就业都回到了城市，但贫富差距扩大和

房价飙升等新问题又出现了。好像一夜之间，人们翘首以盼的城市复苏就演变成了一场新的城市危机。

很多评论家都抓住了这场危机出现的原因，但鲜有人意识到它扩散的深度和广度。前沿城市专家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逐渐分成了两个阵营：城市化乐观派和城市化悲观派。虽然每个阵营都指出了城市化的部分事实，但双方各持一隅之说，无法帮我们全面认识城市化危机，更无从帮我们找到解决之道。.

城市化乐观派强调城市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城市化有益于改善人类生存状况。[1]他们（包括不久前的我自己）认为，今天的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裕、安全、干净和健全，城市化就是一切改善的源头。他们认为，如果国家政府减少干涉，让城市及其管理者有更多自主权，世界会变得更好。

与之相反，城市化悲观派认为今天的城市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供超级富豪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富裕封闭区域，另一部分是周边普通民众生活的大片贫弱区域。他们认为，贪婪的资本家是城市复兴的始作俑者，资本家通过重建某些社区并摧毁其他社区大发横财。世界各地的城市化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秩序造成的，它的标志并不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而是贫民窟和与之相伴相生的巨大的经济、生态和人道主义危机。[2]另外，绅士化和不平等就是富人和优势群体对城市再殖民的直接产物。

所以城市究竟是什么？是乐观派歌颂的伟大创新引擎、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楷模，还是悲观派批评的贫富差距扩大和阶级分化之地？实际上两者皆是。城市既有强劲的经济实力，也造成了恼人的社会分化，城市化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矛盾。要理解现在的城市危机就必须认真对待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观点，我尝试汲取了两者的精华。

“新城市危机”到底是什么?

过去5年我的所有研究都专注于给它下一个准确定义，为此，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一起就以下主题挖掘新的数据：城市不平等的范围与根源、经济隔离的程度、绅士化的成因与规模、全球超级富豪居住的城市与社区、初创科技公司聚集给城市带来的挑战，以及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对艺术与音乐创造活力的压抑。我把自己对城市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与城市社会学家关于集中贫困的腐蚀效用的见解结合起来，绘制了社区和阶层的分化地图，探索郊区贫困和经济危机的发展。我还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城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它们很难通过城市化实现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老路走不通了。[3]

新城市危机不同于20世纪60—70年代之间发生的旧城市危机。旧城市危机被定义为城市丧失经济职能、城市经济被架空的危机。由于去工业化和白人大迁移的影响，城市中心被逐步掏空，城市学家和城市管理者称之为“甜甜圈中间的洞”。由于核心产业的迁出，城市成了长期贫困聚集地：住宅区逐渐衰落；暴力犯罪事件攀升；毒品泛滥、青少年怀孕和婴儿夭折等社会问题激增；城市经济陷入衰退，税收不断减少，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经济资助。[4]这些问题大多延续至今，尚待解决。

但新城市危机的影响范围更广。人们通常以为，贫富差距扩大和房价飙升等典型问题只存在于纽约、伦敦和旧金山等发达城市，其实“铁锈地带”城市和一些依靠能源、旅游业和地产业而没有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太阳地带”城市也饱受其害。新城市危机的其他主要问题，如经济和种族分化、空间不平等和长期贫困等不仅存在于城市，也广泛存在于郊区。从这个角度看，新城市危机不仅仅是城市的危机，还是郊区的危机、城市化本身的危机以及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

在我看来，新城市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少数超级城市（如纽约、伦敦、香港、洛杉矶和巴黎）及高新科技与知识中心地区（如旧金山湾区、华盛顿、波士顿和西雅图）与世界其他城市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超级城市和地区坐拥全球绝大多数高价值产业、科技创新产业、初创公司和人才。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旧金山湾区、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圣迭戈和伦敦这六个城市或地区吸引了全世界一半的高科技风险投资[5]。赢者通吃的城市化在不同城市之间制造了新的不平等，其他城市大多受到全球化、去工业化的冲击，丧失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和超级城市的差距越发扩大。

第二是超级城市的成功给自身带来的危机。它们普遍面临房价高企且不断攀升以及不平等程度不断升级的问题。在这些城市，绅士化已经演变为一种“富豪统治主义”[6]，超级富豪购置高端房产是为投资而非居住，社区变得死气沉沉，因此最有活力与创造力的城市社区成了专供富豪彰显身份的工具。被迫离开城市的不仅仅有音乐人、画家等创意人群，越来越多经济条件良好的知识型工人也发现城市的高房价将耗尽他们所有的积蓄，他们还担心自己的后代可能再也买不起房子。但是直接承担经济后果的还是蓝领工人、服务业从业者、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这些人被赶出了超级城市，也享受不到超级城市提供的经济机会、服务、公共设施和向上一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当教师、护士、医院工人、警察、消防员、餐厅服务生等服务人员都无力承担他们工作地点附近正常范围内房屋的居住成本时，城市的正常经济运转也难以为继。

第三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社会和阶级分化。这方面危机的影响范围更广，危害也更大，无论是“赢家”城市还是“输家”城市都难以幸免。如果说旧城市危机的特征是“甜甜圈中间的洞”，那么新城市危机的特征就是“消失的中层”——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和曾作为美国梦实体化身的中产阶级社区都在不断减少。从1970—2012年，住在中产阶级社区的美国家庭占比从65%下降到40%，而住在穷人社区和富人社区的家庭占比大幅上升。在过去的15年中，约90%美国都市地区的

中产阶级人数都出现了下滑。[7]“穷城市、富郊区”的社会阶层划分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拼布城市”，即小片富人社区与大片贫困社区交织，同时存在于城市和郊区中。

第四是日趋恶化的郊区问题，如贫穷、攀升的犯罪率、愈演愈烈的财富分化和种族隔阂。情景喜剧《脱线家族》里那样的郊区中产阶级生活场景已经越来越少见了，现在郊区的贫困人口已经超过城市——郊区住着约1700万穷人，而城市里只有1350万。2000—2013年，郊区的贫困人口增幅达到惊人的66%，而同期城市的贫困人口增幅只有29%。[8]郊区的贫困人口中少部分是从城市搬来的无家可归者，但大部分都是当地人。由于失业或者房价上涨，部分中产阶级陷入贫困，从原本的阶层跌落。以前郊区都是美国的富人区，但现在郊区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不逊于城市。

第五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城市化乐观派相信，城市化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中产阶级群体壮大，美国、欧洲、日本和近年来的中国都是发展这条道路的成功范例。毕竟从古至今，城市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但如今，在许多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地区，城市化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关联被割裂了，甚至出现了城市化没有带来经济发展的情况。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涌入高速发展的城市，生活水平却并没有显著提高。全世界还有超过8亿人口极度贫困，生活在条件堪忧的贫民窟，这相当于美国人口总量的2.5倍，而且随着世界城市人口的增长，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扩大。[9]

新城市危机的表现形式多样，说到底是由城市人口聚集的悖论导致的。城市人口聚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实体企业、经济活动、人才和野心家在城市的聚集是现代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自然资源甚至是超大型公司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了，城市聚集人才的能力才是。当人才聚集起来产生思想的交流碰撞并形成合力，就能极大地提高创新活力和生产力，带来新发明和创业型企业，促进经济繁荣。经济活动在城市的集中程度高得惊人：全球最大

的50个城市人口总和只占全球人口的7%，却创造了全球40%的经济活动；全球40个超级都市群（例如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经济长廊）只占全球人口的18%，却贡献了2/3的全球经济产出和超过85%的创新活动。如果单看一线城市的某些小型区域，经济聚集程度则更加惊人。例如，旧金山的市中心区域每年就能吸引数十亿风投资金，比除了美国之外任何一个国家的风投资金量都多。[10]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城市化知识资本主义，而不是知识驱动型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虽然城市人口聚类驱动发展，但它也使城市和社会产生严重分化。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聚集在同一个有限的区域的，一些东西必然会把另一些东西挤出去。这就是“城市土地关系”的本质，它是经济活动在少数城市里的小片区域的高度密集和对这些地区的激烈竞争的产物。[11]就像人生中多数事情一样，在对城市空间的竞争中，赢家往往是那些手里有最多可支配资金的人。富人和优势群体返回城市后占领了最好的地段，其他人只能被塞到那些不太好的城区或者郊区去。这种竞争导致了一种与之相关的经济悖论——土地悖论——世界上似乎有用不完的土地，但人们最需要的土地似乎永远不够多。

在城市化知识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地域和阶层一起对社会经济的优势进行强化和再生产。社会阶层顶端的人住在最好的社区，通过社区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服务和经济机会，而其他人只能住在他们挑剩的社区，获得所有资源的次级版本和更小的向上层阶级发展的可能性。富人住在少数优势城市的少数优质社区，为自己和后代赚到了远超其人口占比的大量经济资源。

不幸的是，在特朗普时代，这种分化只会被加深和固化。虽然特朗普大肆宣扬民粹主义的论调，号称要为被遗忘的蓝领工人阶层争取利益并重塑中产阶级，但特朗普政府和占国会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不可能改变导致分化的深层结构性力量，更不可能帮助那些掉队的人和地区。

新城市危机十分令人忧心，但我们能及时找到应对方案。虽然我对城市化的乐观程度有所保留，但我没有对城市化丧失信心。毕竟“危机”一词有两层含义，它既可以表示我们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危急形势，也可以表示一个关键转折点，在这个节点，我们的选择将决定事情的发展方向。

这就引出了本书最关键的部分：如果我们面对的危机在于城市，那么我们的解决之道也在于城市。即便城市制造了这一切的挑战和危机，但它还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引擎。新城市危机的化解方案是城市化的发展而非倒退。

为此，我们需要用全新的战略框架构筑更全面、更平等的城市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对公路系统和住房建设的投资。这些公路和住房巩固了郊区发展，进而提振了居民对汽车、电视、洗衣机、烘干机和其他耐用品的需求，生产耐用品的工厂又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工作岗位。但现在郊区发展举步维艰，与驱动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城市人口聚类越来越格格不入，我们需要一种更包容的新城市化模式，我称之为“惠及全民的城市化”。

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曾一度乐观地认为民主党会赢得大选，组建的新政府会获得各大城市市长的普遍支持，并能持续提供我们实现更包容的新城市化所必需的国家投资。不幸的是这一愿景落空了。我写到本书结尾时，不得不面对特朗普和共和党赢得竞选的残酷现实，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4年里，国家财政对城市的投资将十分有限，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也将更少。虽然特朗普政府承诺要加大基础设施支出，但优先级最高的很可能是公路和桥梁而不是运输。地方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和慈善机构需要共同努力，弥补共和党的不作为，修补美国已经十分脆弱的社会安全网——现在受损严重的社会安全网对劣势人群和他们所在的社区有严重的不利影响。市长和当地官员应当刻不容缓地带头解决运输、经济适用房和贫困等城市问题。

最后，要走出困境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现惠及全民的城市化。

●改革区划法规、建筑规范以及税收政策，让人口聚类的效应惠及所有人。

●加大基建投资，提高人口密度并强化聚类作用，限制昂贵且低效的城市无计划扩张。

●在城市中心地区建造更多廉租房。

●将低收入的服务业工作转换为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岗位，扩大中产阶级群体。

●通过对人和地区的投资解决集中贫困问题。

●帮助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地区构建更繁荣的城市。

●授权社区和当地官员发展本地经济，应对新城市危机。

本书的最后一章对上述内容还有更详尽的阐述。但首先，我想从系统和实证层面全面展示新城市危机的特征。第二章介绍赢者通吃城市化的形成过程，详述“赢家”城市和“输家”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赢家”和“输家”对城市空间的竞争。第三章概述了新“精英城市”的崛起，以及它是如何让相对优势群体，即知识分子、科技专家和创意工作者竞争城市空间的。第四章通过实证研究考察绅士化这一热点问题，调查它的发生地点和过程、部分居民被迫离开城市的问题，以及被城市化抛在身后的长期贫困地区的状况。

后几章侧重于重塑城市的阶级分化现象。第五章阐述城市和不平等现象的密切联系，解释为何不平等问题在大城市和普通城市的市中心地区更严重，以及为何推动经济发展的人口聚类效应导致了不平等。第六章通过详细的实证研究，调查中产阶级群体及其社区的衰

落，研究美国围绕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产生的社会分化。第七章描绘了美国城市和大都市地区的各阶层人口分布变化情况，展示旧的“穷城市、富郊区”断层是如何让位于各阶级交错分布的新型“拼布城市”现象。

最后的三章分别着眼于城市外部、国外和未来。第八章研究不断深化的郊区危机。第九章探寻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没有带来实质发展的问题。最后的第十章展望未来，强调城市、国家和全球层面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应对赢者通吃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并开创惠及全民的城市化发展新纪元。

[1] 城市化乐观派包括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泽，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斯·卡兹和政治学家本粟明·巴伯。参见Edward Glaeser, The 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 Smarter, Greener,Healthier, and Happier (New York: Penguin, 2011); Bruce Katz and Jennifer Bradley, The Metropolitan Revolution: How Cities and Metros Are Fixing Our Broken Politics and Fragile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Benjamin Barber, 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Dysfunctional Nations, Rising Ci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2] 城市化悲观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和城市学家迈克·戴维斯等。哈维写道，“这些新的发展无一不伴随着大规模人口的流离失所和一波又一波的创造性破坏，不仅造成了物质上的负面影响，还影响社会团结、扩大社会不公，把民主城市治理抛掷脑后，反而指望把军事化的警方监控和恐怖活动当作社会规则的主要模式。”参见David Harvey, “The Crisis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Post: Note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Around the Globe, Museum of Modern Art,November 18, 2014, http://post.at.moma.org/content_items/520-the-crisisof-planetary-urbanization;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New York: Verso,2006)。

[3] 罗伯特·桑普森和帕特里克·夏基的著作给了我很多启发，参见Robert J.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atrick Sharkey, Stuck in Place: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 Racial 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本书也受到以下出自我的团队的研究的影响： 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The Geography of Inequality: Differ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Wa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across US Metros,” Regional Studies 50, no. 1 (2014):1–14; Richard Florida, Zara Matheson, Patrick Adler, and Taylor Brydges,The Divided City and the Shape of the New Metropoli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Divided-City.pdf; 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

Segregated City: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Segregation in America's Metro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egregated%20City.pdf。

[4] 20世纪70年代，罗格斯大学的一位教授把美国的市中心比作名副其实的"沙盒"，政府用联邦转移支付项目安抚这里的贫困少数族裔群体。参见George Sternlieb, "The City as Sandbox," National Affairs, no. 25 (Fall 1971):14–21, www.nationalaffairs.com/public_interest/detail/the-city-as-sandbox。

[5] 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Rise of the Global Startup City: The Geography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in Cities and Metro Areas Across the Globe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Rise-of-the-Global-Startup-City.pdf.

[6] "富豪统治主义"一词引自Simon Kuper, "Priced Out of Paris," Financial Times, June 14, 2013, www.ft.com/intl/cms/s/2/a096d1d0-d2ec-11e2-aac200144feab7de.html。

[7] 关于城市地区中产阶级衰落的问题，参见皮尤研究中心，America's Shrinking Middle Class: A Close Look at Changes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May 11, 2016, www.pewsocialtrends.org/2016/05/11/americas-shrinkingmiddle-class-a-close-look-at-changes-within-metropolitan-areas。有关1970年至2012年居住在中产阶级社区的家庭数据，参见Kendra Bischoff and Sean Reardon, "The Continuing Increase in Income Segregation, 2007–2012," 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March 2016, https://cepa.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the%20continuing%20 increase%20in%20income%20segregation%20march2016.pdf。

[8] Elizabeth Kneebone, "The Growth and Spread of Concentrated Poverty,2000 to 2008–2012,"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31, 2014, www.brookings.edu/research/interactives/2014/concentrated-poverty.

[9] "没有增长的城市化"的概念来自Remi Jedwab and Dietrich Vollrath,"Urbanization Without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7 (July 2015): 1–94. 有关全球贫民窟的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居署，参见联合国人居署的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0/2011: Bridging the Urban Divide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11143016_alt.pdf, 7. 也参见 联合国人居署，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merging Futures,World Cities Report 2016, http://wcr.unhabitat.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6/2016/05/WCR-%20Full-Report-2016.pdf。

[10] 超级都市群的数据来自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Tim Gulden, "Global Metropolis: Assessing Economic Activity in Urban Centers Based on Nighttime Satellite Image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April 2012, 178–187; Richard Florida, Tim Gulden, and Charlotta Mellander,"The Rise of the Mega-Reg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1,

no. 3 (2008): 459–476. 风险投资数据来自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Venture Capital Goes Urban: Tracking Venture Capital and Startup Activity Across US Zip Code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tartup-US-2016_Venture-Capital-GoesUrban.pdf; 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The Rise of the Urban Startup Neighborhood: Mapping Micro-Clusters of Venture Capital–Based Startups(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tartupUS-2016_Rise-of-the-Urban-Startup-Neighborhood.pdf。

[11] 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在The Urban Land Nexus and the State (London:Pion Press, 1980)中最早提出了城市土地关系的概念。也参见Allen J.Scott and Michael Storper, “The Nature of Cities: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Urba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9,no. 1 (2015): 1–15。

第二章 赢者通吃城市化

2013年秋天，游戏巨头美国艺电公司在时代广场的一个酒店套房发布了《模拟城市5：明日之城》，这是当时已风靡全球的《模拟城市》系列游戏的最新版本。与传统电脑游戏不同，在《模拟城市》系列里，玩家并不通过杀人赢取积分，而是以市长的身份管理城市。他们可以通过改变税收、市区划分和土地使用规则等措施创造就业、刺激经济发展，他们还能点击屏幕上的市民，查看这些措施对于这个市民生活的影响。在《模拟城市5：明日之城》设定的残酷未来世界里，一个叫控制网的精英集团控制着城市的高科技基础设施，市长可以限制这个集团的权力，但风险就是可能导致城市经济陷入停滞。发展太慢，城市就可能陷入贫困的反乌托邦境地；发展太快，城市的贫富差距会扩大，大量市民将无力负担高额生活成本而被迫离开城市。要赢得游戏，玩家就得在这两个不完美的选项之间寻求平衡。[1]

听起来是不是似曾相识？虽然游戏是虚拟的，但它描绘的基本矛盾正在现实世界中上演。

在城市聚合力的作用下，顶尖人才、野心家、富豪和最富创造活力的核心产业纷纷往超级城市和全球知识技术中心迁移，其聚集程度之高史无前例。[2]然而，在少数精英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多数其余城市却在困境中挣扎、停滞不前，只能仰望后尘，这个过程就是“赢者通吃城市化”。

虽然这个名词是我创造的，但人们对赢者通吃经济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近20年前，罗伯特·H.弗兰克和菲利普·J.库克就提出了广为人知的“赢者通吃社会”的概念。他们参考的是经济学家舍温·罗森的研究成果，而舍温·罗森在他们之前的20多年就研究了超级明星崛起背后的经济学理论：普通职业运动员的收入已经不低，但一流体坛明星和普通运动员的收入相比简直是天上和地下。像勒布朗·詹姆斯、凯文·

杜兰特和斯蒂芬·库里这种篮球明星，或是像汤姆·布雷迪和阿隆·罗杰斯这种橄榄球明星，收入水平都是普通运动员的数倍。同样，在娱乐圈，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和碧昂斯的收入是普通音乐人的数倍，影视巨星詹妮弗·劳伦斯、斯嘉丽·约翰逊、汤姆·克鲁斯、布莱德利·库珀和道恩·强森也是如此。背后的经济原理很浅显，超级歌星有大量粉丝愿意出高价买专辑和看演唱会；超级影星只要翻拍续集就能揽得高票房；体坛明星能吸引粉丝买比赛门票，去现场给他们助阵……这就是他们能获得超高报酬的原因。[3]

但是弗兰克和库克发现，赢者通吃现象广泛蔓延到其他经济领域，从咨询、银行和管理到设计、时尚、医药和法律等行业都出现了巨大的收入差距，表现为首席执行官和普通职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在1978—2015年的近40年里，首席执行官的收入增长率超过940%，而普通职工的收入增长率仅为10%。1965年，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职工的20倍，但到21世纪初，这个比例竟超过了300倍，此后一直维持这个倍数。首席执行官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股票期权等股权报酬，其目的是激励管理者提升公司业绩。但事与愿违，实际上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与公司业绩之间联系甚微。一项针对429家公司的800名首席执行官的研究发现，从2004—2014年，首席执行官薪酬最高的公司反而整体运营情况最糟糕。[4]

城市之间也开始出现赢者通吃现象，超级城市就像那些收入超高的明星一样，轻松凌驾于普通城市之上。它们拥有最强的创新实力，控制着全球最大份额的资本和投资，并聚集了业界顶尖的金融、媒体、娱乐和高科技公司。因此，超级城市成了野心家和顶尖人才的必然选择。超级城市在持续不断地累积并强化自身活力：经济扩张刺激了对高级餐厅、剧院、夜店和画廊的需求；成功人士为城市捐助建设博物馆、音乐厅和学校；政府将不断增长的税收投资于学校、交通、图书馆和公园等公共设施，以此维持并强化城市自身的优势，吸引更多企业和人才。这种强大的反馈循环使超级城市能不断积聚优势。[5]

而欧美发达地区没落的老工业城市和发展中国家贫困闭塞的城市都远远落后，它们与超级城市的差距正不断扩大。

超级城市都有哪些呢？有很多版本的全球城市排名，各自侧重不同的考察指标，如经济实力、竞争力和宜居性。为了集各家所长，我们用五项核心指标生成了“世界超级城市指数”。[6]我们先给城市进行单项排名，排名第一的城市10分，第二的城市9分，依此类推，然后把五项指标的得分加总，得到每个城市的总分。请注意，这些总分不是绝对值，而是相对值，是用来比较各城市相对优劣及划分梯队的参照物（见表2.1）。

表2.1 世界超级城市

排名	城市	分数
1	纽约	48
2	伦敦	40
3	东京	29
4	香港	21
5	巴黎	19
6	新加坡	17
7	洛杉矶	13
8	首尔	11
9	维也纳	10
10	斯德哥尔摩	9
10	多伦多	9
12	芝加哥	8
13	苏黎世	6
14	悉尼	5
14	赫尔辛基	5
16	都柏林	4
16	大阪－神户	4
18	波士顿	3
18	奥斯陆	3
18	北京	3
18	上海	3
22	日内瓦	2
23	华盛顿	1

续表

排名	城市	分数
23	旧金山	1
23	莫斯科	1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全球城市的五项核心指标。

纽约和伦敦分别以48和40的得分名列超级城市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包括得分位于13~29区间的东京、香港、巴黎、新加坡和洛杉矶；第三梯队包括首尔、维也纳、斯德哥尔摩、多伦多、芝加哥、苏黎世、悉尼、赫尔辛基、都柏林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金融经济中心，以及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这样的知识科技中心。超级城市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联盟，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似度远高于它们和自己所在国其他城市的相似度。[7]

超级城市独特经济体系的基础是创新驱动的高附加值产业，如金融、媒体、娱乐和科技等行业。[8]在这里，一切都在高速运转——信息光速传播、创新层出不穷、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快速扩张，速度与规模一起构成了超级城市的生产力优势。快节奏不只是人们的主观印象，如俗话说的“纽约的一分钟”[01]，而是客观的科学现象。在专门研究复杂适应系统的圣菲研究所，科学家发现了城市的独特代谢方式：生物的体型越大，代谢率越慢；而与之相反的是，城市的面积越大，代谢率越快。圣菲研究所还提出，城市人口每翻一倍，居民的创造力、生产力和健康指数就平均提升15%。[9]

超级城市的优势比超级明星更具持久性。名声再响亮的明星都会陨落，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较短，往往受伤后就退居二线，票房巨星会

随着年华老去慢慢淡出舞台。有的大城市也会衰落，比如底特律，但超级城市只会越来越强。在过去不到20年中，纽约遭受了几场重大灾难：2001年的恐怖袭击和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2012年的飓风“桑迪”，但它现在仍是全球最发达的城市。[10]

在某种程度上，赢者通吃城市化是产业全球化的产物，赢者通吃城市化对全球城市排名洗牌的过程也是步产业全球化之后尘。[11]历史上，每个先进国家都有自己的汽车、钢铁、电子、化工产业，后来随着贸易壁垒的消失，它们不得不面对全球化竞争，很多公司被收购或者破产倒闭。产业全球化之前，各行各业的小企业各自占领本土市场，而产业全球化之后，大型跨国集团一统江山，霸占绝大多数市场份额，幸存小企业则为了越来越小的剩余市场份额争得头破血流。

全球化也对世界城市排名进行了洗牌。随着资本主义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也就是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变得越来越精细，最有经济价值的地段和市场集中在越来越少的几个城市。过去最顶尖的人才和最赚钱的行业分散在各个中小城市中，而现在这些人才和行业倾向于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超级城市。这些城市构成了世界经济的“最高峰”。“最高峰”们繁荣发展，“小山丘”们市场萧条，而面积更大的“平原”和“山谷”们则苦不堪言。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与菲尼克斯、达拉斯、大西洋城等“太阳地带”城市不同，像纽约、伦敦、洛杉矶这样的超级城市或者像旧金山、华盛顿、波士顿这样的知识中心都没有经历过高水平的人口增长。但是人口增长并不是超级城市强大实力的来源，因为这些城市的优势在于质量而非数量。超级城市是富人和优势群体的根据地，很多人因为无力承担不断提高的生活成本，只能迁往美国南部的“太阳地带”城市，进而拉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有人认为，超级城市和科技产业中心的高昂物价会导致一些核心行业的企业搬去成本更低廉的地方，由此促成所谓的“其他地区的崛起”。这确实会减少一些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压力。但是，正如我将在下一章阐述的那样，几乎没有任何

迹象表明那些高科技企业会撤离超级城市或科技产业中心，即使有迹象，也是显示它们会更加集中在这些地区。

房价能明确反映超级城市的主导地位以及它们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因此，我的研究团队利用Zillow（提供免费房地产估价服务的网站）的数据追踪了全美11000多个邮编地区的房价。结果显示，160个邮编地区的房价中位数高于100万美元，其中有80%位于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大都市；28个邮编地区的房价中位数超过200万美元，其中有24个分别在旧金山湾区（11个）、洛杉矶（7个）和纽约（6个）。2016年，旧金山城区里约57.4%的房屋价值超过100万美元，而在2012年，这一比例还不到20%。[12]对比之下，全美56.2%的邮编地区房价中位数低于20万美元，更有约15%的邮编地区房价中位数低于10万美元。

图2.1展示了纽约苏荷区公寓和其他城市住宅的等值关系，直观说明了其他城市和超级城市的巨大差距。用一套苏荷区公寓的价格（中位数约300万美元）能在拉斯维加斯买18套房屋，在纳什维尔买20套房屋，在亚特兰大买23套房屋，在底特律买29套房屋，在克利夫兰买30套房屋，在圣路易斯买34套房屋，在孟菲斯买38套房屋。如果只考虑个别邮编地区，差异更大。一套苏荷区公寓价值相当于托莱多某些地区的50套房产或者底特律某些地区的70套房产。在俄亥俄州马霍宁县杨斯顿的某个社区，100多套房产才相当于纽约一套苏荷区公寓的价值。

一套纽约苏荷区的公寓

孟菲斯，田纳西州	38
圣路易斯，密苏里州	34
伯明翰，亚拉巴马州	32
克利夫兰，俄亥俄州	30
底特律，密歇根州	29
俄克拉何马，俄克拉何马州	28
辛辛那提，俄亥俄州	26
亚特兰大，佐治亚州	23
纳什维尔，田纳西州	20
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州	18

图2.1 一套纽约苏荷区的公寓可以在其他城市买多少套房屋?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Zillow2015年的数据。

但是，超级城市的光环只笼罩着城里少数几个区域。2015年底，曼哈顿的房屋均价已经超过200万美元，而纽约市房价中位数仅为60万美元，远低于市里某些地区的房价。苏荷区的房屋业主卖掉一套公寓就可以在纽约市北边的帕克彻斯特社区买30套住宅，那里的房屋均价仅为107067美元。超级城市自身也成了赢者通吃城市化的受害者，逐渐分裂为少数高端社区和大量欠发达区域。

造成超级城市和高端社区房价高企，并导致它们与其他地区房价产生巨大差距的“元凶”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引擎：聚合力。城市提供两种主要的聚合效应。一方面，最显而易见的是企业和行业的聚合。早在19世纪，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提出互相竞争的企业聚集于一处时所产生的效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深入研究过企业聚集是如何影响经济地理学并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为行业聚集提供了土壤，例如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业、洛杉矶的电影业、米兰和巴黎的时尚产业、圣何塞的科技产业。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专业人才和野心家的聚合。简·雅各布斯最早提出多元化人才和技能的聚合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将自己对人才聚合效用的研究进行整合，形成了一套基于人力资本外部效用的经济理论。超级城市让世界各地的人才跨越了种族、国籍和性取向的差异，聚集在一起。在旧金山湾区，过去10年间成立的高科技创业公司中约有1/3到一半的企业至少有一名移民创始人。[13]

但是，城市通过聚合力自我强化的过程也导致了城市自身的根本矛盾。聚合效用在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对有限城市空间的竞争越发激烈。一个地方聚集的人才和企业越多，土地就越贵，房价也就越高，最后必然导致部分居民和企业被挤出。城市经济学家威廉·阿朗索在1960年发表的名为“城市土地市场理论”（A Theory of the Urban Land Market）的经典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简洁优雅的城市空间竞争模

型。在他看来，土地价格遵循一条距市中心越远、地价越低的竞租曲线。[14]那时，大企业总部占据城市中心最昂贵的地段，向外一层是对地段要求较高的工厂和库房，再向外一层是经济条件一般的工薪阶层，他们住在工业区附近，生存环境拥挤、吵闹、脏乱。比较殷实的家庭为了避开这种环境，选择居住在更远的郊区。但现如今，富人占据了过去只有工商业的中心地带，令中心城区房地产价格飙升。高度开发且生产效率极高的土地供应十分有限，带来了城市土地关系的核心——对空间的激烈竞争。

再来看看城市核心地段的房产溢价。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美土地价值共计23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家经济产出的160%。[15]但仅6%的已开发土地价值就共计11.7万亿美元，超过了全美土地价值的一半。全美已开发土地平均价格是未开发土地的16倍，每英亩[02]均价分别为106000美元和6500美元。人口数大于100万的大城市土地均价为64800美元/英亩，人口数少于100万的大城市土地均价为16600美元/英亩，而人口数在1万至49000人之间的小城市土地均价仅为6700美元/英亩。

纽约、伦敦、洛杉矶和旧金山这些城市的高端社区房价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些社区的房价往往是每平方英尺[03]1500美元、2000美元、3000美元或者更高，而美国普通房屋均价为每平方英尺150~200美元。事实上，美国所有超级城市的房地产价值总量已经赶上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了。2015年，纽约市城区的房地产总值约为2.9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泛洛杉矶地区的房地产总值约为2.8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泛旧金山地区的房地产总值是1.4万亿美元，相当于澳大利亚或者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所有住宅地产总价值约为35万亿美元（其中业主自有产权房产占28.4万亿，出租物业占5.8万亿），已经超过了中美两国经济产出之和。[16]

超级城市的房价远超其他地区的现象历史已久。1950年，超级城市房价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到2000年这一比例变成了四倍，如今

还在扩大。[17]从1995—2000年，旧金山的房价增幅为每年3.5%，而同期美国所有人口超过200万（截至2000年底）的大城市平均房价增速仅为每年1.7%。

但超级城市真正的房价飙升出现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因为资源过度聚集导致对稀缺土地的竞争越发激烈。从图2.2可以看出，从1950—1993年，纽约市的房价增速为每年不到0.5%，而在那之后的土地价格便急速上升，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经历了短暂暴跌，然后又重攀历史新高。如果一个投资者在1950年买了一块地并在1993年卖掉，那么在扣除通货膨胀损失后他的年收益率不到0.5%。但如果他在1993年买了一块地并持有至2014年，他就能以28倍于成本的价格把它卖掉，年收益率达到16.3%。

曼哈顿的土地升值幅度远高于其他形式的房地产。在1994—2014年的20年间，土地投资的年收益率约为15%（精确值为14.9%），三倍于独立产权公寓投资的年收益率（4.4%）。[18]这就是城市土地关系的症结：高端小区有限的土地资源阻碍了土木工程的伟大壮举。

排名	社区	城市和州	家庭平均年收入（美元）
1	金三角	格林威治	614 242
2	布拉德利庄园	贝塞斯达	599 440
3	波托马克庄园	波托马克	599 331
4	老卡特勒汉莫克橡树湾	珊瑚墙市	596 851
5	卡德罗克栅栏	波托马克	595 669
6	东湖湖岸	芝加哥	593 454
7	斯威克斯米尔自治区	麦克莱恩	562 596
8	卡米奥海岸高地	新港滩市	554 721
9	派力肯山－派力肯峰	新港滩市	549 659
10	格林海文	赖伊	540 403

图2.2 纽约市的土地价值变化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杰森·巴尔、弗雷德·史密斯、萨亚利·库尔卡尼，“曼哈顿值多少钱？1950—2014年土地价值指数”，罗格斯大学2015-002工作论文，2015年3月，http://econpapers,repec.crg/paper/runwpaper/2015-002.htm。图形来自安娜·谢尔比纳和杰森·巴尔，“曼哈顿房地产：下一步是什么？”，真实清晰市场网，2016年2月8日，www.reald earmarkets.com/artides/2016/02/08/manhattan_real_estate_whats_nect_101995.html。

注：土地价值指数反映的是1950年1月100美元经过通货膨胀后投资于一块标准土地的价值。

城市土地关系不仅是有限的供给与不断增加的需求的产物，它还是由城市土地所有者和房屋业主造成的，这些再城市化的最大赢家通过限制新房屋建设以维持自己持有房地产的高价值。越来越多城市经济学家指出，导致城市房价虚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邻避”[04]主义。“邻避”最初是指居民阻止在自己的社区修建监狱、废物处理厂等“不好的”公共设施的行为。最近几年，“邻避”现象越来越频繁。自1970年以来，美国有关“土地使用”的诉讼案件大幅增加，而“土地使用”就是“邻避”的代名词。[19]

我的一篇专栏文章惹恼了“邻避”的拥护者，因为我建议多伦多政府认真考虑允许噪声较小的新型小型喷气式飞机在比利·毕晓普机场起降的提案，而这个机场离多伦多市中心很近。提出此建议是因为我的一项研究表明，机场是最强有力的城市经济发展引擎之一。目前，比利·毕晓普机场只有通往蒙特利尔、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等地的短途航线。大家讨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延长跑道，允许小型喷气式飞机起降，以此增加飞往温哥华、洛杉矶、迈阿密甚至是伦敦和巴黎的长途航线。我认为政府既应该考虑可能给海滨地区带来的噪声和交通成本，也应该考虑一个充满活力的市中心机场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我在专栏中写道，既然现在多伦多的海滨地区已经十分拥挤嘈杂，难道不应当更充分考虑这些小型喷气式飞机能给城市带来的经济效益吗？[20]我们永远不能提前预知结果。批评者认为我只顾自己的便利而不顾城市的安宁，虽然事实并非如此。最后，由于市民和社会活动分子持续施压，贾斯廷·特鲁多政府为兑现竞选承诺，否决了这项提案。

虽然社区和环境保护确有必要，但“邻避”拥护者的所作所为已经不仅仅是把所谓的“不好的”公共设施挡在城市和社区之外了。不论初衷如何，他们本能地阻止任何发展的行为在保住了自己房价的同时，也抑制了驱动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引擎——聚合力。

多数情况下，“邻避”反映了经济学中的寻租行为。“寻租”本质上就是付出极小代价获得的超额回报。还有什么比坐在自己的房子里看着它不断升值更简单的事呢？尤其是当升值全依赖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时候。早在18世纪，经济学家就对没有生产力的寻租行为表示担忧。在那时，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土地而非资本。在18世纪30年代，古典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了“土地价值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卡尔·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先驱。坎蒂隆把经济参与者分成两类[21]，一类是用劳动换工资，再用工资换生活必需品的劳动者，另一类是优势阶层，但与马克思定义的资本家优势阶层不同，坎蒂隆定义的优势阶层由地主构成，他们通过转让房屋使用权获得的租金回报积累财富。后来，大卫·李嘉图提出“租金理论”，描述地主仅因对土地的所有权而获得暴利，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为了使用土地固有的不可毁灭的力量而付给地主的一部分土地作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抨击了地主的自私和懒惰。

如今，相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可使用土地的稀缺性更能使寻租者提高收益。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经济学人》编辑瑞安·埃文特所说的“寄生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自有房产的相对富裕人群获得远超其人口比例的经济产出和财富。一位经济学家曾尖锐地指出，“吸光所有经济财富的是地主，而非企业家”。[22]

这种行为不仅自私，还十分有害。“邻避”行为通过限制城市的企业聚集和人口密度，抑制了促进城市发展的创新活动，因此我愿意亲切地称他们为“新城市卢德分子”。以前的卢德分子以他们的半神话先驱内德·卢德命名，他们挥动铁锤，砸碎了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抢走他们饭碗的织布机。[23]然而讽刺的是，卢德分子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就因工厂而大幅提高。不过以前的卢德分子都

是穷人，新的城市卢德分子则不再是受剥削的工人阶层，而是“赢者通吃城市化”的最大赢家。

新城市卢德分子的主张影响了土地分区法和其他关于土地使用的法规，在很多城市，这些错综复杂的庞大法律体系限制了房屋供应。虽然最初很多法规的目的只是保证在有毒副作用的工业生产与居民区之间保持安全距离，但林林总总的繁杂法规加起来，就对经济产生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2015年，两名前沿城市经济学家发表的研究表明，1964—2009年，限制住宅开发的政策导致美国损失了1.4万亿~2万亿美元的潜在经济收益。另外，虽然在此期间纽约贡献了全国经济总产出增幅的12%，但纽约超过一半的产出增长都被刻意抬高的房价吞噬了。他们估算，如果没有这些房屋和土地使用法规限制住宅开发，让每一个想在城市工作的人都能承担得起住房成本，旧金山就业岗位将增加5倍，纽约的就业岗位将增加8倍，全国普通工薪阶层的平均年薪将增加8775美元，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3.5%，即近2万亿美元。这些估算数据警示人们，对土地的低效利用令美国经济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由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在2016年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限制土地使用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危害。[24]

更让人担忧的是，新城市卢德主义不仅限制了住房开发，还人为限制了未来城市的整体发展和扩张。随着城市面积的增加，建造新学校、下水道、电网、交通和地铁线路的成本越来越高，因为遣散附近居民的难度越来越高，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这么少。在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新城市卢德分子不懈地阻挠着城市扩张，然而，城市扩张越少，聚合力就越弱，聚合力越弱，创新活力和生产力就越低，结果就导致经济产出更少，税基更小，这又进一步约束了城市投资发展和扩大再分配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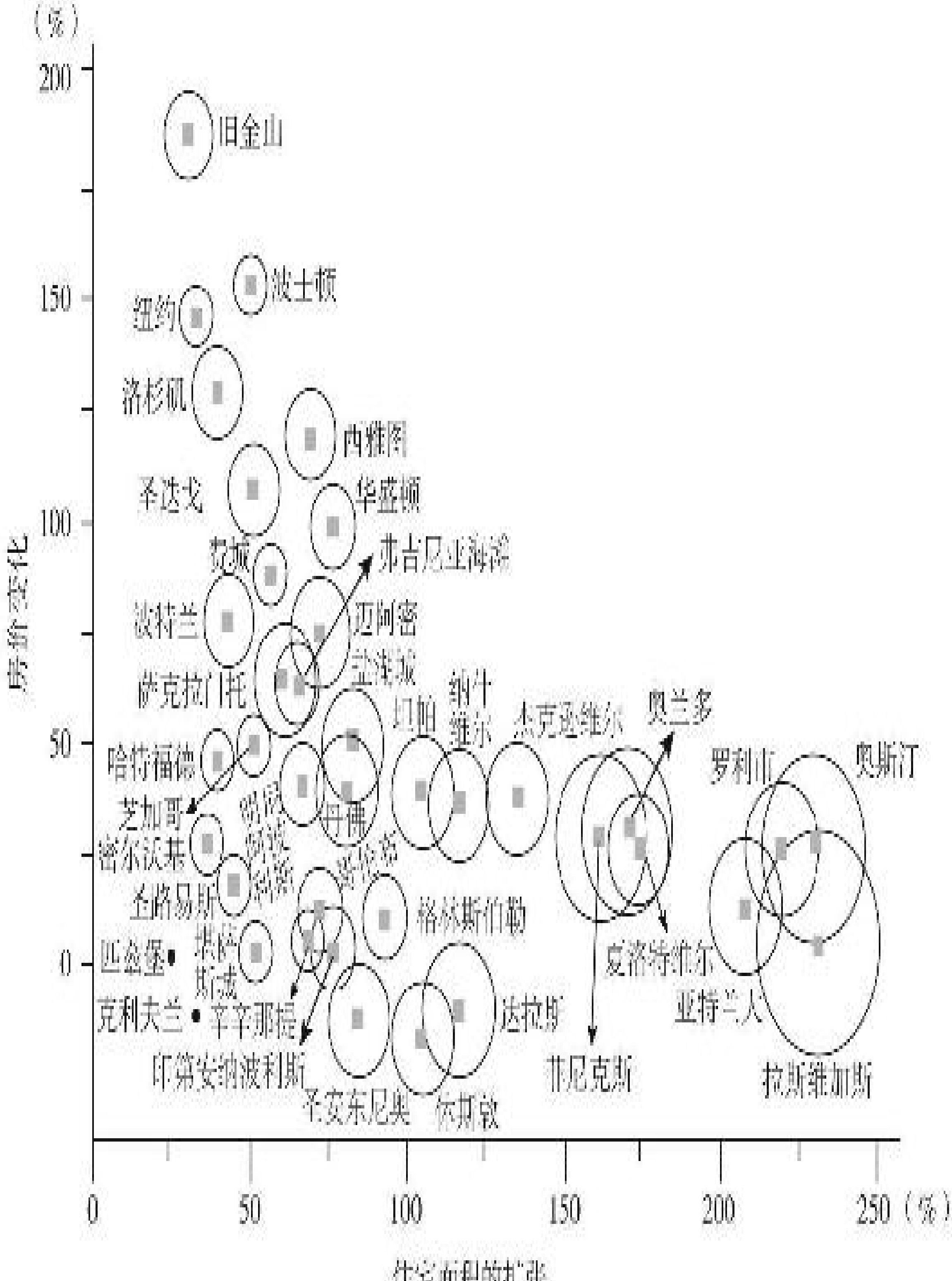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新城市卢德主义对新城市危机的形成负有极大的责任。可以肯定的是，应当采取一定措施制约“邻避”行为，并精简现有的土地使用规定。但这并不代表应当废除所有城市土地使用法规。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市场化城市分子”共同呼吁，应当废除现有土地使用

法规，以此降低城市居住成本、缩小贫富差距及提高生产力。但他们的理念太过理想化了，根本不可行。一方面，高端小区土地价格高昂，私人市场很难甚至不可能在这些地区提供经济住房。高昂的土地价格和高昂的高层建筑成本决定这里只会出现更多的高档公寓，而超级城市紧缺的经济房屋则极少。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密度不断上升，会出现一个转折点。如果人口密度超过了这个转折点，社区就会失去活力。世界上最富创新力的不是亚洲城市中的高楼大厦，而是旧金山、纽约和伦敦那些适合步行的综合性社区。现代城市需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废除法规，而是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并配套改革税收系统，扩大交通投资，逐步用租赁房屋代替独栋住宅，只有这样才能带来城市化知识经济所需要的密集人口、聚合力和多元化人才的碰撞。我在第十章会就这一点展开阐述。

事实上，相对于土地使用管制，城市土地关系面临一个更强硬的限制因素——地理位置。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和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本身就有高山、河流等硬性地理边界，这些因素与约束人口密度的法规一起对城市开发产生限制作用。我在图2.3中对1980—2010年城市的房价增长和住宅开发面积数据进行排列，说明了城市向外扩张和房价增长的反向变动关系，即城市向外扩张并创造新住房供给的能力越强，房价增长幅度就越小。图左上角的城市（如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西雅图和华盛顿）住宅开发面积较小，房价增速很高；图右下角的城市（如拉斯维加斯、亚特兰大、奥斯汀科技中心和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的罗利市）的住宅开发面积则较大，房价增速较低。[25]

地理位置也能从其他方面推高房价。像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这样的老城市由于已被郊区包围，无法向外扩张，而那些年轻的“太阳地带”城市则可以自由征用城市周边土地。事实上，只有到达向外扩张的地理极限的城市才会在建设成熟的市区出现大幅人口增长，比如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湾区、洛杉矶和迈阿密。从1960—2014年，12万

人口从不断扩张的休斯敦市区的成熟社区流失，而实施土地使用限制法规的旧金山的成熟市区则出现了7万新增人口。



（%）
200
150
100
50
0
房价变化
旧金山
波士顿
纽约
洛杉矶
西雅图
圣迭戈
华盛顿
弗吉尼亚海滩
波特兰
迈阿密
萨克拉门托
哈特福德
芝加哥
密尔沃基
圣路易斯
匹兹堡
克利夫兰
辛辛那提
印第安纳波利斯
丹佛
格林斯伯勒
坦帕
纳什维尔
杰克逊维尔
奥兰多
达拉斯
圣安东尼奥
休斯敦
菲尼克斯
罗利市
奥斯汀
亚特兰大
拉斯维加斯
0
50
100
150
200
250（%）
住宅面积的扩张

图2.3 部分美国城市地理位置与房屋价格的关系

资料来源："美国城市的扩张放缓了吗？"，2016年4月18日，www.buildzocm.com/blog/cities-expension-slowing。

注：圆圈大小与人口增长成正比。

2010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艾伯特·赛斯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地理位置对房价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土地使用法规。虽然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和波士顿等城市也有限制性土地使用法规，但地理位置才是房价暴涨的关键因素。[26]

人们普遍认为工薪阶层在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内经济状况更好，尽管土地和住宅价格高昂，但工资报酬水平更高。因此，高新技术和知识产业聚集还为超级城市带来了关联行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机会，由这种乘数效应引发的额外效用应运而生。[27]

这一观点有数据支撑，表2.2分别列出了扣除住房支出后工薪阶层剩余工资最高和最低的五个大城市（人口超过100万）[28]。最高的五个城市都是技术中心和超级城市，硅谷中心圣何塞的工薪阶层平均每年剩余工资为48566美元，旧金山为45200美元，华盛顿为43308美元，波士顿和纽约分别为42858美元和42120美元，它们都远超奥兰多（25774美元）和拉斯维加斯（26194美元）。事实上，如果从整体收入水平来考量，不论是工薪阶层整体，还是其中的三个主要阶层（即高薪创意阶层、蓝领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都存在在大城市中收入较高，并且收入水平与城市人口规模呈正相关的现象。[29]

表2.2 扣除住房支出后工薪阶层剩余工资（美元）

	工薪阶层	创意阶层	服务业阶层	蓝领工人阶层
剩余工资最高				
圣何塞	48 566	80 503	14 372	23 109
旧金山	45 200	71 741	16 806	26 920
华盛顿	43 308	70 030	13 925	21 539
波士顿	42 858	66 871	16 206	25 233
纽约	42 120	71 245	17 861	27 343
剩余工资最低				
奥兰多	25 774	50 002	12 903	21 173
拉斯维加斯	26 194	53 137	14 394	27 103
加州河滨	27 296	54 191	13 501	20 777
迈阿密	27 482	53 809	14 099	20 452
弗吉尼亚海滩	28 448	51 601	13 284	22 939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但是超级城市较高的剩余工资水平则主要归功于优势创意阶层的高收入。如果分别看三个阶层各自的情况，结果大相径庭。高收入的创意阶层完全有能力支付更高的住房费用，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的经济状况则不容乐观。在圣何塞，创意阶层扣除住房支出后的平均剩余工资为80503美元，而蓝领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的平均剩余工资分别为23109美元和14372美元；旧金山的数据分别为71741美元、26920美元和16806美元；纽约则为71245美元、27343美元和17861美元。

这种差别在发达城市中可能更为明显，但在其他350多个大城市中也普遍存在。创意阶层扣除住房支出后的剩余工资与住房支出呈正相关性，但是对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来说，剩余工资则与住房支出呈负相关性。[30] 由此得到的结论十分可怕：虽然超级城市极具创新活力和经济生产力，但优势阶层获得了最大的经济收益，而弱势的蓝领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则被他们远远甩在身后，收入增长赶不上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

在更宏观的尺度上，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高房价是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的一个关键因素，甚至是唯一的关键因素。托马斯·皮凯蒂提出代际不平等的根源可以用著名公式“r>g”来表达，即资本回报率高于整体经济增长率。实际上，资本的超高回报率更多来自不动产增值，而非股票或债券等资产的收益。马修·荣格依利的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现在，房地产增值占资本收入的比值已经翻了3倍，远超其他类型的资本回报。荣格依利写道：“因为房产的所有权十分广泛，所以它不符合传统的劳动力与资本理论，它的增长也不能简单地用其他收入分化理论解释，如劳动者议价能力和科技地位的提升等。”换言之，这类收益完全是地段的租金。简单来说，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土地和房屋所有者成了资本主义的最大赢家，他们彰显身份的顶层阁楼、豪华别墅和其他不动产就是皮凯蒂“r>g”公式的直观体现。[31]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直面新城市危机的核心要素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聚合力迅速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和贫富差距扩大的源头，人才与经济活动在越来越少的几个城市聚集，不仅将世界城市

划分为赢家和输家两个阵营，还让赢家城市越来越贵，变成顶尖优势群体的专属地盘。这个残酷循环只是单单有利于经济优渥的土地和房屋所有者，而对于除了他们之外所有人都不是好消息。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探究土地关系带来的冲突和矛盾，讨论它如何让三个群体——超级富豪、科技人员和商人、艺术家和其他文艺创作者为了空间相互竞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新城市危机中最明显的断层线是如何产生的。

[1] Geoff Manaugh and Kelsey Campbell-Dollaghan, “Sneak Peek of SimCity:Cities of Tomorrow,” Gizmodo，October 11，2013，http://gizmodo.com/sneakpeek-of-simcity-cities-of-the-future-1443653857.

[2] 据我所知，超级城市一词最早来自2013年经济学家Joseph Gyourko、Christopher Mayer和Todd Sinai的研究报告，指房价上涨速度长期位于前列的美国城市。参见“Superstar Citi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 5, no. 4 (2013): 167–199。

[3] Robert Frank and Philip J. Cook,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Why the Few at the Top Get So Much More Than the Rest of Us (New York: Penguin,1996); Sherwin Rosen, “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no. 5 (1981): 845–858.

[4] 该比值到1978年上升至30倍，到1995年上升至123倍，到2000年（也就是弗兰克和库克的理论成型前后）到达383倍，自2008年经济危机后一直徘徊在在300倍左右。参见Lawrence Mishel and Jessica Schieder, “Stock Market Headwinds Meant Meant Less Generous Year for Some CEO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July 12, 2016, www.epi.org/files/pdf/109799.pdf; Ric Marshall and Linda-Eling Lee, Are CEOs Paid for Performance?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quity Incentives, MSCI Research Insight, July 2016, www.msci.com/documents/10199/91a7f92bd4ba-4d29-ae5f-8022f9bb944d; Theo Francis, “Best-Paid CEOs Run Some of Worst-Performing Companie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5, 2016,www.wsj.com/articles/best-paid-ceos-run-some-of-worst-performingcompanies-1469419262. 不难想像，这项研究呼吁大幅削减股权薪酬。

[5] 我在《大西洋月刊》的同事德里克·汤普森称之为“富人更富原则“。参见 Derek Thompson, “The Richest Cities for Young People: 1980 vs. Today,”The Atlantic, February 15, 2015, 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5/02/for-great-american-cities-the-rich-dont-always-get-richer/385513。

[6] 超级城市指数使用了五个指标，第一个指标衡量经济实力，基于布鲁金斯学会全球都市观察报告的经济产出和人均经济产出数据，参见Joseph Parilla, Jesus Leal Trujillo, and Alan Berube, Global Metro Monitor 2014:An Uncertain Recovery,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4,

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Reports/2015/01/22-global-metro-monitor/bmpp_GMM_final.pdf?la=en. 第二个指标衡量金融实力，基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该指数评估城市的银行、金融和投资业发展状况，参见Mark Yeandle, Nick Danev, and Michael Mainelli,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Z/Yen Group, 2014, www.zyen.com/research/gfci.html. 第三和第四个指标衡量全球竞争力，分别是《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Global City Competiveness）和A. T. Kearney的全球城市指数（Global Cities Index），这两个指标追踪全球城市的商业活动、人才和竞争力情况，参见Citigroup, Hot Spots 2025:Benchmarking the Future Competitiveness of Cities,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3, www.citigroup.com/citi/citiforcities/pdfs/hotspots2025.pdf; Mike Hales, Erik R. Peterson, Andres Mendoza, and Johan Gott, Global Cities,Present and Future: 2014 Global Cities Index and Emerging Cities Outlook,AT Kearney, 2014, www.atkearney.com/research-studies/global-cities-index/full-report. 第五个指标衡量生活质量，基于联合国城市繁荣指数（UN City Prosperity Index），该指数从生产力、基础设施、生活质量、公平与社会包容度以及环境可持续性这五个方面评估城市的繁荣程度，参见联合国人居署,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2/2013: Prosperity of Cities(New York: Routledge, 2013),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745habitat.pdf。

[7] Richard Florida, "The World Is Spiky,"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2005), 48–51,www.theatlantic.com/past/docs/images/issues/200510/world-is-spiky.pdf.

[8] John Schoales, "Alpha Clusters: Creative Innovation in Local Economies,"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 no. 2 (2006): 162–177.

[01] "纽约的一分钟"，形容顷刻之间。——译者注

[9] 例如, Luís M. A. Bettencourt, José Lobo, Deborah Strumsky, and Geoffrey B.West, "Urban Scaling and Its Deviations: Revealing the Structure of Wealth,Innovation, and Crime Across Cities," PLOS ONE (November 10, 2010)。

[10] Richard Florida, Hugh Kelly, Steven Pedigo, and Rosemary Scanlon, New York City: The Great Reset, NY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July 2015,www.pageturnpro.com/New-York-University/67081-The-Great-Reset/default.html#page/1.

[11] Richard Florida, "Why Some Cities Lose When Others Win," CityLab,March 30, 2012, www.citylab.com/work/2012/03/why-some-cities-losewhen-others-win/1611; Aaron M. Renn, "The Great Reordering of the Urban Hierarchy," New Geography, March 26, 2012, www.newgeography.com/content/002745-the-great-reordering-urban-hierarchy.

[12] 数据来自Zillow's Research Data网站, www.zillow.com/research/data. 需要注意的是，Zillow的数据排除了以下的数据保密州：阿拉斯加州、爱达荷州、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缅因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蒙大拿州、新墨西哥州、北达科他州、德克萨

斯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即便如此，Zillow还是为我们观察超级城市和超级社区与其他地方的房价差距提供了有益参考。

[13] 关于聚合力的问题，参考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Macmillan, 1890); Jane Jacobs, The Economy of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1969); Paul Krugm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no. 3 (June 1991): 483–499; Robert E.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no. 1 (1988): 3–42. On diversity and immigration, see AnnaLee Saxenian,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Vivek Wadhwa, AnnaLee Saxenian, and F. Daniel Siciliano, America’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Then and Now (Kansas City, MO: Kauffman Foundation, 2012), www.kauffman.org/~/media/kauffman_org/research%20reports%20and%20covers/2012/10/then_and_now_americas_new_immigrant_entrepreneurs.pdf。

[14] William Alonso, “A Theory of the Urban Land Market,” Regional Science 6,no. 1 (1960): 149–157; William Alonso, Location and Land Use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5] Willie Larson, New Estimates of Value of L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15, www.bea.gov/papers/pdf/new-estimates-ofvalue-of-land-of-the-united-states-larson.pdf; Richard Florida, “The Real Role of Land Val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ityLab, April 10, 2015, www.citylab.com/housing/2015/04/the-real-role-of-land-values-in-the-unitedstates/389862.

[02] 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编者注

[03] 1平方英尺约为0.09平方米。——编者注

[16] 数据来自Joe Cortright, “The Market Cap of Cities,” City Observatory, January 1 2016, http://cityobservatory.org/the-market-cap-of-cities. Cortright 结合了Zillow网站对自有房产的估值28.4万亿美元和他自己对租赁房产的估值5.8万亿。他在邮件中解释，他利用Zillow网站上年租金原始数据估测租赁房产价值。例如，为了得到美国租赁房产总价值，他用Zillow网站提供的年租金总额5350亿美元的和65%的净营业收入比计算得到租赁市场净收入3500亿美元，然后除以6%的资本收益率的得到5.8万亿的总值。自有房产和租赁房产的原始数据都来自Svenja Gudell, “How Much Would It Cost to Buy Every Home in America?” Zillow Blog, December 30,2015, www.zillow.com/research/total-housing-value-2015-11535。

[17] Gyourko, Mayer, and Sinai, “Superstar Cities.”

[18] 数据来自Anna Scherbina and Jason Barr, “Manhattan Real Estate: What’s Next,” Real Clear Markets, February 8, 2016, www.realclearmarkets.com/articles/2016/02/08/manhattan_real_estate_whats_next_101995.html。

[04] 邻避（NIMBY），是“Not In My Backyard”的首字母缩写，意为“别在我家后院”。——译者注

[19] “邻避“（NIMBY ）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也有人认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使用了。参见 Michael Dear,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the NIMBY Syndrom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8, no. 3 (1992): 288–300. There is a rapidly expanding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s of NIMBYism and land use restrictions on housing costs and urban development. See, Edward Glaeser, The Triumph of the City (New York: Penguin, 2011); Ryan Avent, The Gated City (Seattle: Amazon Digital Services, 2014); Ryan Avent, “One Path to Better Jobs: More Density in Citie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2011, www.nytimes.com/2011/09/04/opinion/sunday/one-path-to-better-jobs-more-density-in-cities.html; Matthew Yglesias, The Rent Is Too Damn High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12); Matthew Yglesias, “NIMBYs Are Killing the National Economy,”Vox, April 25, 2014, www.vox.com/2014/4/25/5650816/NIMBYs-arekilling-the-national-economy. On the increase in court cases about land use issues, see Peter Ganong and Daniel Shoag, “Why Has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in the U.S. Declined?,”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2015,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81216。

[20] Richard Florida, “Bring on the Jets at Island Airport,” Toronto Star,December 17, 2013, www.thestar.com/opinion/commentary/2013/12/17/bring_on_the_jets_at_the_island_airport.html; 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Thomas Holgersson, “Up in the Air: The Role of Airport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54, no. 1(2015): 197–214; Jordan Press, “Trudeau Government Says No to Expansion of Toronto Island Airport,” Toronto Star, November 21, 2015, www.thestar.com/news/canada/2015/11/27/trudeau-government-says-no-to-expansion-oftoronto-island-airport.html.

[21] Hans Brems, “Cantillon Versus Marx: The Land Theory and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0, no. 4 (1978): 669–678; Anthony Brewer, “Cantillon and the Land Theory of Valu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 no. 1 (1988): 1–14; David Ricardo, “On Rent,” in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821), chap. 2, available at www.econlib.org/library/Ricardo/ricP.html;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Bantam Classics Reprint ［New York: Bantam, 2003 (1776)］.

[22] Ryan Avent, “The Parasitic City,” The Economist, June 3, 2013, 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3/06/london-house-prices; Noah Smith, “Piketty’s Three Big Mistakes,” Bloomberg View, March 27, 2015,www.bloombergview.com/articles/2015-03-27/piketty-s-three-big-mistakesin-inequality-analysis. Emphasis is from the original.

[23] 关于旧卢德分子的讨论，参见Kirkpatrick Sale, Rebels Against the Future:The Luddites and Their War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essons for the Computer (Boston: Addison-Wesley, 1995)。

[24] Chang-Tai Hsieh and Enrico Moretti, “Why Do Cities Matter? Local Growth and Aggregate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15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y

2015. 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Jason Furman和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董事Peter Orszag提到，“最好把城市区域规划法规理解为对房地产市场的供给限制，这些法规通过限制建筑高度、规定最小单位面积、给多户住宅设置复杂的审批流程或直接禁止修建多户住宅等方式有效限制某一区域内的建筑数量。”参见他们的著作Firm-Level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Rents in the Rise in Inequality和在哥伦比亚大学纪念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活动“一个公平的社会”上的演讲，October 16, 2015, 7–8, 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page/files/20151016_firm_level_perspective_on_role_of_rents_in_inequality.pdf. 也参见2016年总统经济报告的“Inclusive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2016), chap. 1, p. 44.除此之外，这类法规也加深了贫富群体的地理隔离和孤立，参见Michael C. Lens and Paavo Monkkonen,“Do Strict Land Use Regulations Make Metropolitan Areas More Segregated by Incom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82, no. 1 (2016):6–121. 这种土地使用法规太过严苛，所以也被称作“新排他性区域规划”。参见John Mangin, “The New Exclusionary Zoning,” Stanford Law and Policy Review 29, no. 1 (January 2014): 91–120; William Fischel,Zoning Rules! The Economics of Land Use Regulation,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2015。

[25] 数据和图表来自房地产网站BuildZoom首席经济学家伊希斯·罗门的研究，参见 Issi Romem, “Has the Expansion of American Cities Slowed Down?”BuildZoom, May 15, 2016, www.buildzoom.com/blog/cities-expansion-slowing.该部分讨论也参考了Richard Florida, “Blame Geography for High Housing Prices?” CityLab, April 18, 2016, www.citylab.com/housing/2016/04/blamegeography-for-high-housing-prices/478680. 奥斯汀的数据有一定的欺骗性：该地区虽然房价增速温和，但存在严重的住房负担问题：它的房价可能低于旧金山，波士顿或华盛顿，但收入中位数也更低，约一半租房者面临沉重的居住成本负担。

[26] Albert Saiz, “The Ge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Housing Suppl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no. 3 (2010): 1253–1296; Yonah Freemark,“Reorienting Our Discussion of Urban Growth,” The Transport Politic, July 6,2016, www.thetransportpolitic.com/2016/07/06/reorienting-our-discussionof-city-growth. Freemark记录了美国前一百大城市的人口变化，对比了这些城市的总人口、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英里4000人的地区）的变化、以及市中心区域（以市政厅为中心方圆1.5到3英里的区域）的人口变化。

[27] 参见 Enrico Moretti, 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2)。

[28] Richard Florida, “Cost of Living Is Really All About Housing,” CityLab,July 21, 2014, www.citylab.com/housing/2014/07/cost-of-living-is-reallyall-about-housing/373128; Richard Florida, “The U.S. Cities with the Most Leftover to Spend… After Paying for Housing,” CityLab, December 23,2011, www.citylab.com/housing/2011/12/us-cities-with-most-spend-afterpaying-housing/778.

[29] 平均工资与城市人口数量呈正相关关系（0.58），并且这一关系适用于所有三个劳动力阶层：知识、专业与创意阶层（0.69）、服务业阶层（0.46）和蓝领工人阶层（0.28）。

[30] 住房成本与创意阶层扣除住房支出后剩余工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0.58），与服务业阶层和蓝领工人阶层扣除住房支出后剩余工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36和-0.20）。

[31]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Matthew Rognlie,“Deciphering the Fall and Rise in the Net Capital Shar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2015, www.brookings.edu/~/media/projects/bpea/spring-2015/2015a_rognlie.pdf. 虽然有人批评罗格利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皮凯蒂的观点，但我认为它明确了住房在不平等加剧问题中扮演的角色。Felix Salmon referred to the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r>g” in his “Lessons from a $110 Million Penthouse,”Medium，June 8，2014，https://medium.com/@felixsalmon/lessons-from-a-110million-penthouse-ca23db711df2。

第三章 精英城市

2013年，著名新浪潮乐队“传声头像”的主唱大卫·拜恩就曾提出警告：“如果纽约财富金字塔顶端1%的人开始扼杀创意人才，我就会离开纽约。”[1]他认为纽约高速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带来文化灾难，“多数曼哈顿社区和部分布鲁克林社区基本已是富人区，中产阶级已经很难负担得起纽约的生活成本，就更别提那些年轻艺术家、音乐人、演员、舞蹈演员、作家、记者和小生意人了，城市的活力源泉在慢慢消失”。

拜恩不是唯一提出警告的。著名朋克摇滚歌手、诗人、传记作家以及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帕蒂·史密斯在被问及年轻人还能否在纽约做出一番事业时回答：“纽约已经不属于年轻人和想白手起家的奋斗者了，可以看看其他城市，比如底特律和波基普西。总之，我的建议是换个地方。”[2]

2014年，电子音乐人莫比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花140美元就能在14街与几个形形色色的音乐人和艺术家一起合租公寓。那时纽约艾滋病蔓延、经济萧条、谋杀率居高不下，大家都避之不及。但即便如此，曼哈顿仍是世界文化之都，其混乱而危险的环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它的文化繁荣。当然，后来一切都变了，纽约成了金钱之都，人们认为房租占薪水的30%很正常，对一些人来说，曼哈顿现在的房租甚至是他们薪水的300%。”[3]

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和艺术家都亲身体会到了城市转型带来的影响。[4]事实上不只他们，很多学者和政客也开始担忧超级城市可能会抑制创新。前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高级顾问、促成伦敦科技繁荣的关键人物罗恩·席尔瓦曾说：“很多人离开纽约，去了洛杉矶，我们应警惕这种人口流失现象在伦敦上演。失去艺术家的后果很严重，城市会失去领先地位。”[5]

富有创造力的城市生态系统需要立足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如果没有城市融合带来的骚动，城市会了无生趣。在如今的苏荷区，奢侈品商店似乎比演出场所和艺术工作室还多，富人纷纷迁入城市核心地带。但即便是房价飙升导致年轻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越来越难在苏荷等社区立足，一些主要的创意社区都在转型，城市也没有失去创新活力，变得死气沉沉，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城市的创新能力有所下滑。纽约、伦敦、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城市通过把创新和科技行业融入自己的经济中来巩固自己的创新优势。毕竟，城市规模很大，创造力可以在社区之间转移。不排除城市变革在将来危及超级城市创新能力的可能性，但目前还言之过早。

拜恩、莫比和史密斯的担忧其实反映了城市空间竞争日趋白热化的现实。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只有艺术家、音乐人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愿意把废弃的城市空间改造成工作室，但现在他们却遭到了金融人士、企业家、科技人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超级富豪的排挤。以纽约的西切尔西区为例，在几十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肮脏的工业区，后来廉价的阁楼和公寓吸引来一批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也包括很多同性恋，于是这里开始出现酒吧、画廊和餐馆。慢慢地，社区越来越安全而富有魅力，经济条件更好的人开始迁入，带来了高端的商场、餐馆和酒店，艺术家的阁楼和工作室也逐渐被创业公司和科技企业取代。高线公园的建成是社区变革的又一个关键拐点，这里开始变成高端公寓聚集地，以迎合更富裕人群的需求。

创意工作者认为他们在城市土地战争中的对手是更富裕的阶层。然而尽管绝大部分创意工作者算不上真正的富人（拜恩、史密斯和莫比除外），但以普通美国人的标准看，他们也属于相对优势人群。扣除住房支出后的剩余可支配收入数据就足以说明问题：在纽约，艺术家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扣除住房支出后平均剩余年薪为52750美元，低于科技人员（65900美元）和商业与金融从业者（88700美元），但已是服务业从业者（17860美元）的约3倍；在洛杉矶，艺术家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扣除住房支出后平均剩余年薪和纽约差不多，为53760美元，低

于科技人员（64350美元）和商业与金融从业者（75870美元），却是服务业从业者（15350美元）的3.5倍有余；在旧金山，艺术家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扣除住房支出后平均剩余年薪为47200美元，仍然低于科技专家（70000美元）和商业与金融从业者（84900美元），却是服务业从业者（16800美元）的近3倍。[6]

这并不代表超级城市中所有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的经济状况都不错，很多人状况并不容乐观，甚至不得不离开原来生活的社区。但经验表明他们的整体经济状况更接近优越的城市精英群体，而不是相对劣势的服务业阶层。

随着超级富豪涌入纽约、伦敦等超级城市，新一轮城市空间竞争开始了。在这一章，我将先对竞争的根源和本质进行讨论，然后探讨创业公司、风险投资和科技从业者从传统郊区涌入城市中心的现象，最后通过数据分析拜恩、史密斯和莫比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房价上涨和富豪涌入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相关数据导向一个明确结论：迄今为止，所谓的城市创造力消亡只不过是谣言。新城市危机的症结不是新城市精英内部的派系冲突，而是弱势群体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和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

最近几年，我每次去伦敦都能从出租车司机那里听到同样的故事。在途经海德公园往返机场的路上，司机一定会指着文华东方酒店旁的现代玻璃大楼说：“看见那栋楼了吗？那儿有5000多万美元的公寓，但根本没人住，晚上永远黑漆漆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2014年，伦敦的高端社区里至少有740套价值500万美元以上的公寓无人居住。

纽约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在曼哈顿，闲置公寓数量从2000年的19000套增加到2001年的34000套，增长率接近70%；在上东区，一片占地三个街区的区域里有57%的公寓每年的闲置时间长达10个月。[7]

越来越多的评论员认为全球超级富豪正逐步占领纽约、伦敦和巴黎等城市。2013年和2014年，外国购房者（包括伦敦市居民和非居民）买下了伦敦市中心地段近一半售价高于100万英镑的住宅。伦敦高端社区里上演的激烈空间竞争意味着过去的“绅士化”开始转变为“富豪化”或“寡头政治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被富有的外国购房者挤出高端社区的不仅有穷人和工人阶级，还包括一些传统精英阶层与富贵世家。虽然在如今城市贫富差距之大史无前例、工人阶级住不起房子、穷人只能蜗居在破烂社区的情况下，没人会同情那些把房产以天价卖给购房者并大赚一笔的外国富人，但这也足以反映，超级城市部分昂贵地段已经成了镀金的全球富豪聚集区，而且还被大量闲置。[8]除了富豪之外，大型公司、房地产投资信托、对冲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也在超级城市大手笔购房置业。全球城市专家萨斯基雅·萨森估计，到2015年，企业对城市房地产的投资总和已超过10000亿美元。《纽约时报》通过对高端建筑群时代华纳中心的详尽调查，披露了超级富豪普遍用空壳公司隐藏身份的现象。新建的卡耐基57号大楼的售价在纽约市名列前茅，超过3/4的业主都用匿名公司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9]

富豪在超级城市置业并不是传统的住宅购置行为，这些房屋没有人居住，只是一种安全的财富保值手段。托斯丹·范伯伦认为，在20世纪初，购买高端房产就是用来衡量和展示财富实力的炫耀性消费。而现在高端房产变得实用多了，属于用来对财富保值增值的新经济资产类别。[10]

大量证据表明，纽约和伦敦确实聚集了大量富人，其中伦敦千万富豪数量最多，而纽约的亿万富豪数量最多。纽约的116位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达到5370亿美元（见图3.1）；在亿万富豪数量排行榜上紧随纽约之后的是旧金山湾区（包括硅谷），它拥有的71位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为3650亿美元；莫斯科排名第三，68位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为29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的亿万富豪多为寡头集团掌控者，最近几年原材料价格下跌和卢布贬值导致他们的资产大幅缩水，

我们也能从本书第二章看到，莫斯科在全球超级城市排行榜中排名靠后）；香港排名第四，有64位亿万富豪；洛杉矶排名第五，有51位亿万富豪；伦敦排名第六，有50位亿万富豪。伦敦比纽约更依赖海外资产：伦敦的50位亿万富豪中有26位是外国人，占比超过50%；而纽约的116位亿万富豪中只有10位是外国人，占比低于10%。全球亿万富豪数量排行榜前十的其他城市依次为北京（46位）、孟买（33位）、迈阿密（31位）和伊斯坦布尔（30位）。排行榜再往下看，七个城市拥有20~30位亿万富豪（首尔、巴黎、圣保罗、深圳、台北、达拉斯和新加坡），三十个城市拥有10~20位亿万富豪（华盛顿、波士顿、亚特兰大、菲尼克斯、西雅图、多伦多和墨西哥城等）。总的来说，城市人口越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越强，金融和科技产业规模越大，亿万富豪数量越多，并且富豪的总资产净值越高。[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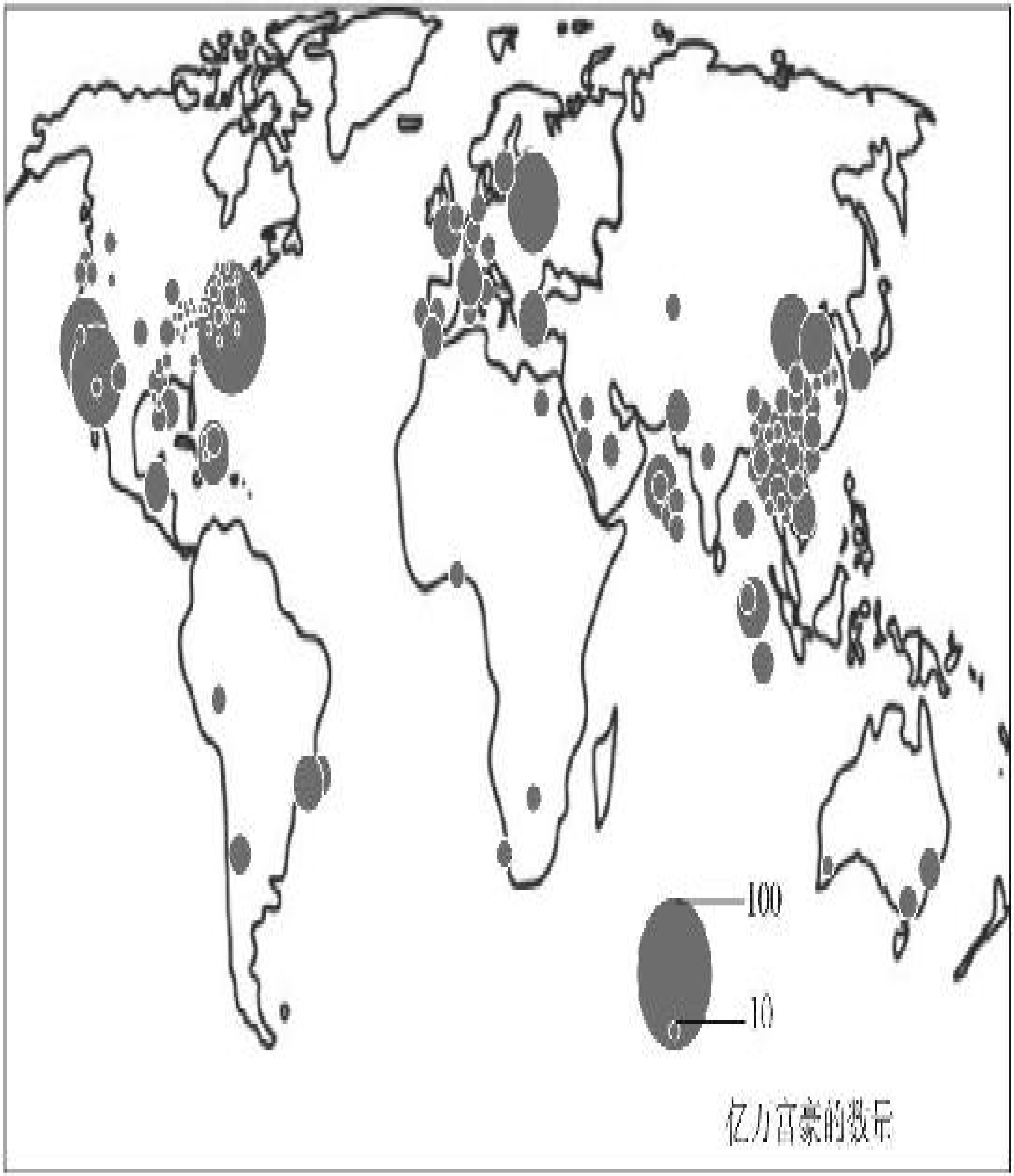


图3.1 亿万富豪都住在哪里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福布斯》，2015年。

图3.2展示了更广义的富人群体——即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所谓“超高净值人群”的全球分布情况。占全球人口0.002%的173000位千

万富豪共拥有约20万亿美元的财富。[12] 在千万富豪城市排行榜中，伦敦以拥有4364位千万富豪占据榜首，东京、新加坡、纽约和香港位列其后。

但这是个问题吗？超级富豪真的会对伟大城市造成负面影响吗？尽管少有人住的奢华住宅确实令某些社区缺乏活力，但超级富豪的数量远不足以抑制整座城市或整个核心城区的发展。纽约市有800多万居民和约300万套住宅，而116位亿万富豪加上约3000位千万富豪甚至填不满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一半的座位。另外，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全球购房热潮从2016年就开始降温了。因为新兴经济体（尤其是石油国家）自身经济状况堪忧，还面临货币贬值的问题，同时美国开始管制海外投资者在美国的房地产投资，包括一些实为洗钱的交易。总之，伟大城市的入侵者与其说是超级富豪，不如说是人口庞大的优势阶层，比如卖掉郊区住宅而到超级城市购房的企业家、风险投资人和高薪的科技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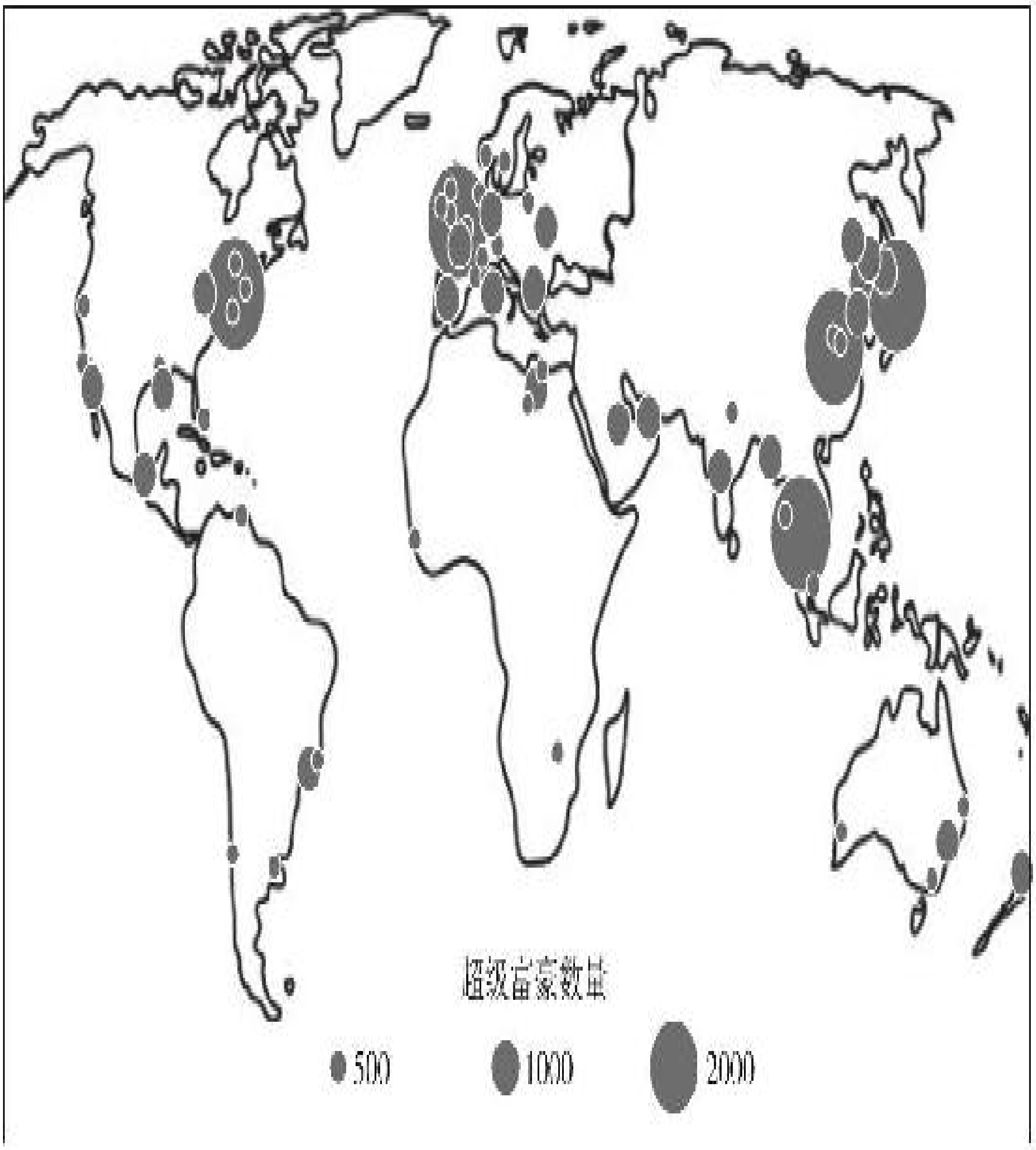


图3.2 超高净值人群的居住地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莱坊地产咨询公司，财富报告（2015），www.knightfrank.com/research/the-wealth-report-2015-2716.aspx。
注：超高净值人群，指购买的房屋价值在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人群。

10年前我并没有预料到如今科技创业公司和人才会向城市迁徙。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英特尔、苹果和谷歌等顶级科技公司把公司总部设在硅谷，微软把总部设在华盛顿雷德蒙德郊区，其他科技公司则聚集在波士顿128号公路附近的郊区、奥斯汀郊区或者北卡罗来纳州科研三角带的办公园区。20世纪80年代末，当我和马丁·肯尼刚开始研究风险投资和科技产业的地理分布时，大部分获得风投资金的创业公司也设立在这些郊区。[13]

后来，它们的地理分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和创业公司流向城市中心。2012年，坐拥近65亿美元风投资金的旧金山都会区雄踞世界风投资金榜首，超过了拥有42亿美元风投资金的圣何塞地区（包括硅谷）和拥有超过20亿美元的纽约都会区，其中纽约地区的大部分风投资金集中在曼哈顿下城区。到2013年，旧金山都会区的风投资金量高达85亿美元，其中62亿流入旧金山市，圣何塞都会区为48亿美元，纽约都会区为30亿美元。[14]

2013年，全美有54%的风投资金和57%的创业公司集中在城市地区。在旧金山湾区，60%的风投资金流向了适合步行的人口密集城区。在纽约，这一数字更是超过80%。在能够吸引全国各地风险投资的地区，通勤方式为步行、单车或公共交通的人数比例（16.6%）是全国平均水平（8.4%）的近两倍。另外，50%以上的工人采取上述通勤方式的地区共吸引了全美1/4以上的风投资金，超过30%的工人采取上述通勤方式的地区则吸引了全美1/3以上的风投资金。2013年旧金山市区有两个区域都有超过60%的人采取上述通勤方式，这两个区域各自吸引了超过10亿美元风投资金。

城市内的整体人口密度对科技创业公司扩大影响力和吸引风投资金至关重要，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高等教育的人口密度和创意阶层的人口密度，仅略逊于科技行业的聚集程度这一吸引风险投资的最初因素。[15]

虽然有一部分风投资金流入小城市或郊区，但它们也选择了最具城市特征的地带。硅谷的风险投资中心是帕洛阿托市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位于斯坦福大学旁边，汇集了超过15亿美元的风投资金。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风投资金规模也超过了10亿美元，远超过波士顿128号公路的沿线郊区。人口密集、适宜步行的圣莫尼卡吸引的风投资金规模也两倍于面积更大的洛杉矶。

科技初创企业向城市汇集的趋势也蔓延到了其他国家。金融中心伦敦以前几乎没有任何科技产业，如今却有数千个科技公司，创造了数万个科技就业岗位，创业公司每年获得超过8亿美元风投资金，规模已经超过了西雅图和奥斯汀。[16]出现在全球风投资金和初创企业城市排行榜的前20名的非美国城市还有北京、上海、孟买、班加罗尔、多伦多、巴黎和莫斯科。另外，欧洲的柏林、阿姆斯特丹、利物浦和慕尼黑以及中东的特拉维夫和安曼的市中心也都出现了创业园区（见表3.1）。

表3.1 全球风险投资城市排行榜

排名	城市	风投资金（百万美元）
1	旧金山	6 471
2	圣何塞	4 175
3	波士顿	3 144
4	纽约	2 106
5	洛杉矶	1 450
6	圣迭戈	1 410
7	伦敦	842
8	华盛顿	835
9	北京	758

续表

排名	城市	风投资金（百万美元）
10	西雅图	727
11	芝加哥	688
12	多伦多	628
13	奥斯汀	626
14	上海	510
15	孟买	497
16	巴黎	449
17	班加罗尔	419
18	费城	413
19	菲尼克斯	325
20	莫斯科	318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2012年汤森路透数据。

很多领先的创业城市本身也是世界主要超级城市。全球超级城市排行榜顶端的纽约、伦敦和洛杉矶的风投资金规模在全球城市中分别位列第四、第七和第五。其他世界顶尖超级城市（如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北京和上海）也都在风投资金规模方面遥遥领先，科技风投资金规模榜单的前25名中有11个是全球超级城市。[17]创业公司在给城市带来创新活力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从超级城市中获得了发展动力。

创业公司和城市是天生一对。城市的多元开放、创新活力、文化丰富性和朝气蓬勃的街头生活，能为初创企业急需的新思想提供肥沃的孕育土壤。虽然微软、苹果和脸书等成熟大型科技公司的庞大总部还在郊区，但创业公司能对城市废弃工厂和仓库的建筑空间进行灵活改造并加以利用。

以前成功的创业公司往往专注于开发生产软件或硬件，廉价的郊区更能满足它们对大型设备和厂房的需求。而如今热门初创公司则涵盖数字媒体、游戏、手机应用等行业，城市才能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设计师、作曲人、编剧、音乐人和广告撰稿人。例如，汤博乐（Tumblr）和Buzzfeed（新闻聚合网站）为了贴近主流媒体和广告公司而设立在纽约。[18]有的创业公司则是为了提高城市的运作效率，比如，优步和爱彼迎分别致力于改善城市交通和提高城市短期房屋租赁市场的效率。对这类创业公司来说，城市不仅是它们的诞生地，还是一个创新平台，它们利用自己的技术特长解决城市的问题。

大城市的文化创造力对创业人才有极大的吸引力。纽约风险投资人弗雷德·威尔逊告诉我，一次他与电商平台Etsy的创始人罗布·卡伦会面时，发现卡伦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弹吉他。弗雷德称赞他是一名有天赋的音乐家，卡伦回答："弗雷德，我确实是艺术家。如果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我可能会是个音乐家，如果我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我可能会是个画家。而出生在这个年代，我的艺术就是做网站。"威尔逊补充说："做网站需要科学技能，更需要艺术才华，而大部分的艺术家都集中在城市。"[19]

2002年，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讨论过波西米亚主义价值观、丰富的文艺活动与科技创业公司发源地之间的联系。作为20世纪60年代迷幻乐的发源地，旧金山诞生了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杰弗森飞机（Jefferson Airplane）、大哥控股公司乐团（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爸爸妈妈乐队（The Mamas and The Papas）等音乐团体；西雅图出生的音乐人吉米·亨德里克斯对微软共同创始人保罗·艾伦的影响极深，以至于后者在西雅图市中心专门建造了音乐体验计划博物馆，另外西雅图还是以涅槃乐队为代表的“垃圾摇滚”流派的发源地；奥斯汀也有其另类音乐流派，与科技产业一起成长发展；纽约和伦敦更是世界艺术文化的风向标。这些不是巧合，大城市创造和革新动力覆盖了各行各业。我的实证研究表明，文艺创新活动与科技产业、商业金融产业一起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科技向城市迁徙并非对历史偏差的急转弯式修正，早在2006年，著名风险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就提前察觉到未来风向的改变。他认为，虽然硅谷的优势不容小觑，但它也存在极大弊端，这个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技行业发展天堂已经成了一个“巨型停车场”。他还写道：“旧金山和伯克利是好地方，但是它们在40英里[01]外，太远了。硅谷完全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庞大郊区，绝佳的气候使它在所有没有灵魂的庞大郊区中鹤立鸡群，但是真正有影响力的竞争对手会设法避免像硅谷一样在郊区大面积扩张。”[20]他是对的，这一预言如今已得到应验。

然而也有不少人指责科技返回城市造成城市住房负担加重，贫富差距扩大。2014年春天，奥克兰爆发游行，抗议矛头直指硅谷公司每天在奥克兰市区接送员工的班车。散发给班车乘客的传单上写着，“你们不是无辜受害者”“你们只图自己享乐，完全看不到你们周围那些贫穷、无家可归和与死亡苦苦斗争的人，因为金钱和成功已经迷住了你们的双眼”。几位抗议者甚至爬上一辆雅虎班车，其中一个人在巴士的挡风玻璃上吐口水。在旧金山米申区，抗议者打扮成小丑，带着健身球，排成金字塔阵形，在谷歌班车前跳大腿舞。

旧金山社会活动家和作家丽贝卡·索尔尼认为，这些班车就像“前来统治地球的外星霸主乘坐的宇宙飞船”。她写道：“一位享誉文坛40年、近期被提名为桂冠诗人奖候选人的杰出拉丁裔诗人，却在妻子接受化疗时被逐出住所，这可是他自成年后生活了整整35年的公寓啊！没人知道他会换个廉价公寓还是只能搬到其他城市生活，也没人知道这个已经容不下诗人的城市将走向何方。”在她眼中，湾区有两个敌对阵营：一方是“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环保人士”，另一方是刚富裕起来的科技精英。然而艺术家有时也会被归入后者阵营，2016年，洛杉矶就爆发了对艺术家和画廊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认为艺术家也是市中心的殖民者。[21]

这类冲突在旧金山由来已久。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提到过2000年旧金山针对L提案的“市场街角区战争”，这项提案主张限制旧金山市场街角区、教会区等市中心社区的科技行业发展和其他形式的绅士化发展，最后提案以微弱劣势被否决了。对旧金山绅士化发展的抗议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1985年有评论家指出，“旧金山可能是全美国最绅士化的城市，10年前蓝领阶层的生活社区现在成了年轻专业人士的聚集地，这种变化催生了消费经济，著名连锁品牌大规模推销牛角面包，一些新词汇也随之产生：雅皮士化、牛角面包潮、曼哈顿化”。[22] 在这场争夺城市空间的漫长战争中，科技初创企业和其从业人员只不过是最新出现的竞争者。

科技初创企业创造了巨额财富，这确实导致优势群体和劣势群体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提出此问题的不只是左派人士和社会活动家，风险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在一篇引发热议的文章中称创业城市和科技行业聚集地区为“不平等的制造者”，但他也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发展的代价，“只要有人创业，就会有人变富；只要有人变富，就会出现财富不均等”。他继续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长期贫困和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而我们对不平等的关注大部分时候只浮于表面症状而忽略了病因。[23]

但是在房价上涨、不平等和绅士化问题上，城市的创业公司和科技人员应当负有多大责任呢？经验证据指向了不同的结论。科技公司的迁入毫无疑问推动了城市房价上涨，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和西雅图等城市尤为明显。房价与衡量创新能力、科技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指标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度。

朋友圈每日分享精品课程书籍，微信：dubook666

然而，经济不平等和城市科技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这么明确。一方面，科技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的聚集与工资差距的扩大息息相关，这很合情合理，因为收入差距反映了城市就业市场的分化，知识型雇员的收入远高于服务业人员和蓝领工人。另一方面，统计数据也反映城市科技行业发展和更广义的收入差距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也就是说两者没有明显的关联。在第五章中我将继续讨论两种形式的不平等——工资差距和收入差距两者的区别及其产生原因。就目前来看，城市不平等的主要源头并非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而在于知识驱动型大城市具备的其他特质，正是这些特质最初吸引了科技公司及科技人员迁入城市。[24]

其他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2015年，有研究者详尽分析了过去几十年美国50个州的创新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尽管创新与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上涨有密切联系，但与更广义范围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毫无关联。[25] 事实上，创新水平越高的城市，社会的经济流动性也越高，人们更有可能进入比自己父母更高的收入层级。尽管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的房价高昂，工资差距极大，但穷人和工人阶级也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旧金山市民和其他很多人其实本能地感受到了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2014年4月对旧金山市民的一项调查显示，1/3的受访人认为，科技行业从业者把其他人“挤出了城市”，降低了城市多元化，增加了城市

排他性；但是近3/4（73%）的受访人相信，科技公司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超过一半（56%）的受访人认为，旧金山应该继续发展科技行业、提高对科技公司的吸引力。[26]

随着科技行业的迁入，城市肯定会面临房价上涨压力，旧金山尤其如此。但科技行业也能带来革新、就业、税收和经济发展。科技行业不会让城市丧失活力，相反，它能大大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对于遇到了真正问题的地方来说，把创业公司和科技人员当作替罪羊很方便，但阻挠科技向城市迁移没有任何经济意义。

毫无疑问，最近几年富人、科技和金融业的迁入引发了城市内部的剧烈冲突，给城市带来了挑战，但它们是否如一些批评家所言，削弱了城市的文化创造力呢？结论是，并没有。事实上超级城市的创新优势反而加强了。

2008年金融危机后，纽约的经济复苏依靠的不仅是它在金融、银行和房地产行业的传统优势，还有文化创意产业的扩张。2003—2013年，纽约的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了13%的惊人增长。纽约市840万人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2.6%，但它提供了美国8.6%的文化创意就业岗位（2003年这一数字是7.1%）。纽约汇集了全美28%的时尚设计师、14%的制作人和导演、12%的媒体编辑和12%的艺术指导[27]，是美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中心。

大西洋对岸的伦敦在创意产业方面的主导优势甚至比纽约还耀眼。大伦敦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2.5%，却拥有英国文化创意产业40%的就业岗位，其中约58%在电视、电影和广播行业，约43%在音乐和表演艺术行业。而且伦敦的文化优势还在扩大，2007—2014年间，伦敦为英国贡献了最大份额的创意产业就业增长。[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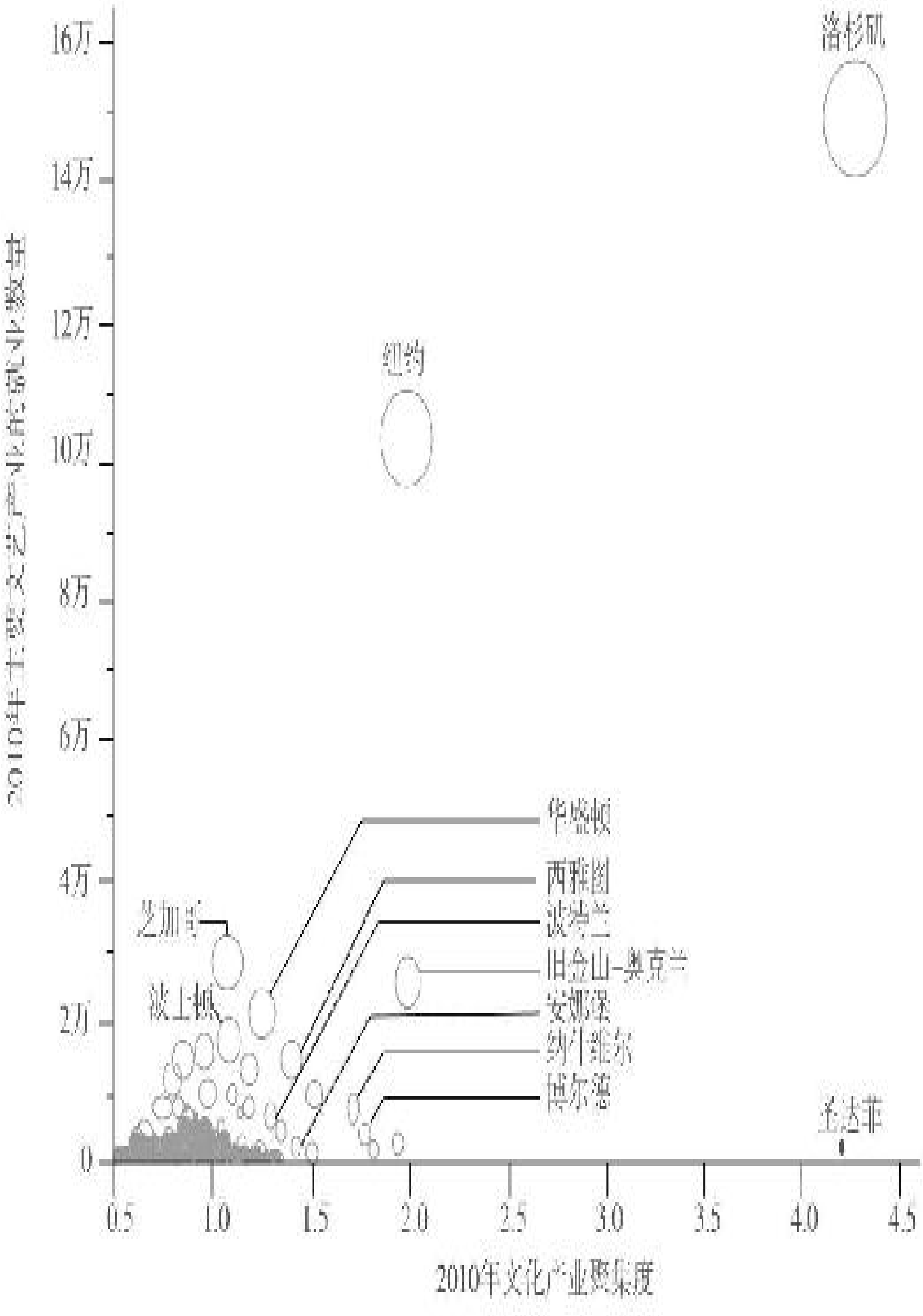
超级城市规模庞大这一因素远不足以解释创意产业的集中程度之高。我们分析了美国创意经济的地理分布，包括音乐、视觉艺术、表

演和舞蹈等，我们发现纽约和洛杉矶拥有的相关就业岗位数量远超其他城市，并且远超其城市的人口比例。[29]

纽约和洛杉矶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先其他城市多少呢？很多。洛杉矶在艺术和创意领域的就业岗位占比是美国均值的近三倍，纽约的占比是均值的两倍多。其中，单看美术行业（包括画家和雕塑师）的就业占比，洛杉矶和纽约分别是美国均值的四倍和一倍半；在音乐人和歌手方面，洛杉矶和纽约的就业占比分别是美国均值的逾两倍和三倍；在演员方面，洛杉矶和纽约的就业占比分别为美国均值的十倍和两倍半；在制片人和导演方面，洛杉矶和纽约的就业占比分别为美国均值的七倍和四倍半；在作家方面，两个城市均为美国均值的逾三倍；在时装设计师方面，洛杉矶和纽约的就业占比分别为美国均值的八倍和十倍。[30]

这两个超级城市之间当然也免不了一争高低。莫比曾在2014年说，他从纽约搬到洛杉矶是“因为创作需要能容忍失败的自由”，洛杉矶相对低廉的房租让失败没有那么可怕。他个人的经验之谈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离开纽约、前往洛杉矶的文艺创作者并不在少数。[31]然而，相较其他美国城市，洛杉矶和纽约还是傲视群雄。

图3.3展示了2010年美国部分城市在22个主要文艺产业的聚集度和就业数量，涵盖了视觉艺术、音乐、影视和设计领域。可以看出洛杉矶和纽约都十分突出，尤其是图中右上角的洛杉矶[32]。即便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影响，它们的文艺产业聚集度和相关就业机会也远远领先其他美国城市。



洛杉矶
纽约
华盛顿
西雅图
波特兰
芝加哥
旧金山-奥克兰
波士顿
安那堡
纳什维尔
博尔德
圣达菲
16万
14万
12万
10万
8万
6万
4万
2万
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2010年主要文艺产业的就业数量
2010年文化产业聚集度

图3.3 赢者通吃的文化创新

资料来源：卡尔·格罗达赫、伊丽莎白·科瑞德-霍凯特、妮科尔·福斯特以及詹姆斯·默多克，艺术人群的位置图：城市与小区级分析，城市研究51，No.13（2014）:2822-2843。

如果继续深入挖掘，还能从流行音乐的视角观测这两大城市在创意产业的主导地位。过去几十年中，纽约和洛杉矶一直是世界流行音乐的中心。实际上“赢者通吃”规则在流行音乐产业中体现得相当明显，甚至超过了金融、传媒和科技行业。通过对2007年十大流行音乐流派进行的地理分布研究，我们发现洛杉矶在其中六个流派中占领先地位，包括流行、摇滚、电子、拉丁、民谣和实验音乐；在三个流派中排名第二，包括都市、乡村和爵士乐。而纽约占领了爵士乐的榜首，并在摇滚、流行、电子、民谣和拉丁乐这五个流派中排名第二。其他比较有影响力的城市只有两个——纳什维尔在乡村和基督教音乐中排名第一，亚特兰大在都市音乐这个流派排名第一。[33]

20世纪的后50年是世界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代表人物包括早期的法兰克·辛纳屈、猫王、披头士乐队，以及后来的碧昂丝、Jay-Z（说唱歌手）和泰勒·斯威夫特，纽约、洛杉矶和伦敦在这一时期三足鼎立。[34] 1950年至今，约2/3（63.2%）的流行歌手在这三个城市生活，其中纽约占21%，洛杉矶占22%，伦敦占20%。当然，成名地不一定等同于出生地，据统计，分别只有14%、7%和2%的流行歌手出生在纽约都会区、伦敦市和洛杉矶市。披头士乐队在伦敦一举成名之前一直在英国利物浦和德国汉堡发展；著名美国本土音乐蓝调诞生于密西西比三角洲，在芝加哥发展成熟，后来才在纽约、洛杉矶和伦敦被大规模商业化；麦当娜搬到纽约之前住在底特律；麦莉·赛勒斯搬到洛杉矶之前住在纳什维尔郊区；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泰勒·斯威夫特先搬到纳什维尔，后搬到纽约；制作的热门单曲数量超过迈克尔·杰克逊的瑞典籍音乐制作人马克斯·马丁一直在洛杉矶有自己的工作室。现在这些城市可能不如从前那样适合事业刚起步的年轻音乐人和其他艺术家了，但它们仍是音乐人一夜成名、登上事业巅峰的风水宝地。

这三个城市为何如此杰出？原因之一是它们庞大的地理规模带来的巨型经济规模。它们不仅具备足够大的市场规模，还能将各行各业的人才技能汇集到一处——除了表演者和其他艺术家之外，还包括制作人、经纪人、作家、作曲人、舞蹈编导、设计师和工程师，这些都是文艺创作产业需要的。谁也不知道哪首歌能登上流行榜单，成功的永远是少数，通常要押注多次才能收获一次成功。而大型超级城市有最优秀的制作人、最完善的音乐发行支持系统和最快的新陈代谢体系，能在短时间内高效生产大量单曲，通过增加押注数量提高成功次数。另外，这些城市也是主流媒体的中心，而主流媒体在流行文化和造星活动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拥有发展完善的创意经济的城市很少见，这要求它们具备艺术、文化、技术和管理行业的综合实力。只有5%的美国城市（364个城市中的19个）拥有在各领域表现优异、功能完备的创意经济，其中包括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超级城市和一些知识技术中心，如旧金山、圣何塞、波士顿、华盛顿、西雅图和奥斯汀。它们强劲多元的经济实力不仅限于创意、科技和管理行业，还体现在其他各个领域。[35]

虽然越来越多的评论家认为，过高的房价会抑制超级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但目前来看这个问题还没出现。2014—2015年，圣何塞都市区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9%，超过美国整体经济增长率2.5%的三倍，成为美国经济增速第二的城市。附近的旧金山在同期也创造了4.1%的经济增速。[36]由此可以看出，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不但没有被削弱创造活力，还以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把其他地区远远甩在身后。

毋庸置疑，纽约、伦敦、洛杉矶和旧金山已成了最昂贵的地方，不再那么适合年轻贫穷的艺术家和音乐人生存，一些引领艺术发展的社区因此失去了创造活力。超级城市和技术中心的空间供不应求，它们有限的土地资源引来了激烈的竞争。

尽管资深音乐家和艺术家不断发出可怕的警告，但这几座城市的艺术创造力并没有被削弱，科技创造力还与日俱增。现在某些炙手可热的摇滚明星还会怀念过去的好日子，感叹那个房租低廉、酒水便宜的创新天堂一去不复返，在我看来这颇具讽刺意味。虽然当看到昔日的朋克摇滚和新浪潮音乐先锋酒吧CBGB变成一家高档服装店时，我也感到很愤怒，但总体来说，现在这几座城市的创意经济比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多了。真有人希望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和洛杉矶的经济状况吗？我认为答案显而易见。新加入的科技行业让这些在文艺创新领域有传统优势的城市获得了更强大的经济实力。

坦率地说，关于城市变迁的某些激烈争论只是来自新城市精英群体内部的派系竞争，但是更严重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这个相对占优势的群体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穷人和工人阶层在城市蓬勃发展过程中被排挤、失去立足之地，但帮助他们的途径并不在于阻断财富创造的源头，而应是让经济发展更全面和富有包容性。

人们常把现在穷人和工人阶级面临的挑战框定为城市发展绅士化，绅士化可能已经成了现在有关城市话题中最大的焦点。虽然比起控诉超级城市的文化枯竭，或者把发达知识中心面临的问题全怪在科技行业头上，关于城市绅士化的讨论显得有理有据多了，但也有一些错误观念需要澄清。在下一章中我将对城市绅士化的问题展开讨论。

[1] David Byrne, “If the 1% Stifles New York’s Creative Talent, I’m Out of Here,” The Guardian, October 7, 2013, 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oct/07/new-york-1percent-stifles-creative-talent.

[2] 来自2010年史密斯和作家乔纳森·勒瑟姆在库伯联盟学院的对话，参见See Jeremiah Moss, “Find a New City,” Jeremiah’s Vanishing New York, May 3,2010, http://vanishingnewyork.blogspot.ca/2010/05/find-new-city.html。

[3] Moby, “I Left New York for LA Because Creativity Requires the Freedom to Fail,” The Guardian, February 3, 2014, 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feb/03/leave-new-york-for-los-angeles.

[4] 参见Scott Timberg, Culture Crash: The Killing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Sarah Kendzior, “Expensive Cities Are Killing Creativity,” Al Jazeera,

December 17, 2013, 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3/12/expensive-cities-are-killingcreativity-2013121065856922461.html.

[5] Marcus Fairs, “London Could Follow New York and Lose Its Creative Class Warns Rohan Silva,” Dezeen, July 10, 2015, www.dezeen.com/2015/07/10/creative-people-designers-new-york-move-los-angeles-cautionary-talelondon-warns-rohan-silva; Alex Proud, “‘Cool’ London Is Dead, and the Rich Kids Are to Blame,” The Telegraph, April 7, 2014, www.telegraph.co.uk/men/thinking-man/10744997/Cool-London-is-dead-and-the-rich-kidsare-to-blame.html.

[6] 从统计学上来说，对于这三个群体——商业金融人士、科技人员和其他创意工作者——住房成本和扣除住房成本后剩余工资都呈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而对于服务业人员来说这两者则呈负相关的关系。住房成本和扣除住房成本后剩余工资的关系如下：商业金融人士（0.6）；科技人员(0.44)；画家、音乐家及其他文化创意工作者(0.42)。美国劳工局统计的文艺创意工作者的数据只适用于把创意工作登记为自己主要职业的人，不包含主业为其它职业的贫困或年轻艺术家。虽然我们容易对这种还在从事其他工作的有抱负的艺术家另眼相待，但其实很多其它行业的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在得到自己的理想工作之前，也可能做过一些不同的工作。

[7] 关于伦敦，参见Jonathan Prynn, Mira Bar-Hillel, and Lindsay Watling,“London’s £3bn Ghost Mansions: ‘Foreign Investors Are Using Capital’s Finest Homes as Real-Life Monopoly Pieces,’” Evening Standard, February 14, 2014, www.standard.co.uk/news/london/londons-3bn-ghost-mansionsforeign-investors-are-using-capitals-finest-homes-as-reallife-monopolypieces-9128782.html. 关于纽约，参见Sam Roberts, “Homes Dark and Lifeless, Kept by Out-of-Towners,” New York Times, July 6, 2011, www.nytimes.com/2011/07/07/nyregion/more-apartments-are-empty-yet-rentedor-owned-census-finds.html; Julie Satow, “Pieds-A-Terre Owners Dominate Some New York Building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2014, www.nytimes.com/2014/10/26/realestate/pieds-terre-owners-dominate-some-newyork-buildings.html。

[8] 关于伦敦的外国购房者，参见Patrick Worrall, “FactCheck: Are the SuperRich Killing ‘Cool London’?,” BBC Channel 4 Fact Check Blog, April 14, 2014, http://blogs.channel4.com/factcheck/factcheck-superrich-drivingproperty-prices/18073. 关于 On the displacement of established London elites by the global super-rich, see Luna Glucksburg, “Is This Displacement?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Super-Gentrification in London’s Alpha Territor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IBG)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London, August 31, 2016. “寡头统治化（oligarchification）”一词来自Feargus O’Sullivan, “No One Feels Sorry for the Latest Victims of London’s ‘Gentrification,’” CityLab, September 2, 2016, www.citylab.com/housing/2016/09/the-latest-victims-of-london-gentrification-are-therich/498536。

[9] Louise Story and Stephanie Saul, “Stream of Foreign Wealth Flows to Elite New York Real Estat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15, www. nytimes.com/2015/02/08/nyregion/stream-of-foreign-wealth-flows-to-timewarner-condos.html; “Story and Saul: The Hidden Money Buying

Condos at the Time Warner Cente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15, www.nytimes.com/2015/02/08/nyregion/the-hidden-money-buying-up-newyork-real-estate.html; Octavio Nuiry, "Are Foreigners Stashing Billions in U.S. Real Estate?" Housing News Report, September 2015, https://issuu.com/ftmagazine/docs/housingnewsreport_sept; Saskia Sassen, "Who Owns Our Cities—and Why This Urban Takeover Should Concern Us All," The Guardian, November 24, 2015, 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5/nov/24/who-owns-our-cities-and-why-this-urban-takeover-should-concern-us-all.

[10]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1994 (1899)］.

[11] 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Isabel Ritchie, The Geography of the Global Super-Rich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The-Geography-of-the-Global-Super-Rich.pdf. 我们的图是基于福布斯对全球1826名亿万富豪的统计数据，这些亿万富豪只占全球人口的0.00003%，但坐拥七万亿美元的资产，大概相当于全球经济产出的10%。亿万富豪的人数和净身家和人口数量正相关（0.41，0.33），与经济产出正相关（0.68, 0.61），与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正相关（0.47, 0.49），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也正相关（0.49, 0.52）。虽然亿万富豪多住在超级城市，也有亿万富豪仍住在他们发家的较小城市，例如，沃尔玛家族住在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沃伦·巴菲特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

[12] Knight Frank, The Wealth Report—2015, www.knightfrank.com/research/the-wealth-report-2015-2716.aspx.

[13] Richard Florida and Martin Kenney, "Venture Capital, High Technology,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al Studies 22, no. 1 (1988): 33–48;Richard Florida and Martin Kenney, "Venture Capital, High Technolog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al Studies 22, no. 1 (1988): 33–48;Richard Florida and Martin Kenney, "Venture Capital–Financed Innovation in the U.S.," Research Policy 17 (1988): 119–137; Richard Florida and Donald Smith, "Venture Capital Formation,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3,no. 3 (September 1993): 434–451.

[14] Richard Florida, "The Joys of Urban Tech,"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31, 2012,www.wsj.com/articles/SB10000872396390444914904577619441778073340;Richard Florida, "The Urban Tech Revolution," Urban Land, October 7, 2013,http://urbanland.uli.org/economy-markets-trends/the-urban-tech-revolution;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 Rise of the Startup City: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the Venture Capital Financed Innovation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4),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tartupCity-CMR-FINAL-formatted.pdf.

[15] 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Venture Capital Goes Urban: Tracking Venture Capital and Startup Activity Across US Zip Code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venture-capital-goes-urban;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Rise of the Urban Startup Neighborhood:Mapping Micro-Clusters of Venture Capital–Based Startups (Toronto: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rise-of-the-urban-startupneighborhood. 风险投资与人口密度的相关系数是0.55，与大学毕业生的相关系数是0.50，与创意阶层的相关系数也为0.5。比人口密度相关系数更高的只有科技行业聚集度，这是风投需求最早诞生的地方。附录的表1提供了详细数据。

[16] Max Nathan, Emma Vandore, and Rob Whitehead, A Tale of Tech City: The Future of Inner East London’s Digital Economy (London: Centre for London, 2012).

[17] 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Rise of the Global Startup City: The Geography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in Cities and Metro Areas Across the Globe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rise-of-the-global-startup-city.

[18] Alessandro Piol and Maria Teresa Cometto, Tech and the City: The Making of New York’s Startup Community (San Francisco: Mirandola Press, 2013).

[19] “Stern’s Urbanization Project Hosts a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Florida and Fred Wilson,” 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October 9, 2013, www.stern.nyu.edu/experience-stern/news-events/conversation-florida-wilson.

[01] 1英里约为1609米。——编者注

[20] Paul Graham, “How to Be Silicon Valley,” PaulGraham.com, May 2006,www.paulgraham.com/siliconvalley.html.

[21] Rory Carroll, “Oakland: The City That Told Google to Get Lost,” The Guardian, February 11, 2014, 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feb/10/city-google-go-away-oakland-california; Ellen Huet, “Protesters Block, Vomit on Yahoo Bus in Oakland,” SFGate, April 2, 2014, http://blog.sfgate.com/techchron/2014/04/02/protesters-block-vomit-on-yahoo-bus-inoakland; Rebecca Solnit, “Diary: Google Invades,” London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7, 2013, 34–35, www.lrb.co.uk/v35/n03/rebecca-solnit/diary. 关于洛杉矶市中心爆发的当地人对艺术家和画廊的抗议活动，参见Jennifer Medina, “Gentrification Protesters in Los Angeles Target Art Galleri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2016, www.nytimes.com/2016/11/05/us/losangeles-gentrification-art-galleries.html。

[22] Dan Morain, “Gentrification’s Price: S.F. Moves: Yuppies In, the Poor Out,”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3, 1985,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85-04-03/news/mn-28445_1_san-francisco-s-skyline.

[23] Paul Graham, “Economic Inequality,” PaulGraham.com, January 2016,http://paulgraham.com/ineq.html.

[24] 夏洛塔·梅兰德和我调查了城市科技行业的关键指标（初创公司的数量，风险投资规模，高科技公司的聚集度等）与住房负担和不公平的关系。月住房支出中位数与创新能力（0.49）、高科技行业聚集度（0.58）、风投初创公司（0.60）和投资规模（0.56）密切相关。薪资不公平与创新能力（0.44）、风投初创公司（0.60）和风险投资规模（0.55）也有正相关的关系。参见附录表1。

[25]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ntonin Bergeaud, Richard Blundell, and David Hémous, “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24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une 2015, www.nber.org/papers/w21247.

[26] Aki Ito, “San Franciscans View Tech Boom as Benefit at Cost of Diversity,”Bloomberg, April 4, 2014, www.bloomberg.com/news/2014-04-04/sanfranciscans-view-tech-boom-as-benefit-at-cost-of-diversity.html.

[27] Richard Florida, Hugh Kelly, Rosemary Scanlon, and Steven Pedigo, New York City: The Great Reset, NY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July 2015,www.pageturnpro.com/New-York-University/67081-The-Great-Reset/index.html; Richard Florida, “Resetting and Reimagining New York City’s Economy,” CityLab, July 29, 2015,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5/07/resetting-and-reimagining-new-york-citys-economy/399815; Adam Forman,Creative New York, Center for an Urban Future, June 2015, https://nycfuture.org/research/publications/creative-new-york-2015.

[28] Juan Mateos-Garcia and Hasan Bakhshi, The Geography of Creativity in the UK, Nesta, July 2016, www.nesta.org.uk/sites/default/files/the_geography_of_creativity_in_the_uk.pdf. Greater London here is defined as its “Travel to Work Area,” or TTWA.

[29] 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Kevin Stolarick, “Geographies of Scop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ntertainment, 1970–2000,”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2, no. 1 (2012): 183–204.

[30] 这些数据是基于一个叫“区位商”的指标，该指标用某项经济活动在一个城市地区的产值比重除以它在全国的产值比重。实际区位商数值如下：对于创业行业整体来说，洛杉矶为2.7，纽约为2.2；对于艺术家来说，洛杉矶为3.8，纽约为1.5；对于音乐人和歌手来说，纽约为2.7，洛杉矶为2.2；对于制作人和导演来说，洛杉矶为6.7，纽约为4.6；对于作家来说，纽约和洛杉矶都为3.3；对于时尚设计师来说，纽约为9.9，洛杉矶为7.7。以上均为2014年的数据。

[31] Moby “I Left New York for LA”; Charlynn Burd, “Metropolitan Migration Flows of the Creative Class by Occupation Using 3-Year 2006–2008 and 2009–2011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Data,” Journey to Work and Migration Statistics Branch, Social, Economic, and Housing Statistics Division (SEHSD), US Census Bureau, Working Paper no. 2013-11,Presented at the 2013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Los Angeles, April 9–13, 2013.

[32] Carl Grodach, Elizabeth Currid-Halkett, Nicole Foster, and James Murdoch,“The Location Patterns of Artistic Clusters: A Metro- and NeighborhoodLevel Analysis,” Urban Studies 51, no. 13

(2014): 2822–2843.

[33] 基于MySpace网站的数据，原始数据由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希尔弗和芝加哥大学的文化政治中心所整理，我是在2007年初这个网站最火的时候下载的（当时它的访客数量超过了谷歌），数据覆盖了300多万名音乐人。因为当时MySpace的线上覆盖面极广，它能很好地记录数字环境下地点对于流行音乐商业生态系统的影响。我在马丁繁荣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清理，并根据音乐流派和地点分类，最后得到的可用数据覆盖200多万名音乐人，横跨十个音乐流派：摇滚乐、城市音乐、流行乐、电子乐、民谣、乡村音乐、基督教音乐、拉丁与加勒比黑人音乐、实验音乐和爵士乐。为了找到对流行乐影响力最大的地点，我们结合粉丝数、观看数和累计播放量创造了一个综合指标：音乐流行度指数。参见Richard Florida, “The Geography of America’s Pop Music Entertainment Complex,” CityLab, May 28, 2013, www.citylab.com/design/2013/05/geography-americas-pop-musicentertainment-complex/5219。

[34] Richard Florida, “The Geography of Pop Music Superstars,” CityLab,August 27, 2015, www.citylab.com/tech/2015/08/the-geography-of-popmusic-superstars/402445.

[35] Shade Shutters, Rachata Muneepeerakul, and José Lobo, “Constrained Pathways to a Creative Urban Economy,”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April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WP2015_Constrained-pathways-to-a-creativeurban-economy_Shutters-Muneepeerakul-Lobo.pdf. 这项研究指出，其他城市要进入这个精英城市俱乐部非常困难，首先必须要在所有方面表现出色，产业构成和人才库必须具备足够的深度和创新性来推动经济发展。另外，它还要克服阻碍创新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如高房价和高居住成本，持续吸引最顶尖的人才。只有非常有限的一些城市地区能满足这些要求。

[36] Jessica Floum, “Bay Area Economy Outpaces the US, China,”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26, 2016, www.sfchronicle.com/business/article/BayArea-economy-outpaces-U-S-China-9289809.php.

第四章 绅士化和它引起的不满

2014年2月的“黑人历史月”活动中，《为所应为》和《黑潮-麦尔坎》的导演斯派克·李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普瑞特艺术学院发表演讲。提问环节中听众向李提了一个有关绅士化的问题，他回答：“你如果在凌晨3点的第125街上看到一个推着婴儿车的白人妈妈，肯定会觉得不对劲。”这位在布鲁克林长大的导演就这个话题谈了很多，他强调绅士化不是社区的变化，而是人的变化，新殖民主义土地掠夺已经不足以形容绅士化了，他称之为“混账哥伦布综合征”。[1]

李认为绅士化就是富白人把穷黑人赶出自己原来的家园，他不是唯一持此观点的人。一直以来就有很多评论家批评绅士化就是富有开发商大量购入土地和楼房，并将原来的居民挤走的剥削行为。[2]

绅士化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情感问题（鉴于此前我受到的谴责，我应该清楚这一点[3]）。很多新来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愧疚感，因为他们的迁入改变了社区样貌，还可能使有些邻居被迫搬走。用2014年一篇文章的话说：“你基本不可能不当绅士化者。”[4]老居民对自己生活的社区都有很深的感情，当他们看到富裕的陌生人迁入，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变得陌生时，即使自己没有被迫搬走，心里也不是滋味。人们都很在意自己的居所，也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居住权利，否则就会激发矛盾。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对绅士化的批评有言过其实之嫌。哥伦比亚大学的城市规划学教授兰斯·弗里曼对纽约哈林区和其他社区进行了大量研究，他认为，很多人担心富裕的绅士化者会直接取代贫困的原住居民，但这并不是事实。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道格拉斯·马西是研究种族和经济分化问题的顶尖专家，他认为，比起规模更大的城市人口流动，绅士化的影响不过是“九牛一毛”。他还认为某些反对绅士化的城市专家十分虚伪，“自由派城市专家一面谴责白人抛弃城市，造成

美国的郊区化，一面又称极少数重返城市的白人精英为投机分子，批评他们造成市中心的绅士化”。[5]

在本章中我将着眼于事实，力求为绅士化的讨论提供客观视角。自2000年起，随着大规模返城浪潮的兴起，绅士化进程也加快了。不过到目前为止，绅士化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几个顶尖的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尽管大量研究表明，被绅士化直接挤出城市的人并不多，但重返城市的浪潮全面推升了城市房价，而饱受其害的就是贫困人口。媒体对绅士化的过度关注让人们忽视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长期集中的城市贫困。客观地理解绅士化十分重要，因为它是理解新城市危机根源的前提。

一般来说，绅士化是指社区价值增长和富人、白人、年轻居民占比升高的过程。露丝·格拉斯在20世纪60年代初创造了这个名词，用来描述伦敦工人阶级社区向中产和上流绅士社区的转变。她写道："'绅士化'一旦开始，便会迅速发展，直到全部或大部分的工人阶层都搬走，整个社会的特质都改变了。"[6]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绅士化有两种主要的存在方式。格拉斯指出，第一种方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人群逐渐搬回以前的高端居民区，比如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波士顿的灯塔山、费城的社会山或者华盛顿的乔治敦等。1970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地主》（*The LandLord*）就描绘过这种绅士化的方式，影片中博·布里吉斯扮演的纨绔子弟用自己继承的遗产购买了贫民窟的一处公寓，他想赶走黑人租客并把公寓楼翻修成自己的私人别墅（当然故事后来发生了意外转折）。电影取景于布鲁克林的公园坡社区，当年的公园坡还破败不堪。这部电影虽然是当年的票房毒药，但它准确地预言了公园坡社区后来的经济和种族发展状况。[7]

一项对这种绅士化方式的早期研究调查了华盛顿的两个社区。[8]第一个是处于过渡期的芒特普莱森特社区，有很多亟待翻修的破旧住宅楼，常驻居民的种族、年龄、婚姻状况和社会阶层状况十分多元

化。但新迁入的绅士化者大多是年轻单身男性，他们喜欢这里历史悠久而有趣的建筑，愿意接受社区的高犯罪率。第二个是绅士化程度更高的国会山社区，多数建筑已经翻新过了，离居民的工作地也很近。它吸引了不同类型的绅士化者，除了单身男性外，还有较年长的居民、已婚或未婚的女性以及有孩子的家庭。相对于芒特普莱森特社区的单身男性，这里的新迁入者更倾向于长居，他们对社区有很强的主人翁意识，也更多地投资于社区的未来发展。新来者挤出老居民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国会山社区尤甚，而黑人、其他少数族裔和老人受到的影响最严重。这项研究警告决策者应关注这一趋势。

第二种绅士化方式发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是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对旧工厂和仓库的再改造利用。随着工业迁往郊区，艺术家、音乐家和设计师开始把废弃的旧工厂和仓库改造成工作室和表演场地。包括极简艺术家唐纳德·贾德在内的很多艺术家都是在曼哈顿下城的阁楼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阁楼周围有很多俱乐部和酒吧，包括Café Wha酒吧、马德俱乐部（Mudd Club）和CBGB酒吧等都曾经为鲍勃·迪伦、吉米·亨德里克斯、大卫·拜恩和雷蒙斯乐队提供了磨炼自己、最终被星探发现的场所。

绅士化已经存在数十年了，从一开始人们就一直担心它会对社区和城市造成危害。在1981年，有位专家提出要警惕绅士化给旧金山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所说的与我们今天听到的很相似，“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以后只有精英才住得起旧金山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肯尼思·罗森对《纽约时报》说：“在未来10年，除非我们采取措施来缩小收入差距，否则所有的中等收入群体都会被挤出他们原来生活的社区。旧金山会变成一个极其昂贵的生活地区，这里只有富有的单身人士、退休人员和在金融区工作的高管，而不富裕的人将很难在这里立足。”[9]

如果把城市绅士化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里审视，就更容易看明白社区在漫长岁月里是如何变迁的。社区从居民区变成工商业中心，再变回居民区，从富裕变贫困，再变富裕。社区变迁的过程可能很痛

苦，但这是城市的自然特征。城市就是永不停歇的施工区，随着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和阶级构成也在改变。虽然从外表上看建筑可能没什么变化，但建筑里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

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和他的学生在2014年的研究中追踪了纽约苏荷区格林尼街的一段仅长486英尺[01]的街区在三个多世纪里的发展史，说明了城市社区建立和重建的过程。[10]1641年，荷兰殖民者把这块土地作为农场特批给被解放的非洲黑奴，作为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缓冲地带。荷兰人离开之后，社区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价值也随之升高，很快就被一个更大的农场合并。大农场后来在18世纪末破产。到19世纪初时，这里开始出现时尚的联排别墅，在曼哈顿南部港口和金融区工作的商人和银行家纷纷迁入。黄热病暴发后，格林尼街上最富裕的居民纷纷迁往纽约市北部。到19世纪中期，这里的住宅和酒店变成了妓院。

城市工业化开始后，格林尼街社区再次转型。19世纪90年代，除了两栋老房子之外，几乎所有原来的建筑都被拆除，人们建起了五六层高的仓库和工厂，格林尼街成了纽约服装贸易中心，尤以制帽出名。到1911年，位于格林尼街和华盛顿广场拐角以北六个街区的三角内衣工厂发生大火灾，社区命运再次被改写。因为这里的建筑开始无法上保险，服装产业和此前的红灯区一样向上城迁移。此后格林尼街又被废弃了一段时间，只在罗伯特·摩西提出改造曼哈顿下城，将其变成多条高架快速公路贯穿的柯布西耶风格的超级街区时，这个社区才重新引起公众关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艺术家迁入社区废弃的工业楼，而现在这些艺术家正在被高档商店和高端住宅挤走。伊斯特利研究中展示的详细房地产价格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左右——也就是此轮绅士化的发展时期，该社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房地产价格增长。

由于返城浪潮加速和超级城市房价暴涨，现在城市绅士化比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更富争议性。1990—2014年，美国前100的大城市中有超过一半城市的市中心社区获得了人口增长，这是一个巨大的变

化。相比之下，从1970—1980年，同样的前100的大城市中只有6个城市的市中心社区获得了人口增长。[11]社会上层人士、富人、高学历人群和白人极大地推动了近年来的再城市化发展。房地产经济学家杰德·科尔科的数据显示，2000—2014年，美国收入前10%的家庭最有可能搬回城市人口密集社区。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湾区、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波特兰和丹佛，高收入群体返回城市现象最为显著，其他城市也有类似趋势。同时，城市里的较底层的居民则被迫迁出。还是2000—2014年，美国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最有可能离开城市。[12]

年轻人在绅士化进程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市规划师马库斯·穆斯专门为此创造了一个术语——“青年化”。他的调查显示，曼哈顿的大片社区、布鲁克林邻近曼哈顿的社区，以及芝加哥、多伦多和旧金山的市中心都被年轻人占据了。在过去10年的美国前50大城市中，市中心的年龄在25~34岁、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口增长速度是郊区同类人口增长速度的三倍。这些市中心社区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5%，但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口数量增长占全国的25%。尽管如此，重返城市浪潮中人数最多的不是出生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00年的“千禧一代”，而是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的“X世代”，他们中最年轻的现在也快40岁了。因为年轻人结婚和生孩子的年龄普遍推迟，所以他们能在市中心住更长时间。如今城市里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单身群体和没有孩子或孩子还小的夫妇。但是不管怎么划分，重返城市的都是年轻人中的优势群体。[13]

绅士化和返城浪潮中，不仅有富裕白人的驱动，还有黑人中产阶级的身影。一份针对1500个城市社区的调查显示，1990—2000年，新迁入的高学历黑人家庭贡献了社区收入增长的1/3。城市社区对黑人中产阶级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为了避免歧视，普遍不愿搬去郊区。由于郊区长期存在住房机会不平等的问题，黑人中产阶级和黑人上层人士比同阶层的白人更多地聚集在城市中心。他们被高房价挤走

时，则倾向于搬到条件更差的黑人社区，从而将那些社区绅士化了。[14]

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纳撒尼尔·鲍姆-斯诺和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同事丹尼尔·哈特利对近几十年的城市绅士化进行了深层研究。他们通过追踪1970—2010年间美国120个城市的市中心社区（距离中心商业区不足3英里）的变迁[15]，形成了三大研究要点，能帮助我们理解绅士化的驱动力及识别这场博弈中的赢家和输家。

第一，城市绅士化是一个较近时期出现的现象，自2000年后蔓延速度急剧加快。从1980—2000年，市中心社区居民主要以穷人和黑人为主，城市绅士化只发生在有限的几个城市，如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这一时期的人们不论收入高低，都在离开城市，其中也包括受过教育的白人和工人阶层白人。2000年后，人们开始重新搬回城市，情况发生了急剧改变。

第二，返城浪潮的主力军是高收入和高学历的白人。在1980年，只有纽约和圣塔芭芭拉两个城市的市中心及其周边社区聚集了众多高收入、高学历白人。但自2000年之后，他们开始大规模重返市中心。到2010年，华盛顿、芝加哥、休斯敦和亚特兰大等城市的市中心都迁入了大量高收入、高学历白人。在该研究覆盖的城市中，居住在市中心的高收入、高学历白人家庭比例在2000—2010年上升了约2/3。

吸引他们重返城市中心的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高薪的知识、专业、技术和创意类工作岗位高度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带。二是住在工作地点附近可以缩短上下班通勤时间。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利用城市提供的设施——图书馆、博物馆、餐厅和咖啡店。简而言之，这些高收入白人群体通过住在市中心可以缩短上下班通勤时间、靠近高薪工作机会并获得享受城市设施的特权。

第三，随着优势人群的迁入，低收入、低学历的少数族裔离开，或者说被挤出了社区，主要是因为无力承担高住房成本。低收入人群

的迁出十分令人担忧，因为市中心会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和设施，能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和经济流动性。弱势人群被挤出市中心后集中在衰败的郊区和城市中偏远和不发达的社区，其结果就是不平等和空间隔离问题不断加剧。我将在第六章到第八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总之，城市绅士化远非某一类人群自身的意愿和选择，不论是如今重返城市的年轻人、高学历和高收入人群，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占领阁楼的艺术家。它是更广泛因素的产物，如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这些因素影响了个人选择，也改变了城市和社区的发展轨迹。[16]

举例来说，公共交通的地理分布长期影响着房地产的发展模式。一个世纪前，有轨电车的线路影响了早期郊区的分布。[17] 而今天富人们纷纷迁入公共交通线路沿线社区，公共交通进一步刺激了绅士化发展。具体来说有两种刺激方式。一方面，对公共交通的大规模投资象征着对社区转型的大力投入，从而吸引了更多富裕居民，提高了房地产价值。另一方面，公共交通能帮优势群体缩短通勤时间，高学历专业人士现在更愿意支付溢价来住在市中心的工作地点附近或车站附近。[18] 这种发展趋势还会自我加强。当越来越多富裕家庭住在交通线路和换乘站附近时，这些社区的房价就会升高，优质的公共设施也随之而来。而更多更好的商店、咖啡馆、餐厅、学校、公园以及其他的设施又提高了社区吸引力，进一步抬高房价。公共交通线路周围的社区的绅士化反映了一种稀缺性：公共交通沿线社区不动产价格高企，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多的公共交通资源和交通便利的社区。

公共交通只是刺激绅士化的众多公共投资中的一种，学校也是一例。以前，高犯罪率和低教育质量的学校曾一度令中产阶级家庭离开城市。最近几十年，随着新的特许学校和更有吸引力的学校的出现和老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富裕家庭决定重返城市，甚至是才刚有孩子的家庭也愿意留下来。当城市社区中的优势群体到达一定数量后，来自他们的政治压力又为当地学校争取到了更多投资。

另一项吸引高学历和高收入居民重返城市的公共投资渠道是高校及其附属医疗中心，即所谓的“教育与医疗”。公立大学与私立研究型大学都能获得联邦政府的大额资助，很多学校为教职工提供住房或住房补贴，这类人群往往就住在学校附近的社区，给这些社区带来了绅士化。

给公园和绿地的公共投资也刺激了绅士化发展。例如，纽约的高线公园沿线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住宅开发项目。公园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是社区发展的象征。从纽约的哈德逊城市广场、多伦多的湖滨区改造到匹兹堡北区的城市体育场，享受高额政府补贴的城市改造项目用纳税人的钱把老工业区改造成复合型开发区，吸引专业人士和新市民，也让邻近社区开始了绅士化进程。

不过讽刺的是，高学历和高收入人群的迁入让城市变得更像郊区。现在的新型城市公寓楼提供一系列类似郊区的公共设施，比如葡萄酒储存区、家庭影院、健身房、露天平台、户外游泳池和停车场。在一栋位于纽约市切尔西区十一大道的高端公寓楼里，居民可以用电梯把车停到家门口。城市中绅士化社区的郊区化也体现在占地空间上，今天的城市居民占地面积几乎和郊区居民一样大。城市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是1678平方英尺，而郊区家庭平均为1800平方英尺。平均到个人的话，城市居民为767平方英尺，仅略低于郊区居民的800平方英尺。城市中崭新的改造建筑和宽敞的空间正在让拥挤脏乱的居所成为过去时。

尽管绅士化在全国范围广泛存在，但在昂贵的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情况则更为严峻。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显示，2000—2007年，美国前55大城市中有3/4的城市的绅士化社区不足10%，有40%的城市的绅士化社区不足5%（研究中将绅士化社区定义为，在2000—2007年间，房价从价格分布图下半部分上升到上半部分的社区[19]）。根据这个衡量标准，只有东海岸的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西海岸的旧金山、波特兰和西雅图等少数几个城市存在大规模绅士化现象（见图4.1）。

我的团队把经济、社会和人口方面的关键指标与上述的研究数据一起分析，发现绅士化出现在特定的发达城市。绅士化与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富裕程度、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和科技专家、文艺工作者和大学生的人数占比呈正相关。绅士化还与公共交通的使用呈正相关，与城市扩张呈负相关（城市扩张用独自开车上下班的人数比例衡量）。[20]也就是说，正是知识中心和超级城市的专属特征孕育了城市化。与其说绅士化是普遍的城市特质，不如说它是成功城市的象征。



图4.1 大城市的绅士化差别很大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源于丹尼尔·哈特利的《绅士化与金融健康》（*Gentrification and Financial Healt*），以及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2013。

可以说，正是因为绅士化主要发生在超级城市，它才从最开始就吸引了广泛关注。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记者和学者都在超级城市生活和工作。今天有1/5的新闻工作岗位集中在纽约、华盛顿和洛杉矶，而在2004年这一比例只有1/8（新闻业在超级城市的聚集同样适用于很多其他行业）。[21]新闻工作者自然会报道自己所在城市发生的绅士化现象，不过这些报道可能存在微妙的偏见。一项2015年的研究找出了《纽约时报》在1980—2009年间报道过的所有绅士化社区，包括已经绅士化的和正在发生绅士化的社区，并把它们与更详尽的研究（比如我在本书中提到的研究）所定义的绅士化社区进行对比。[22]结果发现，《纽约时报》更倾向于把绅士化限定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边界的社区，而不是布朗克斯区和皇后区。新闻工作者或艺术家更容易看到发生在自己社区的绅士化现象，这种偏见会让大家忽视某些重要事实。

即便是在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绅士化也集中于部分特定区域。纽约大学弗曼中心在2016年的研究表明，纽约的绅士化社区占比仅略高于1/4。[23]研究人员研究了纽约市55个社区从1990—2014年的演变，发现只有占比27%的15个社区能被算作绅士化社区，即期初收入低于中位数的40%，但研究区间的租金增长高于中位数的社区。占比13%的7个社区被归为未绅士化社区，一直维持贫困状态。占比60%的32个社区被归类为高收入社区，即期初收入就高于中位数的60%。高收入社区不一定很富裕，但一直属于中产阶级社区。另外，未绅士化社区往往紧挨着绅士化社区，在曼哈顿上城和布鲁克林的部分地区尤为明显，正是这种集中优势和集中弱势毗邻而居的现象定义了今天的城市（见图4.2）。

弗曼中心的调查表明，在过去20多年里，纽约市的不同地区租金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见表4.1）。威廉斯堡和绿点区的租金增长最快，高达79%；哈林区中心、下东区和唐人街的租金增长超过50%；哈林区东部和布什维克区的租金增长超过40%；贝德福德-斯图文森、晨

边高地、汉密尔顿高地的租金增长超过36%；而皇冠高地南部的租金增长仅略高于18%，布朗斯维尔和海洋山丘的租金增长略高于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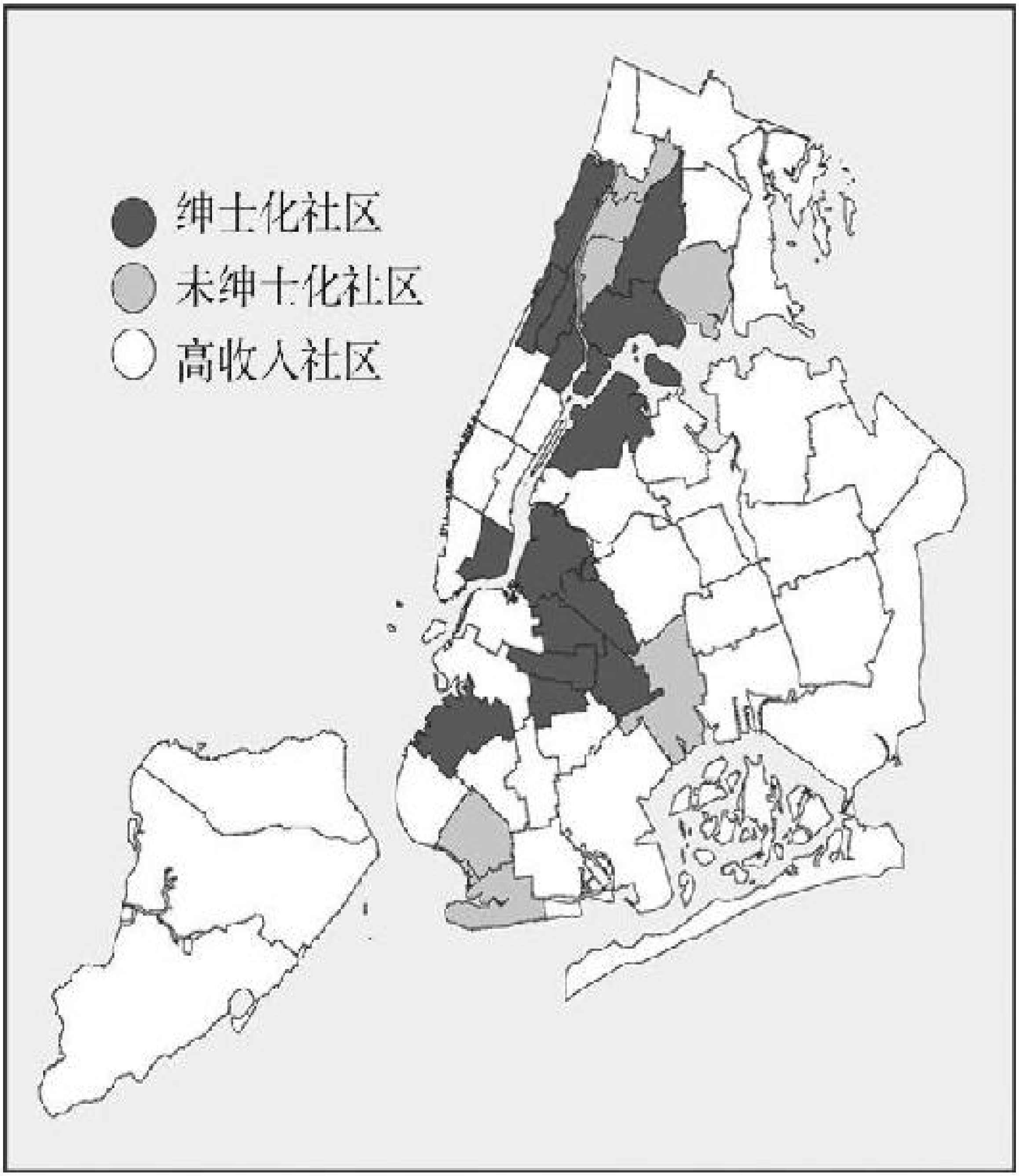


图4.2 纽约市的绅士化社区与未绅士化社区分布

资料来源：纽约大学弗曼中心，《2015年纽约市住房和社区状况》（ *State of New York City's Housing and Neighborhoods in 2015* ），2016年5月。

表4.1 纽约绅士化社区的房租增长

社区	平均租金增长率 1990到2010—2014年
威廉斯堡／绿点区	78.7%
哈林区中心	53.2%
下东区和唐人街	50.3%
布什维克	44.0%
哈林区东部	40.3%
晨边高地／汉密尔顿高地	36.7%
贝德福德－斯图文森	36.1%
皇冠高地北部／普罗斯佩克特海茨	29.9%
华盛顿高地／因伍德	29.3%

续表

社区	平均租金增长率 1990到2010—2014年
莫特黑文/亨茨波因特	28.0%
阿斯托里亚	27.6%
日落公园	23.9%
莫里萨尼亚/贝尔蒙特	23.5%
布朗斯维尔/海洋山丘	20.5%
皇冠高地南部	18.1%

资料来源：纽约大学弗曼中心，《2015年纽约市住房和社区状况》，2016年5月。

布鲁克林的社区间房价差异更大。从“布鲁克林化”这个词就能看出来它已然是绅士化的代名词了，尽管很多人认为布鲁克林已经变成了嬉皮士和年轻白人家庭的乐园，但实际上它还是有很多少数族裔的贫困社区，其中部分社区的房价甚至下跌了。2004—2014年，新潮的威廉斯堡社区的房价猛增269%；格林堡房价增长126%；尽管有污染严重、洪水频发并被列为有害物质场所的工业运河，格瓦纳斯区的房价也增长了92%；布鲁克林中心的房价增长超过70%；有同样增幅的还有历史悠久、全是维多利亚式木结构房屋的迪特马斯公园社区，以及1991年发生过暴乱的黑人和哈西德派犹太人社区皇冠高地；波恩兰姆

小丘的房价增长了69%；展望莱弗茨花园社区房价增长了68%；以前是工业区的丹波和日落公园社区房价增长了61%；全是华丽联排别墅的公园坡社区房价增长了60%。[24]

而其他一些布鲁克林社区的房价则下跌了。2004—2014年，受飓风“桑迪”影响，格里森海滩社区房价下跌了30%；地铁线路不发达的偏远中产阶级社区汉密尔顿堡房价下跌了10%；工人阶级社区卡纳西的房价下跌了12%。交通不便的低收入社区弗雷特兰斯区和雷姆森村房价则分别下跌了8%和27%。绅士化很少出现在交通不便、其他投资也很少的社区。

不论绅士化发生在哪里、影响范围有多大，它最受关注的问题是被挤走的人。研究绅士化及其取代效用的学者兰斯·弗里曼发现，在绅士化过程中被取代和挤走的人数比人们想象中的少得多。弗里曼和他的同事在2004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在纽约市，未绅士化社区的贫穷家庭比绅士化社区的贫穷家庭更可能离开原社区。当然，这可能是因为绅士化社区里的贫穷家庭数量更少。这项研究还指出，哪怕没有发生任何取代效应，社区的贫困居民比例也可能在10年里从30%缩小至12%。弗里曼的其他研究指出，绅士化社区弱势家庭离开原社区的可能性比未绅士化社区的弱势家庭低15%。另外，绅士化社区任何一个单独家庭被取代的可能性只有1.3%。

基于弗里曼成果的另一项研究区分了绅士化对自有房住户的影响和对租户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绅士化社区，租户被取代的风险比自有房住户高2.6%（和离婚率一样），但没有证据显示绅士化对自有房住户有取代效应。[25]研究的重要结论是，绅士化的直接取代效应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严重，它不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绅士化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真正的影响。

导致以上结论的部分原因在于，绅士化要么就发生在从前少有人住的老工业社区，要么就发生在工人阶层社区。后者的房主因绅士化带来房价上涨而获益，被取代的租客也很容易在附近社区找到条件相

当的住处。绅士化很少发生在长期贫困并且社会问题重重的社区。总之，对绅士化直接取代效应的过度关注是模糊焦点的烟幕弹，这让人们忽视了再城市化和绅士化对穷人和弱势群体造成的更大伤害。

绅士化给弱势群体带来的最负面影响并不是发生在绅士化社区自身的，而是通过对房价的涓滴效应或涟漪效应，影响了绝大多数穷人生活的更贫困的社区。2015年的一项研究通过信用记录数据分析了费城从2002—2014年受到的绅士化影响，说明了涟漪效应的作用机理。[26]总体来看，只有15%的调查地区发生了绅士化。研究得出了和弗里曼相同的结论，即绅士化的直接取代效应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在研究期间，费城绅士化社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家庭收入提高了42%，绅士化社区弱势居民的经济状况也改善了；而未绅士化社区的家庭收入则下降了20%。另外，绅士化社区居民离开原社区的可能性并没有显著高于未绅士化社区。

然而出于种种原因，绅士化社区中最贫困的底层居民确实被挤出了原来的家园，只能搬去更贫困、犯罪率更高、学区更差的社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层则能跟上绅士化的脚步，甚至能从它给社区带来的改善中获益。即便是离开，他们也能利用这些收益搬到城市的体面社区，或者郊区更实惠的社区。而最贫困的底层群体则被打发到了最落后的社区，面临可能不断上涨的房租。给城市贫困人群造成最严重的打击的正是这种涟漪效应，而不是对单个住户的直接取代。

费城的例子具有指导意义，不过绅士化的涟漪效应最强的地方是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它们的再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更快，规模也更大。在纽约市，房租占税前收入30%以上的重租金负担家庭占比从2000年的41%上升到了2014年的52%。该比值在绅士化社区从42%上升到53%，而在未绅士化社区则上升得更多，从46%上升到近60%，再次证明了绅士化的涟漪效应。另外，底层家庭受房价冲击最大，2014年在该类人群里重租金负担家庭占比超过了75%。[27]

在某些绅士化快速发展的城市，取代效应本身的威胁也在增强。2015年的研究显示，旧金山有超过1/4的社区面临居民被大量取代的风险。[28]随着对昂贵有限空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到2030年，取代规模还会大幅上升。尽管直接的取代效应在过去不是严重的问题，但随着房价不断上升，更多社区发生变化，取代效应以后可能会成为超级城市的难题。随着绅士化的发展，不仅底层群体会苦不堪言，本地老居民和后来的新居民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张。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绅士化者和原住居民——新来的人和可能被挤出去的人，看待社区及其改变的视角截然不同。李在普瑞特艺术学院演讲时问观众："他们现在叫布什维克什么？那个词是什么？""东威廉斯堡。"观众回答。他咆哮道："那帮房地产混蛋把它的名字都改了！名字怎么能改呢？"[29]

激怒李的这种文化抹杀的确真实存在。一项有关绅士化的民族志研究调查了费城南部某低收入黑人社区，揭示了老居民和新居民在绅士化进程中不同的经历。[30]研究者询问居民社区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他们常用的社区名字。黑人居民倾向于用社区从前的名字，如南费城。而白人居民则喜欢用新名字，如研究生医院、南里顿豪斯或西南市中心。白人居民普遍认为社区中少数族裔聚集区的犯罪率更高，实际上这些区域的犯罪率低于富裕白人更多的区域。种族决定了居民观察和描述社区变化的视角，白人和黑人居民定义社区的差异并不受收入水平或居住年限的影响。"白人居民的社区定义有很多种，但就是没有少数族裔的定义方式。"研究写道："社会群体共同构建的大型包容性社区最终被取代了。"换句话说，老社区被新居民重新定义了。

从白人社区和黑人社区热门餐厅的评论中也能看到种族和绅士化的关系。热门餐厅往往是绅士化和社区变化的象征。2015年的一项研究通过Yelp（点评网站）上的餐厅点评调查了人们对布鲁克林两个绅士化社区的大众印象，一个是传统的波兰社区绿点，另一个是传统黑人社区贝德福德-斯图文森。Yelp点评用户认为绿点代表了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但对贝德福德-斯图文森的印象则大不相同，常用"危险""粗

糙”“贫民窟”来形容它。但是他们认为新餐厅有利于促进社区改变。某Yelp点评用户评价一家餐厅，说它“正是贝德福德-斯图文森所需要的地方”。[31]这类研究说明，绅士化社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社会集体构建和重建的，以及种族对人们感知绅士化的影响。在社区定义问题上，绅士化者总是有更大的话语权。

不幸的是，种族甚至更能决定哪些社区不会发生绅士化，并维持长期贫困。根据2014年的一项研究，1995—2014年，芝加哥经济增速最快的社区都是白人社区，最慢的都是黑人社区。[32]该研究跟踪了99个正经历绅士化或可以绅士化的社区，其中有26个在1995年已经开始绅士化，16个处于绅士化边缘，还有57个与绅士化社区相邻，开始绅士化的时机已经成熟。这项研究最有趣的一点是，它利用谷歌街景跟踪新建楼盘、老建筑的维护水平和其他可见迹象，以此定位绅士化社区。该研究发现，相比居民收入、教育程度等典型因素，种族才是社区是否发生绅士化的关键因素。

总体看来，黑人居民比重越高，社区绅士化的可能性就越小。绅士化社区的白人居民占比均不低于35%，黑人居民占比则不超过40%。黑人居民超过40%的社区一般经济状况鲜有改善，倾向于持续贫困。这种种族门槛从根本上阻止了绅士化的蔓延，或者说，绅士化发生的界限分明，几乎不会向黑人社区蔓延，即便这些黑人社区与绅士化社区的距离很近。当然也不排除有例外发生，比如纽约的哈林区、皇冠高地和贝德福德-斯图文森等传统黑人社区也发生了绅士化。但研究传递的主要信息令人深思，即大量黑人社区几乎完全隔绝了绅士化，居民普遍陷于长期贫困。这一结论适用于绝大多数城市。

种族集中贫困构成了更严重的城市问题。一项覆盖全美51个人口数大于100万的大城市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1970年的贫困社区在30年后依然贫困。研究跟踪了这些城市市中心方圆10英里内的所有高贫困社区，发现在1970—2000年间发生绅士化的调查社区中，有10个社区一直处于贫困状态，12个从稳定状态陷入集中贫困。只有极少数贫困社区的经济状况获得了实质性改善，仅有105个调查社区（占总数的

10%）的贫困率下降到15%以下，即低于美国平均水平。而1200个调查社区从低贫困社区（贫困率低于15%）变成了高贫困社区（贫困率高于30%）。更令人震惊的是，高贫困社区的总数增加了两倍。[33]归根结底，城市的长期集中贫困问题比绅士化严重多了，这可以说是最棘手的城市难题。

绅士化作为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面临的重要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它带来的痛苦确实真实存在，应当认真对待。但被绅士化完全忽略的社区才是更严重的问题，它们长期存在的种族集中贫困还在不断恶化。

与其本能地抵制城市变化，不如为弱势群体提供援助。抑制城市和社区投资毫无意义，尤其是某些社区还极其需要投资。城市政策不应抑制能促进市区经济复苏的市场力量，而应改善落后地区的住房、经济机会和社区状况，本书的最后一章还会回到这个话题。

从根本上说，绅士化是美国新阶层地理分布的城市表现，它在再城市化进程最快和空间竞争最激烈的地方最为显著。美国的阶层分化不断深化，在不同城市有不同体现形式。在某些城市，阶层分化体现为城市内部的优势和弱势地区的分化；在其他城市，则体现为城市与郊区的分化。尽管表现形式不同，阶层分化都反映了新阶层地理分布的基本特征——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经济分化，它们是新城市危机的核心现象，这也是接下来三章的主题。接下来，我将深入讨论经济不平等，它正深深融入美国的新阶层地理分布中。

[1] Joe Coscarelli, “Spike Lee’s Amazing Rant Against Gentrification: ‘We Been Here!,’” New York Magazine, February 25, 2014, 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4/02/spike-lee-amazing-rant-against-gentrification.html. Lee’s rant set off a firestorm of reaction. See John McWhorter, “Spike Lee’s Racism Isn’t Cute: ‘M——F——Hipster’ Is the New ‘Honkey,’”TIME, February 28, 2014, http://time.com/10666/spike-lees-racism-isntcute-m-f-hipster-is-the-new-honkey; Gene Demby, “The One Problem with Spike Lee’s Gentrification Argument,” Salon, February 27, 2014, www.salon.com/2014/02/27/the_one_problem_with_spike_lees_gentrification_argument_partner.

[2] Neil Smith,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London: Routledge, 1996); Neil Smith, “Toward a Theory of Gentrification:A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by Capital, not Peop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45, no. 4 (1979); Neil Smith, “Gentrific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Economic Geography 58, no. 2 (April 1982):139–155; Neil Smith, “Of Yuppies and Housing: Gentrification, Soc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 Drea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5, no. 2 (January 1987): 151–172.

[3] Susie Cagle, “Fallacy of the Creative Class: Why Richard Florida’s ‘Urban Renaissance’ Won’t Save U.S. Cities,” Grist, February 11, 2013, http://grist.org/cities/fallacy-of-the-creative-class.

[4] Daniel Hertz, “There’s Basically No Way Not to Be a Gentrifier,” CityLab,April 23, 2014, www.citylab.com/housing/2014/04/theres-basically-no-waynot-be-gentrifier/8877.

[5] Lance Freeman, “Five Myths About Gentrification,” Washington Post,June 3, 2016, 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five-myths-aboutgentrification/2016/06/03/b6c80e56-1ba5-11e6-8c7b-6931e66333e7_story.html;Douglas Massey, “Comment on Jacob Vigdor, ‘Does Gentrification Harm the Poor?’”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 2002, 174–176.

[6] Ruth Glass,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1964).

[7] Tino Balio, United Artists: The Company That Changed the Film Industry(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8] Dennis Gale, “Middle Class Resettlement in Older Urban Neighborhoods:The Evidence and the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45, no. 3 (1979): 293–304.

[9] Rosen, quoted in Wayne King, “Changing San Francisco Is Foreseen as a Haven for the Wealthy and Childless,” New York Times, June 9, 1981, www.nytimes.com/1981/06/09/us/changing-san-francisco-is-foreseen-as-a-havenfor-wealthy-and-childless.html.

[01] 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10] William Easterly, Laura Freschi, and Steven Pennings, “A Long History of a Short Block: Four Centuries of Development Surprises on a Single Stretch of New York City Street,” NYU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DRI Working Paper no. 96, 2014, http://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451873de4b008f3c5898336/t/54cfbedee4b092432af5f5f8/1422900969104/DRIw1.pdf. The project website is www.greenestreet.nyc. 也参见 Laura Bliss, “The Economic Lessons in a Single New York City Block,” CityLab, August 3, 2015, www.citylab.com/design/2015/08/theeconomics-lessons-in-a-single-new-york-city-block/400154。

[11] Yonah Freemark, “Reorienting Our Discussion of Urban Growth,” The Transport Politic, July 6, 2016, www.thetransportpolitic.com/2016/07/06/reorienting-our-discussion-of-city-growth.前一百大城市中，从2000年到2014年市中心区域（以市政厅位中心，方圆1.5英里的区域）人口增长的城市有53个。同样实现市中心人口增长的城市数量在1990年到2000年间是51个，1980年到1990年间是35个，1970年到1980年间只有6个，1960年到1970年间只有5个。

[12] Jed Kolko, “Urban Revival? Not for Most Americans,” JedKolko.com, March 30,2016, http://jedkolko.com/2016/03/30/urban-revival-not-for-most-Americans.

[13] Markus Moos, “From Gentrification to Youthification: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Young Age in Delineating High-Density Living,” Urban Studies 53, no. 14 (November 2016): 2903–2920, http://usj.sagepub.com/content/53/14/2903.long.

[14] Terra McKinnish, Randall Walsh, and T. Kirk White, “Who Gentrifies LowIncome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7, no. 2 (2010):180–193. 这项研究也指出，绅士化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黑人群体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没有读完高中的黑人家庭是最容易被挤出绅士化社区的群体，而留下来的黑人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群体。

[15] Nathaniel Baum-Snow and Daniel Hartley, “Accounting for Central Neighborhood Change, 1980–2010,”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September 2016, www.chicagofed.org/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016/wp2016-09.

[16] Miriam Zuk, Ariel Bierbaum, Karen Chapple, Karolina Gorska, Anastasia Loukaitou-Sideris, Paul Ong, and Trevor Thomas, Gentrification,Displacement, and the Role of Public Investment: A Literature Review,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2015, www.frbsf.org/communitydevelopment/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015/august/gentrificationdisplacement-role-of-public-investment/.

[17] Sam Bass Warner Jr., Streetcar Suburbs: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1870–19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8] Lena Edlund, Cecilia Machado, and Michaela Sviatchi, “Bright Minds, Big Rent: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ising Returns to Skill,”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72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vember 2015, www.nber.org/papers/w21729. 也可参见 Victor Couture and Jessie Handbury, “Urban Revival in America, 2000 to 2010,”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2015, http://faculty.haas.berkeley.edu/couture/download/Couture_Handbury_Revival.pdf。

[19] Daniel Hartley, Gentrification and Financial Heal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2013, www.clevelandfed.org/newsroom-and-events/publications/economic-trends/2013-economic-trends/et-20131106-gentrification-and-financial-health.aspx.

[20] 绅士化与以下因素正相关：人口规模（0.59）和人口密度（0.44）；人均收入（0.61）和工资（0.62）；某城市地区中科学与技术工人的占比（0.32）；高科技行业的聚集程度（0.58）；创意阶层劳动力占比（0.55）；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占比（0.51）。绅士化与以下因素负相关：某区域内蓝领工人占比（-0.48）。它还与使用公共交通通勤的人数占比（0.61）正相关，与独自驾车上下班的人数占比（-0.55）负相关。详见附录的表2。

[21] James Tankersley, “Why the PR Industry Is Sucking Up Pulitzer Winners,”Washington Post, Wonkblog, April 24, 2015, 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5/04/23/why-the-

pr-industry-is-sucking-up-pulitzerwinners.

[22] Michael Bart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rategy Used to Identify Gentrification,” Urban Studies, December 3, 2014; Richard Florida,“No One’s Very Good at Correctly Identifying Gentrification,” CityLab,December 15, 2014, www.citylab.com/housing/2014/12/no-ones-very-goodat-correctly-identifying-gentrification/383724.

[23] NYU Furman Center for Real Estate and Urban Policy, State of New York City’s Housing and Neighborhoods in 2015, May 2016, http://furmancenter.org/files/sotc/NYUFurmanCenter_SOCin2015_9JUNE2016.pdf.

[24] 数据来自 PropertyShark.com。

[25] Lance Freeman, “Displacement or Succession?,” Urban Affairs Review 40,no. 4 (2005): 463–491; Lance Freeman and Frank Braconi, “Gentrification and Displacement: New York City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70, no. 1 (2004): 39–52; Lance Freeman,“Neighborhood Diversity, Metropolitan Segregation, and Gentrification:What Are the Links in the US?,” Urban Studies 46, no. 10 (2009): 2079–2101.关于绅士化对自有房住户和租房者的影响，参见On the effects of gentrification on homeowners and renters, see Isaac William Martin and Kevin Beck, “Gentrification, Property Tax Limitation, and Displacement,”Urban Affairs Review, September 2, 2016, http://uar.sagepub.com/content/early/2016/08/31/1078087416666959.abstract. 也参见 Kathe Newman, “The Right to Stay Put, Revisited: Gentrification and Resistance to Displacement in New York City,” Urban Studies 43, no. 1 (2006): 23–57; Ingrid Gould Ellen and Katherine M. O’Regan, “How Low Income Neighborhoods Change: Entry, Exit, and Enhancement,”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41, no. 2 (2011): 89–97。

[26] Lei Ding, Jackelyn Hwang, and Eileen Divringi, “Gentrification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Philadelphi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October 2015.

[27] Furman Center, State of New York City’s Housing and Neighborhoods in 2015, http://furmancenter.org/research/sonychan.

[28] Miriam Zuk, Regional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Displacement, Centre for Community Innovation, 2015, www.urbandisplacement.org/sites/default/files/images/rews_final_report_07_23_15.pdf.

[29] Coscarelli, “Spike Lee’s Amazing Rant Against Gentrification.”

[30] Jackelyn Hwa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Gentrifying Neighborhood Reifying and Redefining Identity and Boundaries in Inequality,” Urban Affairs Review 52, no. 1 (January 2016): 98–128.

[31] Sharon Zukin, Scarlett Lindeman, and Laurie Hurson, “The Omnivore’s Neighborhood? Online Restaurant Reviews, Race, and Gentrification,”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October 2015).

[32] Jackelyn Hwang and Robert J. Sampson, “Divergent Pathways of Gentrification: Racial Inequality and the Social Order of Renewal in Chicago Neighborhoo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 no. 4 (August 2014):726–751.

[33] Joseph Cortright and Dillon Mahmoudi, Neighborhood Change, 1970 to 2010: Transition and Growth in Urban High Poverty Neighborhoods,Impresa Economics, May 2014, http://dillonm.io/articles/Cortright_Mahmoudi_2014_Neighborhood-Change.pdf.

第五章 城市的不平等

2012年前，出了布鲁克林或者纽约的政治圈就几乎没人知道谁是比尔·白思豪了。2009年他当选为代表全市的纽约市公共议政员，而此前在他大部分的政治生涯里，他都在市议会里代表布鲁克林的第39区，包括较高端的社区科布尔山和公园坡、卡罗尔花园、格瓦纳斯和温莎台等新绅士化社区，以及肯辛顿和市政公园等蓝领社区。2013年，媒体巨头创始人、传奇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结束了他的第三届也是最后一届纽约市长任期，白思豪决定竞选市长。但人们认为他胜算不大，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市议会代言人和布隆伯格的同僚克里斯蒂娜·奎因会当选下一任市长。[1]

在布隆伯格的领导下，纽约从2008年经济危机中强势复苏。[2]创意产业、科技产业及金融、房地产、教育和医疗等传统经济支柱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就业率在2011年就重回危机前的高峰值。在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失去3万多个就业岗位的金融业也逐渐恢复生机，银行家和分析师又能拿到高额薪金了。建设工程在曼哈顿下城的世贸大厦遗址、切尔西北的哈德逊广场、威廉斯堡的东河沿线、布鲁克林市中心等地大规模展开。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几乎消失殆尽的科技行业也恢复了生机，布隆伯格政府还发起投入20亿美元在罗斯福岛为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建立一座占地200万平方英尺的应用科学工程校区。

街道空前整洁，充满活力，暴力犯罪大大减少，游客数量达到纪录高位。由于新建了自行车道和共享单车设施，曼哈顿街头还出现了很多单车。不论是资本还是人才，纽约都走在世界前列，而这两者正是城市成功的关键。布隆伯格在《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城市如果想吸引创造性人才，就一定要为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他还借鉴了我的创意经济观点，补充道，“经济学家可能不会这

样说，但事实就是：酷很重要。当人们发现一个有优质公园、安全的街道且交通方便的社区能给他们提供灵感时，他们就会用脚投票”。[3]

布隆伯格是纽约市有史以来最能干、最有影响力的市长之一，本来他在任职的最后几年只需庆祝胜利就行了，但还是出了些问题。尽管纽约从2002年开始就重新繁荣起来，但大量纽约人却完全没有富足的感觉。大家公认纽约的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工人阶层和中产阶级则越落越远。到2013年，曼哈顿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总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总收入的88倍。纽约的百万富翁人数约40万，超过了新奥尔良、匹兹堡、克利夫兰或明尼阿波利斯的全市人口。然而，实际工资下降和房价飙升让大多数纽约人的生活质量下滑了。2013年8月，《纽约时报》的民意调查发现，55%的选民认为布隆伯格的政策对富人更有利，当被问到纽约是否已经“太贵而无法生活”时，85%的人选了“是”。[4]

受到民粹主义者抵制城市经济分化扩大的浪潮推动，白思豪围绕不平等展开自己的竞选活动。正如我在第一章提到的，他强调纽约已经变成了“双城记”。他在2013年春天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不做出改变，不采取解决不平等问题、重建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我们的后代会发现纽约只是富人的游乐场，在这个镀金城市里只有极少数特权阶层才能成功，而成百上千万的纽约人每天都要艰难地维持生计。”“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经济也没有任何城市能在这种情况下长期繁荣。”[5] 为了改变这一趋势，他承诺给富人增税，提供免费学前教育，拓展课后活动项目，提高最低工资，增加低薪行业的就业岗位，建造成千上万的经济适用房。

然而学者和政治预言家都没想到，2009年9月白思豪轻松淘汰了克里斯蒂娜·奎因和比尔·汤普森，一举赢得党内初选，比尔在2009年市长竞选中还曾差点击败布隆伯格。白思豪的共和党对手、前大都会运输署主席乔·勒霍塔说，白思豪是顽固不化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政策会摧毁城市经济。但选民并没有买乔的账，白思豪赢得了73%的大众选票，

在部分人群中占比甚至更高——95%的黑人选票、87%的拉丁裔选票和86%的年薪低于5万美元人群的选票。[6]

白思豪的竞选活动反映了当今社会的基本事实：城市不平等在不断加深，不平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城市问题，长期来看，不平等会影响经济发展。尽管成因和推动力可能不同，但不断加深的不平等几乎是所有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不过综合各种衡量方式来看，它在发达城市最严重。城市面积越大、人口越多、知识和科技的密集程度越高，就越不平等。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也不只有不平等，它们的成功还与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人才和企业聚集密不可分。

过去几十年美国的不平等急剧加深，在经历了罗斯福新政到里根当选期间的温和发展后，收入不平等迅速攀升到20世纪20年代盖茨比时代的水平。从1928年经济大萧条前夕到1979年里根总统当选，除了阿拉斯加之外，所有州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的收入在州总收入中的占比都在下降。而在2007年，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占有全国23.5%的收入，达到1928年以来的最高值。1979—2007年，超过一半的全国收入增长（53.5%）都进了前1%人群的口袋；2008年经济危机后，这一比值达到惊人的85%。2013年，前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其他99%的人群收入的25倍。[7]

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级城市和先进科技中心，前1%人群和其他人的收入差距甚至更大。在纽约，前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其他99%人群的40倍；在洛杉矶、旧金山和圣何塞，这一比值达到30倍。[8]

美国整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很高，基尼系数达到0.450（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不平等程度最高），与伊朗相当，比俄罗斯、印度或尼加拉瓜还高。美国很多城市的基尼系数更高，与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相当——纽约的基尼系数接近南非的斯威士兰，洛杉矶接近斯里兰卡，波士顿接近萨尔瓦多，旧金山接近卢旺达，而迈阿密则接近津巴布韦。当然，纽约穷人的经济状况不至于像斯威士兰的穷人那么糟，但美国城市的贫富差距确实和世界上最贫困、最不平等的地方差不

多。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这种状况十分可悲，令人忧心（见表5.1）。[9]

表5.1 美国城市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比较

大都会区	收入不平等	比较国
纽约－北新泽西－长岛	0.504	斯威士兰 (0.504)
迈阿密－劳德代尔堡－庞帕诺比奇	0.496	津巴布韦 (0.501)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0.485	斯里兰卡 (0.490)
孟菲斯	0.482	厄瓜多尔 (0.485)
休斯敦－舒格兰－贝城	0.479	墨西哥 (0.483)
新奥尔良－梅泰里－肯纳	0.478	马达加斯加 (0.474)
伯明翰－胡佛	0.475	中国 (0.473)
旧金山－奥克兰－费利蒙	0.475	萨尔瓦多 (0.469)
波士顿－剑桥－昆西	0.469	卢旺达 (0.468)
芝加哥－内珀维尔－乔利埃特	0.468	玻利维亚 (0.466)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城市和国家中情局人口普查所取得的收入不平等数据。

美国城市的不平等程度在迅速攀升。2006—2012年，美国有2/3的城市（356个城市中的226个）不平等程度变高了，并且核心城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城市都会区。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本身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它们所在的大都会区，甚至高于波士顿和迈阿密的中心城区，华盛顿、亚特兰大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高于各自的都会区。[10]

收入不平等在有的地方是富人收入上升的结果，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由穷人收入下降造成的，在“95-20比”为10~18的高比值城市就可见一斑。“95-20比”是指收入最高的前5%家庭与最低的20%家庭的年收入之比。[11]如表5.2所示，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收入最高的前5%家庭平均收入超过了550000美元。同样由前5%的家庭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城市还有纽约和洛杉矶这种超级城市，以及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这种知识中心。但在有的高“95-20比”城市，低收入群体导致了收入不平等，比如高度依赖服务经济并存在种族集中贫困的“太阳地带”城市新奥尔良和迈阿密。

表5.2 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

排名	大都会区	家庭收入（美元）		95 20比
		第95的百分位数	第20的百分位数	
1	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诺沃克	558 970	31 333	17.8
2	纽约－纽瓦克－泽西市	282 359	23 853	11.8
3	旧金山－奥克兰－海沃德	353 483	31 761	11.1
4	新奥尔良－梅泰里	196 658	18 173	10.8
5	麦卡伦－爱丁堡－米申	136 570	12 760	10.7
6	波士顿－剑桥－牛顿	293 653	27 883	10.5
7	洛杉矶－长滩－阿纳海姆	243 771	23 743	10.3
8	迈阿密－罗德代堡－西棕榈滩	202,461	19 775	10.2
9	纽黑文－米尔福德	221 661	22 652	9.8
10	休斯敦－伍德兰－舒格兰	240 711	24 758	9.7
	城市			
1	波士顿	266 244	14 942	17.8
2	新奥尔良	203 383	11 466	17.7
3	亚特兰大	281 653	16 057	17.5

续表

排名	城市	家庭收入（美元）		95-20比
		第95的百分位数	第20的百分位数	
4	辛辛那提	164 410	10 454	15.7
5	普罗维登斯	196 691	12 795	15.4
6	纽黑文	187 984	12 293	15.3
7	华盛顿	320 679	21 230	15.1
8	迈阿密	184 242	12 262	15.0
9	旧金山	383 202	26 366	14.5
10	纽约	249 609	17 691	14.1

资料来源：艾伦·贝鲁布和娜塔莉·霍姆斯，《因收入下降所导致的不断上升的城市不平等》，布鲁克林研究所，城市政策规划，2016年1月14日。

与收入不平等不同，工资不平等是另一个衡量美国城市经济分化问题的视角（见表5.3）。收入不平等的计算中既包含租金和资本收入，也包含底层无业群体的经济状况，而工资不平等只衡量了工资最高和最低群体之间的差距。由于技术人员和知识工作者的工资很高，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的工资不平等程度尤其高。全美工资不平等程度

最高的地方是位于硅谷中心的圣何塞。排名前十的城市和地区还有纽约、洛杉矶、奥斯汀科技中心、圣迭戈、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的罗利-卡里、华盛顿、旧金山、达拉斯和亚特兰大。

朋友圈每日分享精品课程书籍，微信：dubook666

表5.3 工资不平等

大都会区	工资不平等
圣何塞－森尼韦尔－圣克拉拉	0.481
奥斯汀－朗德罗克	0.418
纽约－新泽西北部－长岛	0.413
圣迭戈－卡尔斯巴德－圣马可斯	0.409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0.409
罗利－卡里	0.408
华盛顿－阿灵顿－亚历山德里亚	0.407
达拉斯－沃思堡－阿灵顿	0.406
旧金山－奥克兰－菲蒙	0.401
亚特兰大－桑迪斯普林斯－玛丽埃塔	0.398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工资不平等数据。

和收入不平等一样，可以通过比较工资最高的10%人群和最低的10%人群的工资差距来观察工资不平等的极值，即“9010比”（见表5.4）。全美工资最高的前10%人群工资约为最低的10%人群工资的5倍。[12]但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的工资差距更大，圣何塞的90-10比超过7倍，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的比值约为6倍，洛杉矶和波士顿的比值约为5.5倍。

表5.4 工资差距最大的城市

大都会区	90-10比
圣何塞－森尼韦尔－圣克拉拉	7.19
华盛顿－阿灵顿－亚历山德里亚	6.72

续表

大都会区	90-10比
旧金山－奥克兰－菲蒙	6.17
纽约－新泽西北部－长岛	6.04
休斯敦－舒格兰－贝城	5.54
波士顿－剑桥－昆西	5.54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5.51
圣迭戈－卡尔斯巴德－圣马可斯	5.44
巴尔的摩－陶森	5.39
亚特兰大－桑迪斯普林斯－玛丽埃塔	5.31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从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模式可以看出，美国城市地区的经济不平等有不同的特征和起因。我和我的同事夏洛塔·梅兰德发现这两种不平等源自两种不同的现象，因此我们详细分析了美国城市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几个共同影响因素：（1）全球化与技术变革；（2）种族和集中贫困的长期影响；（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企业、政府和劳工之间社会契约的削弱。[13]

工资不平等主要是由那些提高高收入群体工资的因素导致的，比如经济家所说的“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14]全球化让很多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入中国等低工资国家，技术革新和生产率上升又淘汰了更多这类工作岗位。曾是中产阶层的蓝领工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劳动力慢慢分化为两极，少数是高薪知识工作者及专业人员，而多数是低薪的日常服务业从业者。我们发现工资不平等与大学生、知识工作者及专业人员和高科技行业的聚集程度有统计相关性[15]，所以工资不平等在前沿知识中心尤其严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收入不平等则更能反映社会经济金字塔底部的长期贫困和经济困境。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等社会学家认为，不平等是贫穷和种族弱势的产物[16]，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时，城市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及用黑人人口占比衡量的种族均具有统计相关性。[17]另外，工会成员占比越高，收入不平等越低；税率越低，收入不平等越高。我们的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工会力量削弱和用来支持社会保险的累进税率的降低具有统计相关性。

换句话说，经济秩序顶层的赢者通吃和底层的长期贫困共同造成了经济不平等。它不只是全球化和自动化等结构性经济变革的结果，也源于那些破坏旧社会契约和侵蚀美国工人工资的公共政策，如减税、缩减福利和反工会措施等[18]，而这些政策是我们可以选择改变的。

不论根源是什么，不平等问题在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最为严重。[19]为了全面了解城市的不平等状况，我把收入不平等和工资不平等合并为一个“综合不平等指数”（见图5.1和表5.5）。根据这一指数，美国最不平等的前三个大城市地区是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第四是休斯敦，第五是夏洛特，随后是费城、达拉斯、波士顿、芝加哥和伯明翰。总之，美国所有前五大城市和前十大城市里的七个都在前十大最不平等大城市地区的名单中。如果考虑所有城市地区，美国最不平等的地方则是纽约州外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地区。另外，由于高薪的教职员工与低薪的服务人员和在职学生存在巨大工资差异，大学城往

往也是美国最不平等的城市地区[20]，包括得克萨斯州的大学城（得州农工大学）、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杜克大学）、西弗吉尼亚州的摩根敦（西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泰特科利奇（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密歇根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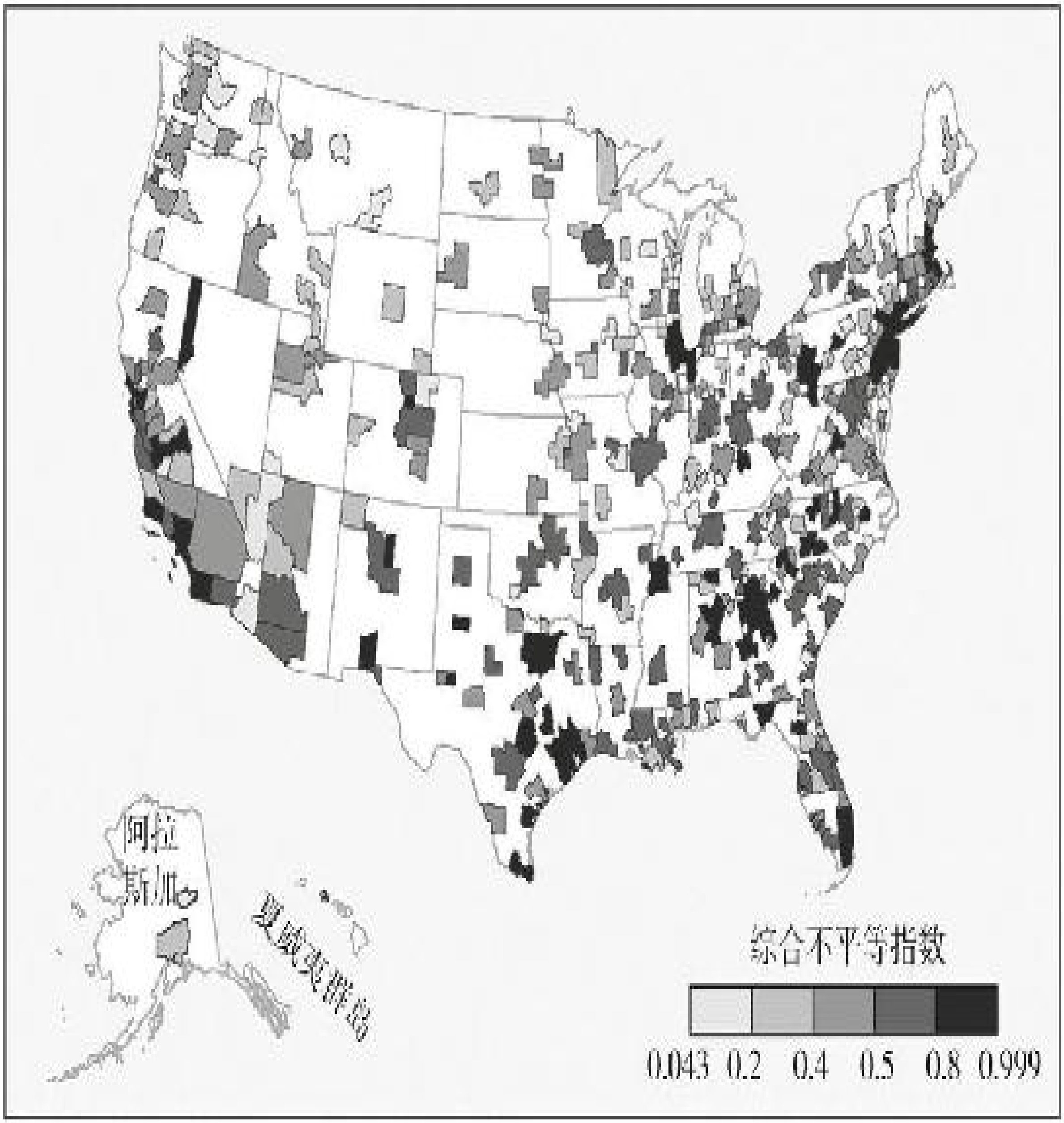


图5.1 综合不平等指数（1）

表5.5 综合不平等指数（2）

大都会区	综合不平等指数
纽约－北新泽西－长岛	0.979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0.962
旧金山－奥克兰－费利蒙	0.919
休斯敦－舒格兰－贝城	0.909
夏洛特－加斯托尼亚－康科德	0.882
费城－卡姆登－威尔明顿	0.873
达拉斯－沃思堡－阿灵顿	0.861
波士顿－剑桥－昆西	0.858
芝加哥－内珀维尔－乔利埃特	0.853
伯明翰－胡佛	0.852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社区调查的不平等数据。

注：该项指数结合了收入和工资不平等。

但是，如果大学城只是反映了劳动力的经济不平等，那么人口密集的大型知识中心还在创造这种不平等。城市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行业越聚集，经济不平等就越突出。[21]这又反映了新城市危机的症结：正是那些驱动经济发展的因素制造了不平等。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不平等与城市规模存在相关性。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有近70%城市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差异（以“90-10比”衡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人口达到50万~100万的城市中，只有34%的工资差异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比值在人口为10万~50万的城市中仅为10%，在人口10万以下的城市中则低于3%。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纳撒尼尔·鲍姆-斯诺进行的两项研究也显示了这一关系。其中一项表明，从1979—2004年，剔除教育、技能水平、产业结构等变量影响后，25%~35%的经济不平等增长是由城市规模造成的；另一项研究表明，从1979—2007年，1/3的工资不平等增长是由城市规模造成的。[22]

由于大城市的政治倾向最偏自由派，所以最自由派的城市也是最不平等的城市。这使得大城市的民主党市长（如比尔·白思豪）把减少不平等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核心显得颇为讽刺。然而整体来看，美国政治倾向偏自由派的地区的不平等程度显著高于保守派地区。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25个国会选区都是由民主党议员代表的。[23]而我自己在对350多个美国城市地区的研究中也发现，工资不平等程度与自由派政治倾向正相关，与保守派政治倾向负相关。[24]不平等当然不是自由派政治倾向的直接产物，而是与自由派一样，都是人口密集的知识型大城市的特征之一。另外，越来越多的富裕高学历人群在搬回城市，他们也加剧了城市的不平等。

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不公平，还会阻碍经济发展。200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控制教育、技术水平和其他促进城市发展的变量后，城市不平等程度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25]根据2014年的另一项研究，城市的不平等程度越高，经济增长期越短。研究分析了1990—2011年期间约200个城市地区，发现在就业增长期较短的城市中，不平等是最关键

的影响因素：城市不平等程度越高，就业增长期越短；不平等程度越低，就业增长期越长。更准确地说，收入不平等每增加1%，就业增长停滞的可能性就上升20%。[26]

此外，美国几乎没有城市能同时实现高经济增长和低不平等，这一令人不安的结论来自2016年的两项研究。第一项研究从两个维度分析了美国前100个大城市，一个维度是社区的不平等程度（按照邮政编码划分），另一个维度是繁荣或贫穷程度（通过收入中位数、就业增长、教育水平、新店开张情况等因素衡量），结果发现只有9个城市同时实现了高度繁荣和高度平等。这些城市普遍面积不大，并向郊区散漫扩张，比如斯科茨代尔、亚利桑那、普莱诺、得克萨斯，或麦迪逊、威斯康星等较富裕和人们的起步收入较同质化的大学城。如图5.2所示，旧金山和圣何塞这样的前沿科技中心高度繁荣且高度不平等，纽约、洛杉矶、华盛顿和波士顿也相对繁荣且高度不平等。[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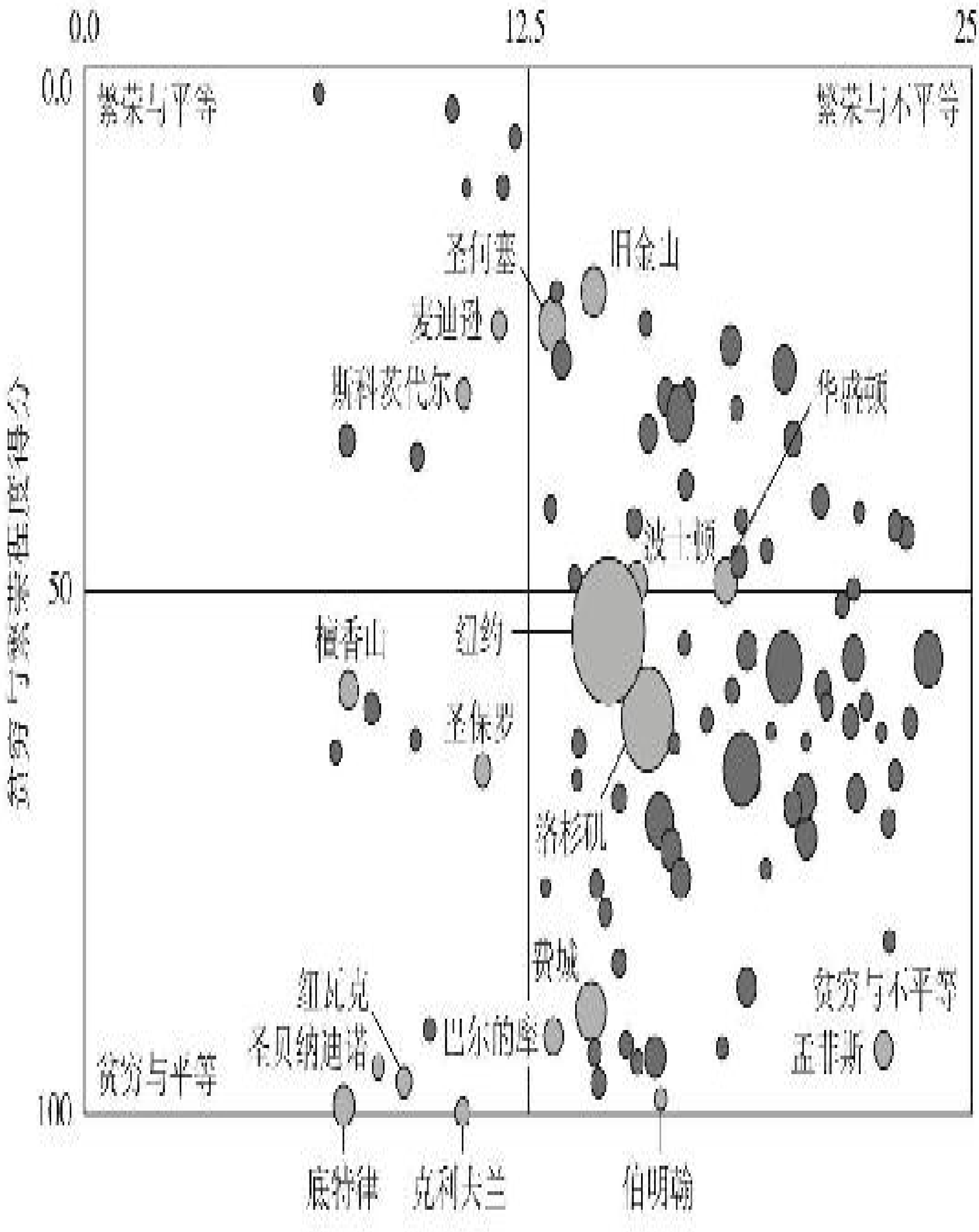


图5.2 不平等与繁荣之间的脱节

资料来源：《2016年贫困社区指数》（*The 2016 Distressed Communities Index*），经济创新集团，2016年。
注：圆圈大小反映人口总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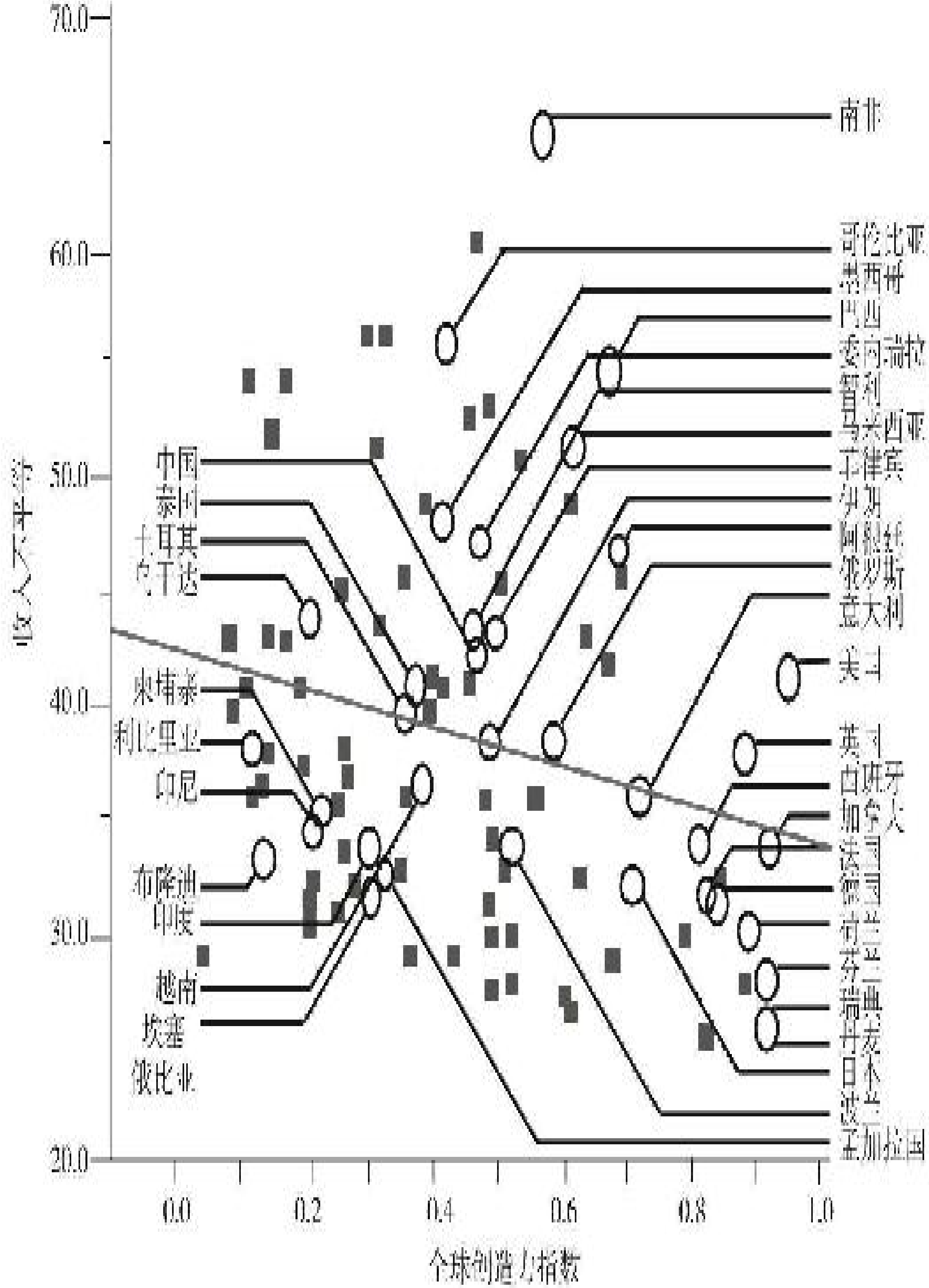
第二项研究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它主要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性（一个衡量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社会贫困程度和种族分化的指标）之间的联系。对大多数城市来说，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善低薪群体和穷人的经济状况。[28]尽管采用了不同的指标，研究对象也变成了城市而非城市地区，但这项研究也发现从2009—2014年，美国100个大城市中仍然只有9个城市的社会包容性提高了，尽管有95个都经历了经济增长。

如果高度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那么高度平等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美国城市里很难看出这一规律，因为美国整体不平等程度太高。如果观察不同国家的不平等与先进创意经济的关系，这一规律就很明显了。这些国家中有很多不平等程度都低于美国，还有部分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远比美国发达。我们通过对比139个国家的不平等与创意经济实力（基于全球创造力指数，这是一个衡量各国技术实力、人才水平和包容度的综合指标）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经济体越创新，不平等程度越低。图5.3展示了各国的收入不平等和创造力水平，向下倾斜的直线表明两者基本呈负相关关系。[29]

第二，如果考察不平等与创意经济的竞争力的关系，这些国家可以分成两组。第一组位于下倾直线的上方，包括美国和英国，它们的创新实力很强，也高度不平等。第二组位于下倾直线的下方，包括瑞典、芬兰和丹麦，它们的创新水平也很高，但不平等程度大大降低。它们代表了国家最大化创新实力的两种路径：以美国为代表的收入高度不平等的“低路”路径，以及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收入较平等的“高路”路径。只有后者才能在不产生负面影响（严重不平等和它引发的一

系列问题）的情况下产生正面效用（高水平的创新实力、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



收入不平等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0.0
0.2
0.4
0.6
0.8
1.0
全球创造力指数
南非
哥伦比亚
墨西哥
巴西
委内瑞拉
智利
马来西亚
菲律宾
阿根廷
俄罗斯
意大利
美国
英国
西班牙
加拿大
芬兰
瑞典
丹麦
日本
波兰
孟加拉国
中国
泰国
土耳其
乌干达
柬埔寨
利比里亚
印尼
布隆迪
印度
越南
埃塞
俄比亚

图5.3 不平等与全球创造力

资料来源：理查德·佛罗里达、夏洛塔·梅兰德、凯伦·金，《2015年全球创造力指数》（*The Global Creativity Index 2015*），马丁繁荣研究所。

经济不平等阻碍经济发展，而财富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则会促进经济发展，如累进税制和北欧发达的福利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国家不平等程度、发展水平和再分配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第一，对更多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国家更平等；第二，再分配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更快；第三，降低不平等的政策能提高经济发展速度。[30]总之，低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即便低不平等是由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公共政策带来的。

不平等不是城市经济的偶然失误，而是城市经济的根本特征。它的产生因素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正如聚集和发展相伴相生，聚集和不平等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不平等是一个讽刺而麻烦的城市成功特征。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对经济增长来说聚集十分必要，但不平等却并不必要。降低不平等并不一定会阻碍经济发展，事实上它还会促进经济增长。不平等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注定不变的，城市和国家一样，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它们可以选择任由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让社会底层人群无法得到社会安全网的保障，也可以选择通过再分配和其他政策机制降低不平等，这样不仅不会牺牲发展，往往还能促进经济增长。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会进一步讨论城市如何兼顾发展和平等，并实现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繁荣。然而，城市聚集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日益严峻的经济分化或空间不平等——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被分隔在城市与郊区中完全相互独立的区域。这种经济分类的趋势比不平等问题本身更麻烦，因为它让顶层不断累积优势，而弱势群体的不利境况却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严重。

[1] Sam Roberts, “Mayor Making It No Secret: He’ll Endorse Quinn in 2013,”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11, www.nytimes.com/2011/08/29/nyregion/in-private-bloomberg-backs-

christine-quinn-as-successor.html.

[2] Richard Florida, Hugh Kelly, Steven Pedigo, and Rosemary Scanlon, “New York City: The Great Reset,” NY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August 2015, www.pageturnpro.com/New-York-University/67081-The-Great-Reset/index.html.

[3] Michael Bloomberg, “Cities Must Be Cool, Creative, and in Control,”Financial Times, March 27, 2012, www.ft.com/cms/s/0/c09235b6-72ac11e1-ae73-00144feab49a.html#axzz3nuBbmXVR.

[4] Michael Barbaro and Megan Thee-Brenan, “Poll Shows New Yorkers Are Deeply Conflicted over Bloomberg’s Legacy,”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2013, www.nytimes.com/2013/08/18/nyregion/what-new-yorkers-think-ofmayor-bloomberg.html; Sam Roberts, “Gap Between Manhattan’s Rich and Poor Is Greatest in US, Census Find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7, 2014,www.nytimes.com/2014/09/18/nyregion/gap-between-manhattans-rich-andpoor-is-greatest-in-us-census-finds.html; “Cities and Their Millionaires,” The Economist, May 9, 2013, www.economist.com/blogs/graphicdetail/2013/05/daily-chart-7; Aoife Moriarty, “Revealed: Global Cities with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Millionaires,” Spears, July 22, 2014, www.spearswms.com/revealed-global-cities-with-the-highest-percentage-of-millionaires.

[5]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Greatness: Bill de Blasio” (video),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Milano School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Management, and Urban Policy, May 30, 2013, http://new.livestream.com/TheNewSchool/Bill-de-Blasio; Bill de Blasio, “A Foundation for Greatness,”New York Public Advocate Archives, May 30, 2013, http://archive.advocate.nyc.gov/jobs/speech.

[6] 投票数据来自《纽约时报》的票站调查，www.nytimes.com/projects/elections/2013/general/nyc-mayor/exit-polls.html。

[7]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no. 1 (2003).

[8] 在一些面积更小但超级富裕的地区，前1%和剩余99%群体的收入差距更大，这里生活的顶级名人附近就住着低收入服务业工人和穷人。例如，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市，前1%的人收入是其他人的200倍。另外还有佛罗里达的那不勒斯（73倍）、维罗海滩（63倍）、基韦斯特（59倍）、迈阿密（45倍），以及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74倍）、拉斯维加斯（41倍）。城市地区和更近期的国家趋势数据来自Estelle Sommeiller, Mark Price, and Ellis Wazete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S. by State, Metropolitan Area, and County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16), www.epi.org/publication/income-inequality-in-theus/#epi-toc-8。

[9] 国家基尼系数数据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The World Factbook (Washington,DC: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15), 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for

metros it is from the US Census Bureau,“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cs。

[10] 关于大都会地区间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参见Richard Florida, “Where the Great Recession Made Inequality Worse,” CityLab, August 4, 2014,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4/08/where-the-great-recession-made-inequalityworse/375480/T; US Conference of Mayors, U.S. Metro Economies: Income and Wage Gaps Across the U.S., Prepared by IHS Global Insight, 2014, http://usmayors.org/metroeconomies/2014/08/report.pdf. 关于城市与大都会地区的不平等问题对比，参见Daniel Hertz, “Why Are Metropolitan Areas More Equal Than Their Central Cities?,” City Observatory, September 22, 2015, http:// cityobservatory.org/why-are-metropolitan-areas-more-equal-than-their-centralcities; Joe Cortright, “The Difficulty of Applying Inequality Measurements to Cities,” City Observatory, July 30, 2015, http://cityobservatory.org/the-difficultyof-applying-inequality-measurements-to-cities。

[11] Alan Berube and Natalie Holmes, “City and Metropolitan Inequality on the Rise, Driven by Declining Incom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 January 14, 2016, 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6/01/14-income-inequality-cities-update-berube-holmes.

[12] J. Chris Cunningham, “Measuring Wag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cross US Metropolitan Areas, 2003–2013,” Monthly Labor Review, September 2015,www.bls.gov/opub/mlr/2015/article/measuring-wage-inequality-within-andacross-metropolitan-areas-2003-13.htm; Richard Florida, “Wage Inequality and America’s Most Successful Cities,” CityLab, October 7, 2015, www.citylab.com/work/2015/10/how-wage-inequality-is-playing-out-americasmost-successful-cities/409231.

[13] 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 “The Geography of Inequality:Differ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Wa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across US Metros,” Regional Studies, 2014, 1–14; Richard Florida, “The Inequality of American Cities,” CityLab, March 5, 2012, www.citylab.com/work/2012/03/inequality-american-cities/861; Richard Florida, “The Inequality Puzzle in U.S. Cities,” CityLab, March 7, 2012, www.citylab.com/work/2012/03/inequality-puzzle-us-cities/858.

[14] David H. Autor, Lawrence F. Katz, and Melissa S. Kearney,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6), http://economics.mit.edu/files/584; David Autor and David Dorn, “The Growth of Low-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no. 5 (2013): 1553–1597;David H. Autor, Lawrence F. Katz, and Alan B. Krueger, “Computing Inequality: Have Computers Changed the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 no. 4 (1998): 1169–1213; David H. Autor, Frank Levy, and Richard J. Murnane,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no. 4 (2003): 1279–1333.

[15] 工资不平等与以下因素呈显著正相关：高科技行业聚集程度（0.74），从事知识、专业和创意职业的劳动力占比（0.68），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占比（0.61）。

[16]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William Julius Wilson,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Knopf, 1996).

[17] 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相关度为0.5，收入不平等和种族的相关度为0.3。

[18] See Barry Bluestone and Bennett Harrison, The Great U-Tur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arizing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1988). Also see Dierk Herzer, "Union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Analysis for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March 3, 2016).

[19] Richard Florida, "Inequality and the Growth of Cities," CityLab,January 20, 2015, www.citylab.com/work/2015/01/inequality-and-thegrowth-of-cities/384571; Richard Florida,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uccessful Cities and Inequality," CityLab, January 6, 2015,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5/01/the-connection-between-successful-cities-andinequality/384243.

[20] 本·卡斯尔曼提出，学生的低收入是导致大学城不平等的原因之一，参见他的文章 "Inequality in College Towns," FiveThirtyEight, April 28,2014, 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inequality-in-college-towns。

[21] 工资不平等与大都市地区的规模（0.48）和密度（0.38）均呈显著正相关。

[22] Nathaniel Baum-Snow and Ronni Pavan, "Understanding the City Size Wage Gap,"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9, no. 1 (2012): 88–127; Nathaniel Baum-Snow, Matthew Freedman, and Ronni Pavan, "Why Has Urban Inequality Increased?," Working Paper, Brown University, June 2014, http://restud.oxfordjournals.org/content/79/1/88.full.pdf+html.

[23] Michael Zuckerman, "The Polarized Partisan Geography of Inequality,"The Atlantic, April 7, 2014, 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4/04/the-polarized-partisan-geography-of-inequality/360130; Joshua Green and Eric Chemi, "Income Inequality Is Higher in Democratic Districts Than Republican Ones," Bloomberg Businessweek, May 12, 2014,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4-05-12/income-inequality-is-higher-indemocratic-districts-than-republican-ones.

[24] 工资不平等和（用希拉里的选票占比衡量的）自由主义的相关度为0.42，工资不平等和（用特朗普选票占比衡量的）保守主义的相关度为-0.42，参见Richard Florida, "Why Democrats Are Focused on Inequality:Liberal Metros Face the Worst of It," CityLab, June 4, 2014,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4/06/why-democrats-are-focused-on-inequality-liberal-metros-facethe-worst-of-it/371827。

[25] Edward Glaeser, Mathew Resseger, and Kristina Tobio, "Urban Inequality,"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49, no. 4 (October 2009): 617–646.

[26] Chris Benner and Manuel Pastor, “Brother, Can You Spare Some Time?Sustaining Prosper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America’s Metropolitan Regions,” Urban Studies 52, no. 7 (2015): 1339–1356; also, Tanvi Misra,“Another Reason to Promote Social Equity in U.S. Metros: Job Growth,”CityLab, March 31, 2015, www.citylab.com/housing/2015/03/anotherreason-to-promote-social-equity-in-us-metros-job-growth/389033.

[27] The 2016 Distressed Communities Index (Washington, DC: 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 2016), http://eig.org/wp-content/uploads/2016/02/2016Distressed-Communities-Index-Report.pdf.

[28] Richard Shearer, John Ng, Alan Berube, and Alec Friedhoff, “Growth,Prosperity, and Inclusion in the 100 Largest U.S. Metro Areas,” Brookings Metro Monitor 2016, Brookings Institution 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January 2016, 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2016/01/metromonitor#V0G10420.

[29] 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Karen King, The Global Creativity Index 2015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the-global-creativity-index-2015/; Richard Florida, “Greater Competitiveness Does Not Have to Mean Greater Inequality,” CityLab,October 11, 2011, www.citylab.com/work/2011/10/greater-competitivenessdoes-not-greater-inequality/230.

[30] Jonathan Ostry, Andrew Berg, and Charalambos Tsangarides, Redistribution,Inequality, and Growth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4), 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4/sdn1402.pdf.

第六章 大分层加剧

2015年4月，在一位名叫弗雷迪·格雷的年轻黑人男性在被警方拘留几天后死亡，巴尔的摩市陷入暴乱。这件事不由让人联想起半个世纪前发生在我的家乡纽瓦克的一起类似事件，当时引发暴乱的导火索是，传说警察杀死了一名出租车司机。但是纽瓦克在1967年暴乱发生前已经出现了经济滑坡，而巴尔的摩在暴乱发生时，经济发展一片欣欣向荣。巴尔的摩的内港是热门的旅游景点和会议场所，联邦山等复兴社区正吸引富人和高学历群体重返城市，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带动了巴尔的摩及其周边地区大规模的高科技行业发展。事实上，大巴尔的摩地区通过发展创意经济已经跻身美国大城市地区的前二十强。

然而，虽然巴尔的摩的绅士化社区在复兴发展，但大部分其他地区都非常贫困。弗雷迪·格雷出生的沙镇-温彻斯特社区就坐落在一个可以俯瞰内港的山顶上。社区里很多排屋都是复合板房子，密不透风，没有街角商店，人行道边上的绿化带几乎都是光秃秃的。超过1/3的社区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枪击案和谋杀案发生率是巴尔的摩其他地区的两倍，而巴尔的摩的这两项指标本来就位于全国前列。沙镇-温彻斯特社区居民的平均寿命比巴尔的摩市整体居民平均寿命短六年半。[1]弗雷迪·格雷的死亡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后续事件都表明，巴尔的摩已经分化为两个城市——一个是繁荣发展，有高学历、高收入的知识工人的城市；而另一个则是在不断沦陷，有大量陷入长期贫困的黑人的城市。

这一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巴尔的摩。尽管返城浪潮带来了经济发展，但美国城市地区的集中城市贫困问题却更严重了，相关数据十分惊人：2014年，有1400万美国人住在极度贫困的社区，生活在集中贫困中，这一破历史纪录的数字是2000年的两倍。在2005—2014年，美

国100个大都会地区中有2/3都经历了集中贫困的增长。[2] 黑人生活在极度贫困社区的可能性是白人的5倍。

这一趋势所反映的问题比经济不平等更隐秘也更严重，即美国的收入、教育和阶层隔离。大约10年前记者比尔·毕晓普就注意到，美国人的隔离已经不仅限于政治信仰和文化倾向了，还出现在社会经济阶层方面，他称这一现象为“大分层”。[3]

大分层现象到如今变得更严重了，因为现在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空间隔离加深了。在1980—2010年，全国前30的城市地区中的27个出现了富人与穷人收入隔离的上升。2009年，超过85%的美国城市居民生活在经济隔离比1970年更严重的地区。1970—2012年这40多年中，住在全富人或全穷人社区的美国家庭占比从15%上升到34％。[4] 在如今的美国，经济不平等也是空间不平等：富人和穷人越来越倾向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空间。

大分层加剧问题的核心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消亡。从前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和稳固的中产阶级社区一度是美国梦的代表，而住在中产阶级社区的美国家庭占比从1970年的近2/3（65%）下降到2012年的不到一半（40%）。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整理的数据，从2000—2014年，美国229个城市地区中有203个都经历了中产阶级人口收缩。中产阶级群体最小的城市都是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圣何塞、华盛顿、波士顿、休斯敦、迈阿密、新奥尔良、萨克拉门托和哈特福德。根据我对皮尤研究中心数据的分析，中产阶级群体规模最小的城市人口更密集，更可能是知识密集型城市，也更多元化，这些都是富有经济活力的地区的特征。相反，中产阶级群体规模最大的城市白人更多、工人阶层更大、政治倾向更保守，这些都是经济衰败地区的特征。[5] 并且，那些在2000年中产阶级群体较大的城市，在到2014年的十几年里也经历了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收缩。不幸的是，在经济活力最强的地方中产阶级最少，在经济滑坡的地方中产阶级最多。

为了更好地理解大分层加剧现象的广度和深度，我和我的同事夏洛塔·梅兰德发明了一些用于衡量收入、教育和职业经济隔离的指标。我们基于全美7万多个人口普查区，通过不同群体或阶级的居住地研究他们的地理隔离。我们还创建了几个衡量整体经济隔离程度的指数，以及综合衡量经济隔离和不平等水平的指数。[6]

虽然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经济隔离特征，但我们的分析发现了一个基本规律。不论是基于收入、教育或职业的隔离指数，还是综合了以上几个因素整体效应的综合指数，都能发现经济隔离更加严重的地方是规模更大、人口更密集，以及科技行业、大学毕业生和创意阶层更聚集的大城市。另外我们还会看到，日趋深化的经济隔离的背后驱动力是优势群体的聚集，尤其是富人的聚集，富人能利用资源把自己圈在专享社区中。

首先是收入隔离，它是受到最广泛认可和研究的经济隔离形式。我们对收入隔离的研究考虑了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和低于国家贫困线的家庭）的地理隔离。[7]

这里的规律和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不平等的地理分布不同。整体收入隔离程度最高的十大城市包括“铁锈地带”的克利夫兰、底特律、密尔沃基、哥伦布和布法罗，以及孟菲斯、费城、菲尼克斯、堪萨斯和纳什维尔（见表6.1）。纽约刚好跌落前十榜单，洛杉矶、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这些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收入隔离程度较低。这就是说，我们更广泛的统计研究表明，收入隔离水平和城市的规模大小、人口密度以及高新科技与创意阶层的聚集程度密切相关。[8]

表6.1 收入隔离

排名	大都会区	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1	克利夫兰－伊利里亚－门托尔	0.964	2
2	底特律－沃伦－利沃尼亚	0.957	3
3	孟菲斯	0.948	4
4	密尔沃基－沃基肖－西埃利斯	0.935	5
5	哥伦布	0.912	8
6	费城－卡姆登－威尔明顿	0.887	11
7	菲尼克斯－梅萨－斯科茨代尔	0.882	12
8	布法罗－尼亚加拉瀑布	0.864	16

续表

排名	大都会区	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9	堪萨斯城	0.861	17
10	纳什维尔－戴维森－莫非斯堡－富兰克林	0.858	19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约15%的美国人——也就是4500万人口的家庭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他们的隔离正在扩大。隔离问题领域最顶尖的两位专家——肯德拉·比肖夫和肖恩·里尔登的研究表明，住在贫困社区的贫困家庭从1970年的8%上升到2009年的18%。[9] 和收入隔离一样，贫困隔离最严重的地方是“铁锈地带”的密尔沃基、克利夫兰、底特律和跨越纽约和波士顿的东北走廊沿线的哈特福德、费城、巴尔的摩，以及东南部的华盛顿和孟菲斯、西南部的丹佛（见表6.2）。但是纽约排名第六，科技中心的贫穷隔离水平也高于它们的收入隔离水平。在这里，我们的统计分析又表明，穷人的隔离与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高度相关。[10]

表6.2 贫穷隔离

排名	大都会区	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1	密尔沃基－沃基肖－西埃利斯	0.478	2
2	哈特福德－西哈特福德－东哈特福德	0.462	6
3	费城－卡姆登－威尔明顿	0.455	9
4	克利夫兰－伊利里亚－门托尔	0.435	15
5	底特律－沃伦－利沃尼亚	0.433	16
6	纽约－新泽西州北部－长岛	0.428	20

续表

排名	大都会区	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7	布法罗－尼亚加拉瀑布	0.416	28
8	丹佛－奥罗拉	0.413	30
9	巴尔的摩－陶森市	0.410	33
10	孟菲斯	0.410	34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经济隔离给穷人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他1987年出版的经典作品《真正的穷人》中就提出了贫穷的空间聚集带来的不利影响，包括就业岗位更少更差、经济网络和职业网络更落后、学校质量更差、犯罪率更高、同伴圈更糟糕、婚配伴侣选择更少以及更难接触到正面榜样。[11]生活在长期贫困社区的人不仅缺乏经济资源，还被孤立于那些能带来经济阶层向上流动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之外。这些劣势导致他们世世代代都被困于贫穷中。

这一现象的反面是如表6.3所示的富人的隔离（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在大城市中，富人隔离程度最高的是老工业城市——如孟菲斯、伯明翰、路易斯维尔、克利夫兰和底特律，以及纳什维尔、哥伦布、夏洛特和迈阿密。但在这里，我们的统计研究再次表明，在规模更大、人口密度更高和高科技行业更发达的城市中，富人的隔离程度更高。[12]

表6.3 富人隔离

排名	大都会区	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1	孟菲斯	0.582	5
2	伯明翰－胡佛	0.576	8
3	路易斯维尔－杰弗逊县	0.575	9
4	圣安东尼奥	0.567	10
5	克利夫兰－伊利里亚－门托尔	0.560	13
6	底特律－沃伦－利沃尼亚	0.552	17
7	纳什维尔－戴维森－莫菲斯堡－富兰克林	0.549	23
8	哥伦布	0.547	25
9	夏洛特－加斯托尼亚－康科德	0.541	29
10	迈阿密－劳德代尔堡－波姆庞帕诺滩	0.540	31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收入隔离的驱动力来自最顶层人群的地理分布。富人比穷人的隔离程度更高。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表明，富人是隔离程度最高的群体。[13]这个发现并不意外：富人能利用自己的资源占领心仪的地盘，并把自己和弱势群体隔开。这从很多方面反映了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

德尔说的社会的“包厢化”，即富人把自己隔离在远离大众看台座位的私人豪华包厢中。[14]

除了收入隔离之外，还应该考虑教育隔离和职业隔离。不同种类的隔离相互强化，它们一直是人口密集的大型知识密集型城市的特征。

人们分类隔离的标准不仅是收入，还有受教育程度。教育有时候也被称作人力资本，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15]，是决定我们收入的核心要素，能强化金钱带来的优势。

低学历人群（高中未毕业）在社会中面临的困难重重。他们的学习速度远低于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也较高。低学历人群隔离程度最高的大城市包括洛杉矶，科技中心中的奥斯汀、丹佛、圣迭戈、旧金山和圣何塞，以及“太阳地带”上的菲尼克斯、达拉斯、圣安东尼奥和休斯敦（见表6.4）。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虽然没有进入前十，但它们的教育隔离程度也较高。

表6.4 低学历人群隔离

排名	大都会区	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1	奥斯汀－朗德罗克	0.451	4
2	丹佛－奥罗拉	0.446	6
3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0.442	7
4	菲尼克斯－梅萨－斯科茨代尔	0.428	8
5	达拉斯－沃思堡－阿灵顿	0.428	9
6	圣迭戈－卡尔斯巴德－圣马科斯	0.412	11
7	圣安东尼奥	0.406	14
8	休斯敦－舒格兰－贝城	0.398	18
9	旧金山－奥克兰－菲蒙	0.395	20
10	圣何塞－森尼维耳－圣克拉拉	0.393	21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高学历人群（拥有大学本科或更高学历）则拥有巨大的经济优势。他们的收入远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失业率则远低于全国平均值。大学毕业生的隔离程度在老工业城市最高，包括伯明翰、孟菲斯、路易斯维尔和能源中心休斯敦。洛杉矶排名第三。前十名中还有圣安东尼奥、达拉斯、夏洛特和芝加哥（见表6.5）。整体来看，高学

历人群的隔离程度与城市规模、人口密度、高科技行业聚集度和创意阶层占比密切相关。[16]

表6.5 高学历人群隔离

排名	大都会区	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1	伯明翰－胡佛	0.424	6
2	休斯敦－舒格兰－贝城	0.419	7
3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0.406	8
4	哥伦布	0.403	9
5	孟菲斯	0.399	11
6	圣安东尼奥市	0.395	12
7	路易斯维尔－杰弗逊县	0.388	16
8	达拉斯－沃思堡－阿灵顿	0.386	17
9	夏洛特－加斯托尼亚－康科德	0.384	20
10	芝加哥－内伯威尔－乔利埃特	0.380	23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的整体教育隔离指标比较了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未毕业群体之间的隔离程度，洛杉矶位列榜首，位列其后的四个城市均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达拉斯、圣安东尼奥和奥斯汀。其他前十名城市包括科技中心圣迭戈和旧金山，还有芝加哥、哥伦布和夏洛特（见表6.6）。

表6.6 整体教育隔离

排名	大都会区	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1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0.982	2
2	休斯敦－舒格兰－贝城	0.968	3
3	达拉斯－沃思堡－阿灵顿	0.967	4
4	圣安东尼奥	0.967	4
5	奥斯汀－朗德罗克	0.955	7
6	圣迭戈－卡尔斯巴德－圣马科斯	0.937	10
7	芝加哥－内伯威尔－乔利埃特	0.932	11
8	哥伦布	0.922	15
9	夏洛特－加斯托尼亚－康科德	0.908	19
10	旧金山－奥克兰－菲蒙	0.907	20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的生活质量不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影响，职业也很关键。职业为我们带来收入，也塑造了我们的身份。此前我将工作岗位

划分为三个大类别：高薪创意阶层、低薪且脆弱的服务业阶层以及不断收缩的工人阶层。在创意阶层隔离方面，我们所熟悉的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模式十分清晰地凸显了出来（见表6.7）。洛杉矶排名第一，纽约第五。前十中还有圣何塞、旧金山、奥斯汀和圣迭戈这些科技中心，全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以及三个得州城市：休斯敦、达拉斯和圣安东尼奥。

表6.7 创意阶层隔离

排名	大都会区	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1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0.344	1
2	休斯敦–舒格兰–贝城	0.327	4
3	圣何塞–森尼维耳–圣克拉拉	0.310	5
4	旧金山–奥克兰–菲蒙	0.301	8
5	纽约–新泽西州北部–长岛	0.300	9
6	达拉斯–沃思堡–阿灵顿	0.294	10
7	奥斯汀–朗德罗克–圣马科斯	0.284	15
8	圣安东尼奥-新布朗费尔斯	0.284	16
9	圣迭戈–卡尔斯巴德–圣马科斯	0.282	17
10	芝加哥–乔利埃特–内伯威尔	0.281	18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服务业阶层的隔离程度最高的地方也是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见表6.8）。圣何塞、华盛顿、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圣迭戈、奥斯汀和洛杉矶都在前十名单中，其他两个城市是东北部的费城和巴尔的摩。

表6.8 服务业阶层隔离

排名	大都会区	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1	圣何塞－森尼维耳－圣克拉拉	0.185	6
2	华盛顿－阿灵顿－亚历山德里亚	0.181	7
3	旧金山－奥克兰－菲蒙	0.178	9
4	纽约－新泽西州北部－长岛	0.176	11
5	波士顿－剑桥－昆西	0.161	18
6	费城－卡姆登－威尔明顿	0.158	19
7	巴尔的摩－陶森	0.154	24
8	圣迭戈－卡尔斯巴德－圣马科斯	0.150	29
9	奥斯汀－朗德罗克－圣马科斯	0.149	33
10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0.142	49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工人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减少，工人阶层的隔离模式与创意阶层很相似。从表6.9中可以看出，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在工人阶层隔离方面的排名也很靠前。洛杉矶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奥斯汀、达拉斯、华盛顿、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的罗利-卡里、旧金山和圣何塞。纽约和波士顿虽然没有进入前十，但排名也很靠前。

6.9 工人阶层隔离

排名	大都会区	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1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0.330	1
2	奥斯汀－朗德罗克－圣马科斯	0.321	2
3	达拉斯－沃思堡－阿灵顿	0.304	6
4	华盛顿－阿灵顿－亚历山德里亚	0.303	7
5	罗利－卡里	0.301	8
6	旧金山－奥克兰－菲蒙	0.300	9
7	圣何塞－森尼维耳－圣克拉拉	0.296	12
8	休斯敦－舒格兰－贝城	0.295	13
9	夏洛特－加斯托尼亚－岩石山	0.287	17
10	哥伦布	0.287	18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用包含三个阶层的综合隔离指数衡量整体职业隔离水平，科技中心和超级城市依然位列前茅（见表6.10）。圣何塞排名第一，其次是旧金山、华盛顿、奥斯汀、洛杉矶、纽约、休斯敦、圣迭戈、圣安东尼奥和哥伦布。在这些地方，创意阶层、工人阶层和服务阶层均匀分散在城市中的可能性最低，他们倾向于和自己同阶层的人聚集而居。

表6.10 整体职业隔离

排名	大都会区	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1	圣何塞－森尼维耳－圣克拉拉	0.981	2
2	旧金山－奥克兰－菲蒙	0.979	3
3	华盛顿－阿灵顿－亚历山德里亚	0.971	4
4	奥斯汀－朗德罗克	0.956	7
5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0.955	8
6	纽约－新泽西州北部－长岛	0.953	9
7	休斯敦－舒格兰－贝城	0.936	13
8	圣迭戈－卡尔斯巴德－圣马科斯	0.924	14
9	圣安东尼奥	0.918	15
10	哥伦布	0.904	16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三个阶层中最占优势的阶层——创意阶层的地理分布决定了整体职业隔离的模式。原因很简单：创意阶层拥有更多财富，因此对居住地点有最大的选择权。他们选择了最好的地段，把其他两个更弱势的阶层挤到他们挑剩下的地方。

收入、教育和职业隔离的精确动态各不相同，但从统计上看他们彼此密切相关。如果把他们放到一起，就能清晰地看到美国经济隔离的整体地理分布。[17] 为了揭示这一规律，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发明了两个广泛指标，一个衡量整体经济隔离水平，另一个则把这一指标和工资与收入不平等的指标结合在一起。图6.1和表6.11（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就绘制了第一个指标——基于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隔离的三个维度的综合指数。

如图所示，整体经济隔离程度最高的地方是位于东北部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长廊，西海岸的洛杉矶、旧金山湾区附近，得州的部分地区以及几个其他地区。知识中心奥斯汀位于经济隔离程度最高城市之首。美国前六大城市——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达拉斯、休斯敦和费城，都出现在前十名单中。塔拉哈西、图森和安娜堡等大学城也排名靠前。[18]

为了全面理解经济隔离，我们还分析了影响经济隔离的各种要素。我们把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反映城市重要经济特征和人口统计特征的数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高新科技行业聚集方面的数据。

首先，经济隔离与城市地区的面积关系紧密。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城市面积高度相关。[19] 有超过200个中小型城市的整体经济隔离程度低于那些经济隔离程度最低的大型城市，这一规律基本也适用于每一种单独的隔离形式。图6.2展示了城市规模（基于人口数量）和经济隔离的关系，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表示两者正向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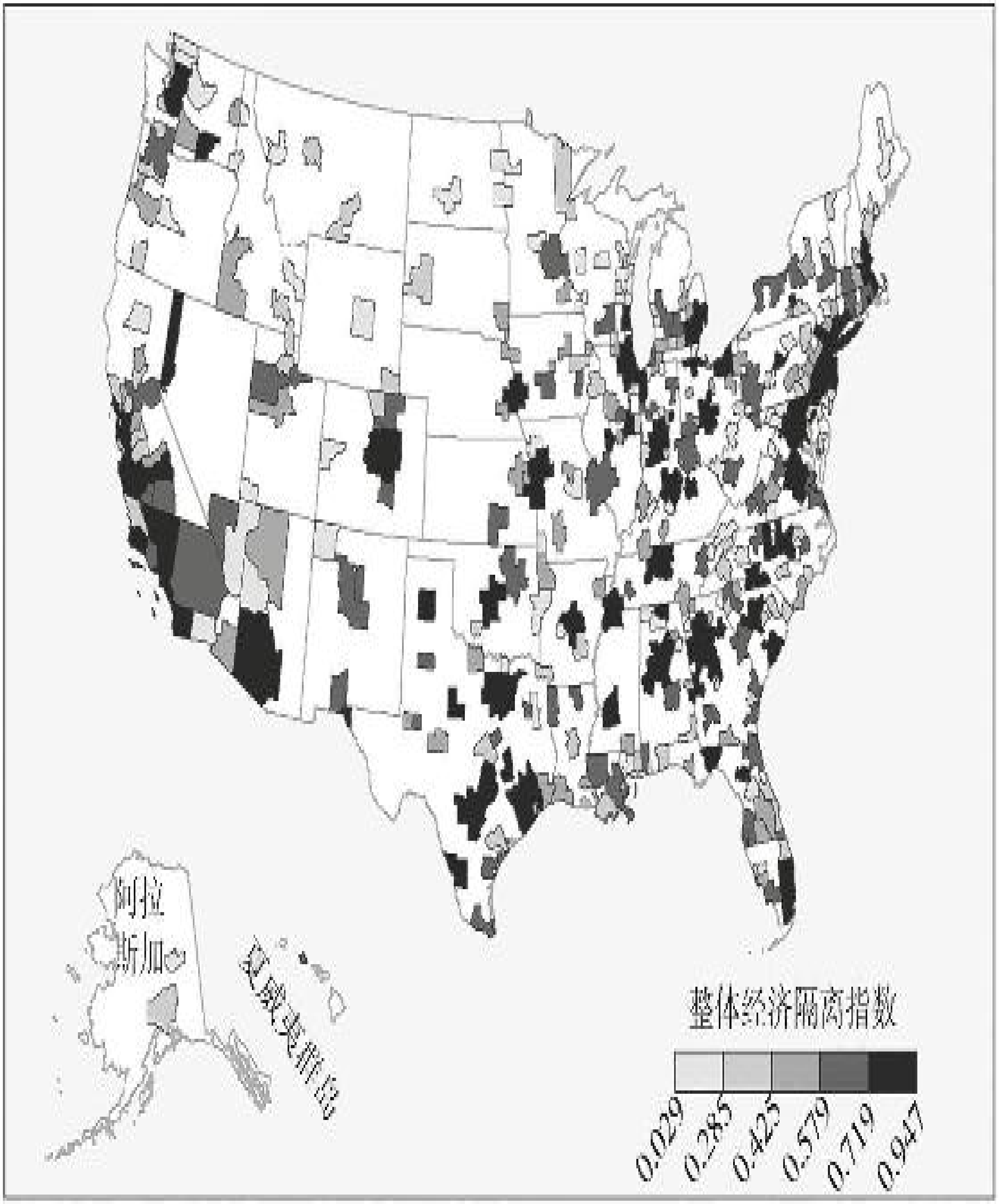


图6.1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1）

表6.11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2）

排名	大部分被隔离的大型城市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1	奥斯汀－朗德罗克	0.925	3
2	哥伦布	0.912	4
3	圣安东尼奥	0.903	6
4	休斯敦－舒格兰－贝城	0.903	7
5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0.893	10
6	纽约－新泽西州北部－长岛	0.889	11
7	达拉斯－沃思堡－阿灵顿	0.875	12
8	费城－卡姆登－威尔明顿	0.873	13
9	芝加哥－内伯威尔－乔利埃特	0.868	15
10	孟菲斯	0.867	16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经济隔离还和人口密度紧密相关。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人口密度正相关，与另一项反映人口密度的影响的指数——乘坐公共交通通勤者的占比同样正相关。一般来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使用公共交通的通勤方式更普遍，反之人们更倾向于独自驾车上班。[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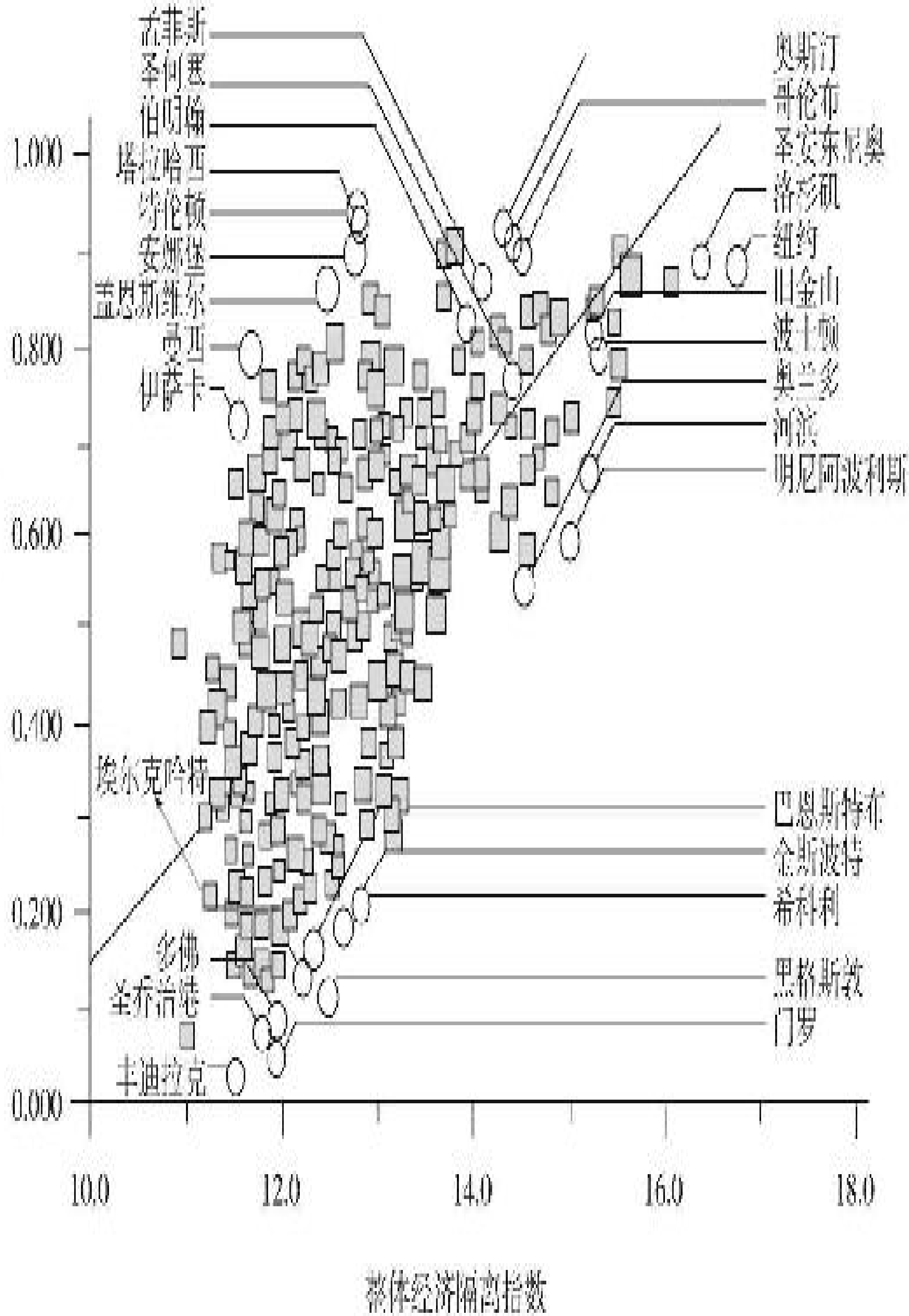

孟菲斯
圣何塞
伯明翰
塔拉哈西
沙伦顿
安娜堡
盖恩斯维尔
伊萨卡
埃尔克哈特
多佛
圣乔治港
丰迪拉克
奥斯汀
哥伦布
圣安东尼奥
洛杉矶
纽约
旧金山
波士顿
奥兰多
河滨
明尼阿波利斯
巴恩斯特布
金斯波特
希科利
黑格斯敦
门罗
1.000
0.800
0.600
0.400
0.200
0.000
10.0
12.0
14.0
16.0
18.0
人口规模（百万）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图6.2 城市规模与经济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注：城市规模基于人口数。

经济隔离还是富裕城市的特征：越富裕的地区经济隔离程度越高，反之亦然。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工资和衡量生产力的人均经济产出指标都呈正相关。[21]

经济隔离和知识型城市的关键特征联系更加紧密，如高科技行业、创意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经济隔离与高新科技行业和创意阶层的相关性是在我们这次分析中最高的。反之，工人阶层工作岗位越多，能提高蓝领工人工资的工会化率越高，经济隔离程度就越低。[22]

另外，经济隔离和不平等一样，都与保守地区和自由地区长期分化有关。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政治自由主义正相关，与政治保守主义负相关。[23]虽然这种相关性反映了大型、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区的广泛特征，但它仍颇具讽刺意味。

接下来这张地图拓展了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图6.3和表6.12展示了全国350多个城市地区的隔离与不平等指数，这一指数综合反映经济隔离、收入不平等和工资不平等水平。[24]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都排在前列。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中，纽约排名第一、洛杉矶第二、休斯敦第三、旧金山第四。这一次，美国前六大城市又全部进入了前十大最隔离和最不平等大城市排行榜。在所有城市地区中，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地区排名第一，其他大学城排名也很靠前，如卡城、盖恩斯维尔、塔拉哈西、达勒姆、雅典、博尔德，以及特伦顿（普林斯顿大学所在地）。隔离与不平等指数与城市的面积、人口密度和富裕程度高度相关，它与高科技行业聚集、创意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的相关性甚至超过了经济隔离本身与它们的相关性。[25]


阿拉
斯加
夏威夷群岛
不平等隔离指数
0.0 0.2 0.4 0.6 0.8 1.0

图6.3 隔离与不平等指数（1）

表6.12 隔离与不平等指数（2）

排名	大都会区	隔离与不平等指数	在所有大都会区中排名
1	纽约－夏威夷群岛新泽西－长岛	0.977	2
2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0.967	3
3	休斯敦－舒格兰－贝城	0.934	7
4	旧金山－奥克兰－菲蒙	0.920	9
5	费城－卡姆登－威尔明顿	0.903	12
6	达拉斯－沃思堡－阿灵顿	0.897	13
7	夏洛特－加斯托尼亚－康科德	0.892	15
8	芝加哥－内伯威尔－乔利埃特	0.889	17
9	奥斯汀－朗德罗克	0.885	18
10	伯明翰－胡佛	0.879	20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经济隔离与经济不平等相伴相生。高度经济隔离的城市地区往往也存在高度收入不平等，而经济隔离和工资不平等的关系甚至更紧

密。[26]经济隔离与不平等的这种关系已经至少存在30年了。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隔离和不平等都随着城市面积的增加而加深，即便控制了教育水平、种族、行业和工作结构等因素，两者依然存在很强的相关性。[27]

这一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过去10年，伦敦、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和米兰等很多欧洲城市的经济隔离和不平等程度都大幅度上升。[28]和美国一样，欧洲不断加深的经济隔离也是由富人和优势群体的资源和选择驱动的。

经济不平等和经济隔离的结合极其危险。它强化了顶层人群的优势，加剧并持续了底层人群的劣势。它不仅产生了经济资源不平等，还带来了更长期和更畸形的机会不平等。根据2005年的一项研究，机会不平等使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25%。也就是说，我们用来衡量收入和工资不平等的传统方法实际上低估了经济分化的程度，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经济隔离和不平等的结合带来的破坏性。[29]

这种机会差异在代与代之间被强化了。大家都知道来自富人区富裕家庭的孩子能获得比穷人家庭孩子更好的教育资源。但是如今，父母的收入也是决定年轻人定居地的重要因素。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高昂房价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望而却步，哪怕他们是在高薪的科技行业工作。他们在这些地方买房并获得职业机会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父母。年轻人越来越依靠父母的财富来选择对自己人生前途至关重要的居住地，而没有父母依靠优势的年轻人就可能被关在门外。阶级和居住地两者互相强化的过程不仅发生在此刻，还在世世代代间不断持续。

今天美国社会的残酷事实就是，贫穷社区永远贫穷，而富裕社区永远富裕。隔离不仅把人困在特定地点，还困住了社区。事实上，2000年的贫困社区中有75%在10年后依然贫困，1990年的富裕社区中有

80%在20年后依然富裕。[30]我们的邮政编码越来越主导了我们的命运。

经济隔离不仅是阶级问题，还与种族和美国长期的种族分化密不可分。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提到过种族和创意经济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联系。具体来说，在城市地区，少数族裔或非白人的人口占比与高增长的高科技公司聚集呈负相关。最近，我发现黑人在创意阶层中的占比严重不足。黑人虽然占总人口的12%，但只占有8.5%的创意阶层工作。对比之下，占总人口数不足2/3（64%）的非拉丁裔白人拥有近3/4（73.8%）的创意阶层工作。只有28%的黑人工人从事创意阶层工作，而在白人中这一比例为41%。在51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中，创意阶层工作中白人占比超过40%的大城市有37个，而该类工作中黑人占比超过40%的大城市只有1个。在大学毕业生和高科技公司更多和更多元化（用移民和同性恋人口衡量）的城市中，黑人在创意阶层工作中占比更高。但在黑人人口比例更高的城市中，黑人在创意阶层工作中占比反而较低。这可能是因为黑人创意阶层都被吸引去了经济更有活力的地区，那里有更多高技术含量的高薪工作，能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31]

虽然种族隔离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前的顶峰不断下降，但今天的经济隔离问题和种族仍然存在紧密关联。根据2012年爱德华·格莱泽和雅各布·维格多的一项研究，1970—2010年，美国最大的85个城市中黑人的隔离程度都下降了。[32]即便如此，种族和经济隔离仍然密不可分。我的城市地区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和黑人人口比例与拉丁裔和亚裔人口比例都呈正相关。相反，该指数与城市的白人人口占比呈负相关。[33]

这并不意外，种族与阶级仍然是人群和社区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令人意外的是，黑人创意阶层对经济隔离和不平等有缓和效应。美国城市中黑人创意阶层与收入不平等没有统计相关性，与经济隔离也只存在较小的相关性，这与白人创意阶层或者创意阶层整体的规律都大相径庭——这两者均与收入不平等和隔离呈正相关。[34]从政策角

度看，这说明促进黑人创意阶层的发展有利于削弱不平等和隔离现象。鉴于现在创意阶层中黑人比例本来就偏低，实施这一举措更是迫在眉睫。

然而既讽刺又让人忧心的事实是，多元化的城市也可能存在严重的隔离问题。我的研究发现，隔离与两个衡量多元化的常见指标正相关：同性恋的聚集和外国出生的人口占比。[35]2015年，内特·西尔弗的一项研究对比了美国最大的100个城市的整体多元化水平以及它们社区的种族隔离，结果发现种族更多元化的城市，隔离问题也更严重。[36]

最后，贫困黑人社区就成了种族和经济隔离这套组合拳的最大受害者。黑人生活在集中贫困地区的可能性远高于白人，1/4的黑人住在高度贫困社区，而白人住在此类社区的比例只有1/13。[37]另外，城市正在分化为种族集中贫困区域和种族集中富裕区域。根据2015年一项针对美国15个大都会地区的研究，洛杉矶有129个种族集中贫困社区拥有超过80%的黑人和拉丁裔人口，有12个种族集中富裕地区拥有超过90%的白人人口。芝加哥则有138个种族集中贫困社区，拥有超过80%的黑人和拉西裔人口，有58个种族集中富裕地区拥有超过90%的白人人口。从15个都会地区整体来看，种族集中贫困的地区中，黑人和拉丁裔人口超过75%，而种族集中富裕的地区中，白人人口超过90%。[38]

在贫困黑人社区长大的人很容易一直待在这种社区。在美国最穷的25%的社区长大的黑人里，有2/3会在同样贫困的社区中养育自己的下一代。讨论种族集中贫困问题的重要著作《滞于其所》（*Stuck in Place*）的作者帕特里克·夏基曾说："社区不公平与几代人相关，它像基因背景和财富的代际传递一样，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39]

这种传递同样损害黑人中产阶级，他们比白人中产阶级更可能住在高度贫困的社区及其周边。事实上，约一半黑人中产阶级成长于贫困率超过20%的社区，而白人中产阶级的这一比例仅为1%。[40]即便贫困的黑人父母能努力脱贫，他们的孩子也往往会重新陷入贫困。

在种族集中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2015年道格拉斯·马西和乔纳森·罗思韦尔的一项研究显示，成长于最贫困的20%的社区的人和最富裕的20%的社区的人的终生收入差距，基本与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生的终生收入差距相同：近100万美元，精确地说是91万美元。总之，黑人的低经济流动性是他们被隔离并集中于长期贫困社区的结果。[41]

经济和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危害是阻碍了非优势群体向上的经济流动。根据经济学家拉杰·切蒂等人的一项重要研究，在隔离与经济不平等更严重的地区，经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42]来自黑人社区的小孩提升经济阶层的可能性非常小，成年黑人与成年白人的收入差距中有约1/5来自于他们成长的郡。种族集中贫困给经济流动性和美国梦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然而有趣的是，切蒂的研究表明，经济阶层流动性最好的地方是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湾区、波士顿、大华盛顿地区和西雅图，这几个城市都在向上流动性最好的前20个城市名单中。虽然它们存在严重的隔离与不平等问题，但更有活力的经济、更多高薪行业和工作机会为它们的经济提供了宽阔的上升通道。相反，在人口更少、布局更不紧凑的城市，向上经济流动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因为弱势群体很可能住在离工作和经济机会更远的地方。

不同城市的经济流动可能性差异巨大，我自己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在我两岁、我弟弟刚出生时，我的工人阶级父母从纽瓦克搬到了博根郡的北阿灵顿市，并在我们的成长期间不断地提醒我们，当初搬家就是为了给我们铺设更好的人生道路。他们这方面的直觉在切蒂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印证，研究发现在博根郡长大的人拥有更好的人生前途，而纽瓦克则相反。我的父母也挑对了时间，切蒂的研究显示，幼童时期搬到好地方能为孩子带来最大收益。

在人口密集的大型知识城市，贫困群体除了拥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还更可能活得更长、更健康。切蒂及其同事的研究显示，在纽

约、洛杉矶、旧金山、圣何塞这样的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中，穷人寿命更长；在底特律、加里、托莱多和代顿这几个“铁锈地带”城市，以及拉斯维加斯、塔尔萨和俄克拉何马城，穷人寿命更短。[43]如果我们想帮助穷人和工人阶级改善经济状况、拥有更长寿命和更健康的生活，就必须保障他们不被高住房成本挤出最大、最富裕及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

即便如此，所谓的以人为本的政策也不会神奇地解决集中贫困的问题，比如帮助穷人搬到大城市，甚至是搬到较好社区。向好地方搬迁带来的好处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大幅下跌，对青少年基本没有什么影响。种族也是一个因素，白人和拉丁裔小孩比黑人小孩更可能通过搬家获得向上的经济流动。[44]这种完全以人为本的政策还会对贫困社区造成巨大伤害：把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人和家庭抽走，会导致原本就问题重重的贫困社区更加落后。我在本书的第十章中将讨论，如果我们希望打破城市集中贫困的困境，就必须把以人为本的政策与改善社区状况的基于地区的政策结合起来。

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虽然各种类别的经济隔离分别在某些特定类型的城市更严重，比如“铁锈地带”城市的收入隔离程度更高，“太阳地带”城市的教育隔离更高，然而从整体来看，经济隔离问题在更大、人口更多、经济更发达且更多元化的城市更严重。这个发现反映了新城市危机的核心矛盾：那些生产力最高、提供最高薪职位、聚集最多高新科技行业和人才、人口最多、拥有最充裕的公共交通设施、最多元化、政治倾向最自由的城市，却面临着最尖锐的经济不平等和经济隔离问题。

在这一章和此前的一章，我用综合数据展现了美国城市整体隔离和不平等程度，及其背后作为驱动力的典型城市因素。在下一章，我将用更细分的数据将社区层面的分化现象视觉化，揭示城市和郊区是如何分裂成小范围的集中优势区域和大范围的集中弱势区域的。

[1] 巴尔的摩市的统计数据来源如下。Creative economy: Shade Shutters,Rachata Muneepeerakul, and José Lobo, "Constrained Pathways to a Creative Urban Economy,"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April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WP2015_Constrained-pathways-to-a-creative-urban-economy_Shutters-Muneepeerakul-Lobo.pdf. Black income: Joel Kotkin, "The Cities Where African Americans Are Doing the Best Economically," Forbes,January 15, 2015, www.forbes.com/pictures/femi45jlhh/no-4-baltimore-md.Concentrated poverty and affluence: Edward G. Goetz, Tony Damiano, and Jason Hicks, "American Urban Inequality: Racially Concentrated Affluence,"Lincoln Land Institute, 2015. Limited economic mobility: Raj Chetty and Nathaniel Hendren,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Childhood Exposure Effects and County-Level Estimates," NBER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y 2015. Crime and violence: Richard Florida and John Roman, "There Are Plenty More Baltimores," CityLab, May 4, 2015, www.citylab.com/crime/2015/05/thereare-plenty-more-baltimores/392264. Murders and shootings: Baltimore Neighborhood Indicators Alliance, Jacob France Institute, "Number of Gun-Related Homicides per 1,000 Residents," http://bniajfi.org/indicators/Crime%20and%20Safety/gunhom; 2011 Neighborhood Health Profile:Sandtown-Winchester/Harlem Park, Baltimore City Health Department,December 2011, http://health.baltimorecity.gov/sites/default/files/47%20 Sandtown.pdf.

[2] Elizabeth Kneebone, "U.S. Concentrated Poverty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Recess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31, 2016, 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2016/03/31-concentrated-poverty-recession-kneebone-holmes.

[3] Bill Bishop, 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8).

[4] 关于1980年至2010年间前三十大城市地区的收入隔离上升问题，参见Paul Taylor and Richard Fry, The Rise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y Income(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2012), www.pewsocialtrends.org/files/2012/08/Rise-of-Residential-Income-Segregation-2012.2.pdf. 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2010年有28%的低收入家庭住在多数为低收入群体的地区，而1980年仅有23%；另外2010年有18%的高收入家庭住在多数为高收入群体的地区，而1980年仅有9%，该报告总结说，"这些数字的上升与长期收入不平等扩大有关，这导致美国中产阶级或混合收入社区的萎缩（从1980年占比85%下降到2010年仅占76%）和低收入社区和高收入社区的双双扩张（前者从1980年占比12%上升到2010年占比18%，后者从1980年占比3%上升到2010年占比6%）"。关于现在住在经济隔离地区的城市居民比例与1970年的对比，参见Tara Watson, "Inequalit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y Income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5,no. 3 (2009): 820–844. On the changing share of American families living in rich and poor as well as middle-class neighborhoods, 参见Kendra Bischoff and Sean Reardon, "The Continuing Increase in Income Segregation, 2007–2012," 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March 2016,

https://cepa.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the%20continuing%20 increase%20in%20income%20segregation%20march2016.pdf. 这项研究将中产阶级社区定义为收入在城市收入中位数的67%到150%之间的家庭，富裕社区为收入超过城市收入中位数的150%的家庭，贫困社区为收入低于城市收入中位数的67%的家庭。在中产阶级中，家庭收入在城市收入中位数的125%到150%之间的算高收入社区，介于100%到125%之间的是中高收入社区，介于80%到100%的是中低收入社区，介于67%到80%之间的是低收入社区。

[5] America's Shrinking Middle Class: A Close Look at Changes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11, 2016, www.pewsocialtrends.org/2016/05/11/americas-shrinking-middle-class-a-closelook-at-changes-within-metropolitan-areas. 我们对皮尤研究中心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如下：在城市地区中，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与工人阶级（0.37）、白人占比（0.34）、政治保守派（与2016年特朗普在城市地区的选民占比的相关度为0.27）成正相关，而这些要素都是经济衰退地区的特征。相反，中产阶级的人口占比与人口密度（-0.22）、创意阶层（-0.20）、多元化（与移民的相关度为-0.46，与拉丁裔的相关度为-0.47，与同性恋群体的相关度为-0.37）和政治自由派（与2016年希拉里在城市地区的选民占比相关度为-0.33）成负相关，这些都是经济活跃地区的基本特征。中产阶级的人口占比还和以下因素负相关：收入不平等（-0.64）、工资不平等（-0.38）、经济隔离（-0.43）和较低阶层人口占比（-0.62）。另外，2000年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比和2000年到2014年间中产阶级人口占比的变化呈显著负相关（-0.48）。

[6] 特定种类的经济隔离指数是绝对度量，数值越高代表隔离程度越高：1代表完全隔离，0代表完全不存在隔离。综合指数则是相对度量，将一个城市地区的各类隔离的程度与其他地区对比。附录提供了对变量、数据和方法论的详细解释，也参见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 Segregated City: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Segregation in America's Metro Area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egregated%20City.pdf.

[7] 贫困线是由美国人口调查局定义的，参见 "Poverty," www.census.gov/hhes/www/poverty/about/overview/measure.html; US Census Bureau, "Poverty Thresholds," www.census.gov/data/tables/time-series/demo/income-poverty/historical-poverty-thresholds.html。

[8] 收入隔离与人口（0.53）、密度（0.44）、创意阶层（0.35）和高科技行业（0.48）正相关。

[9] Carmen DeNavas-Walt and Bernadette D. Proctor,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3, US Census Bureau, 2014, www.census.gov/content/dam/Census/library/publications/2014/demo/p60-249.pdf; Kendra Bischoff and Sean Reardo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y Income, 1970–2009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3).

[10] 穷人的隔离与人口（0.43）、密度（0.54）、创意阶层（0.48）和高科技行业（0.47）正相关。

[11]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2] The segregation of the wealth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pulation (0.38) and high-tech industry (0.26).

[13] 这个结论来自我们计算的隔离程度平均值。数值越高代表经济隔离程度越高。富人的隔离程度平均值显著高于穷人（分别为0.456和0.324）。实际上，在我们分析的所有群组中富人的隔离程度平均值都是最高的。

[14] Michael J.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London: Macmillan, 2012); Michael J.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Skyboxification of American Life,” Huffington Post, April 20, 2012, www.huffingtonpost.com/michael-sandel/what-money-cant-buy_b_1442128.html.

[15] At the national level, see Robert J. Barro,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no. 2 (1991):407–443; Robert J. Barro,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At the city and regional level, see Jane Jacobs, The Economy of Cities (New York:Random House, 1969); Robert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no. 1 (1988): 3–42;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2002); Edward Glaeser and David Maré, “Cities and Skill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 no. 2 (2001); Edward Glaeser and Albert Saiz, “The Rise of the Skilled City,”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 1 (2004): 47–105; James Rauch,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34, no. 3 (1993): 380–400.

[16] 高学历人群的隔离程度与人口规模（0.54）、密度（0.39）、创意阶层（0.43）和高科技行业（0.50）正相关。

[17] 各个隔离指数之间都密切相连，整体隔离指数与收入隔离（0.83）、教育隔离（0.94）和职业隔离（0.95）都紧密相关。

[18] 附录中的表4提供了美国所有350多个城市地区的整体经济隔离指数排名。

[19]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和人口规模的相关度为0.64。

[20]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密度（0.56）和使用公共交通通勤的上班族占比（0.49）正相关，与独自驾车通勤的上班族占比（-0.22）负相关。

[21]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工资（0.46）和人均经济产出（0.41）正相关。

[22]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高科技行业（0.62）和创意阶层（0.53）正相关，与蓝领工人占比（-0.37）负相关。

[23]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2016年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占比（0.47）正相关，与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占比（-0.44）负相关。

[24] 附录中的表4列出了美国所有城市地区的隔离与不平等指数。

[25] 隔离与不平等指数与其它因素的相关系数如下：与密度的相关度为0.5，人口规模0.6，人均收入0.31，人均经济产出0.42，平均工资0.52，高科技行业0.61，创意阶层0.57，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占比0.53。相反，隔离与不平等指数与蓝领工薪阶层在劳动力中的占比负相关（-0.44）。此外，隔离与不平等指数与2016年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占比（0.47）正相关，与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占比（-0.42）负相关。

[26]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收入不平等（0.52）和工资不平等（0.62）密切相关。不平等与各项单独的隔离指数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很多相关性都非常显著，落在0.40到0.50的区间内。

[27] Watson, “Inequalit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28] Tiit Tammaru, Szymon Marcin´czak, Maarten van Ham, and Sako Musterd,eds., Socio-Economic Segregation in European Capital Cities: East Meets West (London: Routledge, 2015). Also see Richard Florida, “Economic Segregation and Inequality in Europe’s Cities,” CityLab, November 16,2016, www.citylab.com/work/2015/11/economic-segregation-and-inequalityin-europes-cities/415920.

[29] Rebecca Diamond, “The Determinants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US Workers’ Diverging Location Choices by Skill: 1980–200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3 (March 2016): 479–524; Rebecca Diamond,“U.S. Workers’ Diverging Locations: Policy and Inequality Implica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SIEPR Policy Brief, July 2014, https://siepr.stanford.edu/?q=/system/files/shared/pubs/papers/briefs/PolicyBrief-7-14Diamond_0.pdf.

[30] Robert J. Sampso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Economic Mobility in the Great Recession Era: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Persistent Inequality,”in Economic Mobility: Research and Ideas on Strengthening Families,Communities, and the Economy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2016).

[31] 对各种族创意阶层的界定是基于美国人口调查显示的从事管理、商业、科学和艺术职业的黑人和白人（非拉丁裔）占比数据。黑人创意阶层与各因素的相关性如下：密度（0.32）、创意阶层整体（0.39）、大学毕业生（0.31）、高科技公司（0.27）、成年人中外国出生的人口占比（0.34）和同性恋群体占比（0.36）。以上几乎所有因素与黑人创意阶层的相关性都显著低于与白人创意阶层的相关性，参见Richard Florida,“The Racial Divide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CityLab，May 9，2016，www.citylab.com/work/2016/05/creative-class-race-black-white-divide/481749。

[32] Edward Glaeser and Jacob Vigdor, The End of the Segregated Century:Racial Separation in America’s Neighborhoods，1890–2010，Manhattan Institute，2012，www.manhattan-

institute.org/pdf/cr_66.pdf.

[33]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黑人人口占比（0.29）、拉丁裔人口占比（0.24）和亚裔人口占比（0.30）都正相关，与白人人口占比（-0.43）负相关。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隔离与不平等指数——它与黑人人口占比（0.30）、拉丁人口占比（0.29）和亚裔人口占比（0.25）都正相关，与白人人口占比（-0.42）负相关。

[34] 黑人创意阶层和用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之间没有统计相关性，而白人创意阶层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40。黑人创意阶层与我的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仅存在微弱相关性（0.20），远低于白人创意阶层与该指数的相关度（0.66）。

[35] 整体隔离指数与同性恋家庭的聚集程度（0.42）和外国长大的成年人占比（0.38）均为正相关。

[36] Nate Silver, “The Most Diverse Cities Are Often the Most Segregated,”FiveThirtyEight, May 1, 2015, 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the-mostdiverse-cities-are-often-the-most-segregated.

[37] Paul A. Jargowsky, “Architecture of Segregation: Civil Unrest, the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and Public Policy,” Century Foundation, August 9,2015, http://apps.tcf.org/architecture-of-segregation.

[38] 种族集中贫困地区是指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为非白人，且超过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普查区。种族集中富裕地区是指超过90%以上的人口为白人，且根据生活成本调整后收入中位数超过的贫困线4倍以上的人口普查区。Edward G. Goetz, Tony Damiano, and Jason Hicks,“Racially Concentrated Areas of Affluenc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umphrey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May 2015,www.cura.umn.edu/publications/catalog/niweb1; Alana Semuels, “Where the White People Live,” The Atlantic, April 10, 2015, 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5/04/where-the-white-people-live/390153。

[39] 来自2013年7月与帕特里克·夏基的邮件对谈，也参见他的著作 Stuck in Place: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 Racial In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Richard Florida,“The Persistent Geography of Disadvantage,” CityLab, July 25, 2013, www.citylab.com/housing/2013/07/persistent-geography-disadvantage/6231。

[40] Sean Reardon, Lindsay Fox, and Joseph Townsend, “Neighborhood Income Composition by Household Race and Income, 1990–2009,”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60, no. 1 (July 2015): 78–97.

[41] Jonathan Rothwell and Douglas Massey, “Geographic Effects o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Economic Geography 91, no. 1 (2014):3–106; Richard Florida, “How Your Neighborhood Affects Your Paycheck,”CityLab, January 16, 2015, www.citylab.com/work/2015/01/how-yourneighborhood-affects-your-paycheck/384536.

[42]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and Emmanuel Saez,"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 (2014):1553–1623;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Emmanuel Saez,and Nick Turner,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4, no. 5 (2014): 141–147; Chetty and Hendren,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Raj Chetty,Nathaniel Hendren, and Lawrence Katz,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May 2015.

[43] Raj Chetty, Michael Stepner, Sarah Abraham, Shelby Lin, Benjamin Scuderi,Nicholas Turner, Augustin Bergeron, and David Cutl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2014,"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15, no. 16 (April 26, 2016):1760–1766.

[44] Chetty et al.,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also see Pat Rubio Goldsmith,Marcus L. Britton, Bruce Reese, and William Velez, "Will Moving to a Better Neighborhood Help? Teenage Residential Mobility, Change of Context,and Young-Adul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rban Affairs Review (March 4, 2016) online edition; Molly W. Metzger, Patrick J. Fowler, Courtney Lauren Anderson, and Constance A. Lindsay, "Residential Mobility During Adolescence: Do Even 'Upward' Moves Predict Dropout Ris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3 (2015): 218–230.

第七章 拼布城市

美国的阶级分化早就嵌入了各种居住地的分布模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富人和上层中产阶级都住在碧绿的郊区，如波士顿的布鲁克莱恩、底特律的格罗斯波因特、费城的布林莫尔或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有抱负的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住在更小、人口更密集、离市中心更近的郊区，如长岛的莱维顿或我长大的新泽西州的北阿灵顿。穷人和真正的弱势群体则挤在市中心的贫民窟，如芝加哥南区、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或离我的出生地不远的纽瓦克部分地区。到20世纪70年代，郊区一般都较富裕，社会向上流动性很强，并且以白人居民为主，而市区则被挖空，经济萧条，少数族裔和贫困居民越来越多。.

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一直认为，阶级身份诞生于工厂车间等工作场所，然而，今天美国的阶级划分不仅与工作类型挂钩，还与我们的居住地息息相关。居住地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通勤距离、经济机会、孩子上的学校、健康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阶级和居住地的关系吸引了来自各个意识形态的评论员的关注。查尔斯·默里在他2012年的著作《走向分裂》（*Coming Apart* ）中比较了两个不同阶层的社区，论证了美国日益加深的经济和政治分化的两级：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外的贝尔蒙特郊区的外向型富裕居民，以及位于费城菲什敦社区的落后的、被疏离的内向型工薪族居民。罗伯特·帕特南在其2015年的著作《我们的孩子》中以他的家乡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衰落为案例，研究了中产阶级的衰落和美国梦的消失。[1]

美国的阶级地理分布已经不再遵循富郊区、穷市区的老规律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大量高薪知识工人、富人和年轻人已经重返市中心，而越来越多的贫困人群则被迫迁往郊区。这种美国地理划分的反转现象有时被称作“大逆转”。[2]

但是当代美国的阶级地理分布实际上与这两种模式都不同，它正被重塑为一种更加错综复杂的模式，我称之为拼布城市。虽然它的具体特性在每个地方都各不相同，但这种新型阶级地理模式的核心特征就是，城市分裂为紧密结合的集中优势区域和面积更大的集中劣势区域，它们在市区和郊区中纵横交错。

在上一章中我用总体数据描述了城市地区的收入隔离、教育隔离和职业隔离，在这一章中我会用更细分的数据来识别新分化是如何嵌入城市地区的，并将其视觉化。其他相关研究要么就是追踪不同类型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如工业、商业和住宅用地），要么就是根据收入将人划分为不同群体（如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我的研究框架与他们不同，我在地图上画出了三种主要阶层人群的居住地点。我和我的团队通过详细数据确定各个人口普查区的主导阶层，是高薪创意阶层、低薪服务阶层还是不断收缩的工人阶层。我们研究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十几个发达城市地区，涵盖了不同的城市类型，包括超级城市、科技中心、蔓延扩张的“太阳地带”城市和去工业化的“铁锈地带”地区。[3]

虽然每个城市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阶层特征，但从整体来看有四种拼布城市模式。

在第一种模式中，优势创意阶层重新占领了市中心，同时在郊区也保持高度聚集。状况稍差的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要么被挤到了市区的其他区域，要么被挤到郊区甚至远郊的边缘地带。这种模式出现在纽约、伦敦这样的超级城市，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这样的知识中心，以及多伦多和芝加哥。

在第二种模式中，创意阶层留在郊区，很少回到市中心。这种模式出现在“太阳地带”城市亚特兰大、达拉斯和休斯敦，以及“铁锈地带”城市底特律、匹兹堡和克利夫兰。

在第三种模式中，整个城市地区被一分为二，优势创意阶层和弱势服务阶层在市区与郊区中分别占据完全不同的街区。温哥华、奥斯汀和费城属于这一类型。

在第四种模式中，富裕的创意阶层占领了一些独立的小型聚居区，弱势阶层则围绕他们而居。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洛杉矶和迈阿密，创意阶层沿着海岸线的市中心地带，围绕着大学和研究机构形成了很多小型聚集区。

创意阶层对地点的选择特权塑造了以上各个类型的新型拼布地理模式，而以下四个关键因素决定了他们对聚集地的选择。

第一个因素是离市中心的距离。纽约和伦敦这两个超级城市以及波士顿、旧金山和华盛顿这几个知识中心的重返城市浪潮最为强烈，在很多城市地区也能看到一定程度的重返城市现象。

第二个因素是到公共交通点的距离。创意阶层喜欢围绕地铁站和公共交通线路而居，这样可以节省通勤时间，避免长距离开车通勤。这一因素对于住房成本高昂而公共交通发达的人口密集型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尤其重要。

第三个因素是到主要大学和其他知识机构的距离。以前很多人住在大学附近只是权宜之计，并不久留，比如大学生在读书时住在学校附近，毕业后就会离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城市的大学，如洛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都受到城市衰败的影响变成了封闭的孤岛。而今天，城市大学和其他知识型机构附近的社区成了创意阶层的居住选择，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与学校并没有直接联系。[4]

第四个因素是到自然景观的距离。创意阶层不仅聚集在城市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还喜欢最美观的地方，比如靠近公园、环山，特别是临水临海的地段。这一规律在创意阶层沿海岸线而居的洛杉矶和迈

阿密最为显著，也适用于其他城市的临水老工业区域，以前的老工厂仓库被改造为满足创意阶层需求的住宅、商店、画廊和办公楼。

为了全面理解拼布城市的模式，我们先回顾一下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经典理论，它们为我们理解如今的阶层地理现状奠定了基础。

在绘制新型阶层地理分布图前，我回顾了20世纪初期城市学家罗伯特·埃兹拉·帕克及其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的开创性著作。他们的观点十分重要，到现在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对城市现状的看法。即便他们的模型已经不能完全反映今天的现实情况，但他们对早期工业城市形状和模式的开创性描绘，为我们理解当今新型阶级地理现状提供了基本方法论。[5]

帕克的经历太特别了，听起来像小说情节。他于1864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哈维维尔，它位于斯克兰顿附近的一个无烟煤矿区。在就读明尼苏达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前，他只是一名铁路工人。大学毕业后他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然后重返学术界，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师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随后他去德国深造，在海德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格奥尔格·齐美尔是极为杰出的社会学家，也是1903年的经典著作《大城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的作者。帕克对非洲（他曾短暂地担任刚果改革协会的公关人员）和美国（曾协助成立黑人城市环境委员会，即现在的城市联盟）的种族关系问题十分着迷，他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大学和布克·华盛顿一起用10年时间写完了《最底层之人》（*The Man Farthest Down*）。

帕克最后去了芝加哥大学，与他的同事和学生一起对芝加哥展开深入研究，包括工厂、屠宰场、红灯区、新摩天大楼、工人阶级社区、贫民窟和快速发展的郊区。他是城市人种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地理学方面的先驱，对城市经济学也有所涉猎。他发表了关于流浪汉、少年犯罪和高贫困社区的研究成果，芝加哥就是他的实验室。

帕克就像生物学家研究器官形态和结构一样研究城市的结构。对他来说，城市远不仅是物质特征、建筑和交通干道的集合，它还是人类活动的组织机制。帕克和他的同事恩斯特·伯吉斯和罗德里克·麦肯齐在1925年合作出版的经典丛书《城市》（*The City*）中写道：“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或人工构筑物，它与人类的生命活动休戚相关。城市是自然的产物，更是人性的产物。”[6]城市由负责组织各类人类活动的独立空间和社区构成，用帕克的话说就是“由一些相邻但互相不渗透的小世界组成的镶嵌画”。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及其主要构成，帕克和他的同事绘制了芝加哥的各类城市空间分布图，包括以下几类：商业区，工厂、仓库等工业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住宅区。

他们用来理解和视觉化城市地区基本结构的研究框架十分具有影响力。在这一框架下，城市的各种功能分区呈同心圆带状分布。圆心是中心商业区，有高层写字楼、法院等政府机关、商场、主要运输枢纽，其他功能分区围绕圆心向外层层扩张。圆心向外一层是工业区的工厂、屠宰场、仓库等建筑，也被称作“过渡地带”。再向外一层是工人阶层住宅区，这里密集杂乱地分布着各种公寓楼、酒吧和公共浴室，很多建筑都在工业区能听得到声音（也能闻到味道）的范围内。离市中心距离越远，人口密度越小。再往外一层是中产和上层阶级住宅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有带大停车场的大别墅（见图7.1的左图）。

约10年后，芝加哥大学博士和经济学家霍默·霍伊特在这一基本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他认为城市的功能分区并不是呈齐整的同心圆分布，而是沿着交通主干道呈楔形或扇形分布（见图7.1的中图）。他在1939年为联邦住房管理局做的研究中分析了约60个美国城市地区，展示了城市中最有优势的群体是如何通过选择居住和工作地点来影响城市轮廓的。他认为，“在考虑城市发展问题时，高租金地区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他还把高租金区域称作“有利地区”。高级住宅区向郊区迁移的势头很

猛，“高租金或高档住宅区向城市外围转移几乎是必然现象，富人不太可能会搬回以前被他们放弃的老住宅”。他写道：“田野、高尔夫球场、乡村俱乐部和乡村庄园就像磁铁一样，把高档社区吸引到外围有免费开放空间的地方。”约10年后，同样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昌西·哈里斯和爱德华·厄尔曼对霍伊特的模型做了进一步调整，提出了更加分化的城市多核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城市有多个商业和住宅中心（见图7.1的右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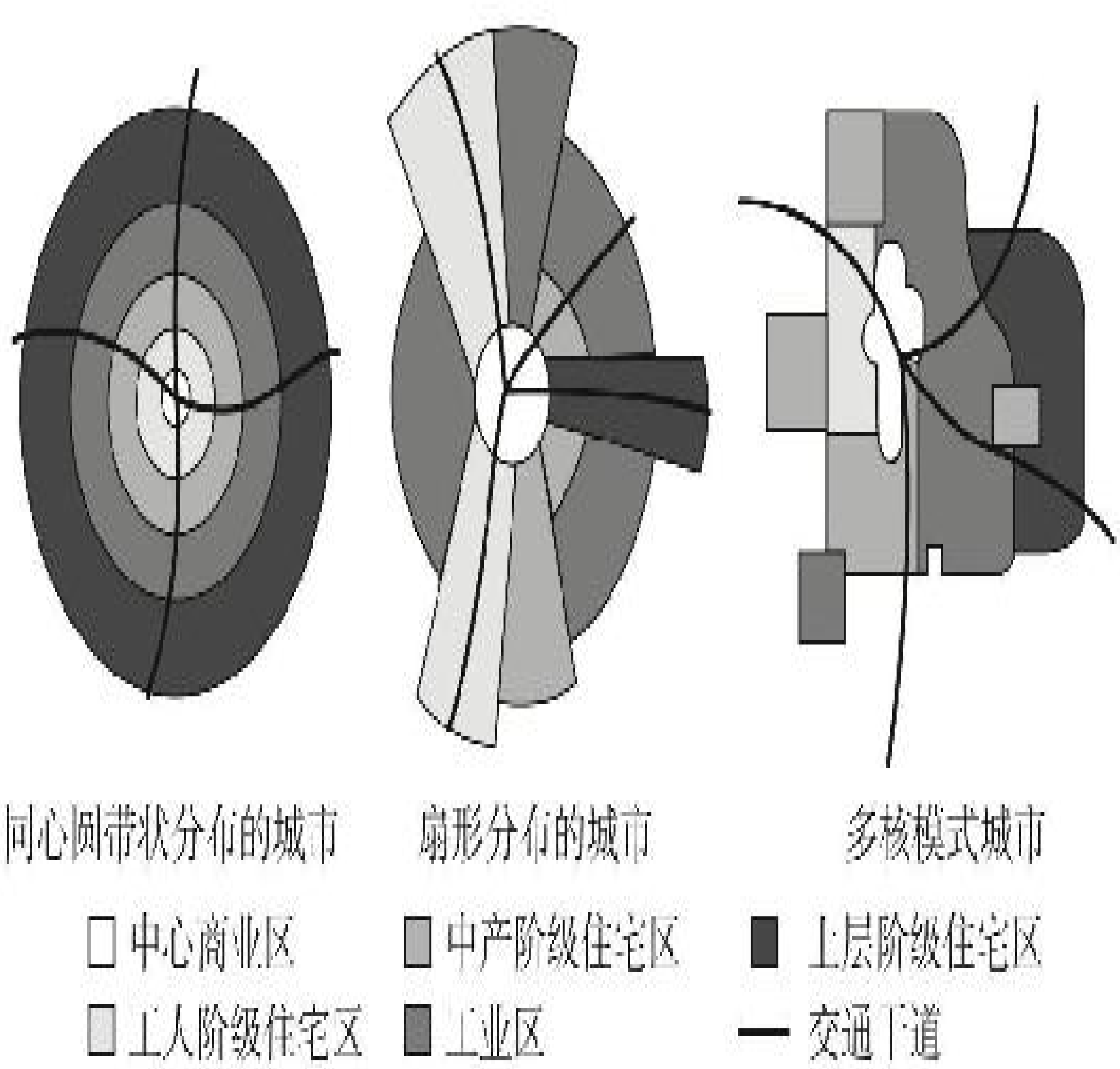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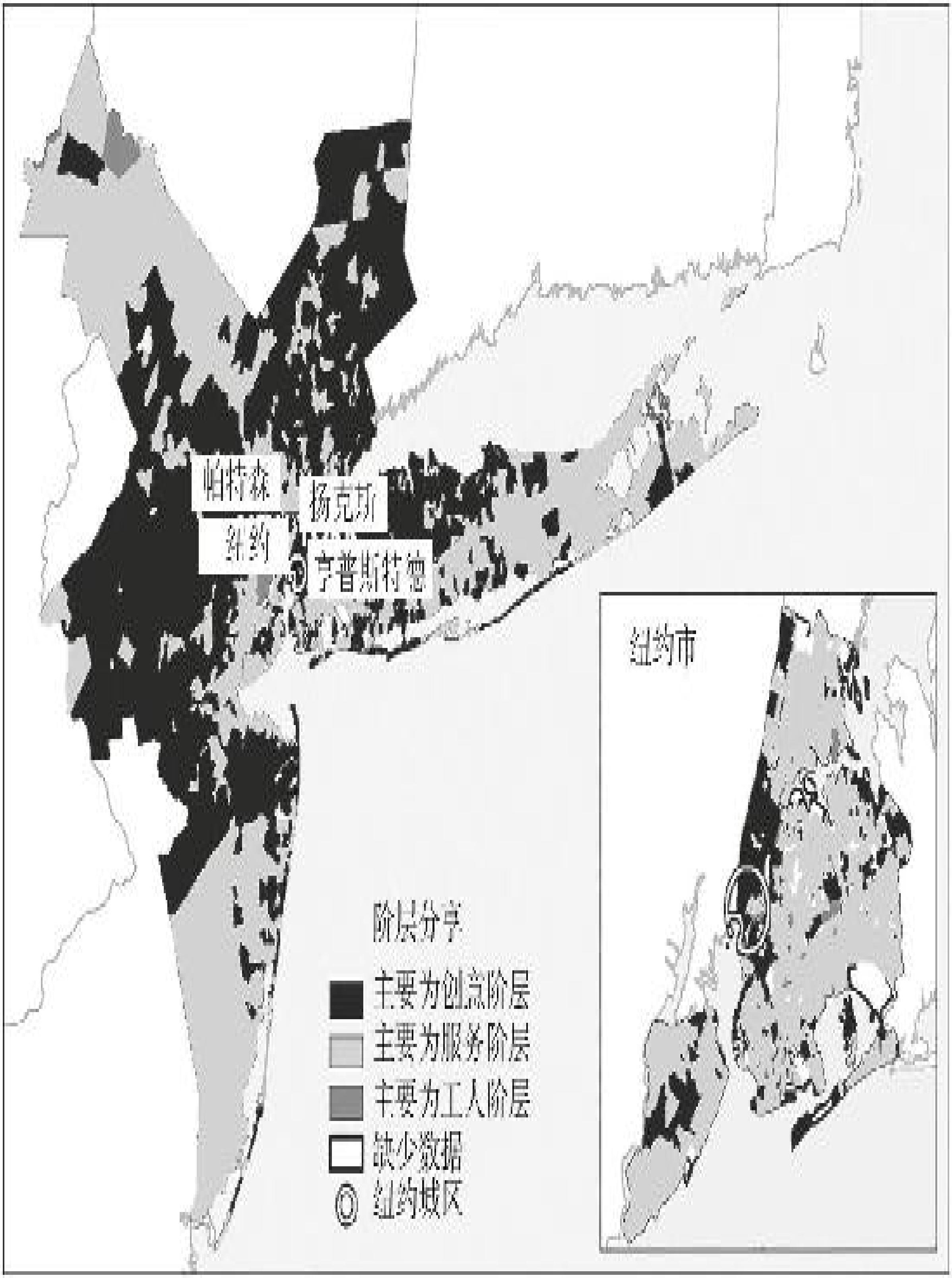
图7.1 芝加哥大学研究的城市空间分布模型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发显著的向外发展模式让市中心失去了很多核心经济功能。1959年，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和雷蒙德·弗农在研究大纽约地区的《解剖城市》（*Anatomy of a Metropolis*）一书中记录了这一现象，他们将它称为“逃离高密度”。他们说，工商业活动和城市居民正从城市向郊区转移，这一趋势达到顶峰的标志是卫星城的出现，郊区卫星城的办公园区和购物中心基本取代了日益荒芜的市中心。[8]

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和21世纪之初时，城市形态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富人和高学历群体开始返回市中心，而穷人则被迫迁入郊区。随着形势的变化，城市发展呈现出更复杂的新模式，与现有模型都不同。有的市区变富了，有的郊区变穷了，并且新模式不只改变了地区。我将以一些大城市为例，探索今天新拼布模型的四种基本模式，以及重塑市区与郊区的主要因素。

第一种模式来自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重返城市浪潮。如前文提到的，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有超级城市纽约和伦敦，科技中心旧金山、波士顿和华盛顿，以及五大湖区的复兴城市芝加哥和多伦多。这些大城市地区的特征是面积大、人口多、创意阶层高度聚集（尤其是在市中心区域），并且公共交通发达，这些特征都有利于主要社会经济阶层地理结构的形成。

在纽约市，创意阶层已经占领了整个市中心，从曼哈顿最南端的金融区、翠贝卡、苏荷区、格林尼治村、切尔西、中城，到上东区（见图7.2）。在布鲁克林，创意阶层的活动范围原来几乎仅限于与曼哈顿下城的相邻部分地区，不过现在也在向其他地方辐射。创意阶层不仅聚集在纽约市，还出现在长岛、新泽西和韦斯特切斯特郡。该地区只剩少数几个工人阶级社区了，它们主要分布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伊丽莎白、帕特森和帕塞伊克地区附近，都离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很近。蓝领社区消亡的速度如此之快，很难想象仅仅在几十年前这里还有巨大规模的制造业基地和工人阶级社区。



帕特森
扬克斯
纽约
亨普斯特德
纽约市
阶层分享
主要为创意阶层
主要为服务阶层
主要为工人阶层
缺少数据
纽约城区

图7.2 纽约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伦敦地区的创意阶层则更加聚集在市中心。在包括肯辛顿、切尔西、伦敦市、卡门和国会山的内城地区，创意阶层人口占比达到80%（见图7.3）。大部分服务阶层都被迫搬到城市边缘，主要分布在城市西北、东北和南部的三片大区域。还有一部分服务阶层聚集在泰晤士河南边、更靠近市中心的一片地区。但出人意料的是，伦敦没有一片区域的主要人口构成为工人阶级，要是马克思知道这一发展趋势的话一定会大为震惊，毕竟他曾经在大英博物馆花了数十年时间书写工人阶级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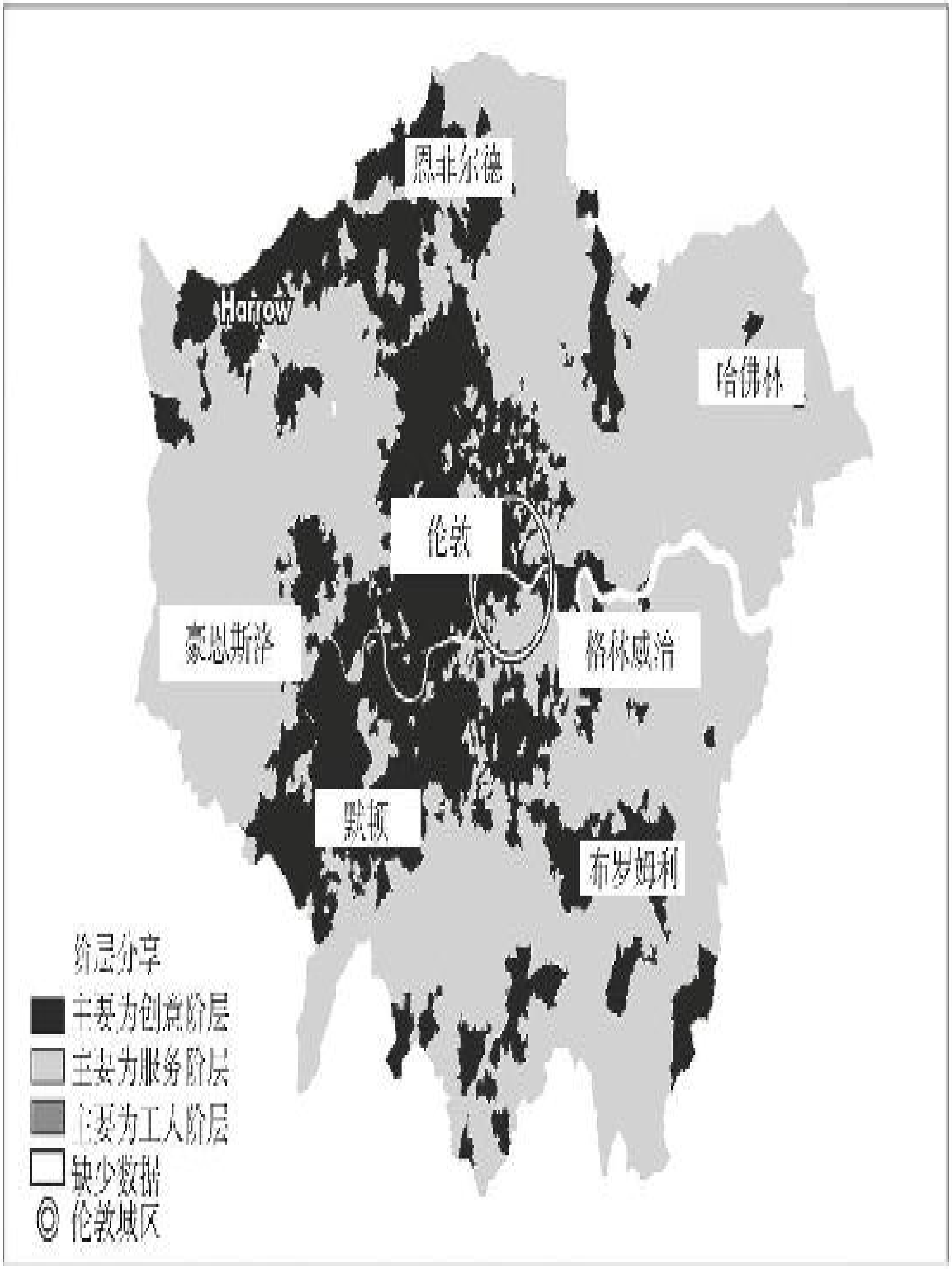

恩非尔德
Harrow
哈佛林
伦敦
豪恩斯洛
格林威治
默顿
布罗姆利
阶层分享
主要为创意阶层
主要为服务阶层
主要为工人阶层
缺少数据
伦敦城区

图7.3 伦敦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基于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邻里统计和人口普查结果。

芝加哥地区如今的阶层地理状况与帕克当时写的非常相似。与纽约和伦敦一样，芝加哥的创意阶层也重新回到了市中心，对老工厂和仓库进行改造重建，并住进了附近的老蓝领阶层社区，如芝加哥小熊球队的主场瑞格利球场的所在地威格利维尔（见图7.4）。创意阶层也在郊区聚集，如芝加哥大学附近的海德公园。他们还喜欢市中心与郊区的湖滨地区，如西北大学的所在地埃文斯顿。服务阶层社区也在市区与郊区均有分布。大量弱势群体还留在城市中，芝加哥地区前10大服务阶层聚集社区中有9个都在芝加哥市。其中有4个社区位于市区西南部的恩格尔伍德，这个面积仅3平方英里[01]的地区贫困率超过40%，是全市贫困率的两倍。服务阶层还在市区和郊区创意阶层社区的中间地带聚集，以及芝加哥地区的远郊。这个曾经的老工业城市已经几乎没有工人阶层聚集地了，工人阶层现在分布在更远的乔利埃特市和加里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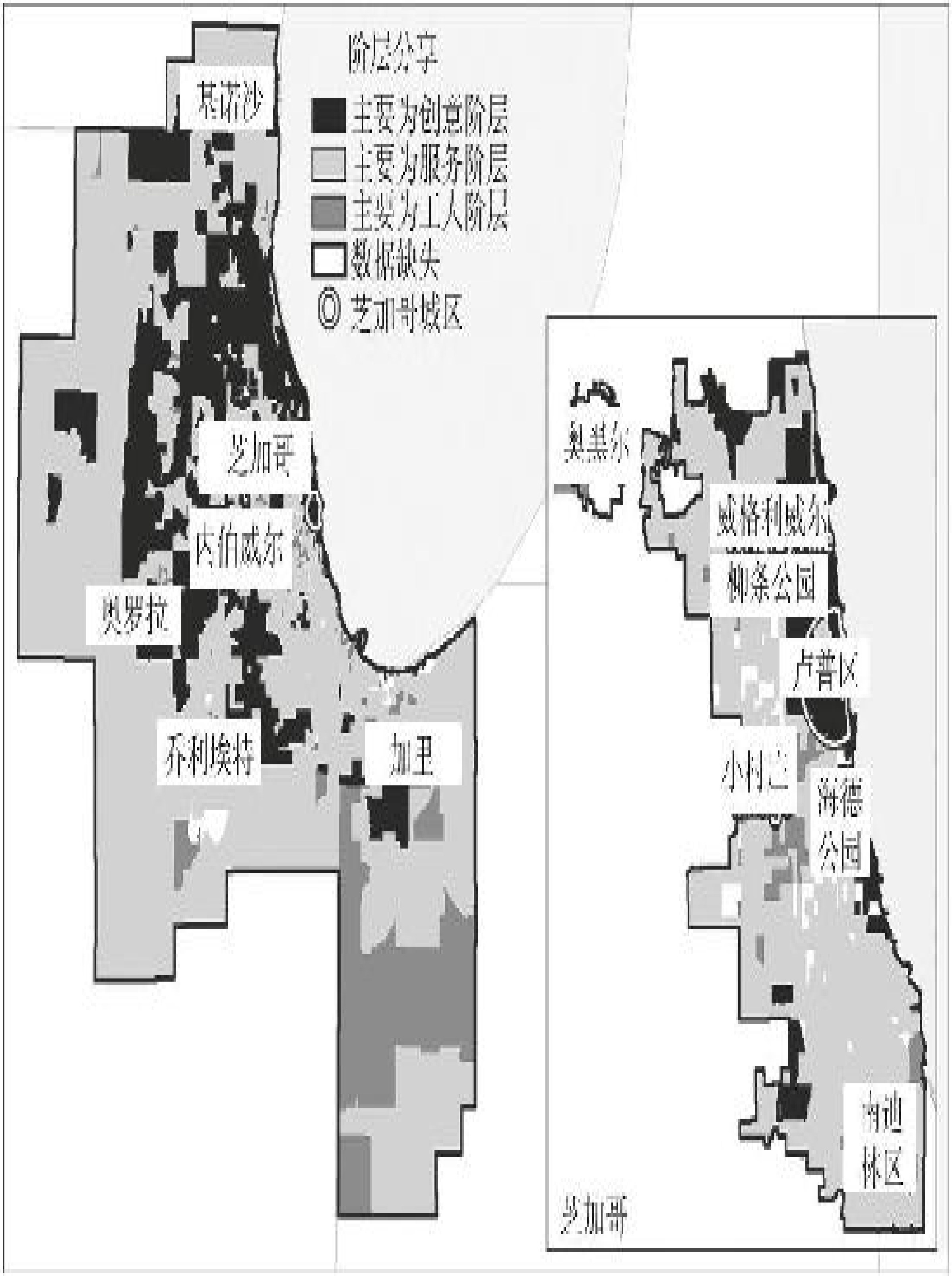

阶层分享
主要为创意阶层
主要为服务阶层
主要为工人阶层
数据缺失
芝加哥城区
基诺沙
芝加哥
内伯威尔
奥罗拉
乔利埃特
加里
奥黑尔
威格利威尔
柳条公园
卢普区
小村庄
海德公园
南迪林区
芝加哥

图7.4 芝加哥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在我的第二故乡多伦多地区，创意阶层紧密集中在市中心的多伦多大学等几所学校和主要医疗机构附近，并以市中心为起点沿着主要交通路线呈倒T字形向外拓展（见图7.5）。在东西方向，他们沿着湖滨和交通干线穿过快速绅士化发展的皇后西区，向郊区的密西沙加市和高端湖滨小镇奥克维尔拓展；在南北方向，他们向北边郊区的万锦市和皮克林市拓展。服务阶层则被挤到了更外围的地区。体现在我的地图上的多伦多发展模式与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大卫·赫尔恰斯基早前发现的模式一致。他的研究发现，多伦多已经被分成了三块：市中心和主要交通干道沿线的少量富裕社区、离市中心和交通干道更远的大量较贫困社区、不断萎缩的中产阶级社区。[9]多伦多地区也只剩下少数几个工人阶层社区，零散分布在城市西边的郊区。

意阶层大量聚集在市中心、海港区、旧金山大学、传统高档社区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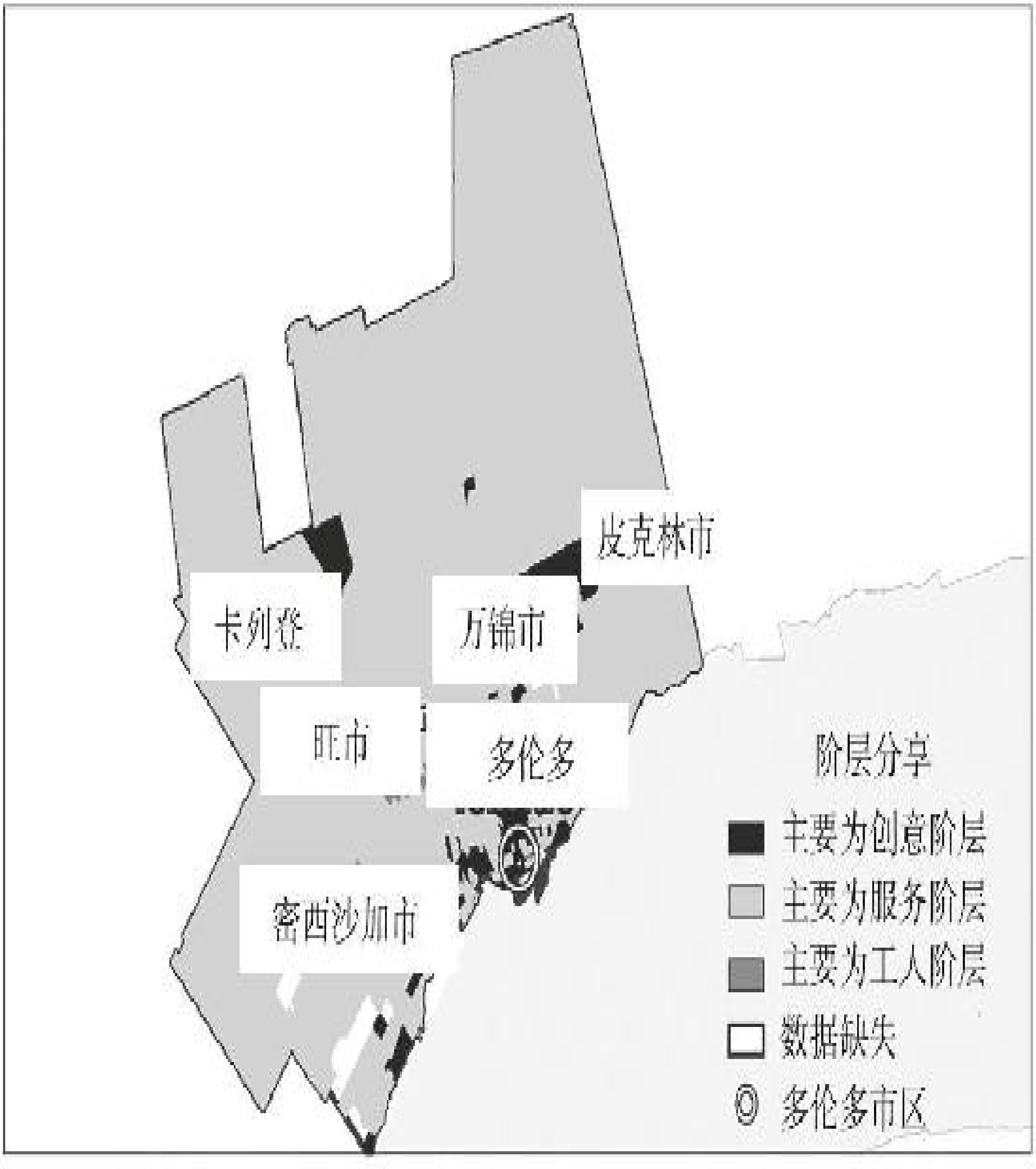


图7.5 多伦多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

这一规律也出现在发达的科技中心城市。例如，旧金山地区的创意阶层大量聚集在市中心、海港区、旧金山大学、传统高档社区太平洋高地与俄罗斯山、海特、卡斯特罗以及新绅士化的使命湾和索玛科

技区（见图7.6）。不过和其他城市一样，旧金山的创意阶层也在向郊区蔓延，他们占领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周边地区、北部的马林郡、东南部和西南部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周边地区。他们还大量分布于东湾，旧金山地区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6个都在这里。奥克兰的上洛克里奇有最大的创意阶层社区，同时奥克兰还有大量服务阶层人口，他们中有很多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奥克兰和湾区，服务阶层生活在创意阶层社区之间和更远的郊区边缘。在旧金山市，服务阶层聚集在某些最富裕的社区外围。旧金山地区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的8个都在日益繁荣的湾区，其中大部分都在市中心附近。马林郡北部和奥克兰东部的边缘地带也有大片服务阶层社区，分布在从奥克兰、费利蒙、门罗公园到硅谷中心东帕洛阿托的长条带状地区。旧金山地区几乎已经没有工人阶层社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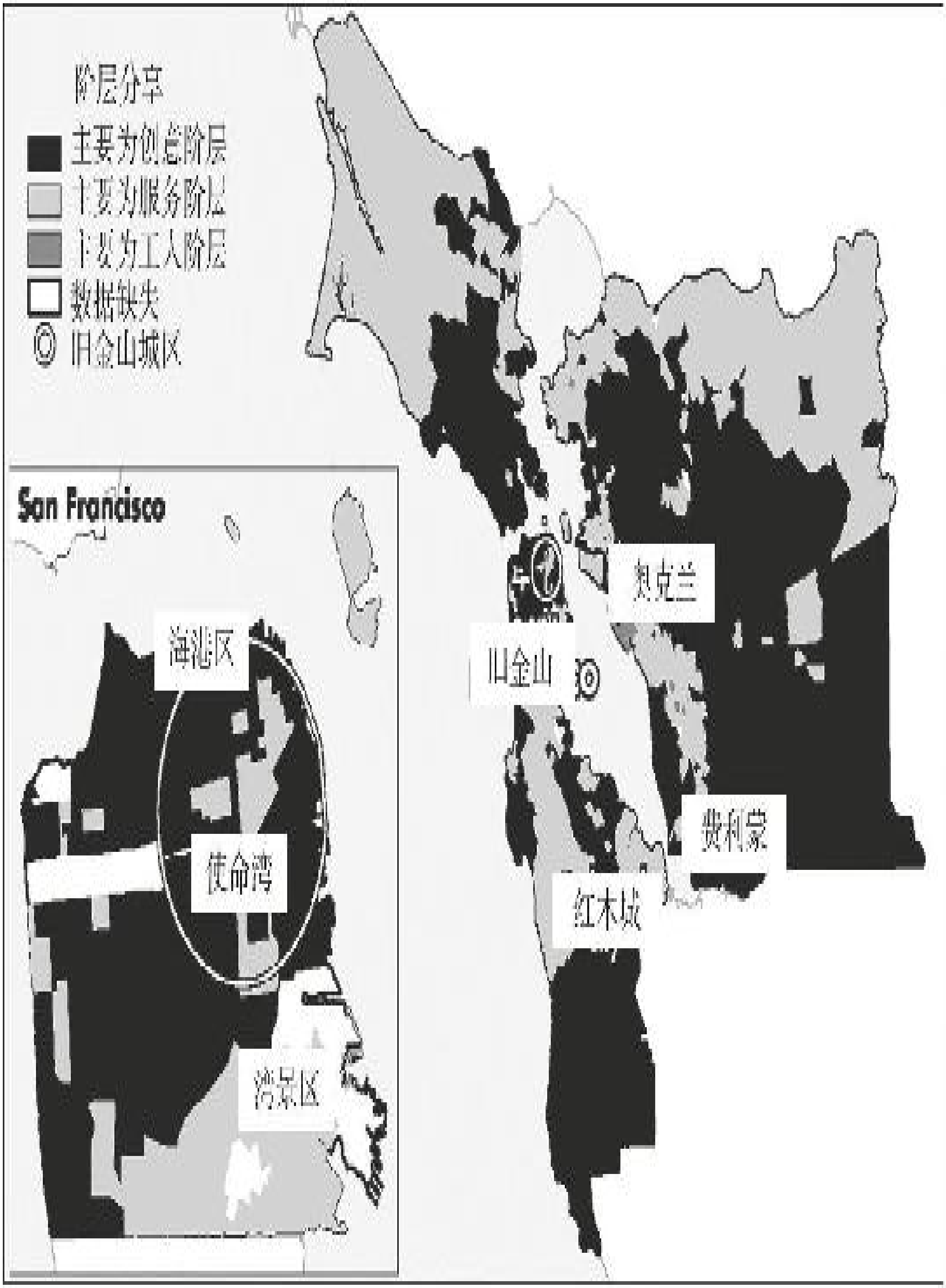

阶层分布
主要为创意阶层
主要为服务阶层
主要为工人阶层
数据缺失
旧金山城区
San Francisco
海港区
使命湾
湾景区
奥克兰
旧金山
费利蒙
红木城

图7.6 旧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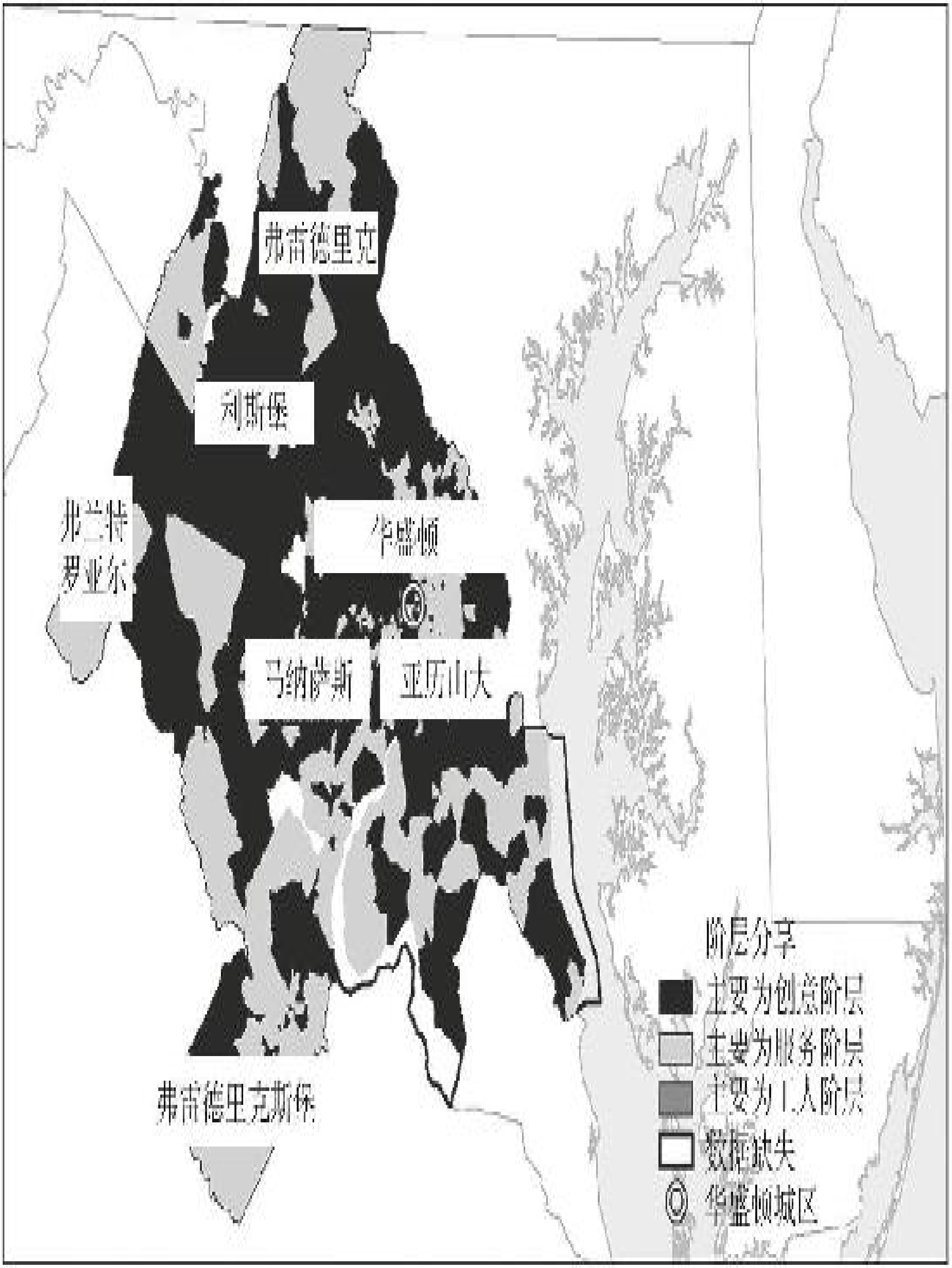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波士顿的创意阶层也聚集在市中心及其周边地区：从金融区和法尼尔厅到高端的灯塔山和后湾地区、同性恋社区中心南角区，以及芬威-肯莫尔区（见图7.7）。历史学家萨姆·巴斯·华纳在半个世纪前的经典著作《电车郊区》（*Streetcar Suburbs*）中就提到过，交通设施塑造了波士顿的城市形态。[10]红线地铁穿过剑桥，它的沿线车站周边吸引了大量高科技公司、创业公司和创意阶层。创意阶层也广泛分布于郊区。在西边，一个主要创意人口聚集地从剑桥外一路延伸到贝尔蒙特、列克星敦、康科德及更高端的牛顿、韦尔斯利和萨德伯里，其中大部分社区都通过交通系统与市中心相连。声名远扬的128号公路科技长廊沿线也有大量创意阶层聚居地。[11]还有很多创意阶层分布在北部海岸线沿线的高端社区，包括海边的曼彻斯特、斯旺普斯科特和马布尔黑德。波士顿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3个在波士顿市，4个在剑桥，3个位于波士顿学院附近地铁绿线上的牛顿。服务阶层则聚集在波士顿市中心外的狭窄带状地带，并向北延伸到马布尔黑德，向南延伸到昆西，形成了一南一北两个位于城市地区边缘的大型聚居地。波士顿地区前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有9个都在波士顿市，主要分布于南波士顿的传统黑人社区洛克希伯里和东波士顿的洛根机场附近。虽然20世纪中期波士顿还是领先工业城市，但它现在只有不到15%的蓝领工人阶级人口，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


阶层分享
主要为创意阶层
主要为服务阶层
主要为工人阶层
缺少数据
纽约城区
黑弗里尔
劳伦斯
洛厄尔
马布尔黑德
康科德
波士顿
昆西

图7.7 波士顿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华盛顿的创意阶层横跨市区与郊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近一半，位居全国前列（见图7.8）。创意阶层聚集地主要包括乔治敦、克利夫兰公园、西北区、市中心和国会山等绅士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创意阶层还延伸至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和亚历山大这些近郊地区，还有弗吉尼亚北部的费尔法克斯、马纳萨斯和利斯堡，以及马里兰州的盖瑟斯堡和弗雷德里克等远郊地区。华盛顿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3个在哥伦比亚特区，分别是亚当斯摩根、克利夫兰公园和拉尼尔高地。其他7个在交通方便的近郊地区，其中4个在阿灵顿，2个在贝塞斯达，1个在亚历山大。哥伦比亚特区沿中轴线可以划分为东西两片地区，创意阶层聚集在西北部，服务阶层聚集在东南部，并拓展到黑人占比65%的乔治王子郡，这里黑人人口占比为65%。华盛顿地区前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有7个在哥伦比亚特区，还有2个在乔治王子郡。大华盛顿的服务阶层工人占比为40%，是美国少有的几个服务阶层人口少于创意阶层人口的地区。



弗雷德里克
利斯堡
弗兰特
罗亚尔
华盛顿
马纳萨斯
亚历山大
弗雷德里克斯堡
阶层分享
主要为创意阶层
主要为服务阶层
主要为工人阶层
数据缺失
华盛顿城区

图7.8 华盛顿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在拼布城市的第二种模式中，优势创意阶层仍然留在郊区。这种郊区模式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城市：亚特兰大、达拉斯和休斯敦等“太阳地带”城市，以及底特律和匹兹堡等“铁锈地带”城市。“太阳地带”城市的创意阶层一直以来都偏好高端的郊区社区，虽然通勤更辛苦，但仍然比前文中提到的第一种模式城市居民更依赖汽车。在“铁锈地带”城市，流行的“白人群飞”现象早就掏空了市中心，因此创意阶层也一直更青睐郊区。在大底特律地区等部分城市地区，20世纪早期沿着河岸和铁路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区也能帮助重塑城市，比如让城市变得更加适宜步行，或者被重建为购物、餐饮和夜生活一体化的功能区。尽管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但这些城市普遍比上述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面积更大、分布更松散、更依赖汽车，并且公共交通也更不发达。重返城市的浪潮没有大规模发生在这些地方，它们的创意阶层也更小。

亚特兰大的创意阶层占领了市中心东北部的地区，包括市区的市中心、中城和巴克黑德以及北部郊区（见图7.9）。该地区的东南部则基本被服务阶层占据，只有零星几个创意阶层社区。亚特兰大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7个位于亚特兰大市，大多数都是贫困黑人社区。工人阶层则分布在城市郊区的偏远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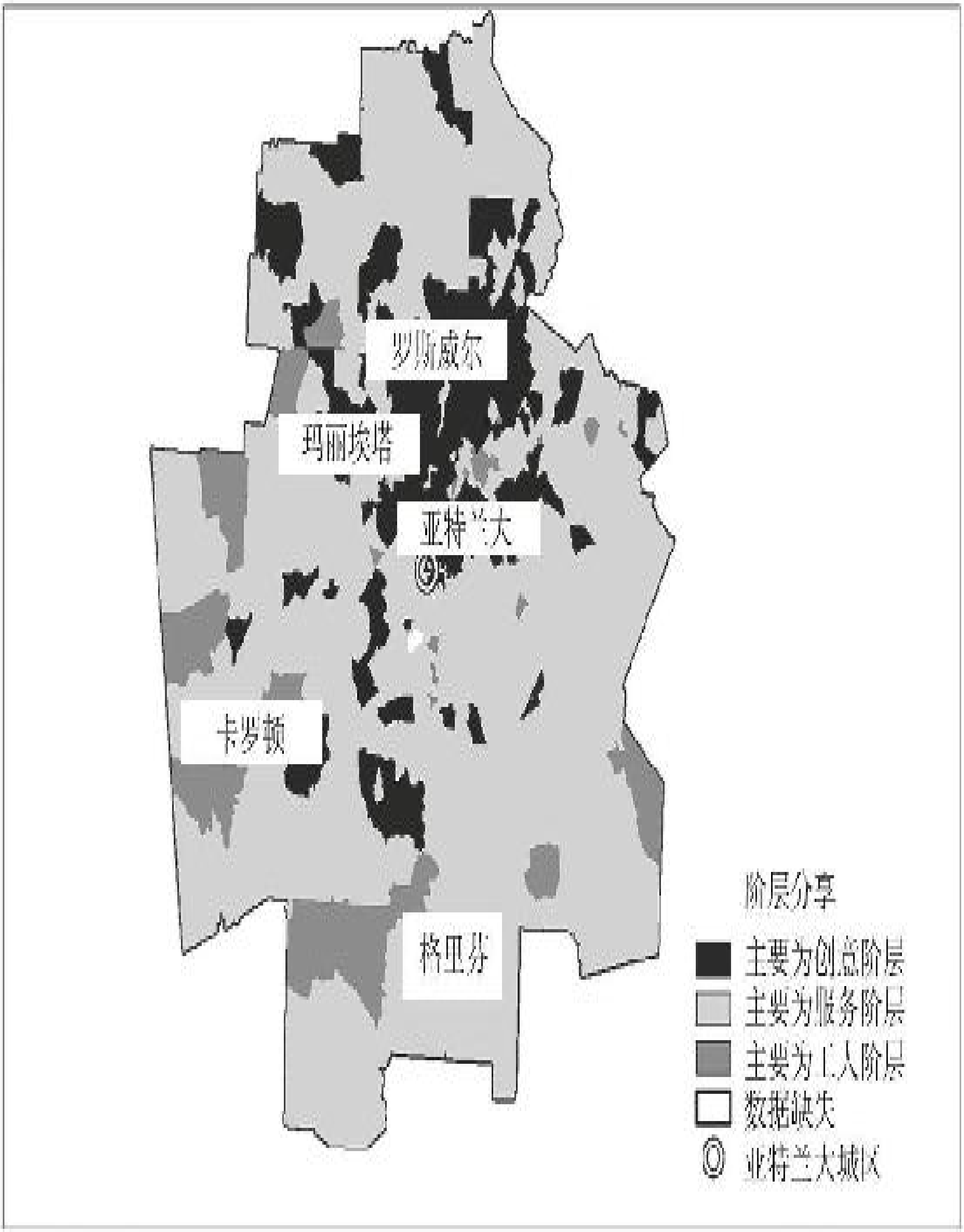


图7.9 亚特兰大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达拉斯的创意阶层集中在北部郊区，包括普拉诺、弗里斯科和欧文，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6个都在这里（见图7.10）。该地区的南部主要是服务阶层的地盘，也有少数几个创意阶层社区。市中心南部的三一河也是一条不太明显的分界线，西河岸是工人阶层和服务阶层社区，东河岸是创意阶层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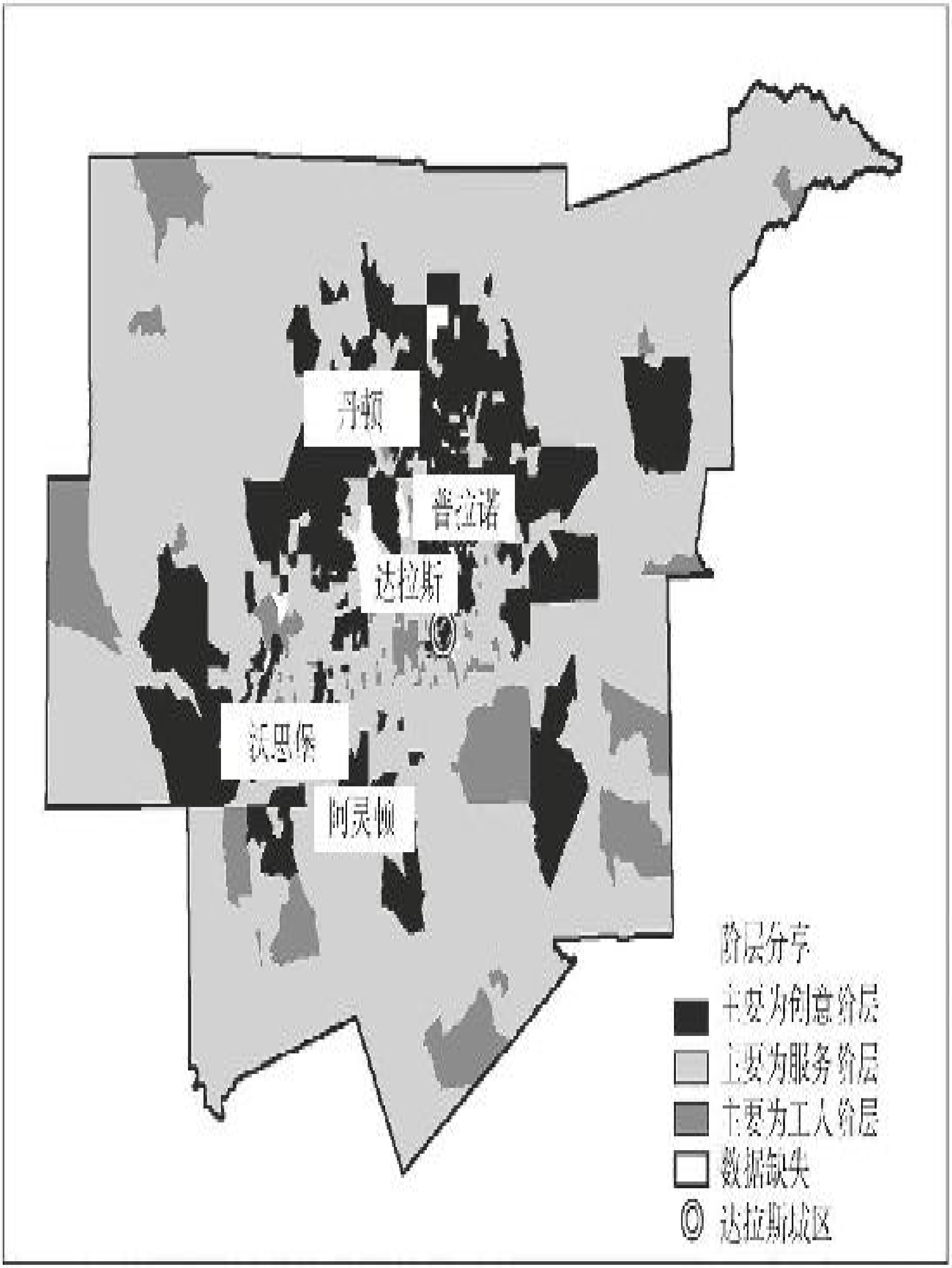


图7.10 达拉斯-沃思堡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休斯敦的创意阶层主要分布在两个环带，一个是从北部伍德兰斯到西南部舒格兰的大郊区环带，另一个是围绕市中心的小环带（见图7.11）。即便如此，该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仍有9个在休斯敦市，其中7个在莱斯大学附近的高端社区。服务阶层主要分布在两大片地区，一个位于市中心和近郊创意阶层聚集地的中间地带，这里覆盖了前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的9个。其他服务阶层人群则分布在更偏远的郊区。休斯敦的工人阶层主要集中在休斯敦港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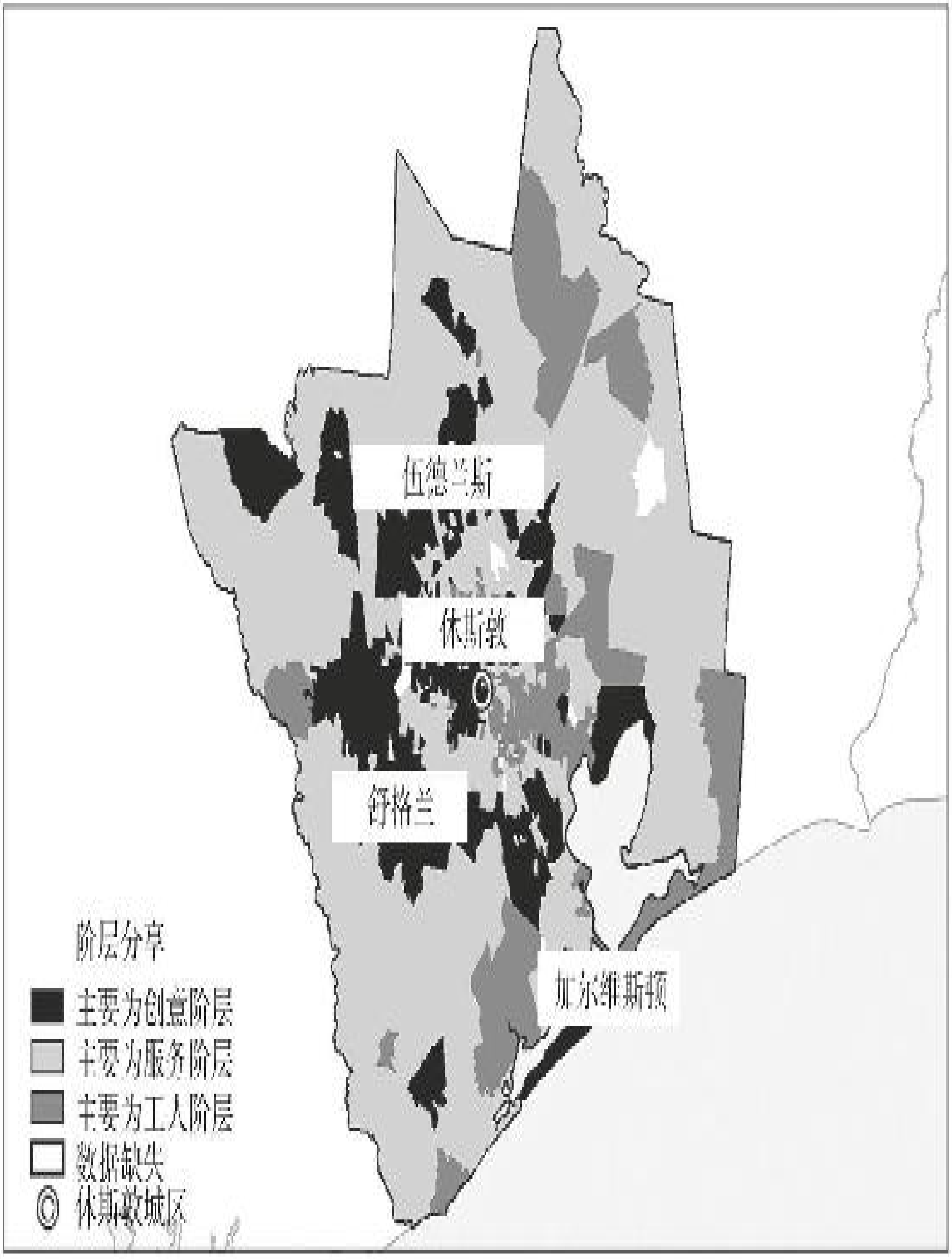


图7.11 休斯敦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纵观从南到北的“铁锈地带”城市，我们都发现了相似的郊区中心化模式。“太阳地带”城市实际上是围绕公路发展的，但是“铁锈地带”城市在经历了20世纪的“白人群飞”浪潮并且市中心被掏空后，城市发展还不足以重新填满市中心。

底特律的创意阶层分布在城市西北部郊区的大片楔形区域，从著名的八英里路向外，包括芬代尔、皇家橡树、高端的伯明翰和布卢姆菲尔德镇。底特律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都位于这片郊区地带（见图7.12）。其中两个在伯明翰、两个在布卢姆菲尔德镇、一个在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所在的布卢姆菲尔德山、一个在特洛伊、两个在有公共高尔夫球场和底特律动物园的亨廷顿森林，还有两个在格罗斯波因特，包括格罗斯波因特湖滨区和格罗斯波因特公园，在这里各色镀金时代的豪宅林立于湖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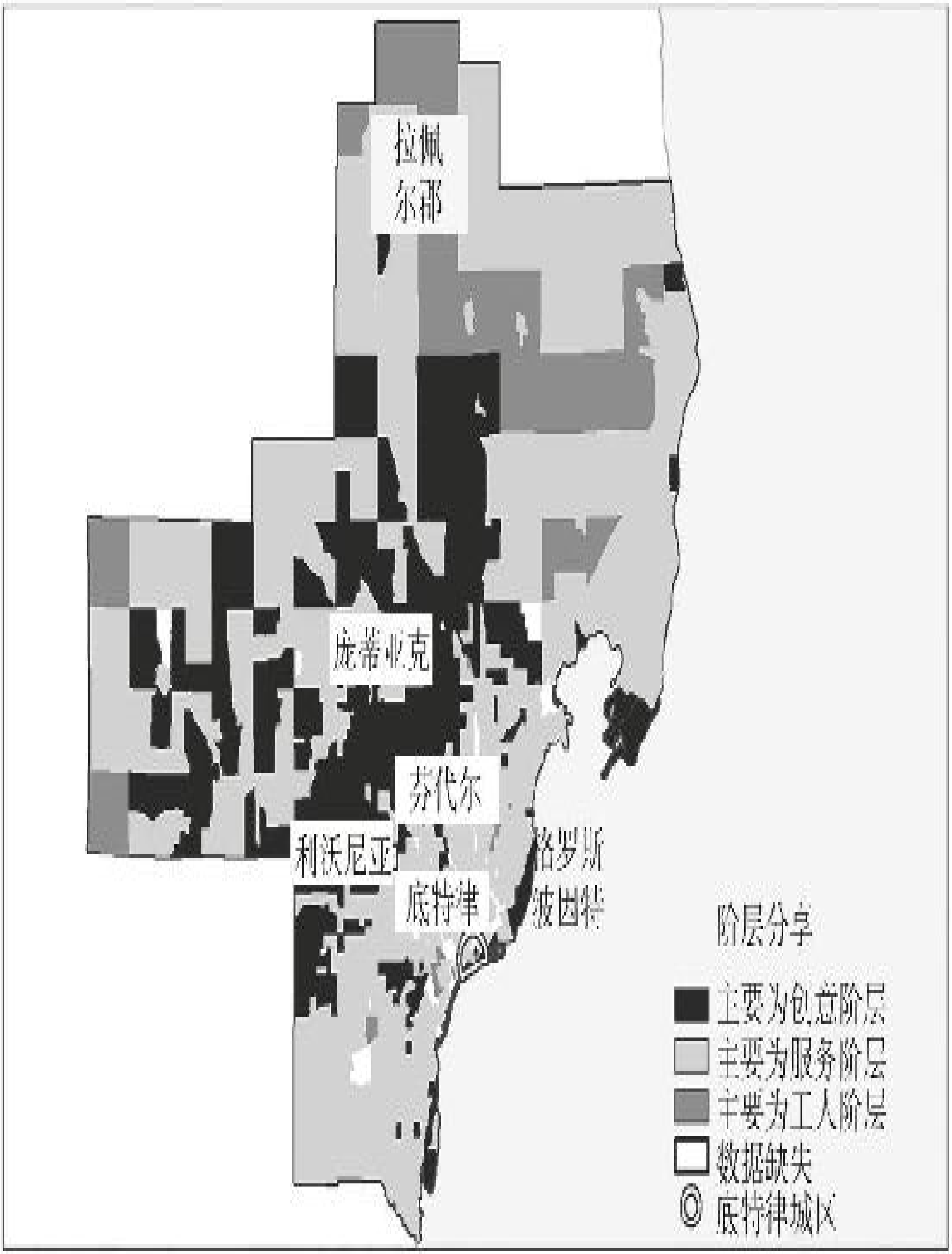

拉佩
尔郡
庞蒂亚克
芬代尔
利沃尼亚
底特律
洛罗斯
波因特
阶层分享
主要为创意阶层
主要为服务阶层
主要为工人阶层
数据缺失
底特律城区

图7.12 底特律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作为受“白人群飞”影响最严重的美国城市之一，底特律地区的阶层分布掩盖并巩固了它长期存在的种族分裂问题。不过它的市中心还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小型创意阶层中心，包括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设计的拉斐特公园社区、库克镇、众多主要艺术文化机构所在的卡斯走廊和韦恩州立大学所在的中城。底特律的市中心获得了大量投资，亿万富翁丹·吉尔伯特更是在它的很多老地标建筑中购下了成百上千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和住宅房产（他曾说自己只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摩天大楼促销”中捡便宜）。[12]沿着杰弗逊大道向北到格罗斯波因特公园的湖滨狭长地带，还有一个小型创意阶层聚居区。传统富人区帕尔默伍兹也是一个创意阶层聚居地。

服务阶层既在底特律市聚集，也大量分布于广阔的郊区。广阔的弱势贫困地区包围着市中心一小片复兴地区。去工业化和“白人群飞”的打击导致底特律市的人口从1950年开始减少了一大半，到现在市区还有大片废弃区域。[13]2009年最近一次经济危机达到顶峰时，该市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到近30%。2013年夏天，底特律市政府宣布破产。该地区最大的服务阶层社区都聚集在底特律市。令人震惊的是，底特律市只剩下少数几个工人阶层社区，大型蓝领阶层社区都在十分偏远的郊区，包括福特汽车总部的所在地迪尔伯恩、通用的庞蒂亚克车厂和费雪车身制造厂所在地庞蒂亚克、通用的罗慕勒斯发动机制造厂所在地罗慕勒斯，以及靠近弗林特的拉佩尔郡。

另一个“铁锈地带”城市匹兹堡是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探讨后工业化变革的基础案例，我们记录了它从国家一流工业中心到知识中心的转变历程。[14]大学城促进了这座城市的重建和复兴。一直以来，创意阶层就大量聚集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附近的老居民区，如桑迪赛德、松鼠山和布里兹角，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大型住宅，街道两旁绿树成荫（见图7.13）。重返城市浪潮也影响了匹兹堡的部分地区，如市中心保存完好的老仓库区——横排区，及其周边地区。不过匹兹堡地区的创意阶层仍然主要分布于城市北部、南部和东

部的郊区地带。服务阶层则在市区中较贫困的地区和郊区外围都有分布。工人阶层社区完全从这个曾经的钢铁之都消失了，全都被迁到了更偏远的郊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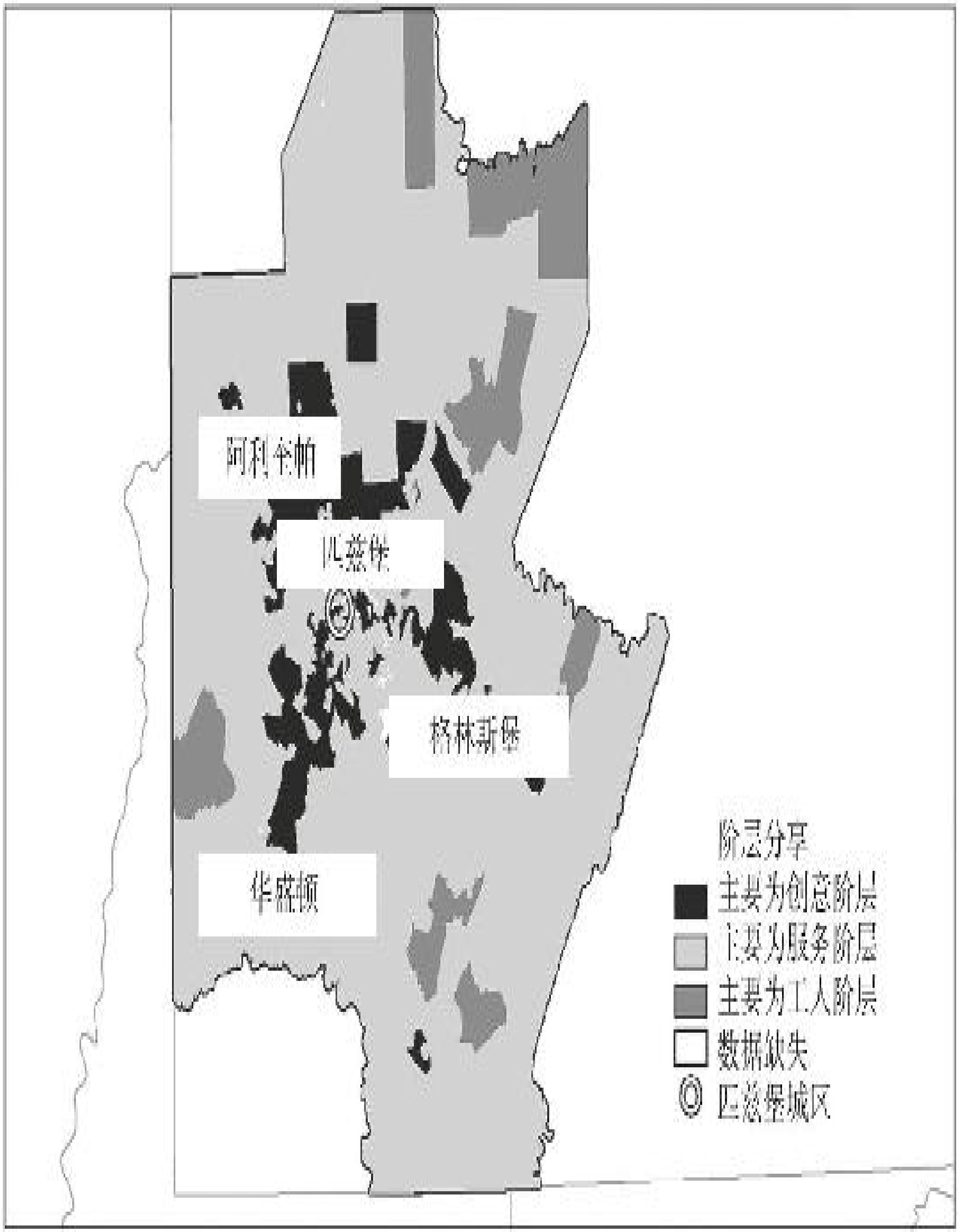


图7.13 匹兹堡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在拼布城市的第三种模式中，整片城市地区都被切割为两块，一块被优势创意阶层占据，另一块被其他弱势阶层占据。这种模式介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模式之间，既有与第一种模式类似的创意阶层聚集，但人数更少；又有比第二种模式更明显的重返城市浪潮，但创意阶层又比第一种模式更郊区化。当他们的市中心发生绅士化时，这些地区扩张并混入高端郊区地区，形成了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统一大型创意阶层社区。温哥华、奥斯汀和费城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温哥华地区完全被一分为二。创意阶层占据了市中心、西部沿海地段、北部公园周边和环山地区（见图7.14），国内需求和国外资本（主要来自亚洲）的推动让温哥华的市中心高度绅士化。服务阶层几乎全部被挤到城市的东南部，工人阶层社区在温哥华地区则寥寥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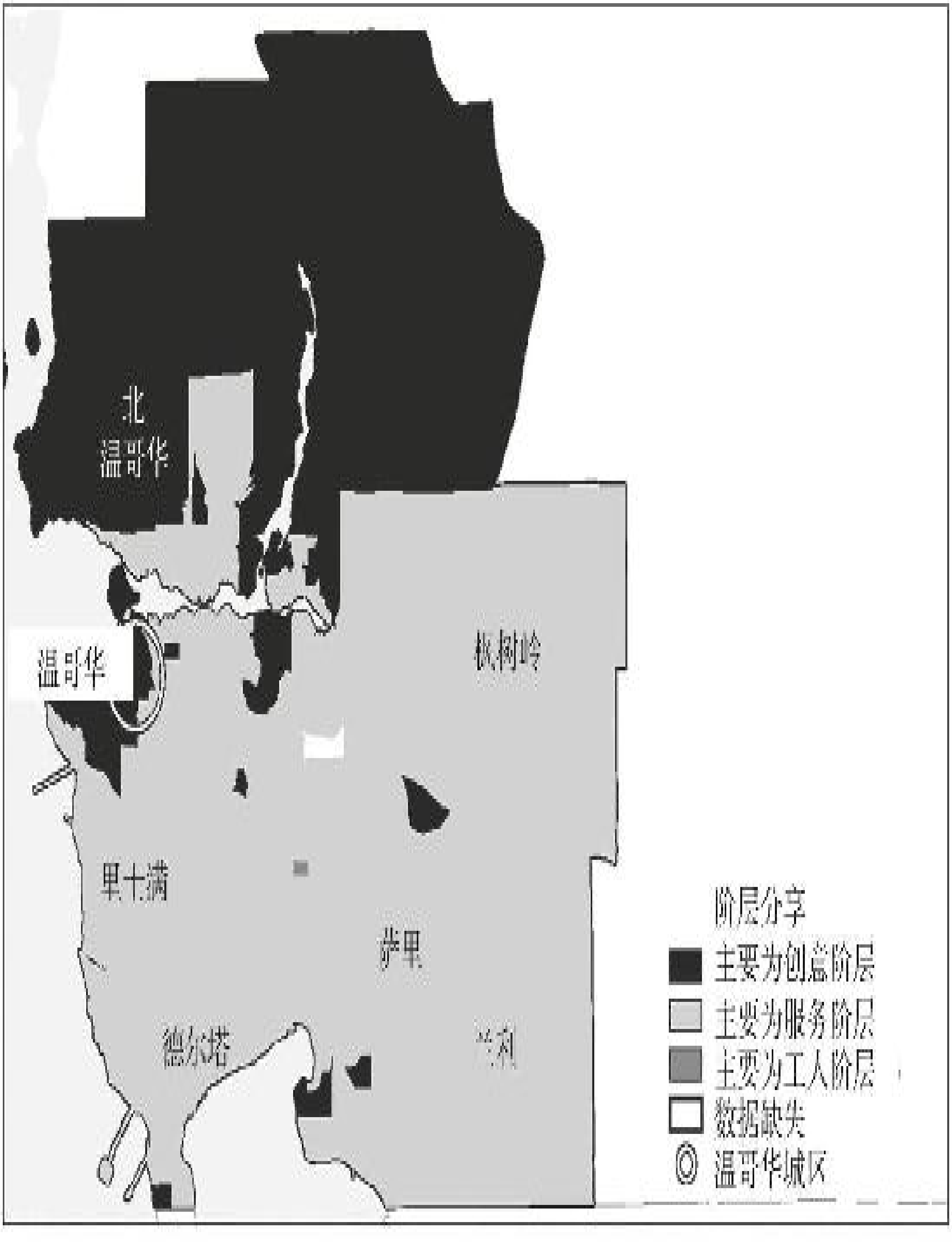

北
温哥华
温哥华
枫树岭
里士满
萨里
德尔塔
兰利
阶层分享
主要为创意阶层
主要为服务阶层
主要为工人阶层
数据缺失
温哥华城区

图7.14 温哥华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

奥斯汀地区则东西分化（见图7.15）。创意阶层聚集在西部从市中心到郊区朗德罗克的大块楔形地区和东南郊区的一片区域。奥斯汀对市中心进行了大力振兴，如大量开发新住宅项目。服务阶层和工人阶级社区分布在市中心东边的贫困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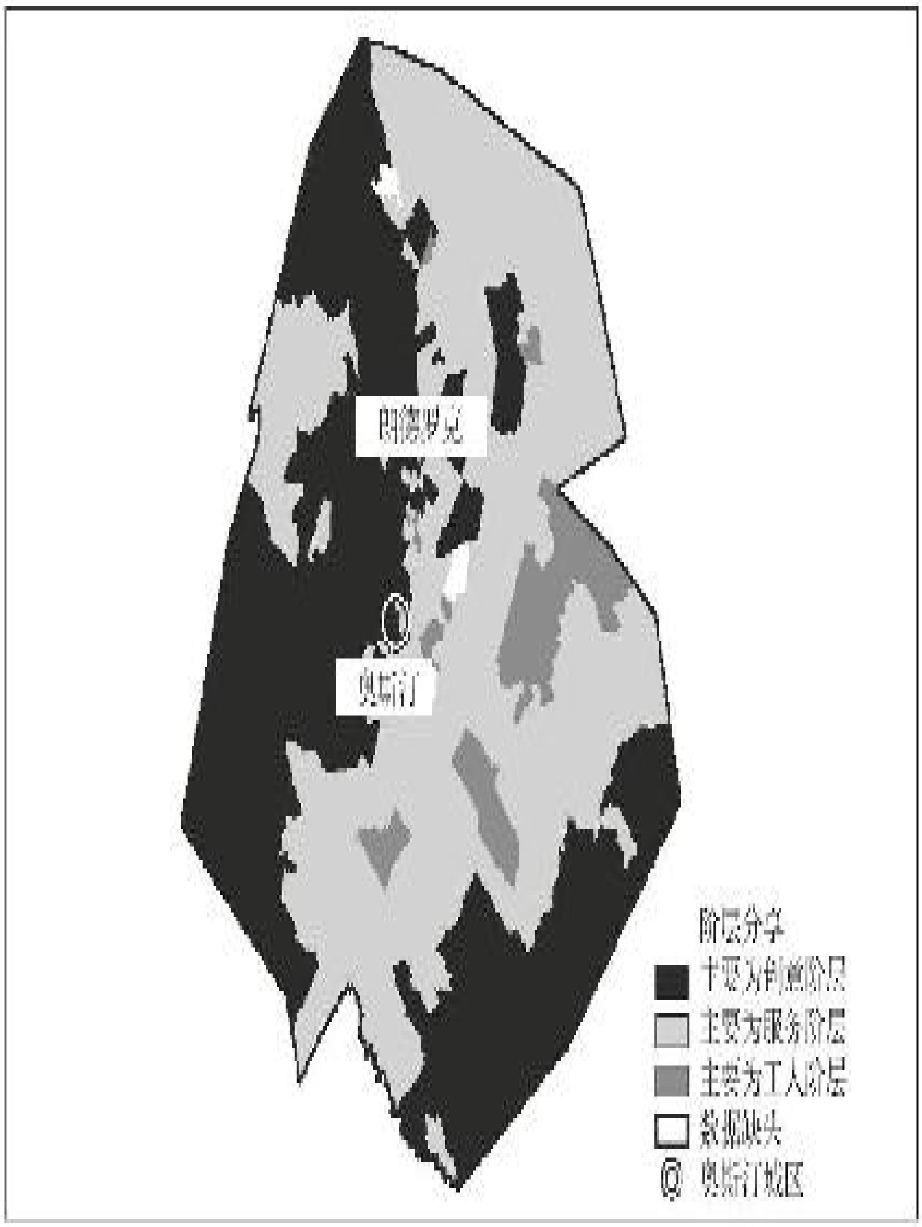


图7.15 奥斯汀

图7.15 奥斯汀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费城地区的创意阶层分别占据了东部和西部的两片区域（见图7.16）。在费城市区有两个主要的创意阶层聚居地：其一是在市中心的绅士化地区，包括社会山、里滕豪斯广场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周边；其二是绿树成荫、历史悠久的栗树山和罗克斯伯勒周边地区，这里也是圣约瑟夫大学和费城大学所在地。服务阶层分布在两片主要创意阶层地区之间的带状地区域和更边缘的地带。费城地区的前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有两个在费城市区，尤其是北边的贫困社区。费城地区只剩下3个工人阶级社区了，分别在东部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南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和多佛周边地区，以及东北部的特伦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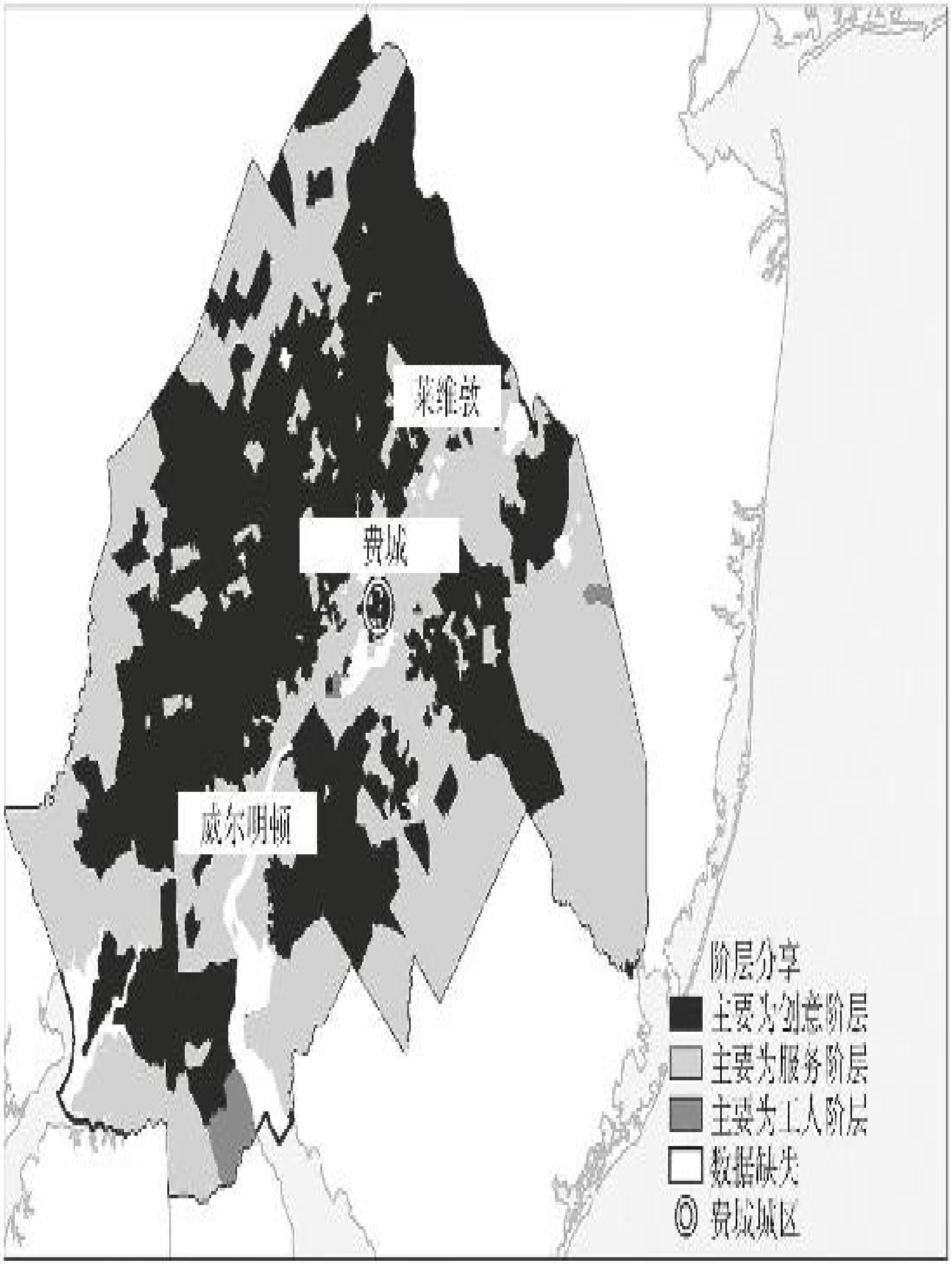


图7.16 费城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第四种模式是创意阶层零散分布在市区和郊区的一些独立地区，该模式的代表是洛杉矶和迈阿密。与东北部和中西部那些围绕老工商业中心发展的老城市不同，这两个典型后工业化城市的阶级地理分布主要受高速公路和汽车影响，呈现分散化特征。在这两个城市地区中，优势的创意阶层主要聚集在沿海地区，在大学、研究机构和复兴的市中心地区也有分布。

洛杉矶的创意阶层沿着风景壮丽的海岸线而居，从北边的马里布一路延伸到南边的尔湾、拉古纳海滩和达纳角，并向东部内陆大范围扩张（见图7.17）。几个主要创意阶层聚居地在好莱坞、贝沙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在的西木区和威尼斯一带、加州理工学院和喷气推进实验室所在的帕萨迪纳，以及东南部尔湾的加州大学周边也各有一片主要创意阶层聚居区。在洛杉矶市中心，艺术家对老式高层建筑进行改造，也慢慢形成了一个小型创意阶层社区。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聚集区夹在市中心的创意阶层社区之间，也大量分布在郊区。一大片服务阶层聚居地就位于西边的圣莫尼卡和东边的帕萨迪纳之间，并向南延伸至安纳海姆和圣安娜。另外，洛杉矶的北部和东北角各有一个主要服务阶层聚居区，在市中心和好莱坞之间也有一个服务阶层的聚居区。洛杉矶的工人阶层则聚集在伯班克、南部的老黑人城市康普顿以及长滩的大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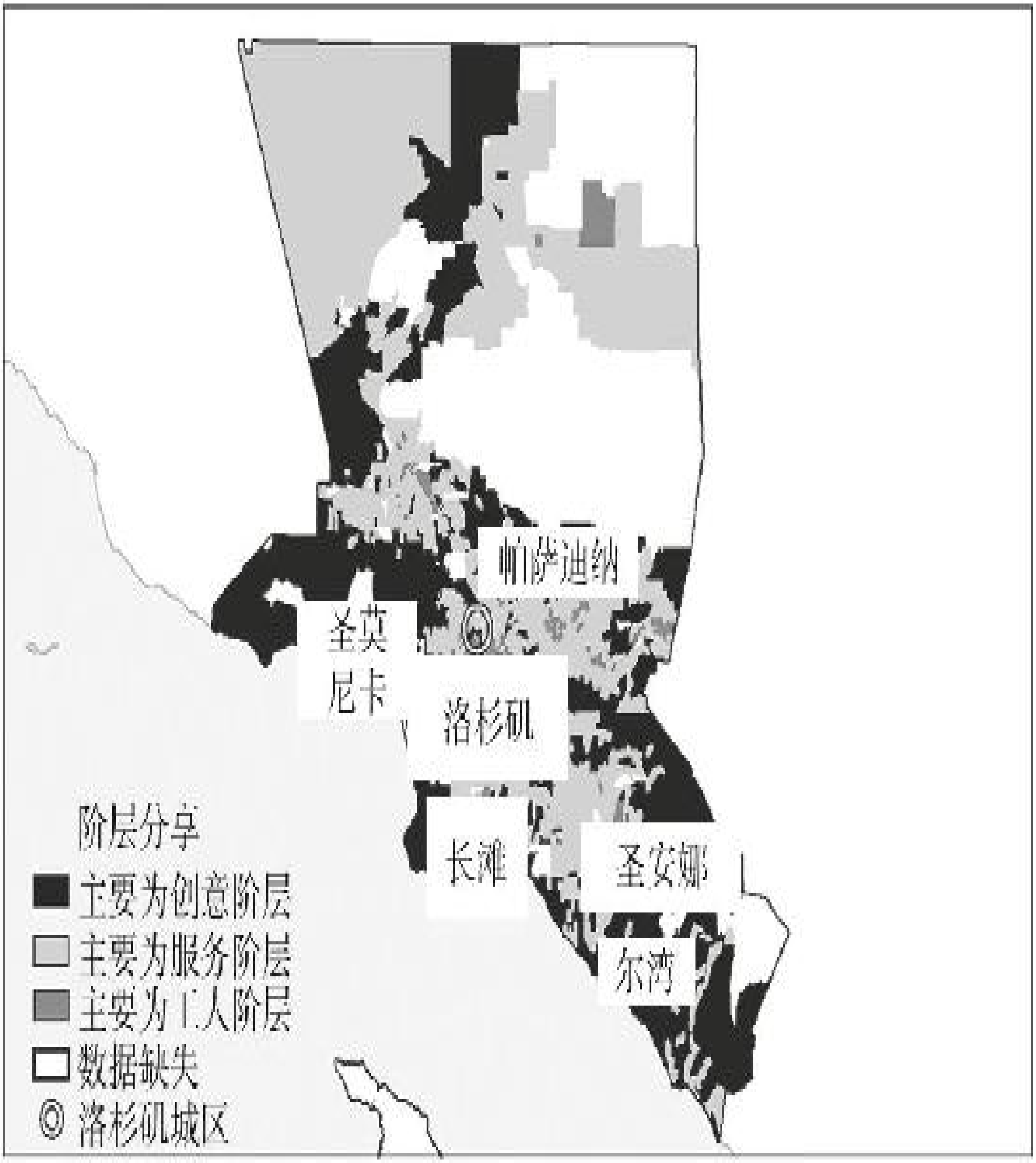


图7.17 洛杉矶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迈阿密地区的创意阶层主要分布在大西洋海岸线沿线（见图7.18），该地区前十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六个都在这里。另外有三个社

区在大学附近，包括科勒尔盖布尔斯的迈阿密大学、博卡拉顿的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和迈阿密西部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前十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五个在迈阿密市区，特别是市中心和沿海地段（旅游胜地南海滩和超级富裕的棕榈滩社区不属于创意阶层社区，可能是因为这里有大量购置二套房的非居民房主和退休人士）。该地区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人口都是服务阶层，位居全国前列。服务阶层分布在离海岸线较远的地方，包围着创意阶层社区。迈阿密几乎所有居民中超过70%的服务阶层的社区都在内陆地区。迈阿密的阶层地理特征就是沿海超级富豪社区和靠近内陆地区的贫困社区毗邻而居。

图7.18 迈阿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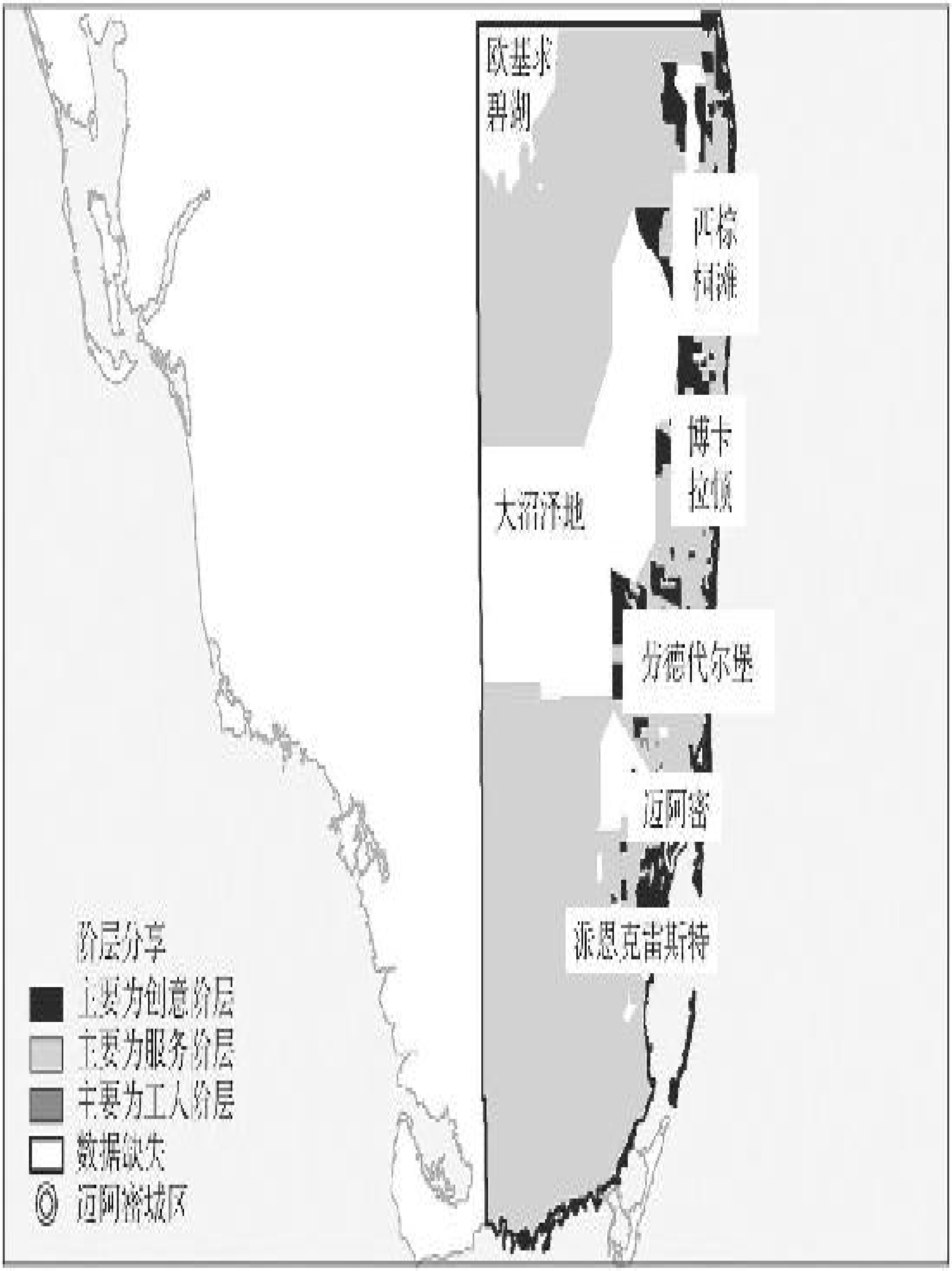


图7.18 迈阿密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以上就是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18个城市的拼布城市模式。有的地方的优势创意阶层大量搬回市区，而有的地方的创意阶层则更偏好郊区。在一些地方，不同的阶层各自占据大片独立领地；而在另一些地方，不同阶层的分布更加分散。不过在所有城市地区，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都既分布于市区，也分布于郊区。和我小时候大为不同的是，现在已经很少有工人阶层社区了，哪怕是在曾经伟大的工业城市芝加哥、波士顿、匹兹堡或底特律。

这种新阶层地理模式广泛存在，并不仅限于以上我们讨论的城市地区。全美的创意阶层都呈现越来越集中的趋势，并与较贫困的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划清界限。我的团队对全美国350多个城市地区的7万多个人口普查区进行的统计分析，更能反映这种新模式的全貌。我们的结果显示，创意阶层社区越来越集中在彼此相邻的区域，而与其他阶层聚集区分隔开，以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与以服务阶层或工人阶层为主体的地区呈负相关关系。这一模式也存在于其他阶层维度中，如收入与学历。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地区明显比其他地区更富裕，居民受教育程度也更高；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占主体的地区则更贫困。创意阶层为主的地区与平均收入和居民中大学毕业生占比都呈正相关；相反，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为主的地区与这两个指标呈负相关。在美国，这三个阶层都分布于完全不同且各自独立的地理空间中。[15]

最后，拼布城市主要受强势创意阶层聚集的主导，创意阶层占据了最具经济价值和最赏心悦目的地区，而其他阶层只能去他们挑剩的地方。这种新模式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伤害极大。优势群体在占领最好社区的同时也获得了最好的经济机会、学校、图书馆、服务和公共设施，这些都强化了他们原有的优势，也让他们的子女获得了更多向上流通的机会。更贫困的人群则被挤到犯罪率更高、学校更差、向上流动性更小的社区。简单来说，富人住在自己想住的地方，穷人住在自己能住的地方。

正如我们看到的，经济弱势已经从市区扩展到了郊区。郊区曾是美国梦的支柱，如今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在下一章我会讨论新城市危机中日渐深化的郊区问题。

[1]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New York: Crown Forum, 2012); Robert Putnam,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5).

[2] Alan Ehrenhalt, The Great Invers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City(New York: Knopf, 2012).

[3] 我们用人口普查区在地图上标注了三个阶层的居住地点，我们在分析中排除了人口小于500人的极小地区。美国城市地区的数据来自201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美国社区调查，参见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cs/#。伦敦的数据涵盖了为低尺度高等级输出区域（Lower Level Super Output Areas, LSOAs），大约等同于美国人口普查区，数据由英国国家统计局提供。加拿大的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2006年的调查数据。我们还在地图上标出了市中心（以市政厅为中心方圆两英里的区域）、主要公共交通路线、大学和知识研究机构以及公园、公共空间、河岸和海岸等自然公共设施，因篇幅原因在此不再赘述。参见Richard Florida and Patrick Adler, “The Patchwork Metropolis: The Morphology of the Divided Post-Industrial City,”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September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2015-MPIWP-006_Patchwork-Metropolis_Florida-Adler.pdf; 也参见Richard Florida, Zara Matheson, Patrick Adler, and Taylor Brydges, The Divided City and the Shape of the New Metropoli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4),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the-divided-city-and-the-shape-of-thenew-metropolis。

[4] Terry Clark, Richard Lloyd, Kenneth Wong, and Pushpam Jain, “Amenities Drive Urban Growth,”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4, no. 5 (2002): 493–515; Richard Florida,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2 (2002): 743–755; Edward Glaeser, Jed Kolko, and Albert Saiz, “Consumer C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 no 1 (2001): 27.

[5] 参见 Robert Owens, “Mapping the City: Innovation and Continuity in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1920–1934,” American Sociologist 43, no. 3 (September 2012): 264–293; Martin Bulm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Institutionalization, Diversity,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6] Robert Ezra Park, Ernest W. Burgess, and Roderick D. McKenzie, The Ci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Burgess also published a seminal study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ee Ernest W. Burges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American Cit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40, no. 1 (November 1928): 105–115.

[7] Homer Hoyt, “Th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n American Cities,”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1939; Chauncy Harris and Edward Ullman, “The Nature of Cit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42 (1945): 7–17.

[8] On the flight from destiny, 参见 Edgar Hoover and Raymond Vernon, Anatomy of a Metropolis: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People and Jobs Within the New York Metropolitan Reg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后来弗农发明了经典的工业地点的产品周期模型，解释了标准制造业技术和自动化的发展何以使工厂搬迁到土地和劳动力更廉价的郊区绿地和海外。Raymond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0, no. 2 (May 1966): 190–207. On the edge city, see Joel Garreau, Edge City: Life on the New Frontier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1).，被称作“洛杉矶学派”的城市学家在回顾后工业大都会地区的种种变化后认为，洛杉矶和其他太阳带地区的大都会地区不再是从市中心向外环形发展，而是呈现出一种更分散的发展模式，有多样化的工业、商业和居民区。参见Michael Dear,“The Los Angeles School of Urban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Urban Geography 24, no. 6 (2003): 493–509。

[01] 1平方英里约为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9] J. David Hulchanski, “The Three Cities Within Toronto: Income Polarization Among Toronto’s Neighborhoods, 1970–2005,” Cit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0, www.urbancentre.utoronto.ca/pdfs/curp/tnrn/Three-CitiesWithin-Toronto-2010-Final.pdf.

[10] Sam Bass Warner, Streetcar Suburbs: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1870–1900, 2n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 AnnaLee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 Richard Florida, “Detroit Shows Way to Beat Inner City Blues,” Financial Times, April 9, 2013; Richard Florida, “Don’t Let Bankruptcy Fool You:Detroit’s Not Dead,” CityLab, July 22, 2013, www.theatlanticcities.com/jobsand-economy/2013/07/dont-let-bankruptcy-fool-you-detroits-not-dead/6261;Tim Alberta, “Is Dan Gilbert Detroit’s New Superhero?” National Journal,February 27, 2014, www.nationaljournal.com/next-economy/america-360/isdan-gilbert-detroits-new-superhero.

[13] Thomas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 Richard Florida, “Visions of Pittsburgh’s Future,” Pittsburgh Quarterly(Fall 2013), http://pittsburghquarterly.com/pq-commerce/pq-region/item/82visions-of-pittsburgh-s-future.html.

[15] 以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与服务阶层为主体的地区（-0.62）或工人阶层为主体的地区（-0.77）负相关。以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与平均收入（0.75）和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

例（0.90）高度正相关。服务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与平均收入（-0.49）和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0.45）负相关，工人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也与平均收入（-0.56）和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0.78）负相关。

第八章 郊区危机

1959年末到1960年初，在我两岁、我弟弟罗伯特快出生的时候，我们家从纽瓦克的出租公寓搬到了北阿灵顿一个工人阶层郊区，我父母花了15000美元买了栋带小后院的科德角式房屋。常听我父亲说，我们的新家所在的社区不久前还是个农场。

就在我们搬家前不久，当时的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一个全新精装样板房的厨房里举行了会面。这栋在美国随处可见的普通郊区房屋是美苏文化交流项目的一部分，被建在了莫斯科的索科利尼基公园。1959年7月24日，电视台记录了两国领导人的即兴“厨房辩论”。“任何一个钢铁工人都能买得起这栋房子，”尼克松指出，“他们的时薪是3美元，如果申请25年到30年的贷款，这栋房子每月的分期付款只要100美元。”[1]赫鲁晓夫反驳道：“只要你出生在苏联，就能有一栋房子。”

会谈的主题随后很快就转向了国际政治和核武器，但是尼克松的发言比房子本身更生动地反映了战后时期的美国梦：一栋带电视、洗碗机、洗衣机和烘干机的房子，加上两辆私家车，这是任何一个像我父母那样的工人阶级都能拥有的生活。愿景很美好，现实未必有这么理想。比如我们家的电视机和洗衣机经常出故障，那辆20世纪50年代的雪佛兰的脚踏板都生锈了，时不时就要送去维修。另外，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来说，有限的经济机会和种族歧视（比如限制性契约、排他性区域规划、不公平的贷款政策）把他们完全隔绝于郊区之外。

不过我父母还是常常感叹自己能拥有这栋郊区房屋是何等幸运，他们在这里养育子女，也度过了自己的大半辈子。我在北阿灵顿长大，从一年级开始就步行上学，骑着变速单车到处跑，打棒球和橄榄球，还和我弟弟一起组建过摇滚乐队。最开始我们还会经常回纽瓦克探望亲戚，上音乐课，去繁华的市中心购物。到我青少年时期后，纽

瓦克的亲戚逐渐搬走，纽瓦克市中心的很多百货大楼纷纷倒闭，我们回去得也越来越少了。

当时在不远的伍德布里奇和利文斯顿，社区里新开了郊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立交桥附近开始出现工业园区和办公楼。这种变化是全国性的。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科技工业在波士顿、旧金山、奥斯汀和西雅图的郊区蓬勃发展，很多曾经的郊区“睡城”慢慢变成了成熟的卫星城，人们在郊区生活、工作和购物，不再需要专门跑到大城市中心去。虽然曼哈顿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远，但我到上高中才第一次去。随着市中心的快速衰退，美国逐渐变成了一个郊区国家。

但今天一切都不一样了。富裕、高学历、年轻及无子女的白人群体正在重新搬回市区，而移民、少数族裔和穷人正迁往郊区。与此同时，很多在我父母辈看来只会出现在城市的问题，如贫民窟、贫困、犯罪、毒品、种族矛盾、暴力、结构性失业、流浪汉等，现在也纷纷涌入郊区。

郊区曾是繁荣与希望之地，如今却大规模陷入经济衰退和贫困的泥潭。郊区的中产阶级社区一方面正在空心化，就像几十年前的城市；另一方面又分化为集中贫困和集中富裕地区，就像今天的城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还没意识到郊区正在走下坡路，但我当时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同事、城市设计师大卫·刘易斯告诉我，和未来的郊区复兴项目相比，20世纪的大规模城市复兴很可能就是小菜一碟。事实上，那时很多占地面积巨大、充斥着劣质建筑和仓促建成的基础设施的郊区已经开始衰退了。全国有成百上千的郊区购物广场被荒废；几十年前的城市工厂停工的情景又在无数郊区工厂上演；有些郊区衰落速度极快，被称作“城市贫民窟”的反攻。[2]

矛盾的是，新城市危机中郊区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会超越城市问题。一个简单的原因是，郊区人口更多。郊区人口很难被精确统计，不过对美国居民的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人（53%）称自己住在郊

区，5个人里面只有1个（21%）称自己住在农村地区，1/4（26%）的人称自己住在市区。[3] 事实上，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包括那些最大的城市）中，还有42%的受访人称自己住在郊区。这说明至少在美国人心里，美国还是一个非常郊区化的国家。

很多典型郊区比著名城市的人口更多。比如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郊区梅萨拥有46.5万人口，比亚特兰大（45.6万）、迈阿密（43万）和明尼阿波利斯（40.7万）都多。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远郊贝克尔斯菲尔德拥有36.9万人口，超过了圣路易斯（31.7万）、辛辛那提（29.8万）和匹兹堡（30.5万）。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郊区普莱诺有27.8万人口，超过了布法罗（25.9万）。

优势精英阶层会重返市中心，但除了他们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留在了郊区。大学以上学历的单身人口或年轻父母是重返城市的主力军；子女年龄较大的家庭主要从城市向郊区迁移；而老年人和婴儿潮一代中较年轻的群体则继续留在郊区。同时，大批较贫困和学历较低的人群也在迁往郊区，有些人是自愿的，但更多都是迫不得已——他们原来的社区被新城市精英占领了。虽然高科技和知识型工作正在回到城市，但郊区仍是美国最大的就业岗位来源，为美国创造了54%的就业岗位。[4]

如今的郊区已经不再是《天才小麻烦》、《唐娜·里德秀》或《老爸最知道》里那样的纯白人地区了，超过一半的移民一开始就直接跳过城市，定居在大城市地区的郊区。在2000—2010年，美国前100大城市地区的郊区人口增长中只有9%来自白人，其中有1/3城市郊区的白人人口甚至减少了。[5]

当然不是所有郊区都在收缩。现在很多迁往郊区的移民和少数族裔的经济状况不比我父母那时差，有些人还比我父母那时富裕多了。虽然有的郊区衰落了，但仍有很多郊区在繁荣发展，并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阶级分化问题。

郊区对耐用品的大量需求曾大大促成了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而在现在这个聚集驱动创新的时代，散漫扩张的郊区则成了经济发展的阻碍。郊区不动产分流了资本，减少了对更有生产力的知识、科技和人才领域的投资。以前郊区象征着资本主义最美好的愿景——所有人都可以向上流动的美国梦，而今天郊区则陷入了新城市危机最深层的矛盾中。

郊区危机之所以如此棘手，部分原因是它的发生太出乎意料了。美国郊区中有超过1/4的贫困或接近贫困人口。事实上，美国大城市地区的郊区比城市的贫困人口更多，郊区贫困的发展速度也更快。从2000—2013年，美国城市的贫困人口增加了29%，而郊区的贫困人口增加了66%。2013年，郊区的贫困人口达到了1700万，城市贫困人口为1350万。[6]

美国郊区贫困是全国性问题，并在逐步恶化。2000年，纽约地区有29%的贫困人口住在郊区；2013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5%。同期，贫困人口分布在郊区的比例在大费城地区从44%上升到50%，在大达拉斯地区从41%上升到48%，在大西雅图地区从61%上升到69%，在大旧金山地区从52%上升到59%，在大圣路易斯地区从68%上升到77%，在大华盛顿地区从61%上升到70%，在大亚特兰大地区从76%上升到88%。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伦敦郊区的贫困人口数量（122万）高于伦敦市（102万）。[7]

从2000—2012年，郊区的集中贫困社区（贫困人口占比不低于40%）居民数量上升了139%，增长速度是城市的三倍。同期，贫困人口占比不低于20%的贫困社区的居民数量在郊区上升了105%，在城市仅上升了21%。既不上学也不工作的年轻人占比最高的地区不是超级城市纽约、科技中心旧金山，甚至也不是经济遭受重创的“铁锈地带”城市底特律，而是曾经郊区梦的典范——位于加州内陆帝国中心的圣贝纳迪诺。[8]

郊区的新增贫困人口中，有的人是因为无力负担城市不断上涨的房价而被迫迁往郊区，但也有很多人是曾经体面的郊区中产阶级，他们要么就是丢了工作，要么就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经历了房价暴跌。

与此同时，几十年前可能会选择住在郊区的一部分优势群体现在重新搬回城市了。约50年前，大量美国人离开了高密度的城市地区，而现在美国人则开始离开散漫扩张的低密度郊区。郊区人口增速逐渐放缓，有的甚至跟不上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速，这标志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城市向郊区人口迁移浪潮开始退去。[9]

城市和郊区房价的相反变动反映了逃离郊区的趋势。过去很多年中，郊区房价都一直高于市中心房价，而到2015年底，城市平均房价均值比郊区平均房价高了两个百分点，前者是269036美元，而后者是263987美元。但这低估了城市和郊区房价的实际差异，因为郊区房屋面积普遍大于城市房屋。如果按照每平方米价格来算，郊区和城市房价的差异就更大了。

这一趋势在重返城市浪潮更明显的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十分显著。在大波士顿地区，1997年城市和郊区的房价均值都为每平方英尺100美元左右，而到2015年，城市的平均房价约为每平方英尺400美元，而郊区则为每平方英尺250美元。在华盛顿地区，1997年城市和郊区房价也均为每平方英尺100美元左右，到2015年城市和郊区的平均房价分别为每平方英尺300美元和225美元。在旧金山地区，1997年城市和郊区平均房价都约为每平方英尺150美元，到2015年城市和郊区的平均房价分别为每平方英尺700美元和不到500美元。[10]

以前的郊区一派宁静祥和，现在则面临犯罪率攀升、经济疲弱和人口流失的问题。《绝命毒师》让城市街角作为毒贩交易中心的形象深入人心，而电视剧《火线》带火了郊区的安非他命兴奋剂。近年来阿片药物的流行就来自郊区。另外，从1990—2008年，虽然美国整体暴力犯罪率都在下降，但美国主要城市的暴力犯罪率下降速度比郊区

快了3倍。2001—2010年，谋杀案在郊区上升了16.9%，而在城市下降了16.7%。[11]从科伦拜校园枪击案到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很多大规模枪击案都发生在郊区。

郊区的政府和警察还没有适应这些新形势。从2015年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迈克尔·布朗案引发的大规模骚乱就能看出来。这个圣路易斯市的郊区有超过2/3（67%）的黑人人口，而全镇54个警察中只有4名是黑人。弗格森镇不算一个典型案例，因为它还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比如失败的机场扩张项目让成千上万的居民被迫搬迁，以及银行住房贷款针对黑人的"红线政策"。但它衰落的原因也包括更广泛的人口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影响了很多其他的美国郊区。弗格森的失业率从2000年到2014年几乎增加了两倍——从不到5%上升到超过13%。而同期有工作的居民的平均年收入则下降了1/4。到2015年，有1/4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12]弗格森不仅仅是警察滥用权力的典型案例，还象征着越来越多美国郊区的衰落。

新城市危机的郊区问题不仅困扰郊区居民，还影响了美国整体的经济发展。郊区的散漫扩张不仅能源利用低效且浪费，还会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并削弱生产力。

郊区房产曾是美国梦的基石，如今则成了美国人向上经济流动的阻碍。俗话"一直往外开，直到住得起"反映了在越远的郊区，房价越便宜。然而，住得远也要付出额外的代价。一般来说，人们的住房支出应占收入的1/3左右，住房和交通支出总和不超过收入的45%。几辆车的购买费用再加上保险、维修和加油的费用并不便宜，而住在离工作地点比较近的地方则意味着可以搭乘公共交通，大幅削减交通支出。因此，住在市中心附近或公共交通沿线的公寓，可能比住在依赖汽车出行的郊区别墅更划算。

如今的郊区不仅不能帮助美国人实现美国梦，还阻碍人们实现向上的经济流动。大面积和低密度城市地区的经济流动性显著低于人口密集的城市。郊区的低收入工人比城市工人离工作中心更远，更难找

到工作，上班也更不方便。低收入群体的通勤时间显著影响了他们经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通勤时间越长，经济流动的可能性越小。城市的贫困社区可能会形成集中和持续的贫困循环，郊区的贫困社区也有自己的问题：社区居民被隔离于工作岗位、经济机会和用来削弱贫困影响的社会服务。虽然郊区也有社会服务，但因为信息更封闭、更不方便获得，穷人往往很难享受到。[13]

郊区散漫扩张的整体经济成本十分高昂。水和能源等基础设施或本地资源在郊区的运输成本是城市的2.5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发现，加州富裕城市马里布（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630人）的居民平均能源消耗量是贝尔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14000人）的10倍有余。根据2015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散漫扩张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每年约600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如低效率土地利用和汽车依赖，另外还有4000亿美元间接损失，如交通堵塞和污染等，两者相加就是每年10000亿美元。[14]长距离通勤带来了额外的成本。美国工人平均每天上下班的总通勤时间为52分钟，一年通勤时间就超过了9个整天，而每天单程通勤时间为1.5个小时的人则每年要在上下班路上浪费超过约1个月的时间（31.3天）。美国有1.39亿通勤人口，每年一共要在路上浪费300亿个小时。如果能让单程通勤时间为1.5个小时的360万美国人把单程通勤时间压缩到30分钟的平均水平，并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工作，就相当于每年给美国增加18亿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或者90万份全职工作。[15]

如果把间接损失也考虑在内，散漫扩张的广泛社会成本更高。住在远郊区、长通勤时间的居民更容易出现肥胖、糖尿病、焦虑、失眠和高血压问题，他们的自杀率和车祸死亡率也更高。以上所有风险导致郊区居民的平均寿命减少了3年。根据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艾伦·克鲁格的调查，人们在各项日常活动的偏好排名中，通勤排在最后，低于工作、照顾孩子和做家务。[16]当我们想到通勤者时，可能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个手提公文包、西装革履并和妻子吻别的专业人士，或者是一个穿着休闲、开跑车的科技工作者。但实际上，通勤的负担主要

落在了穷人和更弱势群体的身上。知识工人和专业人士最倾向于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或者方便的公共交通沿线，如果他们住在依赖汽车的郊区，也能开私家车安全舒适地上下班。但是，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更可能住在远离公共交通的地方，很多人也买不起车。他们的郊区通勤主要靠多次换乘公交车和火车，往往还要在人行道不足的地方长时间步行。

散漫扩张的郊区不仅影响经济流动性、效率和生产力，还在逐步丧失工作制造引擎的地位。虽然郊区创造工作的能力仍比城市强，但差距在逐渐缩小。2007—2015年，在美国3000多个县郡中，纽约的金斯县（即布鲁克林）的就业岗位增长率最高。2007—2011年，在美国41个大城市地区中，有一半（21个）地区的市中心区域（距市中心商业地带方圆3英里之内）的就业岗位增长率高于它的郊区，其中包括夏洛特、俄克拉何马、密尔沃基、印第安纳波利斯、纽约、旧金山和奥斯汀等。虽然整体郊区的就业岗位增长率高于市中心，但郊区新增就业主要是低薪、低技能要求、更容易受到经济下行影响的岗位，而市中心的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是知识型和专业岗位。市中心的平均工资比高密度和更城市化的郊区高20%，比低密度郊区高37%。[17]

虽然现在更多穷人住在郊区而非城市，很多郊区的经济前景也十分堪忧，但还是有很多富人留在郊区。尽管有富人重返城市的浪潮，但不管从收入水平还是房产价格来看，美国最富裕的地区几乎都在郊区。

美国最富裕的10个地区中有9个在郊区（见表8.1）。这一精英群体的最低家庭年收入是54万美元，超过“前1%”群体收入门槛的两倍有余。[18] 排名第一的是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名副其实的“金三角”，平均家庭年收入超过60万美元。其他地区包括华盛顿、迈阿密和洛杉矶的精英郊区飞地，只有芝加哥的东湖湖岸是城市地区。最富裕的城市地区比最富裕的郊区地区更加多元化，前者的住宅类型和收入阶层更多样，租户也更多。

表8.1 美国最富裕的社区都位于郊区a

排名	社区	城市和州	家庭平均年收入（美元）
1	金三角	格林威治	614 242
2	布拉德利庄园	贝塞斯达	599 440
3	波托马克庄园	波托马克	599 331
4	老卡特勒汉莫克橡树湾	珊瑚墙市	596 851
5	卡德罗克栅栏	波托马克	595 669
6	东湖湖岸	芝加哥	593 454
7	斯威克斯米尔自治区	麦克莱恩	562 596
8	卡米奥海岸高地	新港滩市	554 721
9	派力肯山－派力肯峰	新港滩市	549 659
10	格林海文	赖伊	540 403

资料来源：史蒂芬·希格利，希格利1000数据，Higle 1000.com, 2014年2月,Http://higley 1000.com/archives/638。

房地产价格反映了同样的事实（见表8.2）。美国最贵的10个邮政编码区中有9个在郊区，唯一的例外是纽约的翠贝卡与苏荷区。[19] 这些

郊区地区中有8个都在加州，包括精英硅谷郊区阿瑟顿、洛斯阿图斯和帕洛阿托，以及比弗利山庄、圣莫尼卡、圣迭戈的兰乔圣菲和圣塔芭芭拉的蒙特西托等。另外还有在迈阿密海滩对岸只能乘船或乘游轮到达的高级飞地费希尔岛。

表8.2 美国最富裕的社区都位于郊区b

邮编	城市／社区	所属地区	住宅价格中值（美元）
94027	阿瑟顿	旧金山湾区	4 551 333
90210	比弗利山庄	洛杉矶	3 953 775
90402	圣莫尼卡	洛杉矶	2 996 642
33109	费希尔岛	迈阿密	2 928 092
94028	波托拉山谷	旧金山湾区	2 916 175
10013	翠贝卡／苏荷	纽约	2 912 792
92067	兰乔圣菲	圣迭戈	2 720 392
94022	洛斯阿图斯	旧金山湾区	2 680 867
93108	蒙特西托	圣塔芭芭拉	2 647 517
94301	帕洛阿托	旧金山湾区	2 637 158

资料来源：根据马丁繁荣研究所的分析，以及Zillow住房价值指数（2014）。

令人震惊的是，如果只看最富裕的地区，城市社区和郊区社区之间的传统差异几乎消失了。几年前我在一次晚宴中目睹了两对夫妻关于城市和郊区哪里更宜居的争论，他们都来自大纽约地区，其中一对住在郊区的费尔菲尔德，另一对住在曼哈顿。我从争论中发现，尽管住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但除了个别明显差异，如一对夫妻住公寓而另一对夫妻住独栋别墅，他们的生活方式竟然十分相似。他们在相似的地方购物，在相似的餐厅吃饭，穿相似的衣服，享受相似的公共设施，甚至他们的孩子上的学校都极为相似。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未因为住在城市或郊区而改变，而是由社会经济阶层和社区主要阶层构成决定的。

和城市一样，有的郊区富，有的郊区穷；有的郊区快速发展，有的郊区正在衰落。事实上，现在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高密度的城市地区和边远的郊区外围。房地产经济学家杰德·柯尔克的研究表明，在最边远的郊区地带（最“郊区”的地区）和最密集的城市地区，人口增速最快。[20]在边远地区广阔的处女地上建房子便宜得多，也没有什么比从零开始的发展速度更快了。而高密度城市地区利用其便利性和高生产力不断吸引着人口和工作。同时，郊区的中心正被掏空并遭到了经济排挤，经济发展绕过了位于市中心和新开发边远郊区之间的老郊区地区。

老郊区的经济停滞和衰落对今天的美国影响深远。除了影响个人、家庭、社区、城市和国家经济之外，它们还造成了政治地震。[21]

郊区贫困对唐纳德·特朗普的上位起了关键作用，他利用了郊区贫困工人阶级一触即发的愤怒和不满情绪。根据我的调查，特朗普主要靠白人、蓝领、低学历和老社区居民赢得了2016年的共和党总统初选。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特朗普在初选中获得的选票集中在白人、蓝领“老经济”工作者、高中学历以下人口和住低端移动屋人口更多的郡。[22]

相互重叠的阶层和地理分化让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在阶层上，他的支持者主要是感到自己的经济状况正在恶化的白人、低学历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地理上，他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白人和低学历人群占比大、经济焦虑程度高、工厂和服务业工作聚集的地区。在农村，特朗普获得了61%的选票，而希拉里只有33%；在人口少于25万的城市地区，特朗普和希拉里分别获得了57%和38%的选票；在人口为25万~50万的城市地区，特朗普和希拉里分别获得了52%和34%的选票。支持特朗普的城市地区多于希拉里，前者为260个，后者为120个。但是希拉里获得的城市地区选票数量更多，她赢得了51%的城市选票，特朗普只有44%。支持特朗普的城市地区平均人口仅为42万，而支持希拉里的则为140万。[23]

新城市危机的郊区问题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局面。我们都对选举中的蓝州和红州耳熟能详[24]，但真正将民主党和共和党地区分开的不是州界，而是人口密度。在过去几任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总是在面积大、人口多、更城市化的地区获胜，而共和党候选人则占领了低密度的郊区和面积较小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在2008年、2012年和2016年，民主党赢得了大城市地区的支持，而共和党则在中小型城市获胜。[25]人口密度在总统选举中成了越来越重要的默认分界指标，人口密度低于每平方英里800人的地区一般是支持共和党的红州，高于800人则是支持民主党的蓝州。[26]

然而，两党相争的焦点在于受到经济压迫的“中间地带”。它们位于民主党占领的城市中心和共和党占领的远郊地区之间，是美国总统大选中越来越重要的“临界点地区”。政治研究家杰弗里·塞勒斯认为，红州中的贫困郊区会变蓝，而蓝州中的贫困郊区则会变红，他写道：“红州城市地区中最穷困的社区最容易在政治倾向上与支持共和党的其他地区发生分歧，而蓝州城市地区中最穷困的社区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响应共和党的号召。”换种说法就是，这样的地区更不稳定，更可能持相反立场，也更倾向于为改变现状投票。2012年，罗姆尼争取到了2%的动摇地区的支持，再往前的2008年，奥巴马争取到了更多动摇

地区。[27]特朗普在2016年出人意料的胜利就是因为他在经济贫困郊区的显著优势，尤其是“铁锈地带”地区，帮助他攻下了一直以来都是蓝州阵营的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支持英国脱欧和罗布·福特的也是类似地区，这三件事都明确警示着日益严峻的郊区危机所造成的政治不满。

归根结底，郊区危机反映了很长一段时间廉价经济发展的终结。一直以来，相比在成熟城市修建新地铁、隧道和高楼，在处女地上修路、盖楼或建设其他基础设施更能以极低的成本帮助大众实现美国梦。在20世纪50—90年代，郊区化都是美国工业化经济的完美补充。郊区发展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金经济发展期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备战工作或凯恩斯刺激政策。郊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对洗衣机、烘干机、电视机、沙发、地毯、汽车等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制造业发展，创造了更多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从而进一步拉动需求。[28]当时郊区的散漫扩张是廉价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而现在这一发展模式正走向尾声。

现在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聚集而非分散。虽然还有很多人喜欢住在郊区，但是郊区发展已经跟不上城市化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了。大量宝贵的生产资本和国家财富都被浪费在房屋、公路和散漫扩张的郊区，而没有被投资于知识、科技和人口密集的地区，而后者才是优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郊区还没消亡，但它们已不再是美国梦的典范，也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新城市危机中的郊区问题和城市问题有相似的解决方案：继续发展城市化，并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想要解决郊区危机并恢复郊区经济活力，就得提高郊区的人口密度，让郊区更节能环保，更多功能化，并使郊区和城市之间的交通更便利。不过在我们讨论具体的解决方案之前，有必要了解新城市危机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维度，它发生在全球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大都会地区。

[1] Dis, "The Nixon-Khrushchev 'Kitchen Debate,'" Everything2, April 26, 2000,http://everything2.com/title/The+Nixon-Khrushchev+%2522Kitchen+Deba te%2522.

[2] On dead malls, 参见 Nelson D. Schwartz, "The Economics (and Nostalgia) of Dead Mall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2015, www.nytimes.com/2015/01/04/business/the-economics-and-nostalgia-of-dead-malls.html. The term slumburbia is from Timothy Egan, "Slumburbi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0, 2010,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0/02/10/slumburbia。

[3] Jed Kolko, "How Suburban Are Big American Cities?," FiveThirtyEight,May 21, 2015, 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how-suburban-are-bigamerican-cities.

[4] Jed Kolko, "Urban Revival? Not for Most Americans," JedKolko.com,March 30, 2016, http://jedkolko.com/2016/03/30/urban-revival-notfor-most-americans; Jed Kolko, "City Limits: How Real Is the Urban Jobs Comeback?" JedKolko.com, January 29, 2016, http://jedkolko.com/2016/01/19/city-limits-how-real-is-the-urban-jobs-comeback. See also Karyn Lacy, "The New Sociology of Suburbs: A Research Agenda for Analysis of Emerging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2 (July 2016): 369–384, www.annualreviews.org/doi/full/10.1146/annurevsoc-071312-145657.

[5] Alan Berube, William H. Frey, Alec Friedhoff, Emily Garr, Emilia Istrate,Elizabeth Kneebone, Robert Puentes, Adie Tomer, and Howard Wial, "State of Metropolitan America,"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0, 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010/05/09-metro-america; William H. Frey, "The End of Suburban White Flight,"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23, 2015, www.brookings.edu/blogs/the-avenue/posts/2015/07/23-suburban-white-flight frey.

[6] Elizabeth Kneebone and Alan Berube, Confronting Suburban Poverty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7] Mary O'Hara, "Alan Berube: We Are Moving Poverty to the Suburbs," The Guardian, May 6, 2015, 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5/may/06/alanberube-moving-poverty-to-suburbs.

[8] Elizabeth Kneebone, "The Growth and Spread of Concentrated Poverty,2000 to 2008–2012,"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31, 2014, www.brookings.edu/research/interactives/2014/concentrated-poverty; Richard Florida, "The Living-in-the-Basement Generation," Washington Monthly (November/December 2013), www.washingtonmonthly.com/magazine/november_december_2013/features/the_livinginthebasement_genera047358.php;Kristen Lewis and Sarah Burd-Sharps, "Halve the Gap by 2030: Youth Disconnection in America's Cit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2013, http://ssrc-static.s3.amazonaws.com/moa/MOA-Halve-the-GapALL-10.25.13.pdf.

[9] William H. Frey, "Demographic Reversal: Cities Thrive, Suburbs Sputter,"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e 29, 2012, 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2/06/29-cities-suburbs-frey;

William H. Frey, “Will This Be the Decade of Big City Growth?,”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y 23, 2014, 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4/05/23-decade-of-big-city-growth-frey.

[10] Cody Fuller, “Rockin’ the Suburbs: Home Values in Urban, Suburban, and Rural Areas,” Zillow Research, January 16, 2016, www.zillow.com/research/urban-suburban-rural-values-rents-11714.

[11] Elizabeth Kneebone and Steven Raphael, “City and Suburban Crime Trends in Metropolitan America,”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1;Cameron McWhirter and Gary Fields, “Crime Migrates to Suburbs,”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0, 2012, 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3300404578206873179427496.

[12] 弗格森的数据来自 Elizabeth Kneebone, “Ferguson, MO, Emblematic of Growing Suburban Poverty,” Brookings Institution, August 15, 2014, www.brookings.edu/blogs/the-avenue/posts/2014/08/15-ferguson-suburban-poverty; James Russell, “Ferguson and Failing Suburbs,” Jamessrussell.net, August 17,2015, http://jamessrussell.net/ferguson-and-failing-suburbs; Stephen Bronars,“Half of Ferguson’s Young African-American Men Are Missing,” Forbes,March 18, 2015, www.forbes.com/sites/modeledbehavior/2015/03/18/halfof-fergusons-young-african-american-men-are-missing。

[13] 关于通勤时间和经济流动性的关系，参见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mmuting time and economic mobility, 也可参见 Reid Ewing, Shima Hamidi,James B. Grace, and Yehua Dennis Wei, “Does Urban Sprawl Hold Down Upward Mobility?”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48 (April 2016): 80–88。

[14] 关于向郊区运输本地服务，参见Arthur Nelson as cited in Leigh Gallagher,The End of the Suburbs: Where the American Dream Is Moving (New York:Portfolio Penguin, 2013). 有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参见Laura Bliss, “L.A.’s New ‘Energy Atlas’ Maps: Who Sucks the Most Off the Grid,” CityLab, October 6, 2015, www.citylab.com/housing/2015/10/lasnew-energy-atlas-maps-who-sucks-the-most-off-the-grid/409135. 当然，贝尔市近20%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意味着这里的居民更少地使用空调和电脑等。关于散漫扩张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总成本，参见Todd Litman, “Analysis of Public Policies That Unintentionally Encourage and Subsidize Urban Sprawl,”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for 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 for the New Climate Economy, 2015, http://static.newclimateeconomy.report/wpcontent/uploads/2015/03/public-policies-encourage-sprawl-nce-report.pdf。

[15] Christopher Ingraham, “The Astonishing Human Potential Wasted on Commutes,”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5, 2016, www.washingtonpost. com/news/wonk/wp/2016/02/25/how-much-of-your-life-youre-wasting-onyour-commute.

[16] 关于散漫扩张给居民带来的健康成本，参见Reid Ewing, Gail Meakins,Shima Hamidi, and Arthur C. Nelson,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prawl and Physical Activity, Obesity, and Morbidity: Update and Refinement,”Health and Place 26 (March 2014): 118–126; Reid Ewing and Shima Hamidi, “Measuring Sprawl, 2014,” Smart Growth America, April 2014,www.smartgrowthamerica.org/documents/measuring-sprawl-2014.pdf; Jane E. Brody, “Commuting’s Hidden Co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13,http://well.blogs.nytimes.com/2013/10/28/commutings-hidden-cost.。关于通勤为什么是人们最不喜欢的的日常活动，参见Daniel Kahneman and Alan B. Krueger,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no. 1 (Winter 2006): 3–24。

[17] 关于布鲁克林区，参见 Justin Fox, “Want a Job? Go to Brooklyn,” Bloomberg View, January 21, 2016, www.bloombergview.com/articles/2016-01-21/want-ajob-go-to-brooklyn。关于2007年到2011年间市中心附近区域的就业增长，参见Joseph Cortright, Surging City Center Job Growth (Portland, OR: City Observatory, 2015), http://cityobserva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5/02/Surging-City-Center-Jobs.pdf. 2007年到2011年，市中心的年就业增长率为0.5%，而外围郊区地区仅为0.1%，参见Jed Kolko, “The Urban Jobs Comeback, Continued: Follow the Money,” JedKolko.com, January 20,2016, http://jedkolko.com/2016/01/20/the-urban-jobs-comeback-continuedfollow-the-money。对于大型都会地区（人口超过100万且贡献了全国就业岗位的绝大多数）来说，郊区提供了54%的就业岗位，其中有38%位于临近市中心的人口密度较高的郊区地区，16%位于更偏远、人口分布更稀疏的郊区和远郊地区。参见Kolko, “City Limits.”。

[18] 基于地理学家史蒂芬·希格利对美国最富有的一千个社区的排名，这个排名基于美国人口调查数据，平均家庭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The cutoffis based on geographer Stephen Higley’s rankings of America’s 1,000 richest neighborhoods。The list is based on US Census data on contiguous block groups with mean household incomes of $200,000 or more. Stephen Higley,“The Higley 1000,” Higley1000.com, February 17, 2014, http://higley1000.com/archives/638.

[19] 这些数据来自 Zillow的研究网站www.zillow.com/research/data。正如我在第二章提到的，这些数据不包括如阿拉斯加州、爱达荷州、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缅因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蒙大拿州、新墨西哥州、北达科他州、德克萨斯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这些数据保密州。

[20] Jed Kolko, “No, Suburbs Aren’t All the Same; The Suburbiest Ones Are Growing Fastest,” CityLab, February 5, 2015, www.citylab.com/housing/2015/02/no-suburbs-arent-all-the-same-the-suburbiest-ones-aregrowing-fastest/385183.

[21] Richard Florida, “Welcome to Blueburbia and Other Landmarks on America’s New Map,” Politico (November 2013), 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3/11/welcome-to-blueburbia-and-other-landmarkson-americas-new-map-98957.html; Richard Florida, “The Suburbs Are the New

Swing States," CityLab, November 29, 2013,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3/11/suburbs-are-new-swing-states/7706.

[22] Richard Florida, "The Geography of the Republican Primaries," CityLab,April 12, 2016,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6/04/the-geographyof-the-republican-primaries/477693; Neil Irwin and Josh Katz, "The Geography of Trumpism,"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2016, www.nytimes.com/2016/03/13/upshot/the-geography-of-trumpism.html.

[23] 关于特朗普支持者的阶层分布，参见Andrew Flowers, "Where Trump Got His Edge," FiveThirtyEight, November 11, 2016, 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where-trump-got-his-edge; Jon Huang, Samuel Jacoby, K. K. Rebecca Lai, and Michael Strickland, "Election 2016: Exit Poll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16, 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11/08/us/politics/election-exit-polls.html。关于地理分布，参见Jed Kolko, "The Geography of the 2016 Vote," jedkolko.com, November 11, 2016, http://jedkolko.com/2016/11/11/the-geography-of-the-2016-vote; and Jed Kolko, "Trump Support Was Stronger Where the Economy Is Weaker," FiveThirtyEight,November 10, 2016, 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trump-was-strongerwhere-the-economy-is-weaker。

[24] Andrew Gelman, Red State, Blue State, Rich State, Poor State: Why Americans Vote the Way They D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25] Dave Troy, "The Real Republican Adversary? Population Density," Davetroy.com, November 19, 2012, http://davetroy.com/posts/the-real-republicanadversary-population-density. 同样参见 Richard Florida and Sara Johnson,"What Republicans Are Really Up Against: Population Density," CityLab,November 26, 2012,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2/11/what-republicansare-really-against-population-density/3953.

[26] 我对州级选举的研究显示希拉里得票占比与以下因素正相关：密度（0.71）、城市地区面积占比（0.63）、工资（0.82）、大学毕业生占比（0.77）和创意阶层（0.72）。而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占比则与这些因素负相关：密度（–0.61）、城市地区面积占比（–0.54）、工资（–0.81）和大学毕业生占比（–0.81）。参见Richard Florida, "It's Still About Geography and Class," CityLab, November 17, 2016,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6/11/americas-great-divide-of-class-and-geography/507908/。在市级层面，密度和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得票占比的相关度从2000年的0.61上升到了2016年的0.75。参见Kolko, "Geography of the 2016 Election."。

[27] Jefferey Sellers, "Place,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Ecology of U.S.Metropolitan Areas," in Jefferey Sellers, Daniel Kübler, Alan Walks, and Melanie Walter-Rogg,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Metropolis: Metropolitan Sources of Electoral Behaviour in Eleven Countries (Colchester, UK: ECPR Press, 2013), 37–85. Sellers就他称之为美国政治的"都市化"问题整理了一个时间序列数据库，包含了亚特兰大、伯明翰、辛辛那提、底特律、弗雷斯诺、卡拉马祖、洛杉矶、纽约、费城、西雅图、锡拉丘兹和威奇托的投票数据。关于2016年总统大选，参见Emily Badger,Quoctrung Bui, and Adam Pearce, "This Election Highlighted a Growing Urban-Rural Spli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 2016, www.nytimes.com/2016/11/12/upshot/this-election-highlighted-a-growing-rural-

urbansplit.html; Lazaro Gamio and Dan Keating, "How Trump Redrew the Electoral Map, from Sea to Shining Sea,"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9,2016, 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politics/2016-election/electionresults-from-coast-to-coast。

[28] Eva Jacobs and Stephanie Shipp, "How Family Spending Has Changed in the U.S.," Monthly Labor Review (March 1990): 20–27.

第九章 全球城市化危机

2014年5月，我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办的“可持续城市化”主题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其他演讲嘉宾包括前任巴塞罗那市长和现任负责城市与人类居住问题的联合国人居署署长华安·克洛斯，以及巴黎市长安娜·伊达戈，伊戈达的竞选承诺是解决城市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和提供更多的廉价住房。听众席中有联合国负责城市事务和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务的各组织机构负责人，还有其他顶尖的城市学家。.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市参加了第七届世界城市论坛。来自16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城市学家、领导人和城市规划师出席了会议。会议上通过的《麦德林宣言》指出，城市是我们应对威胁地球的严峻挑战的关键。[1]从麦德林回来后，我就一直在围绕论坛上讨论的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

“城市是我们面临的众多重大挑战的核心，如气候变化、贫困、就业、公共健康、可持续能源和包容性发展。”我在联合国会议发言时说道，“城市化有巨大潜力，如提高生活质量、创造经济机会和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但我们无法单凭城市化本身实现这些目标。应该把城市和可持续城市化作为联合国最重要的议程。”

那次演讲时，本书的主题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明朗。我开始意识到全球城市与城市化危机是新城市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美国严重的城市问题与郊区问题。在21世纪我们将见证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浪潮，全球城市新增人口将达到70亿~80亿，超过目前全球人口总数，并且这些新增人口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21世纪后半叶，人类活动需要的所有基础设施中有超过60%还尚未建成，未来投入建设新城市以及重建旧城市的资金将以万亿计。

问题是，这波铺天盖地的城市化浪潮将产生什么影响？它会像城市乐观派认为的那样带来发展、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像悲观派认为的那样带来更严重的贫困、不平等和环境问题？[2]这一次，正反两派同样都看到了问题的部分关键。

历史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城市化还帮助穷人和工人阶级跃升为中产阶级。但现在，世界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很多城市却碰到了棘手的贫困问题。在东南亚、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于成百上千万涌入新兴城市的人来说，经济机会远远不够。超过8.4亿人（约全球1/10的人口）被困在了快速城市化地区的贫民窟中。[3]问题规模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全球生存状况堪忧的贫民窟居民人口总数约等于美国和欧盟的人口之和。相较于美日欧等最发达国家地区与最欠发达国家地区之间“消失的中层”问题，美国的内部分化就是小巫见大巫，这就是新城市危机的全球问题。

我们这些有幸生活在世界发达经济体城市的人理所当然地享受了城市化的好处，我们的城市化实现于多年以前。现在，正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进行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史无前例。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只完成了一波城市化浪潮，即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它让全国超过8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还有两波城市化浪潮在等着我们，其中一波是正加速发展的中国的城市化——到2025年，中国将会有超过200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另一波即将发生在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4]

今天大概有一半的世界人口（约35亿人）生活在城市地区。而仅仅在200年前，城市地区人口占比还只有3%。这一数字在工业化发展100年后的1900年上升至15%，到1950年又增加了一倍，达到30%，人数约为10亿。在未来一到两个世纪内，世界城市人口将增长近两倍，达到近100亿，占全球110亿~120亿总人口的85%。其中约86亿城市人口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很多城市还尚未建成），只有12亿左右的人口将生活在发达国家城市地区。[5]

为了更充分地理解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看之前的情况。在1800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北京；1900年，这样的城市有12个；195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约6倍，达到83个；2005年，这一数字爆炸性地增长到400；今天，全世界有超过500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1950年，全世界只有两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都市——纽约和东京；今天这样的城市有28个；到2030年将达到约40个。一个合理推测是，到2150年，全世界可能会出现10个人口在5000万~1亿的特大都市，届时，印度的大城市德里、加尔各答和孟加拉国的达卡的人口将达到两亿，超过现在全世界除了前五大国家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6]

财富和生产力的巨大差异导致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发达国家城市产生了分化。有个生动的指标反映了这一差异：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经典产品iPhone（苹果手机）等于普通城市工人时薪的多少倍。[7] 在2015年的纽约市，一个普通城市工人工作24个小时就能购买一台内存16G的iPhone 6；而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孟买需要工作350个小时，在雅加达为460个小时，而在基辅则需要超过600个小时。

人均经济产出能更系统性地衡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差距。不幸的是，常用来比较各国经济状况、薪水、收入和生产力差异的统计数据在城市层面往往很难获取。虽然很多国家也统计城市地区的数据，但各国对城市地区的定义和获取经济数据的方式存在差异。因此对比不同国家的城市数据基本没有意义，即便是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等发达经济体的城市数据。而很多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则根本没有可靠的经济数据。我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是想找到成功城市化的驱动力，就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解决办法的。布鲁金斯学会在《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中，用牛津经济研究院和穆迪公司的数据估测了全世界前300大城市的经济产出。[8] 我和我的团队用这些经济产出数据与人口数据一起估算了人均经济产出。数据虽然不完美，但对全球城市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产出提供了粗略衡量。基于这些数据，我们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把300个城市分为四组，它们覆盖了从最发达的西方城市到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城市。

第一组是全球最富裕的城市地区，它们是赢者通吃城市化的最大赢家，包括超级城市纽约、伦敦、洛杉矶、巴黎、新加坡和香港，知识中心旧金山、波士顿和华盛顿，以及先进发展中国家中一些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这100多个城市地区的人均经济产出介于45000~94000美元之间，虽然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却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16%。

第二组是发达国家地区中较富裕的城市地区，人均经济产出为30000~45000美元，包括巴塞罗那、柏林、哥本哈根、马德里、墨尔本、迈阿密、米兰、罗马、首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等。这100个城市地区也占世界总人口的4%，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11%。

第三组是较不富裕的城市地区，人均经济产出为15000~30000美元，包括加的夫、利物浦、那不勒斯以及正在迎头赶上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如曼谷、北京、波哥大、瓜达拉哈拉、伊斯坦布尔、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上海等。这70个城市地区占世界人口的6%，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9%。

第四组是最贫困的城市地区，人均经济产出仅为4500~15000美元，它们多为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包含了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城市地区，如马尼拉、雅加达、开罗、亚历山大、德班、麦德林、卡利、孟买、加尔各答、德里以及很多正在城市化的中国贫困地区。这1/3左右的城市地区占了世界人口的4.3%，但仅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3%。

虽然贫困和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也出现在前三组城市地区，但它显然在第四组城市地区更严重。东南亚有5亿贫民窟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2亿，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有1.1亿。[9]全世界每天约有20万人迁往城市，到2020年，城市贫民窟人口将达到10亿。在快速城市化

的进程中，大量人口缺少基本服务设施，如冲水厕所、下水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卫生设施，以及清洁水资源和电力供应。举例来说，非洲只有约一半（54%）的城市居民拥有我们在西方世界习以为常的卫生设施，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超过2/3的城市居民没有基本的电力供应。世界上最不幸地区和最幸运地区（包括西方城市）在经济资源和生活质量上存在惊人差别。对于约10亿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来说，城市化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许多贫民窟没能提供经济上升的渠道，而是成了自我强化的贫困陷阱。从城市边缘的棚户区和违章居住区、市中心的出租屋和破败公共住房到贫困乡村，贫民窟的居民挤在狭窄破旧的房子里，缺少经济机会。贫民窟往往分布在城市边缘，在地理上十分孤立，远离经济活动。很多地区已经证明，传统经济政策和投资无法扭转现状。举一个近期的例子：2009年，印度宣布采取广泛措施，旨在5年内大力消除贫民窟，但仅仅两年后领导人就不得不承认，在2011—2017年贫民窟人口将增长12%。[10]

巨型贫民窟之所以长期持续存在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今天绝大部分正在快速城市化的地区都是世界上最贫困和最不发达的地区，而一个世纪前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地区则是最富裕和最发达的地区。第二，如今世界更大，人口更多，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往往是世界人口中心。第三，很多城市化是人们为了躲避战争、冲突、极端暴力和自然灾害而集体迁移到其他城市而产生的[11]，这类大规模人口迁徙很容易超出城市有效吸纳新增人口的能力，所以大量新移民最后只能挤在巨型贫民窟里。

第四，全球化本身也是一个大问题。广泛的全球贸易系统的发展打破了城市、本地农业和本地工业之间的传统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平衡发展。以前，城市为当地农业提供市场。但现在，城市里有大量全球食品连锁商店，它们不再依赖周围地区提供的农产品。快速城市化的国际化都市中，人们可以以低廉价格买到从其他地方进口的食物。[12]全球化还完全打破了城市和本地化制造业发展的联系。以前城市里

有一系列围绕居民衣食住行开展的基础工业活动，如开采、制砖、伐木、食品处理等。在现在的全球化经济中，所有这些都能以低廉的价格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工业活动不再零散分布在全世界的城市中，而是越来越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地方。

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地区无法像从前那样以传统工农业为基础发展经济，它们提供的工作种类也大大减少，无力满足成百上千万新移民实现经济阶层向上流动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发达国家考虑全球化影响时，想到的是被廉价外国工厂抢走的制造业工作。但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来说，城市化实际上切断了工人经济发展的通道。

全球城市危机的关键问题在于，在这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迁移浪潮中，城市化已经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了。对于过去几百年的西欧和美国城市来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紧密结合。然而现在它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出现了一个恼人的新现象："没有增长的城市化"。[13]

一项研究追踪了过去约5个世纪城市化与发展的关系，具体说明了两者的脱节。研究发现，从1500年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城市化与发展的关系都十分松散。在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化爆发性增长之前，世界人均经济产出每增长300%，城市化只增长12%。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才变得紧密相关，人均经济产出每增长300%，城市化增长20%。但这一结果可能是发达国家广泛工业化的产物，在这期间，发展中国家还未开始城市化，十分贫穷。到了2010年，这一关系又发生了改变。现在快速城市化的是穷国家而不是富国家，而城市化和增长的关系与16世纪很像，人均经济产出每增长300%，城市化率的增长只有13%。总之，我们不能继续假设城市化和发展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世界上很多快速城市化的地区已经不是这样了。[14]

虽然城市化不能确保经济繁荣，但它仍是更优选。即便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地区存在严重的贫困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它们仍比农村边远地区拥有更显著的经济优势，哪怕是最穷的城市地区的经济产出也超过边远地区。为了研究这种差异，我和我的团队发明了一个简单指标——城市产出比，它衡量的是城市地区和其所在国的人均经济产出之比。[15]

在典型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大城市，城市产出比介于1~1.5之间，说明城市地区的经济产出至少与其所在国家非城市地区的产出持平，最多高出50%。发达国家中，城市产出比最高的是硅谷所在地圣何塞，达到了1.6，伦敦为1.5，波士顿和旧金山为1.4，纽约为1.3，洛杉矶和巴塞罗那为1.2，东京、法兰克福和芝加哥介于1.1与1.2之间。

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城市产出比非常高。有超过80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人均经济产出是其所在国的两倍以上，包括北京、伊斯坦布尔、孟买、圣保罗和上海等。约50个城市地区的人均经济产出比其他地区高3~9倍，有12个城市地区的经济产出比其他地区高10倍以上，包括马尼拉（13.6）、曼谷（12.6）和利马（12.6）等。

但布鲁金斯学会在《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中的数据仅覆盖了全世界最大的300个城市地区，这些地方仅占世界人口的不足1/3（31%）。虽然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没有覆盖到很多其他城市地区，包括最穷、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但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粗略估计。我和兰德公司的计算地理学专家提姆·古尔登一起，利用美国航空航天局及其他研究机构卫星图中夜晚的灯光对全世界每个城市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城市产出进行了间接估测。[16]把我们称为“光地区产出”的光发射数据和人口统计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得到城市产出比，比较城市地区和国家的人均经济产出（包含不确定的城市地区）。图9.1的地图展示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注意，反映高城市产出比的大圈出现在非洲、东南亚和其他快速城市化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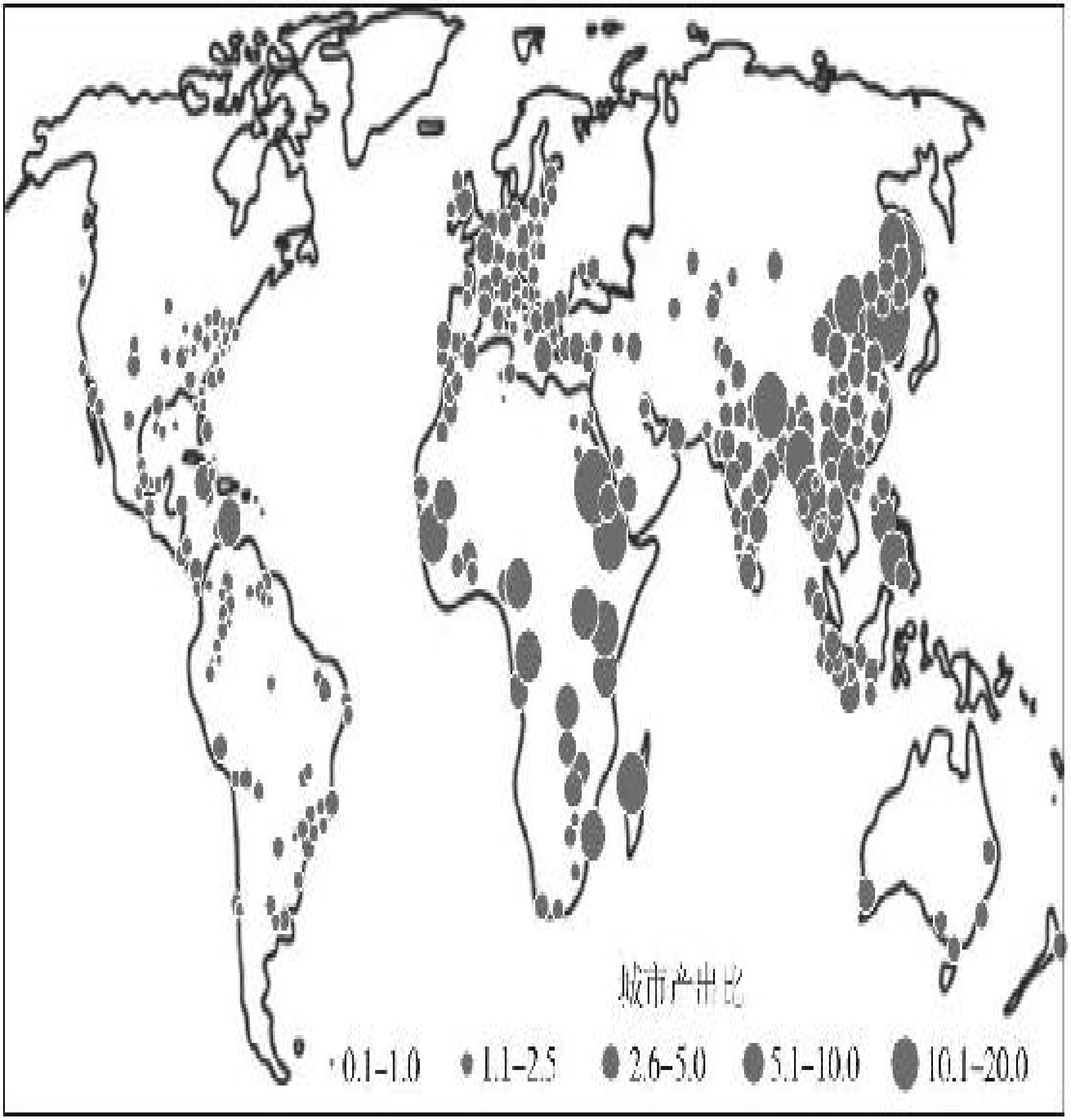


图9.1 城市产出的比较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约瑟夫·帕里拉、耶苏·莱亚尔·特鲁希略、艾伦·贝鲁布和陶然，《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布鲁金斯学会，2015年，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2015/01/22-global-metro-monitor；以及来自理查德·佛罗里达、夏洛塔·梅兰德和提姆·古尔登的夜间灯光数据，全球大都市：基于夜间卫星图像的城市中心经济活动评估，《专业地理学家》期刊，2010年。

我们在发展中国家中发现了125个城市产出比超过3的城市地区，其中有40个地区（主要在亚洲和非洲）的比值超过5，7个地区（仍然在亚洲和非洲）的比值超过10。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城市产出比都这么高，但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比值小于1。即便在地球上最贫困、最不发达的地区，城市中心的生活质量仍然比乡村好。怀疑论者可能会反对说，这种优势更能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而不是它们城市的高生产力。不过广泛规律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不管城市化有多少弊端，它仍是更优的选择。

但是我们要怎样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并重新将城市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联系起来呢?

答案是，通过释放城市居民的活力和才能，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发展。“找到贫困的‘原因’是行不通的，因为贫困没有原因，繁荣才有原因，”简·雅各布斯写道，“贫困和经济萧条就是缺乏经济发展而已。”[17]如果缺乏解放人和社区创造力的机制，或者存在阻碍创造力发挥的不良组织，贫困就会出现。反之，能利用人的创造力的机制和组织可以促进繁荣。如果贫困社区的居民能够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技能，他们自己和所在社区的经济状况都会得到改善。

1972年，约翰·F.C.特纳在一篇题目特别的文章“作为动词的住房”中比较了传统自上而下的政府建造廉价房的模式（他称之为“作为名词的住房”）以及自下而上的穷人自己建造住房的模式（他称之为“作为动词的住房”）。[18]在第一种模式中，穷人被孤立，离经济机会更远，贫困进一步集中，从而带来持续失败。而在第二种模式中，穷人聚集在自己喜欢（或需要）的地方，更靠近经济机会。

记者道格·桑德斯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强调“落脚城市”的作用。他认为“落脚城市”是帮助从农村来的新移民磨炼技能的地方，比如重庆的六公里，它位于中国中部这座1000万人口大城市的郊区，从前是个贫困乡村。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人们纷纷从周边农村涌入，来这里务工。由于工作有限，人们开始做起非正式的小生

意，还开始自己建造房屋，很少有合法的。桑德斯说，今天的六公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群落，它的12万居民已经完全融入重庆市。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城市外围蓬勃发展的贫民窟，都是临时建筑，街上随处可见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垃圾，但它也是创业的大熔炉，有各种小商贩、小工厂、新移民在这里生产纺织品、塑料、木制品，甚至摩托车零部件。六公里的居民告诉桑德斯："在这里，只要你找对了谋生方式，就能让你的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19]

越来越多的研究记录了自下而上的模式在推动贫困地区发展方面的潜力。人类学家詹妮丝·珀尔曼研究了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半个世纪中，有140万人口曾生活在这里的1200多个社区中。[20]人们普遍认为贫民窟是持续贫困的陷阱，珀尔曼的研究却发现，它们可以变成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载体。20世纪60年代受访居民的孙辈中，有一半人到21世纪初住上了条件更好的房子，有些是租的，有些是买的，但大部分房子都有电、自来水、室内厕所，很多房子还安装了空调、洗衣机甚至平面电视。贫民窟家庭的教育水平在代与代之间提升速度很快，在20世纪60年代，受访居民的父母辈中有3/4的父亲和90%的母亲都不会读写；2000年，受访居民的子女文盲率只有6%，他们的孙辈则全部都能读写，多数都有高中学历，还有不少人上了大学。贫民窟居民没有陷入注定的贫困，他们基本上实现了自我提升，还发展了自己的社区。

圣菲研究所和国际贫民窟居民组织的研究则更广泛地证明了这种自下而上模式的有效性，他们让来自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社区居民记录自己的日常活动，开始是在传统纸质媒介上记录，后来则通过移动设备记录。研究发现，虽然贫困社区的穷人有发展潜力，但日常生活的重负让他们无法有效利用自己的能力。他们没有发达国家的人们习以为常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分工，因此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应付日常生活的急迫需求：自己取水、交换食物或自己准备食物、长距离步行或乘坐最基本的交通工具。研究结论是，要打破这个循环、提高贫民窟的生产力，就要让城市穷人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

间。[21]在哥伦比亚我常听人提到著名自行车手内罗·昆塔纳的故事，他每天在一辆廉价自行车上骑行10英里山路上下学，就这样锻炼出卓越的爬坡能力。不过他是个特例，大部分人都不能像他这样有效利用满足基本需求的时间。

另一项研究发现，巴拿马贫困地区的企业家同样面临缺少时间和资源的问题。他们有很多创新的商业想法，但要么是没有钱来完善这些想法，要么是没有时间等待市场发展成熟。这种状况十分堪忧，因为在传统就业岗位不足，并且穷人找工作时面临较严重歧视的地区，自主创业是对传统就业市场的重要补充。[22]

各项研究都说明，穷人并不缺少技能或创新能力，而是缺少能有效利用它们的时间和资源。贫困社区需要建设更多基础设施，帮助居民与社区利用和发展自己的能力。

更糟糕的是，很多快速城市化地区的散漫扩张孤立了穷人，斩断了他们的经济机会。大量从农村地区涌入新兴城市的穷人聚集在城市郊区的贫民窟和临时居所，远离市中心的发展机会，这种情况在非洲尤甚。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密集，如开罗、德里、加尔各答、马尼拉和孟买，但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正以远高于西方发达城市的速度向外散漫扩张。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什洛莫·安格尔的研究说明，在1990—2015年的25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总城市人口数量翻了一倍，但占地面积增长了350%，人口密度实际上大幅下降52.5%。如果它们仍以这样的速度扩张，从现在到2050年，这些城市的占地面积还将扩大4倍。[23]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提高连通性。增加公路和基本交通等基础设施，穷人就能靠近发展机会，城市的市场规模也能得以扩大。非法居住场所占据了大量空间，它们的平均街区面积大于发达城市居民区，而道路面积则相对不足。例如，在拥有700万人口的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道路仅占城市面积的12%，远低于发达城市的比例。

街道是全球贫民窟经济的转型和升级的关键要素，它们不仅能让居民在城市各地穿行，还是建设其他重要实体基础设施的前提，如水管、下水道和电线等。另外，街道还将贫民窟及其居民与城市的种种便利条件相连。联合国人居署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街道能促进经济活动的开展，它能吸引商铺和服务业，增强居民对居住社区的认同感，提高社区安全感，带来更规范的发展”。[24] 正规的街道地址能将非法占据的住宅变成合法住宅和正常运转的社区，这一转变又能促进商业发展并提高流动性，因为房子可以交易了。随着社区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贫民窟就能从孤立的贫困陷阱转化为通向经济机会之路，从而更全面地融入城市经济生活。

交通系统也能有力增强社区之间的连通性，并连通居民与经济机会。亚的斯亚贝巴是一个拥有350万人口的埃塞俄比亚城市，轻轨向当地贫民窟居民开放了经济机会，提高了轻轨站周边的人口密度，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还降低了当地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对汽车的依赖度。[25]

传统轨道交通不是唯一的方式，其他更廉价、更符合当地情况的交通方式也可以增强社区连通性。2011年我和创意阶层咨询公司的同事参与评选了首届“菲利普斯宜居城市奖”，三个获奖创意之一是“遮阳站”，在坎帕拉、乌干达和其他快速发展的非洲城市，它不仅可以用来遮阳避雨，还能作为小型巴士和简易公交车的车站，这些交通工具给居民出行提供了便利。

我在麦德林还看到了一些提高当地连通性的巧妙方式。不久以前，麦德林还被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巴和他臭名昭著的麦德林贩毒集团控制，是世界上最混乱暴力的城市之一。13区那时是麦德林最贫困危险的社区，由于海拔的原因，它远离市中心、就业和教育资源，那里的12000名居民要穿过相当于28层楼高的斜坡和楼梯才能进出社区。山坡上其他拉丁裔贫困社区的居民则每天要坐长达4个小时的巴士上下班。后来，市政府安装了连通13区和城市其他地区的户外电梯，以及连通其他贫民窟和市中心的空中缆车。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社区群

体将电梯和缆车站周边区域改造为生机勃勃的公共空间，商业活动、社会与公共服务也随之发展起来。这些小的改进把孤立且长期贫困的贫民窟变成了更安全、功能更完善和经济更连通的社区。2012年，麦德林被城市土地学会、花旗银行和《华尔街日报》评选为年度创新城市。[26]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基础设施的战略性投资有利于连通贫民窟居民和就业机会，充分利用居民的才能和创造力，把城市孤立和贫穷的恶性循环转化为城市进步的良性循环。

城市新居民、社区与当地政府可以通过很多努力来促进发展，但是光靠他们是不够的，国际发展政策必须以城市和城市建设为核心，毕竟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根源在于城市而非国家。2015年，联合国将“包容、安全、有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作为17个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27]，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但是要解决这些严重问题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全球城市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它包含并影响了如天气变化、能源使用、贫困和经济机会等各类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只有学会建设更有生产力、更繁荣、更可持续和更包容的城市，我们才能解决其他挑战。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金钱，还有方法、信息和数据。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与医药、法律、工程和商业等几乎其他所有领域相比，在城市学领域，告诉市长和城市建造者如何建设社区与城市的系统性培训少之又少。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得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由于缺少追踪监控全球城市地区发展的基本数据，我们甚至无法鉴别什么方法可行，什么方法不可行。可靠、连贯和完全可比的数据对于我们重建城市化和提高生活水平之间的连接十分重要。

在这方面，城市学可以借鉴医药学的发展经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左右，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开始加强医药与科学研究的联系，并制定了医生、医学专家和公共健康官员共同遵守的最高水准的临床协议

书。医生在医学院要学习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其他领域的知识，还要作为实习生接受大量的在职培训，并定期持续地参加会议。新药和医学干预方式要经过科学研究和临床试验，全球医药和公共健康机构网络保证新知识能得以快速高效地传播。我们应有类似的机构来培养城市建设者，并建立类似的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全流程，将基础数据和最佳实践中提取的先进知识输送到全球的市长、社区建设者和城市领导人手中。

在22世纪，我们投入新建与重建城市的资金将超过人类有史以来在这方面花费资金的总和。但我们只有给予城市应有的关注和它们迫切需要的资源与投资，城市才能成为人类未来的发展希望之光。

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

[1] Medellín Declaration, “Equity as a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联合国人居署, Seventh World Urban Forum, April 2014,http://wuf7.unhabitat.org/Media/Default/PDF/Medell%C3%ADn%20 Declaration.pdf。

[2] Joseph Parilla, Jesus Leal Trujillo, Alan Berube, and Tao Ran, Global Metro Monitor,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5, 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2015/01/22-global-metro-monitor.

[3]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定义，贫民窟是居民缺乏以下一种或多种资源的地方：清洁水、厕所、安全的住房、充足的居住空间（居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人数不超过两个）、不被迫迁或驱逐的合理保障。参见联合国人居署,Streets as Tools for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Slums: A Street-Led Approach to Citywide Slum Upgrading, 联合国人居署, 2012, http://unhabitat.org/books/streets-as-tools-for-urban-transformation-in-slums, 5。

[4]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Urban World: Mapping the Economic Power of Cities, March 2011, www.mckinsey.com/insights/urbanization/urban_world.

[5] Brandon Fuller and Paul Romer, “Urbanization as Opportunity,” World Bank, 2013,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013/11/18868564/urbanization-opportunity, 1–13.

[6] 关于到2030年的数据预测，参见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Metropolitan Century: Understanding Urbanis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Paris: OECD, 2015), www.oecd.org/greengrowth/themetropolitan-century-9789264228733-en.htm。关于到2150年的数据预测，参见Robert H. Samet, “Complexity, the Science of Cities, and LongRange Futures,” Futures 47 (2013): 49–58。

[7] 使用的参照物是2015年16GB的iPhone. 参见The comparison is for a 16GB iPhone 6 in 2015。参见 Catey Hill, “This Is How Long It Takes to Pay for an iPhone in These Cities,” Marketwatch, September 24, 2015, www.marketwatch.com/story/this-is-how-long-it-takes-to-pay-for-an-iphone-inthese-cities-2015-09-24。

[8] Parilla et al., Global Metro Monitor.

[9] 联合国人居署，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2/2013: Prosperity of C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http://mirror.unhabitat.org/pmss/listItemDetails.aspx?publicationID=3387。好消息是发展中国家中在贫民窟生活的城市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39%下降到2010年的32%，这意味着约2.27亿贫民窟人口获得了更清洁的水和卫生资源与更好的住房。坏消息是全球贫民窟人口总量与发展中国家急剧上升的人口同步上升了。参见联合国人居署，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0/2011: Bridging the Urban Divide(New York: Routledge, 2010),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11143016_alt.pdf, 7。也参见联合国人居署，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merging Futures, World Cities Report 2016, http://wcr.unhabitat.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6/2016/05/WCR-%20FullReport-2016.pdf; Eugenie L. Birch, Shahana Chattaraj, and Susan M.Wachter, eds., Slums: How Informal Real Estate Markets Work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10] “UPA’s Target: A Slum-Free India in 5 Years,” The Times of India, June 5,2009,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UPAs-target-A-slum-freeIndia-in-5-years/articleshow/4618346.cms?referral=PM.

[11] Benjamin Marx, Thomas Stoker, and Tavneet Suri, “The Economics of Slum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4 (2013): 187–210.

[12] 关于这一点，参见Edward Glaeser, “A World of Citi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Urbanization in Poorer Countries,” Paper no. 19745,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3, www.nber.org/papers/w19745;Richard Florida, “Why So Many Mega-Cities Remain So Poor,” CityLab,January 16, 2014, www.citylab.com/work/2014/01/why-so-many-megacities-remain-so-poor/8083.

[13] Remi Jedwab and Dietrich Vollrath, “Urbanization Without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7 (July 2015): 1–94.

[14] Ibid.; Richard Florida, “The Problem of Urbanization Without Economic Growth” CityLab, June 12, 2015, www.citylab.com/work/2015/06/theproblem-of-urbanization-without-economic-growth/395648.

[15] Richard Florida, “Why Big Cities Matter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ityLab,January 14, 2014, www.citylab.com/work/2014/01/why-big-cities-matterdeveloping-world/6025.

[16] 数据来自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Tim Gulden, “Global Metropolis: Assessing Economic Activity in Urban Centers Based on Nighttime Satellite Image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4, no. 2 (2010): 178–187。关于利用卫星数据估计经济产出，参见J. Vernon Henderson, Adam Storeygard, and David N. Weil, “Measur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Outer Spa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no. 2 (2012): 994–1028. As they note, “Night lights data are available at a far greater degree of geographicfineness than is attainable in any standard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17] Jane Jacobs, The Economy of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18] John F.C. Turner, “Housing as a Verb,” in John F.C. Turner and Robert Fichter, eds., Freedom to Build: Dweller Control of the Housing Process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19] Doug Saunders, Arrival City: How the Largest Migration in History Is Reshaping Our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2010); Doug Saunders, “Liu Gong Li: Inside a Chinese Arrival City,” Arrival City video, n.d., http://arrivalcity.net/video.

[20] Janice Perlman, Favela: Four Decades of Living on the Edge in Rio de Janeir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nice Perlman, “Global Urbanization and the Resources of Informality: Moving from Despair to Hope,” Presented at the Humanity, Sustainable Nature: Our Responsibility Workshop, Vatican, May 2–6, 2014.

[21] “SFI Takes First Steps Toward a Science of Slums,” Santa Fe Institute,February 6, 2013, www.santafe.edu/news/item/gates-slums-announce;Rebecca Ruiz, “Scientists Look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lums Devise a New Way to Look at Big Data,” Txchnologist.com, January 22, 2013,http://txchnologist.com/post/41201839670/scientists-looking-to-solve-theproblem-of-slums; Luis Bettencourt, “Mass Urbanization Could Lead to Unprecedented Human Creativity, but Only If We Do It Right,” Huffington Post, August 29, 2014, www.huffingtonpost.com/luis-bettencourt/massurbanization-creativity_b_5670222.html?1409329471.

[22] 研究呼吁通过小额拨款或企业孵化器的方式扶持城市贫困企业家发展和扩大初创企业。Laura Doering, “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somorphism: Poverty and Market Creativity in Panama,”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2, no. 3 (Fall 2016):235–264; Phyllis Korkki, “Attacking Poverty to Foster Creativity in Entrepreneurs,”New York Times, March 12, 2016, www.nytimes.com/2016/03/13/business/attacking-poverty-to-foster-creativity-in-entrepreneurs.html.

[23] 有关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和密度的数据，以及本段内容都来自Shlomo Angel, Atlas of Urban Expansion,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2016。

[24] 联合国人居署, Streets as Tools for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Slums。

[25] Mark Swilling, “The Curse of Urban Sprawl: How Cities Grow and Why This Has to Change,” The Guardian, July 12, 2016, 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6/jul/12/urban-sprawl-how-cities-grow-change-sustainability-urbanage.

[26] Letty Reimerink, “Medellín Made Urban Escalators Famous, but Have They Had Any Impact?,” Citiscope, July 24, 2014, http://citiscope.org/story/2014/medellin-made-urban-escalators-

famous-have-they-had-any-impact; “City of the Year,” Wall Street Journal Magazine，2012，http://online.wsj.com/ad/cityoftheyear.

[27]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是联合国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1个，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第十章 惠及全民的城市化

你上次看到国家领导人把城市或城市政策列为重要议程是什么时候？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生长在城市，自然十分关心城市问题，但奥巴马政府也没有在城市政策上取得什么进展。2016年有两位前市长参与了民主党党内初选——佛蒙特州伯灵顿的前市长伯尼·桑德斯和前巴尔的摩市长马丁·奥马利。另外，里士满前市长蒂姆·凯恩加入了希拉里的竞选阵营。2016年民主党党内初选和总统竞选中，除了我协助奥马利起草的有关城市政策的呼吁，几乎再没人提到城市政策。上一次有关城市问题的严肃国家对话还要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旧城市危机时期，有的城市爆发暴乱，有的濒临财政崩溃。现在特朗普和其他保守派政客谈到城市问题时，都在指责自由主义在解决城市长期贫困与犯罪问题方面的无能。现在与实际城市政策最相关的呼吁就是通过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发展。[1]

城市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政策制定者却对它如此忽视，这种强烈反差令人忧心。正如前面章节提到的，经济发展的实力取决于人才、企业和其他经济资产在城市的聚集。城市是科技创新、财富创造、社会进步，以及培养开放性思维、进步价值观与政治自由思想的重要平台，它还是我们试行新政策、激发创造活力、创造高薪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佳实验室。

但正如前面章节提到的，城市面临的深刻挑战可能影响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聚集力在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分裂了我们。赢者通吃城市化意味着少数赢家获得绝大多数的创新和经济发展成果，而其他大多数地区发展停滞，被赢家远远抛在身后。随着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社区的消亡，城市、郊区和整个美国都变成了一块由集中优势地区和集中劣势地区构成的拼布。

新城市危机不仅是孤立的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危机，它也是当代城市化知识资本主义的核心危机，影响范围覆盖全美国——从超级城市、科技中心到“铁锈地带”老工业城市和“太阳地带”散漫扩张的城市地区。图10.1和表10.1展示了美国各大城市地区的新城市危机指数。虽然没有一个单独的指标能捕捉新城市危机的全貌，但这一综合性指标衡量了危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经济隔离、薪酬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和高住房成本。

一方面，正如我们所料，危机在前两大超级城市和领先科技中心最严重：超级城市洛杉矶的指数最高，纽约第二，旧金山第三。科技中心圣迭戈、波士顿和奥斯汀也排在前十。更详尽的统计结果巩固了这个结论——新城市危机指数和城市规模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还与高科技行业的聚集、创意阶层人口占比、大学毕业生人口占比、经济产出、收入和薪酬水平呈正比。新城市危机也与美国的政治分化密切相关——它与2016年希拉里支持者的占比呈显著正相关，与特朗普支持者的占比呈负相关。我们再次看到，新城市危机是人口更密集、经济更发达、更自由主义、受教育程度更高、高科技发展程度更高，以及拥有更多创意阶层群体的大城市地区的基本特征。[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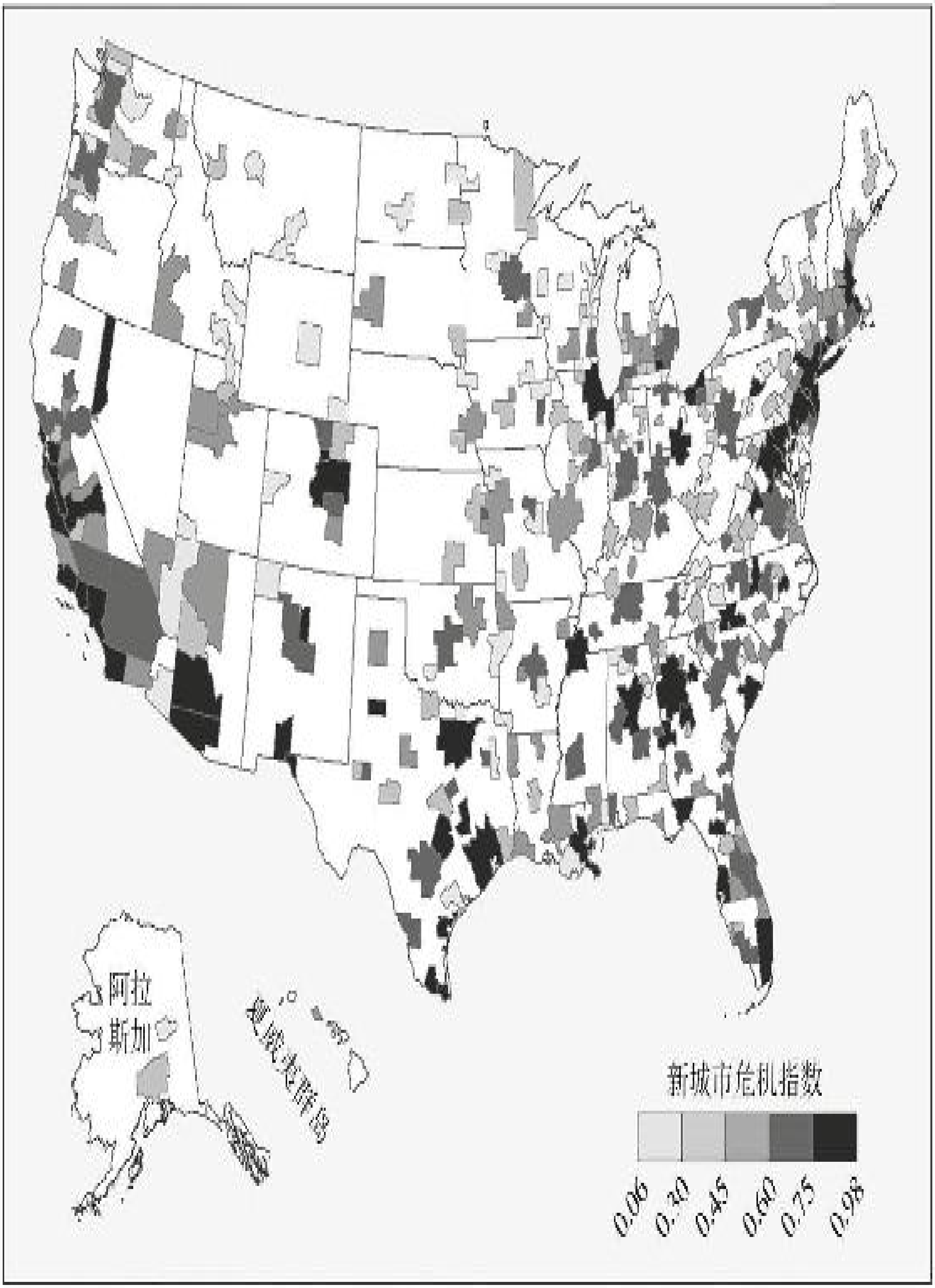

阿拉
斯加
夏威夷群岛
新城市危机指数
0.06
0.30
0.45
0.60
0.75
0.98

图10.1 新城市危机指数（1）

表10.1 新城市危机指数（2）

排名	大都会区	新城市危机指数	整体排名
1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0.972	2
2	纽约－北新泽西－长岛	0.967	3
3	旧金山－奥克兰－菲蒙	0.922	6
4	圣迭戈－卡尔斯巴德－圣马科斯	0.884	10
5	芝加哥－内伯威尔－乔利埃特	0.878	12
6	迈阿密－劳德代尔堡－波姆庞帕诺滩	0.875	14
7	波士顿－剑桥－昆西	0.874	15
8	费城－卡姆登－威尔明顿	0.852	18
9	奥斯汀－朗德岩克	0.845	20
10	孟菲斯	0.842	21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另一方面，危机也出现在美国众多其他地区。芝加哥、迈阿密和孟菲斯也位列新城市危机指标排行榜的前十，“太阳地带”的达拉斯、

休斯敦、夏洛特、亚特兰大、菲尼克斯、奥兰多和纳什维尔排名稍后，“铁锈地带”的克利夫兰、密尔沃基、底特律排名靠前。如果把较小城市地区也包括在内，新城市危机指标数最高的是纽约州外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诺瓦克地区，圣塔芭芭拉、弗雷斯诺、特伦顿、里诺也排名靠前，其他一些小型大学城也是。

新城市危机影响范围之广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经济焦虑持续恶化。郊区发展模式曾是美国梦的基石，而现在它的瓦解重创了中产阶级群体，还让穷人和弱势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也觉得自己没有以前富足了，因为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保障自己和后代未来的稳定生活变得越来越昂贵，也越来越困难。

实际上，美国经济之所以无法从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甚至陷入“长期停滞”，主要就是因为新城市危机。“长期停滞”的概念最早是指经济体失去提高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创造力、经济增长和就业。而如今，用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的话说，我们陷入了“新萧条”时代，经济复苏速度不理想，高薪就业岗位也不足以重振广大的中产阶级群体。[3]

包括萨默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解决当前经济困境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增加政府基建支出来刺激经济，这个想法是有成功历史先例的。[4] 19世纪，运河和铁路将美国连为一体，拓展疆土，刺激经济发展与创新。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有轨电车和地铁进一步刺激城市发展，拓展城市的人口容量。20世纪中期，对公路和个人住房的大量投资带来大规模郊区化发展，经济增长期也随之延长。

现在，加大公路和桥梁投资也许能短暂地刺激经济，但很难带来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些胡乱安排的基建项目，而是能促进聚集化、集中化城市发展的战略性投资。若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重振经济，就必须成为更远大的聚集化与城市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新城市危机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从很多方面标志了大规模美国拓荒潮的终结。1893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的著名演讲中说：“自从哥伦布的船队驶入新世界水域的第一天开始，美国人就一直在永不停歇地拓荒，这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使命。”他说，美国的西部边疆终于关闭了，国家的基础时代也随之终结。然而，事实证明他言之过早，在那之后的一个世纪，用历史学家肯尼思·杰克逊的话说，郊区的“马唐草边疆”成为美国新的增长中心。[5] 新城市危机标志着这段漫长的廉价外向型增长时代的终结。

如今向外扩张已经不能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了，这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要重振美国经济，就要实现城市和郊区的聚集化和密集发展。与上个时代的廉价扩张型增长相比，这种再城市化所需的投入更高。提高城市发展的密度以满足聚集需要，修建交通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来巩固发展，重建高密度郊区，按需提供经济适用住房等，这些需要投入的成本都远高于修路和随意建造郊区独立屋。

除了高成本之外，美国社会始于托马斯·杰斐逊的田园幻想的反城市偏见根深蒂固，再城市化明显与之相悖。反城市化偏见仍深深根植在国家立法机构和国会中，给予了郊区和农村地区过多的权力。[6] 偏见被一种由来已久的保守派主张所削弱了，即城市是精英化、浪费、放荡、犯罪的代名词，也是导致社会瓦解和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而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强化了这种偏见，即传统美国梦的经济适用住房更主要分布在散漫扩张的保守地区，而不是密集和知识型的自由地区（2015年，蓝州的平均房价几乎是红州的两倍，分别为每平方英尺227美元和119美元）。[7]

重振政治决心来应对新城市危机并不是件容易事，在如今特朗普执政、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但现在是美国发展的必要转折时刻，这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所以，我们应怎样应对新城市危机，才能把经济和社会带回正轨？

我不是第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但此前我们对新城市危机的了解一直非常片面，提出来的战略和方案很不完整，难以全面应对危机中方方面面的深层挑战。正如很多人所说，我们必须要克服我称之为新城市卢德主义的保守“邻避”冲动，因为它不利于提高城市创新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聚集度和密度。当然，也应该改革过于严苛、不利于提高聚集度的分区和建筑法规。毫无疑问，城市领导人应当获得更多权力来治理城市。但这些还不够，要想全面应对新城市危机，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要解决一个如此深入和系统性的危机，我们必须把城市和城市化放在经济繁荣议题的首位。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提到的，危机源于城市，危机的解决之道也在于城市。要恢复广泛和可持续经济繁荣，就必须使美国的城市化更全面、更平等。这需要的投资规模十分惊人，但不是不可能。好消息是，仅利用我们手头现成的资源就能大有收获。要提高生产力、实现惠及全民的城市化发展，可以围绕以下七个方面铺开新战略，我将对它们进行逐个讨论。

将聚集力变成发展助力而非阻力

聚集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如何有效利用聚集力来最大化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效用至关重要。正如我们看到的，问题的症结是城市土地关系：越是需求旺盛的地方，土地越是稀缺。我们无法创造出更多土地，但我们能提高土地开发的密度和效率。

越来越多所谓的市场城市规划专家提出，提高土地开发密度的最好方式就是取消部分限制性分区和建筑法规，它们限制了市场供给，导致建筑供不应求。他们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分区和建筑法规确实需要放宽和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再让邻避和新城市卢德分子阻碍城市和经济所急需的高密度和高聚集化发展了。

解除土地管理限制虽然必要，但不足以解决新城市危机的问题。尽管此举能增加新建房屋，提高城市密度，但城市土地和高层建筑的

成本高昂，解除土地管理限制的后果是将产生更多高级高层公寓，而不是廉价住宅，而后者才是城市最需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对这一举措提出过明确质疑：“随着新建房屋的增加，城市经济产出会提高，土地仍是稀缺要素，最后租金仍将十分高昂。”他写道：“如果我们解除建筑管理限制，土地所有者将成为最大赢家。”[8] 最后，那些最有需要的人反而只能从中受益最少。

另外，作为“太阳地带”散漫扩张城市的典型，休斯敦没有分区和土地使用限制，开发商可以自由选择建筑地点和建筑种类，是扩张性城市的原型。但是在不平等、隔离和新城市危机的排行榜上，休斯敦和纽约、洛杉矶与旧金山总是靠得很近。大休斯敦地区的新城市危机指数在大城市中排第十一；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在大城市中排第四，仅次于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隔离与不平等指数在大城市中排第三，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虽然休斯敦的房价比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低，但远高于绝大多数其他城市，休斯敦的不平等和隔离水平也位于全国前列。

新城市危机不仅是某些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特有的危机，更是普遍存在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的危机。解除土地使用限制，让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变得更像休斯敦，很难将城市从新城市危机中解救出来。

另外，完全解除土地使用与房屋管制有杀鸡取卵的风险。驱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不是住宅密集的摩天大楼，而是能促进融合与互动的多功能中高层建筑。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创新实力最强的不是纵向扩张、摩天大楼密集的中国香港或新加坡，而是纽约、旧金山和伦敦。曾是老工业区的社区，街上主要是中高层建筑、工厂和仓库，偶有高楼，这些带来持续的融合与互动。很久以前简·雅各布斯就曾提出警告：“如果缺少步行空间，多样化就成了大问题。”[9]

完全放松土地使用管制可能会鼓励过度的垂直扩张，将城市变成死气沉沉的“公寓峡谷”，破坏最富创造力的城市社区。因为在郊区发

展时代，这类城市社区的建设完全停滞了，现在它们正是我们最缺乏的。每消灭一个，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创新资产。

虽然落后的法规必须淘汰，但不能破坏宝贵而独特的城市生态系统。因此我们要改革城市土地使用制度，使之具备灵活性以适应城市化知识经济发展，并能增强城市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而不是破坏它们。

要实现更密集和更聚集化的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目前对房产税的依赖，以土地价值税取而代之。房产税以土地及其上面的建筑物为征税对象，而土地价值税以土地本身的基础价值为征税对象。这样能极大地鼓励不动产持有者最大化地利用土地，这一想法可以追溯到大卫·李嘉图，他在18世纪早期就提出了著名的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源于土地的非劳动收入是一种纯粹的浪费。

土地价值税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是19世纪末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他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说，土地价值税不仅能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还能提高工资、降低不平等并提高生产力。其基本前提是，土地开发程度越低，对其所征的税率越高。乔治认为，对未开发土地的征税应为土地价值的100%减去业主对土地进行改良获得的增值。换言之，如果没有对土地进行改良，那么就应该把全部的土地价值都返还给公众。按这一税收制度，在今天的城市，未开发的地面停车场会被征收极高的税，小型公寓楼的税率较低，较大公寓楼的税率更低。这种税收制度激励业主提高对城市中心土地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城市密度和聚集度。[10]

此外，在目前的房产税制度下，土地和房屋所有者不仅没有动力提高房地产开发密度，还能从邻里升级和房地产升值中获得超额回报。例如，纽约的高线公园大大提升了周边地区的房地产价值，但结果是只有房地产开发商敛得了意外之财，公园和周边社区几乎没有从中受益。类似的情况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吸引了新居民、新餐馆、新咖啡店、新的好学校并且犯罪率下降的城市社区，而土地价值税能让更

广泛的公众群体分享社区改善的好处，因为源自整体社区改善的土地价值上涨被征税并返回给了公众，能用于投资公共服务，缩小社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另一个有趣的想法是，通过地方税收政策来团结邻避者共同促进社区新发展。这一基本理念称为“增值税本地转移”，它允许社区居民分享新发展带来的税收收入——比如在一段时间内抵扣和减少居民自己缴纳的房产税。[11]

虽然这样改变国内税收制度看起来很有政治难度，但土地价值税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和正反两派城市学家的广泛支持，它能让更多房屋被建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提高城市的密度和聚集度，使城市和经济更强大。

用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密度并促进发展

基础设施是解决城市问题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对其进行良好规划和战略性投资，能扩大聚集发展的规模，帮助更多地区实现聚集化发展，并加强偏远地区与城市聚集发展地区之间的联系。

基础设施是包括特朗普在内的所有政界人士关注的焦点话题，特朗普呼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刺激经济。加拿大的贾斯廷·特鲁多政府也承诺投入巨额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但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基建项目都能奏效的，投资修建更多道路和桥梁对解决问题毫无益处。我们需要进行战略性基础设施投资，使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不是更加分散，提高城市密度和聚集度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将基建投资从使人们更加分散的公路转移到聚集人与经济活动的公共交通。

美国对公共交通的投资少得惊人。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公共交通基本都是100多年前遗留下来的产物（纽约和伦敦的大规模公共交通基本都建成于汽车出现之前）。实际上，正是由于公共交通便利的地方

十分稀缺，地铁和公车站附近的地价和房价才如此高昂。研究显示，有公共交通的社区让居民的通勤更便捷，从而更容易实现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扩大公交系统能增加这种社区的数量，让更多人，特别是相对弱势群体得以享受这种便利。

公交系统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能发挥最大效用，如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和华盛顿。虽然这些城市已经有公交系统了，但还需要更多公共交通将偏远地区和市中心相连，减少交通拥堵和对汽车的依赖。

散漫扩张的城市地区也需要公共交通，面积过大、发展已经超负荷的城市尤其如此。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随着城市扩张，其发展将面临地理限制。当城市人口达到了500万或600万的临界值时，汽车和公路就不再是很有效的交通方式了。美国有不少这种规模的城市地区，如旧金山湾区、大华盛顿、波士顿、费城、休斯敦、达拉斯、亚特兰大和迈阿密。这些城市地区已经临近或到达了依靠汽车实现地理扩张的极限，要通过进一步向外扩张来增加住房供给越来越难，甚至不可能。提高市中心和郊区的密度是唯一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不论是在城中心还是郊区地带，要实现更密集、更有聚合力的发展，关键都在于对公共交通的投资并减少汽车依赖。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亮点是，很多地区的选民都投票支持增加政府在公共交通上的支出。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还有利于扩大城市外围。在20世纪中期，有轨电车、地铁和汽车等新型交通方式的产生扩大了工人的通勤范围，使城市地区得以向外扩张。高铁等更好更快的公共交通能极大地扩张城市地区的通勤和工人居住范围，让他们能住在廉价地段，去更富于生产力的地段工作。

不是所有在超级城市或知识中心工作的人都得住在那里。我在第二章中提到一项研究展示了土地使用限制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我还提到有效的交通系统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方便工人在住

房成本低廉的偏远地区和城市中心之间通勤。研究者称，交通系统（尤其是高铁）能在顷刻之间扩大城市地区的功能性劳动力市场，无须处理棘手的土地使用限制问题，甚至可能也无须增加新住房。[12]

高铁还能连接大型都会区中的各个分散城市。[13]类似的连接已经出现在还没有高铁的地区了，比如，美国铁路公司的“东北走廊”铁路线连接了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这整片地区的人口超过5000万，经济产出超过20亿美元。美国有十几个这种大型都会区。在五大湖地区，有包括芝加哥、底特律、匹兹堡在内的中东部城市集群，还有从布法罗、罗切斯特到多伦多及其附近地区的一系列城市集群；在南方，有迈阿密-坦帕-奥兰多地区、亚特兰大和夏洛特地区，以及包括休斯敦、达拉斯和奥斯汀等城市的得克萨斯三角地带；在加州，南部有以洛杉矶为中心的都会区，北部有以旧金山为中心的都会区；在太平洋西北地区，有包括西雅图、波特兰和温哥华在内的卡斯卡迪亚地区。

高铁能缩短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促进城市的紧密连接。真正的高铁［行驶速度能达到法国TGV（高速列车）或者日本新干线的水准］能将纽约与波士顿或纽约与华盛顿之间的交通时间缩减到90分钟，用同样的时间也能从达拉斯到休斯敦或奥斯汀。洛杉矶与旧金山，或匹兹堡与芝加哥之间的通勤时间能缩短至2.5个小时。[14]高铁能显著扩大这些地区的功能性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经济市场，提升它们的整体经济竞争实力。

私有部门投资已经开始进入高铁项目了。佛罗里达政府不愿插手，一些私人投资者便自行恢复了迈阿密和坦帕之间的部分高铁线路。然而，最有效的方式是由政府将更多汽油税收入投资于交通系统特别是高铁建设。

应当减少以修建公路的方式给汽车的直接补贴，使公共交通领域重回平衡。伦敦等城市已经开始征收交通拥堵费，让汽车驾驶者付费使用繁忙道路，解决交通、散漫扩张和污染问题。未来，自动驾驶汽

车、电动汽车和优步、来福车等线上按需运载平台将在城市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们仍需要公共交通作为连接网，提高城市聚集度，建设更多让人住得起的密集的多功能聚集社区。最后，重点不是选择哪种交通方式，而是要确保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来承载居民交通、提高城市密度、让更多人有房可住，以及刺激整体经济发展。

修建更多经济适用的租赁房屋

廉价住房是解决新城市危机的第三个关键要素。在最昂贵的城市中，除了社会经济状况最好的1/3人口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无力承担高昂的住房成本。警察、消防员、教师、医疗人员、餐厅和零售工作人员等基本服务从业者都被迫迁到远离市中心和其他经济活动中心的偏远地区。在有的城市，吸引这些基本服务从业者越来越难，大型商业开发商呼吁修建“城市劳动力住房”，保证有足够多的工人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缺乏廉价住房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和经济运转的绊脚石。

住房问题可能在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最为严峻，但它的辐射范围远不止于此。太多美国人——尤其是低收入租房者，住房开销占收入的比例都非常高。我们的住房系统非常偏好散漫扩张郊区的独立屋，而抑制城市化知识资本主义需要的聚集式出租屋。

问题主要在于美国的住房政策本身。我们现有住房政策起初的设计意图是刺激郊区化发展，为购房者提供大量补贴。联邦政府每年通过房贷税收减免为购房者提供了约2000亿美元的补贴，如果再算上间接成本，补贴可能高达6000亿美元，这是国家每年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住房补助（460亿美元）的4~12倍。[15]收入最高的20%人口获得了75%的购房补贴，最高的1%人群则获得了15%。这种政策扭曲了房地产市场，导致分散的独立屋过多，而聚集的租赁房屋过少。

即便如此，已经出现了人口从郊区独立屋向多家庭租赁屋转移的现象，我称之为“大住房重置”。自有住房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峰值开始大大降低，现在仍在下降。[16]在过去1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

美国人变成了租房者，尤其是房价高企的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的居民。2005—2015年，美国的租房家庭数量上升了900万，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10年涨幅。到2015年底，4300万美国人都在租房，租房者的人口占比从31%上升到了37%。年龄分布在18~34岁的“千禧一代”中有超过70%都在租房。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超过一半市民在租房。[17]

房屋租赁比住房自有更能满足城市化知识型经济的需要。租房者更倾向于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或者乘坐公共交通上班，而郊区自有房屋者则倾向于长距离开车通勤。租房人口比例更高的城市创新水平更高，高科技公司的聚集度更高，大学毕业生和创意阶层人口占比更高，薪酬、收入和生产力也更高。而自有房占比更高的城市地区则相反，创新水平、生产力、多元化程度、高学历和技术人才的人口占比都较低。[18]增加租赁房屋、减少独立屋不仅符合城市聚集的需要，还能强化这种能促进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城市聚集。

尽管如此，很多租房者承担着极高的房租负担，陷入房租上升和收入下降的死循环中。在2006—2014年，平均房租上涨超过22%，而平均工资收入下降近6%。2001—2014年，房租超过收入1/3（高房租负担的临界值）的人口数量从1480万上升到2130万，而房租超过收入一半的人口数量从750万上升到1140万。低收入租房者（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的经济状况明显恶化，其中近3/4（72%）的人支付的房租超过收入的一半。2006—2014年，收入底层家庭的房租收入比从55.7%上升到惊人的62.5%。

应重新分配联邦住房补贴，向真正需要的人倾斜，更多地补贴经济状况较差的租房者，而不是经济状况较好的自有住房人群。这样有助于扩大租房需求，鼓励建造更多公寓楼并促进聚集化发展。继续补贴独立屋业主的不平等政策，只会带来更多散漫扩张，破坏密度和聚集度，给经济造成巨大的其他成本。

这些措施与理性的土地使用政策改革、交通系统投资结合在一起，能鼓励社会建造更多价格低廉、聚集程度较高的公寓楼和出租屋，但仍不足以解决经济状况较差人群的住房负担问题，特别是在昂贵的超级城市。2016年一项针对旧金山湾区的研究发现，要解决该地区的住房负担问题，需要将更多的市场化住房建设和补贴住房建设结合起来。[19]

关于如何为真正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廉价住房已经有很多政策建议了，如扩大租金调控范围、修建更多政府补贴住房和所谓的包容性区域划分——开发商必须修建经济适用房，才能开发更大、更高和更高端的住宅项目。虽然这些政策的目标很美好，但它们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租金调控会使业主丧失改善不动产的动力，还很容易被钻空子；包容性区域划分在昂贵的超级城市房地产市场最有效，因为它们的开发商愿意通过修建经济适用房换取修建高楼的许可，但是在其他城市，这些政策可能导致开发商减少住房供给；其他大规模改革措施——如开放过时的分区和建筑规则、用土地价值税取代房产税或者扩大交通系统，虽然可以增加总体住房供给，但无法将足够多的经济适用房提供给最需要它们的服务业工人和穷人。

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他们的收入，不论是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下一节的内容），还是以住房抵扣的形式直接提供政府支持，甚至通过更广泛的支持政策，比如用负所得税保证基本最低收入（将在再下一节展开说明）。

将低薪服务业工作转化为中产阶级工作

要同时实现提高密度、增加交通基建投资和修建经济适用房三项措施已经十分困难了，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彻底解决新城市危机。现在美国经济没有足够多的高薪工作来支持新中产阶级，我们需要更多较高收入的就业帮助人们脱贫，提高居住质量。可能有人会说特朗普和共和党就在做这件事情，但联邦政府、市政府和私人部门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政客提出的重塑中产阶级的措施对解决问题没什么帮助。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很多人都爱把“将中产阶级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挂在嘴边，但如今只有20%的美国人从事蓝领工作，而在工厂从事直接生产工作的甚至只占劳动力的6%。即便我们能把更大量的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即便被广泛宣传的高级制造和所谓的“作坊制造”还能继续扩张，新的就业岗位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在今天的全球化科技经济中，制造业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成为中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力量和支柱了。

另一个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提议是让更多人上大学。它背后的基本理念是对的，即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就越高。但这个措施也很难帮助中产阶级恢复昔日荣光，因为美国经济没有足够多的知识工作岗位——只有1/3的劳动力在从事高薪知识型和专业型创意阶层工作。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经济中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部门是低薪服务业。超过6000万美国工人在从事低技能水平、低薪和不稳定的工作，总数占全国劳动力的45%。如果再加上在非正规经济中从事临时工作的、未充分就业的、失业的以及不属于劳动力的人口，则占到了美国劳动适龄人口的2/3。如果我们想创造新中产阶级，就一定得将数千万低薪服务业工作转化为薪酬更高的工作。

乍看之下这个提议显得有些古怪，实则不然，它和我们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低薪制造业工作转化成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蓝领工作是差不多的。当时亨利·福特提出了“流水工作线工人的薪水应足够买车”的观点，直击问题要害。我父亲13岁时辍学去工厂上班，那时候他的父母、6个兄弟姐妹和他自己一共9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而当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回来进入同一家工厂工作时，发现旧工作的薪水已经足够他养活一家四口、买房，并把我和我弟弟送进教会学校和大学。他的工作和成百上千万份其他工作得以成功转型是得益于罗斯福新政和一些提高制造业工资的项目，包括1935年通过的赋予工人组织工会和与雇主集体谈判权利的《瓦格纳法案》、同年通过的《社会安全保障法》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它们共同构成了基本社会安全网。美国社会推出了新政策，创立了新机构，

将低薪制造业工作转化成薪酬更高的中产阶级工作，今天我们要用一样的方式转变成百上千万占据社会阶梯底层的服务业工作。

我们可以先从提高最低工资入手。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通过了一项行政命令，将联邦政府合同工的最低小时工资提高到10.10美元。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对于生活成本高昂的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来说还远远不够。在洛杉矶、纽约和西雅图等发达城市之外，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和市政府都带头提高了当地最低工资。2014年中期选举时，阿拉斯加、阿肯色、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这四个深红州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全国前列（剔除各地生活成本差异后）。

保守派通常会提出反对意见：提高最低工资会提高劳动力价格，把更多人挤出劳动力市场。但根据最近的研究，将最低工资提高到当前工资中位数的50%左右并不会产生这种负面影响。[20]并且我们不该忘记，1968年联邦最低工资是当时工资中位数的55%。

全国各地的住房成本迥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应考虑到地域差异，就像其他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政策一样。[21]如果我们把最低工资设置在当前本地工资中位数的50%，那它在不同州、不同都会区和不同城市都会不同，最高的是圣何塞，最低小时工资约为15美元，旧金山的约为14美元，波士顿、纽约和西雅图的约为13美元，在更便宜的城市地区，如拉斯维加斯、路易威尔、孟菲斯、迈阿密、纳什维尔、新奥尔良、奥兰多、圣安东尼奥和坦帕等，最低小时工资则为约9.5美元。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来把大量低薪服务业工作变成能养家糊口的工作。工资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成本上升，但也能提高生产力和利润。工资福利较差的工人缺乏工作积极性，工资低的企业往往要为高人员流动性问题付出高昂代价。相反，待遇较好的工人工作积极性更高，还能带来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全球顶级制造企业很久以前就发现，支付高工资、提高员工工作参与度可以激发创新、提高工厂生产力，对企业发展大有裨益。[22]

很多事实表明，在服务业提高工人工资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在过去几十年，许多成功的零售和酒店管理企业［如乔氏超市、好市多、Zara（服装品牌）、全食超市、四季酒店等］给员工支付的工资远高于最低工资水平和竞争对手，这是它们“好工作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力，降低人员流动性和提升客户服务水平。[23]升级低薪服务业工作还能给工人、企业和整体经济带来其他好处：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能促进企业生产力和利润提升，成百上千万服务业工人的工资提高能极大地拉动消费需求，服务业企业的业绩提高还有助于经济整体生产力和经济效率的提升。

提高服务业薪资还能以其他间接方式提高创新力。对我的创意阶层理论最好的评论之一来自一位奥斯汀的创意阶层人士：城市创意经济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薪水较高的服务业工作。他指出，总部在奥斯汀的全食超市为当地艺术家和其他创意阶层群体提供了大量工作时间灵活、工资较高的就业机会，它对奥斯汀创意经济的支持力度甚至超过了当地政府和私人机构提供的支持。[24]提高服务业薪资能帮助创意阶层支付房租，从而促进创新经济发展。

升级服务业工作不一定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由于问题部分在于很多企业都没有意识到升级服务业工作能提高生产力和利润，因此政府可以仿照从前在农业和制造业扩张项目和鼓励私人部门成就的奖励项目（如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中扮演的角色，帮助宣传经济中相关的最佳实践。

最后，创造新中产阶级意味着我们大部分人将为服务支付更高的费用。可以再次参考罗斯福新政时代——大萧条后，我们集体为汽车和家电支付溢价，从而创造了中产阶级群体。如果过去我们愿意为那些耐用商品支付溢价，支撑起我们父母辈的中产阶级，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给那些帮我们照顾小孩和老人、给我们提供重要服务的人支付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从而创造一个新的中产阶级。

通过对人和地方的投资消除贫困

新城市危机最危险的部分可能是城市和郊区中长期集中贫困的蔓延，要解决危机就必须直面这一问题。

我们目前有两种消除贫困的方式：一种方式“基于人”，为贫困家庭提供资源，或帮助他们搬到更好的新社区；另一种方式则“基于地点”，通过投资于学校、提供社会服务和降低暴力犯罪来改善贫困社区状况。这两种方式都应为我们所用。

我们知道，如果让贫困社区的家庭搬到教育质量和经济条件更好的社区，孩子们的发展机会将会得到显著改善。但显然不是每个长期贫困地区的人都能搬到学校更好、机会更多的新社区的，迁移的机会本身就不够多，还有人更愿意留下来和家人朋友在一起。如果只让表现最好或来自积极性最高的家庭的孩子搬走，最终就会榨干贫困社区的顶尖人才，剩下的人将面临更严重的集中贫困。

要解决数十年的长期贫困问题还需要对贫困社区进行全面、协调的地区投资。作为美国集中贫困问题方面的顶级专家，罗伯特·桑普森呼吁“为社区采取积极行动”，让每个社区都能给居民提供经济机会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他恰当地指出“贫困居民最想要的不是搬家，而是社区重振。”[25]地区投资不能像挤牙膏一样碎片化投入，而应提供全面的重要社会和经济服务，覆盖教育和经济机会与降低暴力犯罪等领域。

解决城市的学校问题是消除长期贫困的重中之重。很多贫困社区的学校都存在资金短缺问题，无法为学生提供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维生技能，辍学率持续高企。教育是人们向上流动的关键途径，低质量学校会导致贫困家庭及其子女被困在贫困的代际循环中。其他多数发达国家不是这样的，以多伦多为例，所有儿童都能获得州政府资助的体面教育。虽然美国学校也有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资助，但主要还是依赖当地地产税，这就导致各地学校质量良莠不齐。当然，城市地区的富裕家庭可以绕过公立学校系统，直接把小孩送到私立学校。严重的教育不平等问题已然成为美国最深入的社会不公之一。

贫困社区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缺少好学校，因为那里的儿童甚至在上幼儿园之前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有利于学龄前儿童的发展，符合美国通过教育公共投入刺激经济发展的传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大众公共教育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教育的大幅扩张都刺激了经济发展，也推动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26] 现在，增加对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投资，尤其是在长期贫困社区的投资，也能提高社会整体人力资本和经济水平。

从根本上说，贫困就是缺钱。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为每个人提供最低工资或全民基本收入保障。而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负收入所得税”将部分税收返还给贫困人口，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种方法比名目繁多的住房、食物、儿童支持等直接援助项目都更经济有效，也省了很多官僚主义的麻烦。

对基本收入保障项目的普遍批评是它会鼓励懒人，但负收入所得税则鼓励人们工作和创业，随着他们收入的增加，政府的支持力度逐步降低。这一税收制度没有看起来那么激进，它在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差点就被纳入美国税收政策中。目前很多国家已经在实施了，还有很多国家在考虑实施。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自由派经济学家詹姆士·托宾最先提出了这一基本方法，很多左派和右派的经济学家也是它的支持者。最近很多硅谷的企业家重提这一理念，认为这是打击贫困最有效的途径。[27]

除了消除贫困，负收入所得税还有诸多益处。它为从事着养育子女、照顾生病亲人等零报酬工作的人提供了支付机制。承诺最低收入还能作为低成本原始资本，给创业阶段的人足够的资金来支撑日常生活。[28]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五章提到的，这种收入重新分配机制最终能起到降低不平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利用负收入所得税、按当地生活水平调整的最低工资和上述其他方法，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安全网，降低城市化知识经济的不平等。然而我们要记住，新经济结构产生后，要经历一个漫长历程才

会出现相应的社会福利机构与公共政策，消除新经济结构带来的不平等，并创造强大的中产阶级。在工业时代，这一过程从19世纪中期持续到20世纪中期，长达大半个世纪。旧社会安全网产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目的是解决旧工业经济的不平等问题，现在它已经无法应对赢者通吃城市化、地域不平等和城市与郊区的集中贫困了。我们亟须建造一个新的社会安全网，解决城市化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不平等问题。

与世界一起促进城市繁荣

虽然美国可能缺乏足够强烈的政治意愿，但有足够多的经济资源来实施上述五个方面的措施。然而，新城市危机并不止步于美国国界。在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城市化发展地区，超过10亿人口饱受其害，他们面临的问题往往还更加严峻。过去，美国的城市政策往往聚焦于国内，现在是时候使之国际化了。我的第六个提议就是，美国发挥更广泛的世界领导力，在全世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地区打造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城市。

将综合的城市政策和外交与国际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对美国益处良多。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全球建造中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发达城市能帮美国打开新的商业市场。更重要的是，在长期不稳定地区建造强大和有弹性的城市，有助于实现重要的外交、军事和人道主义目标，如打击恐怖主义和缓解迅速发酵的难民危机。

城市稳定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还能提高世界的安全性和包容性，并减少暴力犯罪。实际上，全球恐怖主义滋生的衰败国家都是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地方。[29]军事干涉本身很容易摧毁大城市，并让人口更加分散，带来城市化水平和稳定水平双双降低的恶性循环。在这些分裂地区建造稳定的城市能让世界变得更安全。

美国还应考虑支持难民城市的发展，让它们更好地利用难民的才能。比起我们现在做的（如协助修建难民营），这种方法对于解决全

球难民危机更有效、成本更低，也能让难民如愿待在离家更近的地方。[30]

把美国的外交与国际发展政策的重点从“国家重建”转化为“城市重建”有很多好处。帮助发展中国家建造人口更密集、更清洁、能源利用率和生产率更高的城市，有利于降低贫困，加强全球稳定性，并创造更强大的全球中产阶级。市长等城市领导者管理着全球经济体中越来越重要的权力中心，与他们建立新型关系也有利于提升美国的软实力。

授予城市与社区更大权力

我在写作本书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在构想一个新型民主党政府，它将开展持续、深入的投资，以满足开启惠及全民的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在本书的早期版本中，我的改造方案很彻底——将住房及城市发展部扩张为更广泛的城市发展部，处理与城市地区有关的联邦提案；类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经济顾问委员会，成立“城市委员会”，为总统提供有关城市政策的建议；联邦政府和城市之间应建立新型关系，联邦对城市的投资应该交到市长和当地官员手中，因为他们才是最了解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金来发展本地经济和解决本地难题的人。

然而，事情出现了难以预料的逆转——特朗普当选了美国总统。我所设想的蓝图不太可能在特朗普执政和共和党掌控国会两院期间得以实现了。特朗普可能会兑现竞选承诺，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但很可能只是胡乱投资于修建道路和桥梁，不是对公共交通、能源利用效率和廉价住房进行战略性投资，而可持续和富有包容性的城市化发展需要的是后者。共和党多数派肯定会继续削减已经十分贫瘠的公共交通、廉价住房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联邦支出，当地政府、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肯定会忙得团团转来补上这些缺口。

如果特朗普真的兑现竞选承诺，在边境修墙，阻止移民入境，那么他将摧毁美国建国的基础——活力与多元化，把人才和创新推向别

的国家。新城市危机带来的地理和文化分化十分深刻，从某种程度而言甚至可能是永远无法消弭的，而我们的新政府只会令它继续恶化。

在城市政策和投资方面，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正努力将基建投资与城市建设相结合，以及开发有关经济适用房和城市发展的新战略（我和其他优秀的城市经济学家都被包含其中）。澳大利亚的保守派政府新设立了城市和建筑环境部，负责在国家层面协调城市发展事宜。

然而，即便在特朗普执政和共和党掌权联邦政府期间，我们也能做出一些改变。最关键的是赋予城市和社区更大的控制权，让它们发展自身经济、应对新城市危机。在这方面英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城市与国家政府建立了一种受到左右两派领导人支持的新型合作关系，包括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和前工党领袖爱德华·米利班德，米利班德还曾提议建立一个“城市参议院”。2015年，由英国商业领袖、高级官员、经济学家和城市学家组成的蓝丝带委员会提出了增强城市权力的四个关键：将决策主体从国家政府转变为城市；赋予城市更大的税收和财政权力；让城市官员进入国家代表机构，并在内阁为他们保留永久席位；设立新机构来协调对城市地区基础设施、人才和经济发展的投资。[31]

美国的市长和社区领导人现在应当积极争取权力，以便更好地管理社区，因地制宜地解决本地问题，这种战略既能发挥本地创新和问题解决机制的优势，也能适应各城市不同的能力和需求。

其实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地理分化已经太严重了，可能很难就城市问题达成国家层面的共识，也没有一种自上而下的通用方法，能解决从人口密集、生活成本高昂的蓝州城市地区到人口较少、汽车依赖度更高的红州城市地区的各种问题。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的需求差异极大，正如我们需要根据地区状况调整最低工资，制定城市政策时也应根据当地需求量体裁衣。以基础建设为例，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需要更多公共交通，而人口更稀少的地区需要更多道路和桥

梁。因此赋予城市、郊区和社区更多自主权来处理它们各自的问题就是我的最后一个建议。

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比党派活跃分子更务实。我在美国各地访问时，很难看出地方官员是共和党、民主党或是无党派独立人士，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议程是由当地实际需求驱动的，而不是由某种党派意识形态驱动的。他们能更好地理解本地经济状况和社会问题，也最有可能建设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市长统治世界》（*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的作者、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指出，要让地方政府解决问题，就应尽量减少联邦政府向地方政府收缴的财政收入。[32]

由两个党派的市长共同发起这一提议更容易在联邦政府获得更多支持。美国有极大的制度优势，灵活的联邦制能调整和平衡权力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之间的分配。罗斯福新政期间，罗斯福总统在联邦政府和市政府之间建立了新型合作关系，是时候再来一次了，但这次权力应向地方政府倾斜。

现在正是重塑城市治理、让地方官员能更有效地解决城市问题的良机。解决某些城市问题需要大范围合作，这些是目前分散的市政府系统无法提供的。可以根据具体问题的规模调整权力控制范围，例如，公交运输投资可以由一个都市圈里的各个城市和郊区，甚至一个大城市地区的各都市圈共同监督完成。

如果今天市长和地方官员抓住主动权，努力争取权力下放，那么当风向转变，美国准备再次投资重建城市和郊区时，他们就能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但当我想到未来的图景可能是这样时，言语已经无法描述我内心的惆怅：急需的经济适用房和交通系统不会建成，集中贫困的原因仍未解决，社会经济阶层固化。但我也记得在此前见证城市衰落和重生的大循环时所学到的，这不是我们的国家第一次背弃城市。不管在漫

漫历史中发生过什么，城市仍然是最伟大的创新、经济增长、多样性、包容性和社会进步引擎，它们还将继续引领文明的前进方向。

新城市危机是历史性的分水岭，我们的应对方式将决定城市、郊区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是走向一个富有包容性的可持续繁荣新时代，还是沦为日益深化的不平等和分裂问题的牺牲品？

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城市危机只会继续恶化。赢者通吃城市化进程中，赢家和其他人的差距将继续扩大。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会变得昂贵至极，成为封闭的镀金社区，创新活力随之消失，维持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基本服务业人员也只能被迫离开；老工业城市的复兴之路十分艰难；"太阳地带"城市将继续自欺欺人，认为随意扩张就等于增长；郊区的经济越来越萧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社区继续缩减，国家进一步分化为富人的封闭飞地和大片的衰败城市与郊区；穷人和弱势群体将深陷日益扩大的经济与社会衰退地区。在世界上其他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地区，将出现城市化水平提高而经济没有增长的怪象，超过10亿新城市居民将困于脏乱差的贫民窟并长期贫困。

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新城市危机这一当今时代的核心危机，才能让经济重回正轨、激发新一轮创新浪潮、创造充足的就业和经济机会，并且消除日益深化的经济鸿沟。

我对克服危机持谨慎而现实的乐观态度，原因很简单：尽管来自特朗普支持者的阻力重重，但城市仍是帮助我们认识和解决严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最佳工具。城市复兴带来了种种挑战，并且想对它们视而不见越来越难。20世纪的富人可以住在封闭的崭新郊区社区，乘空调火车或开车到守卫森严的办公楼上班，而现在所有的城市功能缺陷都一目了然。即使一些城市的部分区域已经被富人和高学历群体占领了，但这些城市仍有丰富的种族和阶级多样性。市场、地方官员和城市居民不得不面对他们城市的经济社会问题。

最后，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是倒退。人在社会中的聚集推动了人类发展的每一步。现在"城市主导增长"的基本逻辑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站得住脚。然而，历史发展并不总是线性的，在继续前进之前可能会倒退。新经济秩序出现后，往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期，才能配套建立起稳定新秩序的制度与政策，并使更广泛人群从中获益。在我们上一个伟大黄金时代——20世纪50年代，大型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出现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和奋斗的结果。最终，恢复经济繁荣的道路将取决于我们的城市和更优质、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

实现这种新型城市化是可能的，但它绝不会自动发生。我们是选择赢者通吃城市化带来的分歧和矛盾，还是选择更全面、更公平的惠及全民城市化带来的希望?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和面临的斗争。

[1] Russell Berman, "Hillary Clinton's Modest Infrastructure Proposal," The Atlantic, December 1, 2015, 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5/12/hillary-clintons-modest-infrastructure-proposal/418068; Paul Krugman,"Ideology and Investmen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14, www.nytimes.com/2014/10/27/opinion/paul-krugman-ideology-and-investment.html; Ezra Klein, "Larry Summers on Why the Economy Is Broken—and How to Fix It,"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4, 2014, 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4/01/14/larry-summers-on-why-the-economyis-broken-and-how-to-fix-it.

[2] 新城市危机指数与城市的人口规模（0.61）和人口密度（0.55）正相关，也与密度的间接衡量指标——使用公共交通通勤的人口比例（0.42）正相关。它还与工资(0.50)、收入(0.34)和人均经济产出(0.34)正相关，与高科技产业的聚集度(0.61)、劳动力中创意阶层的占比(0.55)和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占比(0.55)正相关。相反，新城市危机指数与劳动力中蓝领阶层占比(-0.55)负相关。与不平等和隔离类似，新城市危机指数与多元化的两个关键标志正相关——在国外出生的成年人比例（0.52）和同性恋人口比例（0.61）。另外，新城市危机指数与城市地区的政治立场和投票模式也息息相关：它与城市地区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0.59）正相关（用2016年希拉里得票比例衡量），与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0.55）负相关（用2016年特朗普得票比例衡量）。关于美国350多个城市地区的新城市危机指数完整排名，参见附录表4。

[3] 关于长期经济停滞的概念，参见Timothy Taylor, "Secular Stagnation:Back to Alvin Hansen," Conversable Economist, December 12, 2013,

http://conversableeconomist.blogspot.ca/2013/12/secular-stagnation-back-toalvin-hanson.html; Larry Summers, “U.S. Economic Prospects: Secular Stagnation, Hysteresis, and the Zero Lower Bound,” Business Economics 49,no. 2 (2014): 65–73, http://larrysummers.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NABE-speech-Lawrence-H.-Summers1.pdf。关于美国创新和更广泛的生产力下滑，参见Robert J.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4] Krugman, “Ideology and Investment.”

[5]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meeting, Chicago,July 12, 1893, 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 http://nationalhumanitiescenter. org/pds/gilded/empire/text1/turner.pd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21); Kenneth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 Gerald Gamm and Thad Kousser, “No Strength in Numbers: The Failure of Big-City Bills in American State Legislatures, 1880–200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 no. 4 (2013): 663–678. 研究追踪了13个州立法机构从1881年到2000年的1700个与市或郡有关的立法，发现与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关的立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远低于与小地方有关的立案，并且小地方立法者提出的立案被通过的可能性是大城市立法者的两倍。

[7] Richard Florida, “Is Life Better in America’s Red States?,” New York Times,January 3, 2015, www.nytimes.com/2015/01/04/opinion/sunday/is-lifebetter-in-americas-red-states.html.

[8] Tyler Cowen, “Market Urbanism and Tax Incidence,” Marginal Revolution,April 19, 2016, http://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2016/04/market-urbanism-and-tax-incidence.html.

[9] 引自Stephen Wickens, “Jane Jacobs: Honoured in the Breach,” Globe and Mail, May 6, 2011, www.theglobeandmail.com/arts/jane-jacobs-honoured-inthe-breach/article597904.

[10] 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Robert Schalkenbach Foundation, 1997 (1879)］. For more on George, see Edward T. O’Donnell,Henry George and the Crisi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Why Henry George Had a Point,” The Economist, April 1,2015, 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5/04/land-value-tax.

[11] David Schleicher, “City Unplanning,” Yale Law Journal 122, no. 7 (May 2013): 1670–1737.

[12] Enrico Moretti and Chang-Tai Hsieh, “Why Do Cities Matter? Local Growth and Aggregate Growth,” April 2015, http://faculty.chicagobooth.edu/chang tai.hsieh/research/growth.pdf.

[13] Richard Florida, “The Mega-Regions of North America,”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March 11,2014,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the-mega-regions-of-north-america.

[14] 这些时长估计来自 Richard Florida, “Mega-Regions and High-Speed Rail,”May 4, 2009, The Atlantic, www.theatlantic.com/national/archive/2009/05/mega-regions-and-high-speed-rail/17006。

[15] Todd Sinai and Joseph Gyourko, “The (Un)Changing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ousing Tax Benefits, 1980 to 2000,”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32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ebruary 2004, www.nber.org/papers/w10322.pdf; Robert Collinson, Ingrid Gould Ellen, and Jens Ludwig, “Low-Income Housing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071,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5, www.nber.org/papers/w21071;Richard Florida, “The U.S. Spends Far More on Homeowner Subsidies Than It Does on Affordable Housing,” CityLab, April 17, 2015, www.citylab.com/housing/2015/04/the-us-spends-far-more-on-homeowner-subsidies-than-itdoes-on-affordable-housing/390666.

[16] Richard Florida, “How the Crash Will Reshape America,” The Atlantic,March 2009,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9/03/how-thecrash-will-reshape-america/307293; Richard Florida, The Great Reset: How the Post-Crash Economy Will Change the Way We Live and Work (New York:Harper Business, 2010); Nick Timiraos, “U.S. Homeownership Rate Falls to 20-Year Low,”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9, 2015, http://blogs.wsj.com/economics/2015/01/29/u-s-homeownership-rate-falls-to-20-year-low.

[17] 关于租房数量上升和下文中租房负担上升的数据均来自哈佛大学房屋研究联合中心，参见America’s Rental Housing: Expanding Options for Diverse and Growing Demand,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December 2015, www.jchs.harvard.edu/research/publications/americas-rental-housing-expanding-options-diverse-and-growing-demand。

[18] Richard Florida, “The Steady Rise of Renting,” CityLab, February 16, 2016,www.citylab.com/housing/2016/02/the-rise-of-renting-in-the-us/462948.

[19] Miriam Zuk and Karen Chappel, “Housing Production, Filtering, and Displacement: Untangling the Relationship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 Research Brief, May 2016, www.urbandisplacement.org/sites/default/files/images/udp_research_brief_052316.pdf.

[20] Arindrajit Dube, “The Minimum We Can Do,”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2013,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3/11/30/the-minimumwe-can-do; Arindrajit Dube, T. William Lester, and Michael Reich,“Minimum Wage Effects Across State Borders: Estimates Using Contiguous Count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2, no. 4 (2010): 945–964.

[21] Richard Florida, “The Case for a Local Minimum Wage,” CityLab,December 11, 2013, www.citylab.com/work/2013/12/why-every-city-needsits-own-minimum-wage/7801; Arindrajit Dube, “Proposal 13: Designing Thoughtful Minimum Wage Policy at the State and Local Levels,” 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4/06/19-minimumwage-policy-state-local-levels-dube.

[22] James Womack, Daniel T. Jones, and Daniel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23] Zeynep Ton, The Good Jobs Strategy: How the Smartest Companies Invest in Employees to Lower Costs and Boost Profi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4); Richard Florida, “The Business Case for Paying Service Workers More,” CityLab, March 3, 2014, www.theatlanticcities.com/jobsand-economy/2014/03/case-paying-service-workers-more/8506.

[24] Michael Erard, “Creative Capital? In the City of Ideas, the People with Ideas Are the Ones with Day Jobs,” Austin Chronicle, February 28, 2003 www.austinchronicle.com/news/2003-02-28/147078.

[25] Robert J. Sampso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Economic Mobility in the Great Recession Era: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Persistent Inequality,”in Economic Mobility: Research and Ideas on Strengthening Families,Communities, and the Economy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2016).

[26] 关于儿童早教，参见James J. Heckman, “Skill 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Children,” Science 312 (June 2006): 1900–1902;William Dickens, Isabell Sawhill, and Jeffrey Tebbs, “The Effects of Investing in Early Educ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e 2006;Timothy Bartik, “Investing in Kids: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pjohn Institute, 2014, http://research.upjohn.org/up_press/207。关于公共教育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参见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7] 参见 Robert A. Moffit, ‘The Negative Income Tax and the Evolution of U.S.Welfare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 no. 1 (August 2003):119–140。

[28] 一位评论家称之为人的风险投资。Steven Randy Waldman, “VC for the People,” Interfluidity, April 16, 2014, www.interfluidity.com/v2/5066.html.

[29] Richard Florida, “How Stronger Cities Could Help Fix Fragile Nations,”CityLab, November 19, 2015, www.citylab.com/politics/2015/11/howstronger-cities-could-help-fix-fragile-nations/416661.

[30] Brandon Fuller, “Rethinking Refugee Camp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Solving an Intractable Problem,” City Journal, December 11, 2015, www.city-journal.org/2015/eon1211bf.html.

[31] 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Unleashing Metro Growth: Final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ity Growth Commission,” London, October 2015, www.thersa.org/discover/publicationsand-articles/reports/unleashing-metro-growth-final-recommendations.

[32] 参见Benjamin Barber, 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 Dysfunctional Cites, Rising Na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Barber, “Can Cities Counter the Power of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The Nation, November 14, 2013, www.thenation.com/article/can-cities-counter-the-power-of-president-electdonald-trump/。

附录

本附录提供了有关本书使用的主要变量和统计分析的详细信息，以及美国城市在以下三个主要指数上的完整排名：新城市危机指数、隔离-不平等指数和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主要指标和测量方式

关键变量和指数的定义和来源如下。

阶层

创意阶层。 创意阶层包括从事以下工作的人群：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建筑和工程，生命、自然和社会科学，艺术、设计、音乐、娱乐、体育和媒体，管理、商业和金融，法律、医疗、教育和培训。

工人阶层。 工人阶层包括从事以下蓝领工作的人群：工厂生产，开采、安装、维护和修理，生产、交通和物流，建筑。

服务阶层。 服务阶层包括从事以下日常服务工作的人群：食品准备等食品服务，建筑和场地的清洁维护，个人护理和服务，低端销售，办公室和行政支持，社区和社会服务，安保服务。

三类阶层的数据来自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2010年。

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是基于基尼系数的传统衡量标准，来自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美国社区调查。

工资不平等： 工资不平等反映创意阶层、工人阶层和服务阶层之间的工资差距，基于泰尔指数计算，该指数是衡量工资不平等的常用指标。[1] 数据来自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2010年。

综合不平等指数：该指数是用收入不平等和工资不平等得到的平均加权指数。

经济隔离

第六章中用到了两类经济隔离的衡量标准。

特定经济隔离指数

特定经济隔离指数有七个，它们反映了美国城市中七万多个人口普查区的隔离情况。每个指数都是根据相异指数计算的，该指数比较某地区特定人群与其他人的分布情况。[2]特定人群与整体人口相比，分布越均匀，隔离程度就越低。相异指数D表示为：

$$D = \frac{1}{2}\sum_{i=1}^{n}\left|\frac{x_i}{X} - \frac{y_i}{Y}\right|$$

x_i是第i个人口普查区中特定人群的人数，X是大城市地区中特定人群的人数。y_i指人口普查区中“其他人”的数量，Y是大都市区中“其他人”的数量。n表示大城市地区中人口普查区的数量，D表示我们选定的特定群体在各人口普查区的分布与其他人的分布差异。D的数值范围从0到1，其中0表示最低隔离（或完全融合），1表示最高隔离。这个指数是隔离的绝对量度值，数值越高表示隔离程度越高。反映各个群体的住宅位置的数据来自2010年的美国社区调查。

穷人的隔离：衡量收入低于联邦政府规定的贫困水平的家庭的居住隔离。

富人的隔离：衡量收入高于20万美元的家庭的居住隔离。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的隔离：衡量未获得高中学历的成年人的居住隔离。

大学毕业生的隔离：衡量大学毕业的成年人的居住隔离。

创意阶层隔离：衡量创意阶层的居住隔离。

服务阶层隔离：衡量服务阶层的居住隔离。

工人阶层隔离：衡量工人阶层的居住隔离。

综合隔离指数

还有四个综合指数衡量更广泛的经济隔离，是相对的衡量标准，数值较高表示与其他城市相比经济隔离程度较高。

收入隔离：综合富人隔离和穷人隔离的整体隔离指数。

教育隔离：综合大学毕业生的隔离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未完成高中的人）的隔离的整体隔离指数。

职业隔离：综合创意阶层、工人阶层和服务阶层的隔离的整体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综合七个特定经济隔离指数（同比重加权）的经济隔离指数。

其他综合指数

有两个更广泛的综合指数，也是相对的测量标准，数值较高表示与其他城市相比程度较高。

隔离-不平等指数：将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工资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数据以相同比重加权结合，得到的衡量不平等和隔离水平的综合指标。

新城市危机指数：将工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和住房负担（基于住房成本与收入的比值）四项指标以相同比重加权结合，得到的综合指标。

其他变量

书中统计分析使用的其他关键变量如下。

人均收入：平均人均收入，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工资：平均工资，来自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

人均经济产出：基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大学毕业生：大学本科以上成年人口的比例，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高科技产业：基于米尔肯研究所的技术极点指数，该指数衡量单个城市高科技产业产出占国家总高科技产业产出的比值[3]，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的郡商业模式报告。

特定创意阶层职业：将创意阶层职业分解为特定的亚群组，包括科学和技术，商业和管理，艺术、文化和媒体，教育和医疗。

风险资本投资：投资于高科技创业公司的风险投资金额，来自汤森路透2013年的分析报告。

工会化：工会成员在工人中的占比。[4]

住房成本中位数：月住房成本的中位数，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住房成本占收入的比例：住房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人口规模：城市人口，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密度：基于到市中心或市政厅距离的人口加权密度，来自美国人口普查数据。[5]

公共交通：乘公共交通工具通勤的上班族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独自驾车上班：独自驾车上班的上班族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骑自行车上班：骑自行车上班的上班族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步行上班：步行上班的上班族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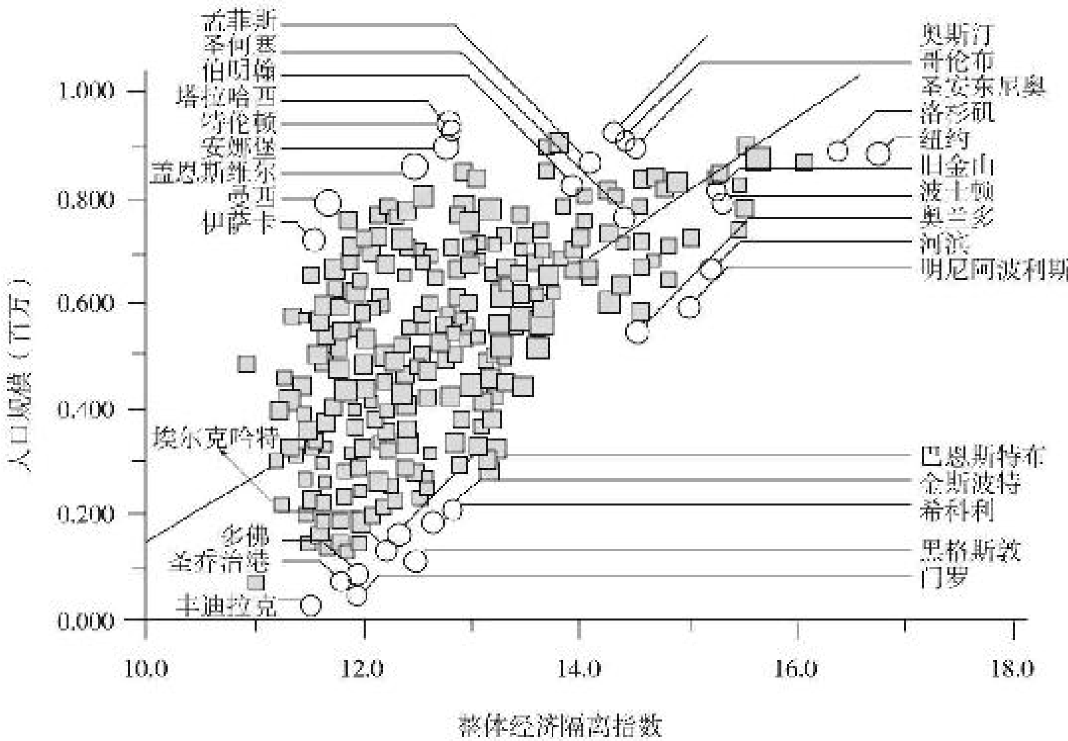
种族和民族：白人、黑人、亚洲人或拉丁裔人口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外国出生居民：外国出生居民比例，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男女同性恋指数：衡量男女同性恋家庭聚集的区位指数，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自由派或保守派：根据2008年、2012年和2016年选举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在各个州和城市获得的选票。[6]

附表1 风险投资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分析来自夏洛塔·梅兰德，基于汤森路透、美国统计局、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注：一个星号表示统计数据的显著性在5%的置信区间，两个星号表示统计数据的显著性在1%的置信区间。

附表2 绅士化的相关性

变量	绅士化的相关性
工资	0.62**
收入	0.61**
使用公交通勤者	0.61**
人口	0.59**
高新技术产业	0.58**
创意阶层	0.55**
每月住房成本	0.53**
大学毕业生	0.51**
男女同性恋者	0.47**
租房中间价格	0.47**
密度	0.44**
住房中间价格	0.40**
步行上班	0.36**
骑自行车上班	0.35*
收入不平等	0.33*
科技工作者	0.32*
服务阶层	-0.18
工人阶层	-0.48**
驾车上班	-0.55**

资料来源：分析来自夏洛塔·梅兰德，数据来源于丹尼尔·哈特利的《绅士化与金融健康》，以及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美国统计局、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

注：绅士化是指2000年至2007年间，从大城市地区房价分布的下半部分向上半部分转移的社区或人口普查区域。

附表3 经济隔离的相关性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收入隔离	整体教育隔离	整体职业隔离
不平等隔离指数	—	0.872**	0.641**	0.842**	0.854**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0.872**	—	0.825**	0.935**	0.946**
收入隔离	0.641**	0.825**	—	0.677**	0.649**
整体教育隔离	0.842**	0.935**	0.677**	—	0.852**
整体职业隔离	0.854**	0.946**	0.649**	0.852**	—
人口	0.563**	0.643**	0.525**	0.621**	0.596**
密度	0.463**	0.560**	0.438**	0.557**	0.520**
人均经济产出	0.406**	0.405**	0.268**	0.405**	0.405**
收入	0.308**	0.291**	0.159**	0.279**	0.321**
工资	0.426**	0.456**	0.249**	0.474**	0.477**
高新技术产业	0.587**	0.619**	0.479**	0.588**	0.599**
大学毕业生	0.536**	0.465**	0.300**	0.431**	0.495**
创意阶层	0.557**	0.532**	0.352**	0.503**	0.554**
服务阶层	-0.043	-0.124*	-0.109*	-0.162**	-0.079
工人阶层	-0.446**	-0.370**	-0.175**	-0.354**	-0.426**
分享租房	0.420**	0.386**	0.152**	0.408**	0.431**
住房成本	0.270**	0.312**	0.100	0.362**	0.342**
公交通勤	0.369**	0.377**	0.232**	0.337**	0.417**
独自驾车上班	-0.243**	-0.230**	0.026	-0.265**	-0.317**
自由派	0.305**	0.319**	0.240**	0.272**	0.335**
保守派	-0.301**	-0.313**	-0.229**	-0.268**	-0.332**
黑人	0.299**	0.292**	0.304**	0.234**	0.264**
白人	-0.392**	-0.434**	-0.254**	-0.479**	-0.424**
西班牙裔－拉丁裔	0.237**	0.244**	0.018	0.380**	0.236**
亚裔	0.272**	0.304**	0.094	0.317**	0.362**
外国出生居民	0.379**	0.380**	0.073	0.479**	0.421**
男女同性恋者	0.470**	0.422**	0.067	0.478**	0.514**

资料来源：参见附录文本中的主要指标和测量方式。

附表4 大都会地区在新城市危机指数、不平等隔离指数、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上的排名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大都会地区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诺瓦克	1	0.978	1	0.988	9	0.898
洛杉矶－长滩－圣安娜	2	0.972	3	0.967	10	0.893
纽约－北新泽西－长岛	3	0.967	2	0.977	11	0.889
盖恩斯维尔	4	0.952	5	0.959	14	0.870
大学城－布莱恩	5	0.944	4	0.964	36	0.788
旧金山－奥克兰－菲蒙市	6	0.922	9	0.920	29	0.817
圣塔芭芭拉－圣玛丽亚－戈利塔	7	0.914	15	0.892	45	0.774
塔拉哈西	8	0.912	11	0.904	1	0.947
雅典－克拉克城	9	0.897	10	0.916	47	0.773
圣迭戈－卡尔斯巴德－圣马科斯	10	0.884	31	0.848	24	0.831
弗雷斯诺	11	0.879	22	0.866	19	0.854
芝加哥－内伯威尔市－乔利埃特	12	0.878	17	0.889	15	0.868
特伦敦－尤英	13	0.875	8	0.922	2	0.933
迈阿密－劳德代尔堡－波姆帕诺海滩	14	0.875	40	0.833	39	0.786
波士顿－坎布里奇－昆西	15	0.874	21	0.873	34	0.799
雷诺－斯帕克斯	16	0.872	26	0.860	17	0.856
博尔德	17	0.857	14	0.896	89	0.689
费城－卡姆登－威尔明顿	18	0.852	12	0.903	13	0.873
安娜堡	19	0.847	19	0.883	8	0.902
奥斯汀－朗德罗克	20	0.845	18	0.885	3	0.925
孟菲斯	21	0.842	29	0.853	16	0.867
休斯敦－舒格兰－贝城	22	0.841	7	0.934	7	0.903
达拉斯－沃思堡－阿灵顿	23	0.837	13	0.897	12	0.875
哥伦布	24	0.836	25	0.861	32	0.807

续表

大都会地区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illegible]经济隔离指数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达勒姆	25	0.833	6	0.935	23	0.835
夏洛特－加斯托尼亚－康科德	26	0.831	15	0.892	33	0.805
丹佛－奥罗拉	27	0.829	32	0.844	21	0.841
图森	28	0.820	30	0.852	5	0.906
亚特兰大－桑迪斯普林斯－玛丽埃塔	29	0.817	44	0.815	60	0.738
夏洛茨维尔	30	0.815	24	0.863	98	0.677
圣何塞－森尼维尔市－圣克拉拉	31	0.811	48	0.804	49	0.766
萨利纳斯	32	0.811	61	0.762	38	0.787
梅肯	33	0.800	35	0.837	43	0.780
纽黑文－米尔福德	34	0.799	58	0.766	58	0.741
布朗斯维尔－哈林根	35	0.788	42	0.828	128	0.610
新奥尔良－梅特里－肯纳	36	0.787	56	0.779	85	0.705
坦帕－彼得斯伯里－克利尔沃特	37	0.785	71	0.742	116	0.646
格林维尔	38	0.784	53	0.793	129	0.609
斯泰特科利奇	39	0.783	23	0.865	51	0.762
圣达菲	40	0.781	34	0.838	95	0.681
伯明翰－胡佛	41	0.780	20	0.879	25	0.830
克利夫兰－伊利里亚－曼托	42	0.778	41	0.829	22	0.837
埃尔帕索	43	0.774	45	0.811	56	0.742
拉斯克鲁塞斯	44	0.772	39	0.833	99	0.675
查尔斯顿－北查尔斯顿－萨默维尔	45	0.770	61	0.762	61	0.737
巴尔的摩－陶森	46	0.769	54	0.791	27	0.823
菲尼克斯－梅萨－斯科茨代尔	47	0.769	76	0.733	20	0.842
奥克斯纳德－橡木城－文图拉	48	0.759	96	0.688	97	0.679

续表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社会经济隔离指数	
大都会地区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科珀斯克里斯蒂	49	0.758	48	0.804	103	0.672
哥伦布	50	0.757	42	0.828	4	0.912
麦卡伦－爱丁堡－米申	51	0.756	50	0.803	122	0.624
华盛顿－阿灵顿－亚历山德里亚	52	0.754	71	0.742	25	0.830
拉伯克	53	0.753	33	0.840	87	0.702
圣安东尼奥	54	0.749	27	0.858	6	0.903
普罗维登斯－新贝德福德－福尔里弗	55	0.747	85	0.715	126	0.611
格林斯伯勒－海波因特	56	0.733	55	0.784	45	0.774
圣塔克鲁兹－沃森维尔	57	0.729	118	0.641	213	0.441
那不勒斯－马可岛	58	0.728	98	0.678	112	0.657
贝克斯菲尔德	59	0.722	106	0.667	63	0.732
杰克逊	60	0.721	47	0.805	41	0.784
列克星敦－费耶特	61	0.720	36	0.836	52	0.762
布卢明顿	62	0.719	78	0.730	65	0.731
西雅图－塔科马－贝尔维尤	63	0.718	104	0.668	67	0.727
奥尔巴尼	64	0.718	77	0.732	91	0.687
密尔沃基－沃基肖－西艾利斯	65	0.716	69	0.743	54	0.749
阿尔伯克基	66	0.713	64	0.756	80	0.715
纳帕	66	0.713	114	0.644	212	0.442
萨克拉门托－阿登－罗斯维尔	68	0.711	122	0.634	76	0.717
伊萨卡	69	0.710	87	0.712	68	0.723
开普科勒尔－迈尔斯堡	70	0.709	113	0.645	172	0.521
纳什维尔－戴维森－默弗里斯伯勒－富兰克林	71	0.704	65	0.755	28	0.821
欧本－欧佩莱卡	72	0.704	73	0.740	161	0.540

续表

大都会地区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锡巴斯琴－维罗海滩	73	0.700	104	0.668	136	0.596
奥兰多－基西米	74	0.697	132	0.608	157	0.548
温斯顿－塞勒姆	75	0.696	51	0.803	90	0.689
格林维尔－莫尔丁－伊斯利	76	0.694	46	0.809	75	0.718
哈特福德－西哈特福德－东哈特福德	76	0.694	86	0.713	100	0.674
劳伦斯	78	0.692	110	0.651	189	0.493
罗利－卡瑞	79	0.689	58	0.766	37	0.787
曼西	80	0.688	61	0.762	35	0.795
阿克伦	81	0.685	70	0.743	58	0.741
韦科	82	0.684	82	0.723	115	0.647
拉雷多	83	0.683	125	0.626	53	0.752
科林斯堡－拉夫兰	84	0.682	111	0.649	217	0.424
底特律－沃伦－利沃尼亚	85	0.681	109	0.656	18	0.854
奇科	86	0.681	135	0.599	202	0.466
艾奥瓦城	87	0.679	57	0.777	83	0.711
莫比尔	88	0.679	91	0.699	132	0.606
萨凡纳	89	0.678	124	0.630	117	0.644
哥伦比亚（南卡罗来纳州）	90	0.676	67	0.750	62	0.733
哥伦比亚（密苏里州）	91	0.673	88	0.703	167	0.528
奥古斯塔－里士满	92	0.671	63	0.761	84	0.710
科罗拉多泉	93	0.670	115	0.644	66	0.729
印第安纳波利斯－卡梅尔	94	0.667	81	0.725	31	0.812
杰克逊维尔	94	0.667	127	0.623	114	0.649
辛辛那提－米德尔敦	96	0.659	84	0.717	101	0.673

续表

大部会地区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摩根敦	97	0.655	28	0.857	108	0.665
里士满	98	0.651	120	0.637	30	0.812
泰勒	99	0.647	75	0.739	133	0.602
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布卢明顿	100	0.647	121	0.635	136	0.596
波特兰－温哥华－比弗顿	101	0.646	144	0.578	143	0.581
代顿	102	0.646	93	0.693	86	0.702
米德兰	103	0.642	37	0.836	120	0.636
诺克斯维尔	104	0.641	66	0.753	105	0.669
匹兹堡	105	0.640	51	0.803	92	0.686
俄克拉何马城	106	0.638	67	0.750	55	0.743
布莱克斯堡－克里斯琴斯堡－拉德福	107	0.636	80	0.727	118	0.642
里弗赛德－圣贝纳迪诺－安大略	107	0.636	165	0.516	103	0.672
尚佩恩－厄巴纳	109	0.634	108	0.661	48	0.769
路易斯维尔	109	0.634	38	0.834	72	0.719
卡拉马祖－波蒂奇	111	0.633	112	0.647	165	0.531
小石城－北小石城－康韦	112	0.630	73	0.740	70	0.723
塔斯卡卢萨	113	0.624	128	0.622	64	0.731
奈尔斯－本顿港	114	0.616	79	0.728	141	0.586
棕榈湾－墨尔本－泰特斯维尔	115	0.614	156	0.546	235	0.384
蒙哥马利	116	0.613	115	0.644	81	0.713
托莱多	116	0.613	117	0.643	71	0.721
大西洋城－哈蒙顿	118	0.612	181	0.487	218	0.423
威尔明顿	118	0.612	150	0.561	145	0.579
圣罗莎－佩塔卢马	120	0.610	181	0.487	264	0.320

续表

大都会地区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不伦瑞克	121	0.607	90	0.701	110	0.661
杰克逊	122	0.606	133	0.606	140	0.587
莫德斯托	123	0.605	186	0.482	234	0.387
罗切斯特	124	0.604	107	0.663	96	0.681
弗吉尼亚海滩－罗福－纽波特纽斯	125	0.602	165	0.516	121	0.634
圣露西港	126	0.601	187	0.480	248	0.347
堪萨斯城	127	0.601	103	0.669	40	0.785
圣路易斯	127	0.601	101	0.671	76	0.717
什里夫波特－博西尔城	129	0.596	100	0.674	107	0.667
欧塞德	130	0.594	185	0.484	243	0.362
盐湖城	131	0.593	144	0.578	94	0.682
尤金－斯普林菲尔德	132	0.592	175	0.497	187	0.495
科瓦利斯	133	0.586	123	0.633	205	0.453
艾姆斯	134	0.585	92	0.694	146	0.577
拉斐特	135	0.584	136	0.597	124	0.616
盖恩斯维尔	136	0.582	155	0.547	184	0.497
琼斯伯勒	137	0.581	99	0.677	160	0.545
皮茨菲尔德	138	0.575	143	0.578	292	0.273
维塞利亚－波特维尔	139	0.574	190	0.469	138	0.593
弗林特	140	0.573	152	0.555	149	0.570
拉斯维加斯－天堂市	141	0.572	204	0.447	78	0.717
檀香山	142	0.572	196	0.459	125	0.612
斯托克顿	143	0.570	208	0.433	155	0.557
麦迪逊	144	0.569	141	0.581	129	0.609

续表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大都会地区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迪凯特	145	0.569	83	0.721	151	0.568
伍斯特	146	0.566	153	0.555	156	0.553
阿马里洛	147	0.565	89	0.701	42	0.783
哈蒂斯堡	148	0.565	129	0.617	185	0.496
阿比林	149	0.563	97	0.685	69	0.723
埃尔森特罗	150	0.562	203	0.448	314	0.228
马德拉	151	0.560	212	0.429	179	0.503
塔尔萨	152	0.559	119	0.640	111	0.658
兰辛－东兰辛	153	0.556	139	0.581	74	0.719
伯灵顿－南伯灵顿	154	0.555	193	0.463	231	0.394
巴吞鲁日	155	0.551	101	0.671	81	0.713
门罗	156	0.550	95	0.689	134	0.600
路易维尔－杰斐逊	157	0.548	130	0.613	50	0.762
诺威奇－新伦敦	158	0.548	171	0.504	158	0.547
布卢明顿－诺默尔	159	0.547	94	0.692	88	0.699
费耶特维尔	160	0.543	199	0.455	232	0.391
查塔努加	161	0.541	138	0.582	199	0.472
斯普林菲尔德	162	0.540	173	0.500	139	0.593
瓦尔多斯塔	163	0.536	167	0.514	168	0.528
博伊西－楠帕	164	0.535	177	0.494	206	0.449
弗拉格斯塔夫	165	0.535	189	0.474	162	0.536
布法罗－尼亚加拉瀑布	166	0.533	131	0.609	93	0.682
普韦布洛	167	0.531	178	0.494	123	0.622
大兰城	168	0.530	227	0.391	237	0.380

续表

大都会地区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出丁	169	0.529	230	0.385	295	0.268
卡森市	170	0.528	159	0.532	193	0.489
波基普西－纽堡－米德尔敦	171	0.528	209	0.430	207	0.448
奥马哈－康瑟尔布拉夫斯	172	0.526	139	0.581	56	0.742
鲍灵格林	173	0.518	134	0.601	170	0.523
费耶特维尔－斯普林代尔－罗杰斯	174	0.515	146	0.570	213	0.441
普罗沃－奥勒姆	174	0.515	210	0.429	181	0.500
美特尔海滩－北美特尔海滩－康韦	176	0.513	207	0.440	245	0.359
索尔兹伯里	177	0.510	221	0.401	277	0.298
曼彻斯特－纳舒厄	178	0.507	215	0.417	238	0.378
尤巴城	179	0.506	235	0.374	280	0.296
罗马	180	0.500	168	0.511	342	0.140
莱克兰－温特黑文	181	0.497	213	0.424	150	0.569
南本德－米沙瓦卡	182	0.495	169	0.510	152	0.567
巴恩斯特布尔	183	0.492	245	0.358	332	0.164
德尔托纳－代托纳比奇－奥蒙德海滩	183	0.492	235	0.374	246	0.359
阿伦敦－伯利恒－伊斯顿	185	0.488	200	0.453	165	0.531
弗洛伦斯	186	0.485	142	0.579	236	0.382
大急流城－怀俄明	187	0.483	192	0.464	126	0.611
圣路易斯－奥比斯保－帕索罗布尔斯	188	0.481	262	0.318	260	0.324
罗切斯特	189	0.478	154	0.553	177	0.506
波特兰－南波特兰－比迪福德	190	0.477	222	0.401	277	0.298
梅德福	191	0.476	251	0.346	266	0.317
莱克查尔斯	192	0.476	126	0.623	201	0.467

续表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大都会地区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拉安德城	192	0.476	184	0.485	223	0.416
巴拿马城－林恩文	194	0.470	233	0.378	182	0.499
雷城	195	0.467	165	0.516	119	0.638
肯纳威克－帕斯科－里奇兰	196	0.465	157	0.545	72	0.719
奥尔巴尼－斯克内克塔迪－特洛伊	197	0.464	176	0.497	142	0.584
宾厄姆顿	198	0.463	149	0.561	220	0.422
格尔夫波特－比洛克西	199	0.462	210	0.429	296	0.268
温泉村	200	0.456	195	0.460	343	0.136
拉法叶	201	0.455	137	0.590	211	0.444
斯波坎	201	0.455	216	0.417	165	0.531
温切斯特	203	0.453	228	0.389	297	0.267
约翰逊城	204	0.452	150	0.561	247	0.357
罗克福德	205	0.451	225	0.396	154	0.559
罗阿诺克	206	0.448	179	0.493	135	0.597
林肯	207	0.444	170	0.509	144	0.579
米苏拉	208	0.442	237	0.372	324	0.199
斯普林菲尔德	209	0.440	147	0.566	44	0.775
哥伦布	210	0.440	163	0.518	230	0.396
威奇托	211	0.437	162	0.521	103	0.672
博蒙特－阿瑟港	212	0.435	148	0.565	147	0.575
普雷斯科特	213	0.433	266	0.314	305	0.254
汇致登	214	0.432	172	0.501	190	0.491
萨吉诺－萨吉诺乡北	215	0.430	219	0.405	188	0.494
斯帕坦堡	216	0.428	174	0.498	174	0.517

续表

大都会地区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得梅因－西得梅因	217	0.422	191	0.468	108	0.665
蒲基山城	218	0.422	244	0.359	244	0.361
巴特尔克里克	219	0.421	230	0.385	257	0.329
多森	220	0.416	161	0.528	267	0.315
汉福德－科克伦	221	0.416	270	0.296	106	0.668
玫刺萨	222	0.414	158	0.545	203	0.465
棕榈海岸	223	0.414	297	0.239	304	0.259
孟林－坦吉尔－娜德堡	224	0.413	226	0.393	226	0.411
坎顿－马西隆，	225	0.410	198	0.456	163	0.532
圣安吉洛	226	0.409	183	0.487	153	0.566
亚力山德里亚	227	0.408	188	0.476	241	0.364
瓦洛戈尔尔达	228	0.406	278	0.286	340	0.143
彭萨科拉－费里帕斯－布伦特	229	0.403	269	0.299	254	0.332
瓦列霍－费尔菲尔德	230	0.403	311	0.217	268	0.314
查尔斯顿	231	0.400	160	0.530	131	0.608
格里利	232	0.393	283	0.275	113	0.655
韦恩堡	233	0.390	180	0.489	79	0.716
金斯顿	234	0.388	299	0.234	307	0.248
伯灵顿	235	0.384	240	0.367	225	0.412
哈里森堡	236	0.382	246	0.355	297	0.267
威奇托福尔斯	237	0.381	201	0.451	197	0.480
伊利	238	0.379	216	0.417	222	0.419
苏濯	239	0.377	202	0.448	200	0.469
亨廷顿－阿什兰	240	0.374	194	0.462	309	0.243

续表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六都会地区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奥卡拉	241	0.373	290	0.254	318	0.214
亚基马	242	0.370	267	0.307	170	0.523
贝灵厄姆	243	0.368	303	0.230	311	0.234
科达伦	244	0.366	291	0.252	354	0.097
马斯基根－诺顿绍尔	245	0.365	282	0.276	233	0.388
阿什维尔	246	0.363	248	0.353	274	0.302
塞勒姆	247	0.362	312	0.216	251	0.337
斯普林菲尔德	248	0.359	206	0.440	239	0.377
达文波特－莫林－罗克艾兰	249	0.360	241	0.366	208	0.448
林奇堡	249	0.359	218	0.415	192	0.489
哈里斯堡－卡莱尔	251	0.358	224	0.398	169	0.524
本德	252	0.355	328	0.176	321	0.208
法戈	253	0.352	219	0.405	319	0.213
利马	254	0.352	236	0.373	185	0.496
安德森	255	0.351	214	0.422	249	0.343
桑达斯基	256	0.349	251	0.346	317	0.218
皮奥里亚	257	0.346	205	0.443	178	0.504
惠灵	257	0.346	196	0.459	271	0.311
安克雷奇	259	0.344	273	0.292	216	0.425
斯克兰顿－威尔克斯－巴里	260	0.343	250	0.348	258	0.328
杨斯敦－沃伦－博德曼	261	0.339	242	0.364	180	0.501
杰克逊维尔	262	0.338	331	0.164	262	0.322
布雷默顿	263	0.334	321	0.189	293	0.271
霍兰－格兰德港	263	0.334	275	0.292	290	0.279

续表

大都会地区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奥林匹亚	265	0.333	309	0.219	283	0.288
埃尔迈拉	266	0.330	223	0.400	148	0.573
刘易斯顿－奥本	267	0.329	322	0.188	334	0.158
雷丁	268	0.329	272	0.294	215	0.438
瓦恩兰－米尔维尔－布里奇顿	269	0.328	333	0.161	308	0.243
克拉克斯维尔	270	0.327	284	0.269	176	0.506
奥什科什－尼纳	271	0.327	246	0.355	256	0.330
埃文斯维尔	272	0.322	239	0.370	183	0.498
沃纳罗宾斯	272	0.322	231	0.382	284	0.287
奥格登－克利尔菲尔德	274	0.322	273	0.292	219	0.423
托皮卡	275	0.321	233	0.378	210	0.444
班戈	276	0.318	281	0.281	287	0.285
海恩斯维尔－斯图尔特堡	277	0.317	339	0.135	281	0.294
多尔顿	278	0.313	260	0.322	175	0.507
杜鲁斯	279	0.309	253	0.342	259	0.325
杰克逊	280	0.307	293	0.246	204	0.454
洛根	281	0.303	284	0.269	227	0.405
大福克斯	282	0.303	238	0.371	323	0.201
萨姆特	283	0.298	276	0.290	250	0.337
坎伯兰	284	0.298	249	0.352	339	0.147
特雷霍特	285	0.296	263	0.316	220	0.422
派恩布拉夫	286	0.292	271	0.296	272	0.309
大章克申	287	0.290	318	0.204	306	0.251
帕斯卡古拉	288	0.288	254	0.341	228	0.401

续表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大都会地区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尤提卡－罗马	289	0.287	257	0.335	198	0.476
夏延	290	0.284	267	0.307	252	0.334
拉辛	291	0.283	307	0.219	302	0.263
安尼斯顿－牛津	292	0.283	265	0.315	288	0.285
尤马	293	0.283	317	0.205	196	0.482
朗维尤	294	0.281	324	0.182	261	0.323
维多利亚	295	0.278	243	0.361	262	0.322
斯普林菲尔德	296	0.274	301	0.233	195	0.482
欧克莱尔	297	0.271	293	0.246	327	0.188
科科莫	298	0.267	264	0.316	242	0.363
阿尔图纳	299	0.266	258	0.332	289	0.280
朗维尤	300	0.266	255	0.338	335	0.158
金斯波特－布里斯托尔－布里斯托尔	301	0.263	259	0.331	329	0.187
特克萨卡纳，TX－特克萨卡纳	302	0.263	261	0.320	282	0.292
爱达荷福尔斯	303	0.257	289	0.256	331	0.169
安德森	304	0.256	305	0.228	194	0.486
霍马－巴约肯－蒂博多	305	0.255	256	0.338	265	0.319
坎卡基－布拉德利	306	0.252	329	0.166	240	0.374
多佛尔	307	0.248	337	0.139	355	0.089
哈瓦苏湖城－金曼	308	0.247	353	0.097	332	0.164
乔普林	309	0.242	307	0.219	325	0.195
丹维尔	310	0.239	327	0.177	313	0.232
希科里－勒诺－摩根顿	310	0.239	302	0.231	320	0.210
弗洛伦斯－马斯尔肖尔斯	312	0.237	277	0.287	336	0.155

续表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大都会地区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苏城	312	0.237	280	0.282	158	0.547
格林贝	314	0.237	309	0.219	269	0.314
费尔班克斯	315	0.235	338	0.136	291	0.277
锡达拉皮兹	316	0.233	279	0.286	253	0.333
圣克劳德	316	0.233	316	0.206	301	0.264
芒特弗农－阿纳科特斯	318	0.227	357	0.061	337	0.153
波卡特洛	318	0.227	295	0.245	273	0.307
拉克罗斯	320	0.222	292	0.247	312	0.233
贝城	321	0.219	288	0.257	352	0.113
兰开斯特	321	0.219	330	0.166	270	0.314
曼斯费尔德	321	0.219	298	0.237	173	0.517
戈尔兹伯勒	324	0.218	326	0.181	341	0.141
简斯维尔	325	0.218	342	0.128	275	0.299
史密斯堡	326	0.214	286	0.261	299	0.266
约翰斯敦	327	0.198	287	0.258	229	0.399
比灵斯	328	0.195	324	0.182	286	0.285
沃特卢－锡达福尔斯	329	0.192	300	0.234	191	0.490
黑格斯敦－马丁斯堡	330	0.190	348	0.108	350	0.116
圣乔治	331	0.189	359	0.032	357	0.074
丹维尔	332	0.189	314	0.208	224	0.416
迪比克	333	0.187	306	0.221	208	0.448
门罗	333	0.187	349	0.103	358	0.049
俾斯麦	335	0.186	296	0.243	348	0.118
约克－汉诺威	335	0.186	344	0.119	275	0.299

续表

大都会地区	新城市危机指数		不平等隔离指数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谢尔曼－丹尼森	337	0.184	335	0.154	351	0.115
劳顿	338	0.184	332	0.162	279	0.296
大瀑布城	339	0.182	323	0.185	255	0.331
密歇根城－拉波特	340	0.182	341	0.129	322	0.203
帕克斯堡－玛丽埃塔－维也纳	341	0.179	303	0.230	330	0.183
格伦斯福尔斯	342	0.175	354	0.095	328	0.188
韦纳奇	343	0.171	351	0.101	347	0.120
威廉斯波特	343	0.171	345	0.117	346	0.132
埃尔克哈特－戈申	345	0.170	355	0.089	343	0.136
伊丽莎白	346	0.170	336	0.150	315	0.224
迪凯特	347	0.168	313	0.209	302	0.263
法明顿	348	0.159	315	0.206	300	0.265
莫里斯敦	348	0.159	334	0.160	353	0.099
欧文斯伯勒	350	0.155	319	0.196	294	0.269
卡斯珀	351	0.152	320	0.190	345	0.133
阿普尔顿	352	0.150	343	0.127	316	0.224
希博伊根	353	0.143	346	0.114	338	0.150
刘易斯顿	354	0.129	350	0.102	356	0.075
圣约瑟夫	355	0.118	340	0.131	310	0.240
莱巴嫩	356	0.104	347	0.111	285	0.286
沃索	357	0.101	351	0.101	349	0.117
丰迪拉克	358	0.099	358	0.050	359	0.029
杰斐逊城	359	0.062	356	0.082	326	0.189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人口调查局和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1] Paul D. Allison, “Measures of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no. 6 (December 1978): 865-880.

[2] 关于相异指数，请参见Douglas Massey and Nancy Denton, “The Dimension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ocial Forces 67, no. 2 (1988): 281–315。

[3] 关于米尔肯研究院的高科技指数，请参见Ross DeVol, Perry Wong, John Catapano, and Greg Robitshek, America’s High-Tech Economy: Growth,Development, and Risks for Metropolitan Areas (Santa Monica, CA: Milken Institute, 1999)。

[4] Barry Hirsch and David MacPherson, “Union Membership and Coverage Database from the CPS,” Union Stats, 2014, http://unionstats.com.

[5] 关于人口加权密度，请参见Steven G. Wilson, David A. Plane, Paul J.Mackun, Thomas R. Fischetti, and Justyna Goworowska et al., Patterns of Metropolitan and Micropolitan Population Change: 2000 to 2010, 2010 Census Special Reports, September2012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www.census.gov/prod/cen2010/reports/c2010sr-01.pdf。

[6] 州级选举数据来自权威媒体，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城市的选举结果由郡县结果汇集而成，参见Dave Leip’s “Atlas of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or 2012 and 2016, http://uselectionatlas.org。

致谢

我关于这本书的想法是受到一场谈话的启发。2013年夏天，我在纽约和编辑与出版商探讨关于另一本书的构想。那是一个天气宜人的夜晚，我在苏荷区克罗斯比街酒店的休息室与Basic Books（出版社）的人聊天，在我努力解释自己观察到的再城市化趋势时，出版商拉腊·海默特打断了我："你说的是新城市危机，写这本书吧。"她确实是对的，在我还几乎不确定它是什么时，就已经忙着在做这件事了。

但首先，我需要重新调整自己。我最早的研究方向是住房和城市问题，但在职业生涯后面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专注于研究促进城市创新及经济增长的要素。在本书中我需要深入探讨城市社会学领域，特别是城市贫困、集中劣势和社区的长期影响。我与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马丁繁荣研究所的团队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包括不平等和经济隔离的地理分布、绅士化的猜想与现实、亿万富翁的地理分布和超级富豪的城市入侵、创业城市化的规模和挑战、城市和郊区之间新的深层鸿沟，以及全球城市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在研究新城市危机的深度以及绘制它在城市、郊区和全部都会区的断层线时，我发现不论是城市经济学还是城市社会学都没能勾勒出它的全景。前者主要关注集中优势，后者主要关注集中劣势，把二者观点结合互补，就能找到一个理解新城市危机的新方式和综合体。

这个大型项目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从中收获了诸多启发和教益。对作者而言，海默特是最理想的出版商。她帮我打磨观点，不断激励和敦促我，并和我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让我能尽量清晰和直接地表达观点。我的经纪人吉姆·莱文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项目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坚持伴它度过各个成长阶段，并最终帮它找到了完美的归宿。

亚瑟·戈德瓦格是个智多星，也是最优秀的作家和编辑之一。他是我的绝佳参谋，总能使我的写作更清晰明了。夏洛塔·梅兰德是位统计学家，负责搭建本书中的关键指标和统计分析。出版社的布莱恩·迪斯特尔伯格的编辑保证本书内容紧凑、紧扣重点，凯西·斯特雷克弗斯对本书进行了仔细审稿，梅丽莎·韦罗内西高效完成了本书的最终制作。

我特别感谢马丁繁荣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包括那些已经离开研究所去追求更伟大事业的人，他们的研究给本书奠定了基础。凯伦·金作为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与组织从数据分析到地图、图表和表格的编辑、引用和构建的所有工作；伊莎贝尔·里奇和泰勒·布莱克负责制作地图并辅以数据分析；米歇尔·霍普古德负责整理图表；金·西尔克和伊恩·高梅利汇总源材料和参考资料；帕特里克·阿德勒、泰勒·布里奇斯和扎拉·马西森合作完成《拼布城市》那一章中的原始地图与分析。

马丁繁荣研究所是一个很棒的研究所，我来罗特曼学院就是因为罗杰·马丁。执行董事贾米森·斯蒂夫负责研究所的管理；瓦什·贝德纳是城市问题方面的关键人物，他负责维持项目正常运转、管理预算和建立团队文化；瓦莱里娅·斯拉多耶维奇-索拉和奎恩·戴维森负责研究所的日常运作；已故的乔·罗特曼和罗特曼家族为研究所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

我在组约大学城市实验室的同事史蒂文·佩德戈也是CCG（Creative Class Group）咨询公司的研究董事，他使我不断参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专业实践，帮我更加深入地理解本书讨论的问题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意义。CCG的拉赫曼·亚历山大高效支持我的各项活动，无论我走得多远，她都能保证我坚持下去按时完成工作。

过去几年，我在《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朋友阿利亚·本迪克斯、斯蒂芬妮·加洛克、萨拉·乔纳森、阿里安·马歇尔和安德鲁·斯莫尔协助我研究和发表在CityLab（城市实验室）网站上的帖子，其中许多帖子都成了某项新研究的起点，我后来又对它们进行了充实和拓展。

我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同事马克·罗森伯格和布莱恩·施里纳在迈阿密海滩城市工作室给我提供了一个很棒的工作室，在加拿大寒冷的冬休期我能去那里思考和写作。

还有很多人对本书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意见，我非常感谢他们，包括帕特里克·阿德勒、路易斯·贝当古、博伊德·科恩、吉姆-麦·卡特勒、扬·德林、梅勒妮·法斯克、约瑟·洛沃、罗伯特·曼杜卡、加布·梅特卡夫、塞斯·品克斯、亚伦·勒恩、乔纳森·罗思韦尔、罗伯·桑普森、帕特·夏基、丹·西尔弗、格雷格·斯潘塞和莱曼·斯通。

我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个大家庭，它给予我宽慰和快乐。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妻子拉娜，她是真正的自然之力，帮我打磨想法，告诉我它们听起来是否正确。她还照管我们的生意和生活琐事，让我能专注于研究项目。我的至爱用她无限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情丰富了我的每一天。我想把本书献给我们家庭的新成员，米拉·西蒙娜·佛罗里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美）理查德·佛罗里达著；吴楠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9.7
书名原文：The New Urban Crisis: How Our Cities Are Increasing Inequality, Deepening Segregation, and Failing the Middle Class—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ISBN 978-7-5217-0509-6
I . ①新… II . ①理… ②吴… III . ①中等资产阶级- 研究- 美国 IV . ① D77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2847号

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
著者：[美]理查德·佛罗里达
译者：吴楠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220千字
版次：2019年7月第1版
印次：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0509-6
定价：6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